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周恩来经济文选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出版说明

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长达二十六年。他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我国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这本文选集中反映了周恩来同志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思想和实践。

这本文选，收入了周恩来同志自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七五年关于经济方面的重要著作，共一百零八篇，多数是首次公开发表。

收入这本文选的著作，凡是公开发表过或有手稿的。都保持原貌，只作了个别字句和史实的订正；对讲话记录稿，作了文字整理，核对了史实和引文。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些著作，还作了题解和注释，题解放在各篇第一页下边，注释附在书末。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一九九二年九月

周恩来经济文选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1]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与旧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区别。

原则：

1．无产阶级领导的经济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经济；

2．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

3．以劳动大众为主附加自由资产阶级，还是以资产阶级为主附加劳动大众；

4．基本上计划经济，还是完全自由主义经济；

5．如果个人或少数人利益与大多数人不冲突时则大多数加少数，如果少数人或个人利益与大多数发生根本冲突时则抛弃少数而顾大多数。

工业与商业的区别。工业是生产的，商业则附属于工业，投机性大，必须区别二者，尤其要以是否于国计民生有利为标准。

金融斗争——国家银行与私人钱庄。什么是我们要提倡的保护的，什么是我们要反对的取消的，什么又是我们今天尚不能取消而于我们不利应暂时容忍而须加以限制的。

税收政策。区别超利润税、限制税、普通税、免税、减税及区别营业牌照、所得税及摊派包税的各种根据。

公营、私营与合作社三种经济。主要与次要，少数与多数，国家命脉所系或非国家命脉所系，于国计民生有科或不利。

国家权力如何运用。政权、法律、监狱、税收、管制、奖励、贷款、禁令、会计核算新观点。

新民主主义的合理组织与旧资本主义合理化。

工厂委员会与厂长负责制。

工会、党委的作用。

同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1]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的。

工业的科学管理还是后方机关制度。

工资制度还是供给制度。

生产观点还是救济观点。

工业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贫雇农路线。

技术进步还是安于落后。

政治条件是什么？老资格还是新资格。

向谁学习，学习什么？

---

[1] ①这是一个提纲。

恢复和发展主产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关键

①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今天在座的大多数同志是来自各个老解放区，少数同志是来自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天津、沈阳和南京等城市。在这个会场上就可以看出，我们是由城市与乡村这两种不同地区结合起来的。现在，我们应该很好地解决乡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这样才能更利于我们的工作。这也是青年团工作的前提。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也只有在今天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过去我们的解放区被敌人分割着，我们解放了乡村，敌人霸占着城市，在那种情形下，我们很少可能有很多的城市。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占据着城市和交通要道，后来国民党又占据着城市和交通要道。可是，现在的情况变了，我们由包围城市而改成进到城市，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结果。因此，如何把我们的工作重心从乡村移到城市，又转过来由：城市领导乡村，并使城乡很好地结合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时刻注意的问题。

从我们的工作历史发展上说，我们是从乡村来的，在广大的乡村有工作经验，对于中国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比较了解，曾经在土地改革[2]和自卫战争当中进行了很多工作。但是，今天我们进到了城市，城市中有广大：的工厂，要我们去参加领导生产，恢复与发展生产，城市交通与市政、学校也需要我们去参加整理。对于这个工作，我们只有少数的同志是熟悉的。因为过去我们是被压迫的，只能在一个岗位上、一个侧面、一个地方来反抗压迫者，但是今天我们变成了主人，要来管理城市，因此我们的工作方式就要改变。至于从乡村来的广大干部。就更不熟悉城市工作。所以，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同时还要联系乡村的问题。

不但在我们已经解放的地区是如此，而且在待解放“区也是如此。到待解放区首先要到什么地方？首先要到城市及交通要道，不是首先到乡村。固然我们刚过江要以广大的乡村作为桥头堡垒，然后前进，但是我们很快就要进城及占领交通要道，追击敌人，继续前进。因为走的是交通要道、大川河流，所以在前进当中，我们不能和过去一样了。过去是先占领乡村，然后包围城市、夺取城市。今天到了南方是先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道，然后再到乡村，就是先城市而后乡村，和以前的先乡村而后城市是反过来了。

这样，就使得我们整个的工作重心起了变化。因为有了这个变化，所以需要我们首先了解这个问题，认识中国的城乡关系为什么有距离，城市和乡村两方面的人为什么有不同的看法、想法与作风。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首先从历史上来看，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它们把中国的乡村和城市完全分开，划成为两个堡垒，城市是一套奴化、洋化措施，生活水准较高，而乡村就更加破产与落后。那样一隔离，就使得乡村变成了永远被它们搜刮的殖民地，城市变成了买办统治的商场。城市生活使得从乡村出来到城市念书或工作的孩子，不愿意回乡村去了，有很多知识分子宁愿在南京、上海卖烧

---

① 这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第二部分。

饼、油条，也不愿意回家种地。因为他们过不惯乡村生活了，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了，所以这就造成城市和乡村里的人的思想意识及生活习惯格格不入。进到城市以后冉回顾乡村，就嫌乡村脏、破、落后，再不愿意回去了。这样，就利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利于它们榨取原料，把一些人变成买：办、洋奴，来为它们服务。

这种情形，我们共产党人和青年团员是不能允许的。要改革，要变更这种情形。不错，我们过去深入乡村做了这个工作，可是我们今天进了城，就要改造城市，使城市和乡村接近。当然，这就不能使城市依然继续充当过去：帝国主义统治时期那一种不合理的买办商场。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城市再退化到乡村。生产的进化需要有城市集中的生产，不可能将城市像分土地一样，工人分厂，店员分店，学生分校，如果那样，工厂就不成其为工厂，商店就不成其为商店，学校也就不成其为学校了。我们当然不能退回去。城市的生产、文化应该保持，但是既不要继续帝国主义、买办官僚的生产和帝国主义、洋奴的文化，也不能退回到破产的农村生活那样。我们要维持和发展生产，要用很大的力量来整顿城市生产，而且要使城乡不对立。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两方面的人——从乡村到城市来的和原来在城市里的干部、团员应该注意.这个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不是我们说一说，懂得了城乡关系就能解决的，要随时照顾这两方面，随时联系这两方面。

我们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譬如，我们提倡乡村增产粮食、棉花和花生，那就必须在城市很好地组织它的出口和外销，使农民得到利益，增加农民的购买力，使他们能够购买城市的工业品。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很好地把城市生产发展起来，才能使城市工业品有销路和扩大再生产。那么，城市工业就要照顾到农村的需要，对外来的奢侈品我们要限制，只有对于关税贸易加以限制，才能制止奢侈品临市；并且组织合作社，使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和工人生产的工业品都有销路。这样，工农的利益就结合起来了，劳动知识分子也就可以在工厂、运输机关、经济机关里工作，贡献出自己的能力，使城乡关系搞得融洽了。

譬如生活水准，城市跟乡村就有一个距离。虽然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自卫战争，城市的生活水准也降低了，教授、职员的薪水也常常跟一般工人的薪水差不多，而工人又跟农民的收入接近，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城市的生活水准要比乡村高。我们从乡村来到城市，要注意到不使生活水准增得太高。因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很大的开支，所以我们在消耗方面不能开支大多。这就需要我们提倡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传统作风。这样，就可以使城市受到乡村朴素生活的影响，使乡村的朴素生活作风散布到城市。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是有希望的。比方解放军到了北平，街道上许多腐化的事情、许多装饰就减少了，这是好现象、可喜的事情。青年人在这方面要做模范，因为一般的青年人旧社会的习气较少，甚至于很少。我们要提倡养成朴素的作风，我们的党也好，政府也好，军队也好，机关也好，假设有铺张浪费的现象，我们很欢迎青年人来批评。过去不是有《轻骑队》[3]的刊物吗？当然，他们散布一些不正确的言论是不好的。但是，他们善于积极地批评，这是应该欢迎的。你们将来要办团报，团报要在这一方面提出，不要认为这些事情是小事。今后我们要缩减消耗，把资财用到发展生产上去，使城市生活跟乡村生活的距离不致相差太远。这就需要我们青年养成朴素作风，来维持和推行这件事情。现在我们应该有这种精神准备。

今后的建设当中，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们的物质生活还不应该过于享受。在这一点上，我们老一代的人，非常希望青年一代的同志来做模范、做先锋。我相信，在这种精神之下，便于我们解决城乡关系的问题，使共同的力量用在生产上。有些时候，同样的一种工作，青年人做起来就可以节省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在学校里、工厂里和农村里工作的青年团的同志们，可以用极少的经费办好多的事情。要勤俭朴素，还要活泼愉快，并不是因为勤俭朴素就变成什么事情也不管，要节省就什么活动也不搞了。青年人可以在最少消耗的情况下成就最大的事情，把节省下来的钱用在生产上、学习上及各种工作上。他们还可以创造发明，因为青年人富有朝气，可以抓住很小的事情加以研究，能够接受新鲜事物。这些都是青年的优点，今后要发扬起来。在城乡关系上来说，需要青年来改革城市中的奢侈生活及铺张作风，养成一种朴素、勤俭、活泼的作风。这样，就会使城乡之间的关系搞得更好。

我们解决城乡关系要依靠什么人呢？在城市，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因为它是先进的阶级，它能够创造社会，创造出新的力量来，它能够使全中国和全世界都走向社会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依靠工人阶级来改造城市。从整体来说，就是要依靠劳动群众——乡村的农民、城市的工人和劳动知识分子。三者结合起来解决城市和乡村的生产问题。

我们依靠劳动群众，并不是说我们对工作不管，因为那样就会偏在一方面，事情还是做不好的。譬如，毛主席最近给大家讲的四面八方的问题：工人方面要解决劳资问题，要劳资两利；解决公家问题要照顾到私人，公私兼顾；刚才所讲的城乡关系：还有内外关系。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个本。解决劳资问题，就是为了工人得利，同时也要使资本家生产有利润。假设资本家垮了台，工人也就失了业，这样，对工人也不利，为了工人也要解决资本家方面的问题。为了私人，要解决公家的问题；为了公家，也要使私人得利，使公家雇的雇员能维持生活，这样，才能使公家的事情做得好。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但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劳动群众。

我们到新区也是如此，虽然先到城市，但是还要走向乡村，所以，恢复和发展生产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关键。我希望青年同志除了参加人民解放军之外，就要广泛地参加生产劳动，要进行直接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成为劳动知识分子。只有生产劳动才能把城乡关系解决得好。城市的工业发展了，才有力量领导乡村，我们的政治任务才能实现。这个任务对于青年来说，也是很艰巨的。为什么呢？因为提到生产，就联系到了我们中伺今天的经济。中国今天的经济是非常落后的，按抗战前数字，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这个百分比就说明了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是一个小生产个体经济的国家。因为工业生产仅仅占十分之一，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来发展生产，就需要很好地组织力量。

要想使我们中国现在的几种经济形态——国营企业、私人企业、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有组织地前进，就需要我们很好地进行组织工作。我们青年团员应该学习生产技能，首先要懂得这几种经济形态。我们站在一个劳动者的立场上，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国家企业中、私人企业中或合作社中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呢？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考虑。谈到生产，就有很多困难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学习。学习对青年来说，是有有利条件的，因为青年学习文化和技术比成年人或老年人容易得多；因为青年是后一代，对于生产问题，应该有更大的学习

兴趣。生产的关键就是要了解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四面八方的问题——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城乡关系和内外关系。
要解决生产问题，就要了解这个政策，用你们的知识搞好生产，发展生产。现在发展生产的任务，在一天一天地增加着它的比重。一旦全国胜利了，不但工厂、农村、学校、机关要为生产而努力，就是人民解放军，将来也要为生产而努力。人民解放军在今天是战斗部队、工作部队，将来一样地要参加生产建设，成为生产部队。因为人民解放军原来就是一支集中训练的部队，所以在他们一旦转入到：生产建设中，还会一样地有力量、有创造。中国的经济建设，从人力上来看是有很大希望的，因为广大人民是勤劳的，他们已经勇敢地战胜了敌人，他们还可以在经济建设当中使生产获得发展。在这方面就需要青年积极努力地从各方面去学习，提高自己的本事。这样来使二中全会[4]在这一方面的指示得到有力的拥护和实现。

恢复主产，建设中国

①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开幕了。刚才朱总司令讲了工会工作的许多问题，大家在会议中还要讨论许多具体问题，我在这方面就不多说了。我把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工作重心讲一讲。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但是还没有完全胜利；我们已经开始建设，但是还没有结束战争。革命还在向着彻底胜利前进。我们现在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渡的发展的形势当中！我们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打到台湾去，打到海南岛去，打到昆明去，打到新疆去。我们要赶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同帝国主义封锁作斗争，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变为自力更生的独立的中国经济。我们的一切工作，首先要为着把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工会工作也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主要地位。

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工会动员全体工人阶级的口号是：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现在我们接收的生产机构这么大，这么多，要把生产恢复起来，要把经济调整好，是个艰巨的工作。原封不动地接收是比较容易的，天津、北平、南京、上海、武汉，一个城市比一个城市接收得好。进一步来管理就难得多。而且还要改革旧制度。中国的半殖民地经济结构，是服从于帝国主义的意志的，现在要把它改变过来。我们要有信心地稳步地重新组织中国经济结构。当前的问题，首先是城市与乡村的经济不协调，加上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封锁。过去，城市工厂主要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原料和运输来生产的，像上海的纱厂，主要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棉花纺成纱织成布，用外国的运输工具运到外国市场去推销，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今天不同了，条件完全变了，也应该变了，应该依靠自己的原料和运输来生产了。但经济结构还是原样，是畸形的，不合理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困难。第二是我们接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冗员很多，原来敌伪的一套人员再加上国民党的人员组成官僚主义的管理机构，人力浪费，开支庞大。这也给我们添了很大的负担。第三是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的极大破产，没办法给城市工业提供原料。拿棉花生产来说，凡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棉田都减产，因为有美棉的倾销。其他原料也是这样。所以城市解放以后，我们会看到原料缺乏，生产降低，销路减少，运输困难，不少人失业。这种情况在一定时期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要认识，这种困难和革命失败时期的困难不同，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困难也不同，革命失败时期的困难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我们还能转败为胜。帝国主义的经济困难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制度造成的，无法克服。我们的困难是革命胜利中所遇到的，是以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给我们遗留下来的，而不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带来的。正是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我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农村解放和进行土地改革[2]以后，只要经过一年时间，农业生产就能增加。这种经验在华北、东北、西

---

① 这是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北都有过。东北去年全部解放，今年就计划增产粮食一百五十万吨，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华北今年春天全部解放，明年就可以增产。接着，华东、华中、华南都会这样发展。而且，现在我们的战争进行得很顺利，农村破坏很少，第一步先做到不减产，第二步就可以增产。农业生产提高了，原料增加了，工业生产就更有基础。第二是恢复交通运输。首要的是恢复铁路。中国两万多公里铁路，今年要恢复百分之八十，明年不仅要恢复余下的百分之二十，而且还要有新的发展。我们要恢复生产，必须靠交通运输畅通。比如淮南的铁道恢复了，就可以使淮南的煤产量增加，保证上海工业的恢复。将来平汉、粤汉都要这样地恢复。此外就是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先要为铁路制造钢轨、火车头、车厢、车皮：还要增产农业工具，如水车等，使农村得到帮助。这些，都是我们恢复生产急需要做的，当然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这些方面。

所以从全局来看，我们的事业是发展的。在局部，譬如上海，或者在某一方面，生产确实是减少了一些。大城市的那种殖民地商业，外国货充斥的商业，是会少一些的：有些买卖是会关闭一些的。特别是那些人民不需要的消费品的制造厂和商店是要关闭的。由于这些生产的减少，就会有一部分工人失业。但是，这只是生产发展中的减产，商业发展中的萧条，交通恢复中的停滞，工作增加中的失业。这是全局与局部、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

我们的革命要彻底胜利，要把帝国主义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统统去掉，必然会遇到他们留给我们的困难，我们要准备迎接和克服这些困难。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发扬长期在农村中建立起来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现在到了一个新环境，要精兵简政，节衣缩食。接收一些机关，不要把官僚机构的坏东西也接收下来，而是要加以改造。我们现在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旧衣裳还是要穿，不要向剥削阶级造成的奢侈腐化的生活看齐，要向我们历来的艰苦朴素的生活看齐。这样才能节省国家的经费，使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生产的东西，首先用到革命当中、战争当中去。这样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增加生产，克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困难。这是我们在恢复生产的工作中对于我们工人阶级的一个号召，也是对于我们人民的一个号召。

我们的党在农村中依靠农民，领导他们进行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三年的解放战争，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在人力上，农民单是送自己的子弟、丈夫参军，先后加起来就有七百多万人。还要有多少民工支前！还要有多少民兵打游击战！在公粮的负担上，每一个农民每年平均收入大概是四百斤小米，要拿出八十斤给公家，这就是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现在到了城市，我们的开支更大了。譬如上海、天津、北平三个大城市，有一千万人口，生产还没有恢复，我们要支出多少人民券？这些支出加在谁身上？还是加在我们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身上了。因此，我们城市工作的同志要想到农民。我们工人阶级今天也要负担同样的辛苦，起到我们应该起的作用。

我们工人阶级要参加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工作。全国总工会和各地工会都要派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5]，这样就参加了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不但工会的代表，而且我们革命的职员，从事革命工作几十年了，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代表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也要来领导全国政权的建设工作。现在各个地方也正在建设地方的人民政权，工人阶级要在其中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还要参加今后的国防建设。过去，我们是从游击战发

展到正规战，把敌人的武器缴获过来，装备自己，消灭敌人。今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武器装备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生产，这就需要我们工人阶级作出更大的努力。工人阶级还要参加文化建设。总之，我们工人阶级要参加各种建设工作，而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只要我们有步骤有计划有组织地把生产恢复趄来，发展起来，我们就有把握建设新中国。

最后，讲一讲团结问题。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我们要团结起来。有四个方面的团结：

首先是我们工人阶级本身要团结起来。据说现在有组织的工人已经有一百万以上，如果把全国一切工人、职员、手工业工人统统组织起来，把农村的农业工人也组织起来，会达到一千万以上。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教育工人的地方，是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机构，也是代表工人阶级来参加领导和参加各种建设的组织。工人阶级团结不仅要看到工人中先进的部分，还要看到落后的和中间的部分。对于落后的和中间的部分，我们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团结在一起，领导他们向前进，而不能搞关门主义，挑剔他们，冷淡他们，排斥他们。我们要有明确的团结全国工人阶级的认识，这样工人阶级的力量才是伟大的，才能担负起刚才所说的任务。

第二是公营企业中工人与职员要团结起来。工人和职员都是工人阶级，他们有的是处在管理的地位，有的是直接生产的体力劳动者，但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对立。以前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工厂，工人对管理者有对立、反抗、斗争的情绪那是必然的。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要把过去旧的对立的观念和态度改变为新的团结的观念和态度。实现这种团结的最好的机构就是工厂管理委员会。我们的工厂一切管理人员，不要把旧的官僚主义那一套拿过来，要实行民主，工人代表和管理人员、工程师在一起，民主地具体地来讨论工厂中的一切问题，如关于生产的方针、计划等等，同时要给厂长以最后决定权。有民主，有集中，全体团结起来，才能把生产搞好。

第三是在私人企业中我们要团结民族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愿意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束缚来建设中国的企业，所以他们还有进步性和建设性；同时他们又是软弱的、动摇的，并且有投机破坏性，因为过去他们只有投机才能生存。今天应该把这个投机破坏性去掉，这就需要斗争；同时要承认他们的进步性，鼓励他们的建设性，这样才能够团结他们。要实现劳资两利，中心环节是要订立各行各业的集体合同，解决各行各业的劳资问题，否则两方面的斗争就不能限制，弄不好罢工也可能发生，生产就要受到破坏。订立集体合同，双方就可以安心生产了。

第四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有了这个团结，才能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争冒险。中国革命的胜利得到了世界工人阶级的欢迎和拥护，更增加了整个世界和平的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够实现我们的一切任务！

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

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诸位同志：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各部委分别召开了全国性的会议，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这是必要的。各部委工作的总的方针在《共同纲领》[6]中都已经规定了，可是怎样使这些方针具体化，怎样贯彻下去，就需要召开一些业务会议来解决。各部委都是草创，不可能立刻掌握全面情况，也需要通过开会或者去各地调查来了解。

诸位这次来北京开会，除了讨论本部门的业务以外，有权要求了解全面的政策，了解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总的方针。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知道本部门的业务同总的方针怎样配合，才能有整体的观念。不然，你们业务的进行就会是孤立的、迷失方向的，成为盲目的工作。盲目不是科学的态度，不能建设新国家。我今天对同志们谈话，目的就在于使大家有个整体观念。今天要谈的是总的方面的问题。我想，你们不仅对中央，就是在地方上，也有权要求负责同志在一定时期向你们做这样的报告。有人说，这是国家大事，要保守秘密，不能随便告诉别人。国家大事中有秘密的，也有不秘密的，在秘密的范围内也还要区别对待。我认为国家大事必须与闻，应该使每个人有与闻国家大事的习惯。也有人说，工作忙，完成工作任务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与闻国家大事。这是旧社会里公务员办公事的态度。新中国的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国家应有责任感，这样才能涌现出成千成万具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人员。

按照刚才所说的要求，我下面讲两个问题。第一，国家财经计划问题。讲财经计划的目的在于给大家一个整体观念。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财经计划就体现了在这种形势下政府采取的一一些政策。比如，从国家财经计划中可以看出在总的安排上是军事为主还是建设为主，在生产上是工业为主还是农业为主，也可以看出政府在文教、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第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问题。处理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也是工作问题。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看出工作的重点所在。

国家财经计划问题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的一九五〇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是个一年的计划，为什么只订一年的计划呢？因为现在还处在战争状态中，成都附近、西藏、台湾、海南岛等地还没有解放。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制定出一个几年的计划。就是这一年的计划也只是个大体的、不很准确的，还要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才能准确。要求一下子订出一个准确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不实际的。在：中国此时此地，只能做到有个这样大体的计划，这倒是种学的，合理的。就是你们的业务计划现在也只能如此。

全国财经计划是根据什么观点、什么理由制定的呢？我提出四点来讲。

（一）承受负担。为了全国的胜利，要求人民承受必要的负担。我把这

---

① 这是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

种负担叫做胜利负担。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只剩下成都附近以及西藏、台湾、海南、岛等地尚待解放。只有这些地方解放了，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因此，还要有军事上的准备，不仅要有陆军的而且要有海军、空军的准备。这样，军费在财政支出上仍要占很大的比重。军队的人数也要增加。现在是四百七十万人，因为要把被我门俘虏或者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包下来，估计明年最高峰会达到五百五十万人。大家知道，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一年，被我们俘虏或者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都被我们包下来了。北京解放后，我们曾把几百个国民党军官遣送回家，但是绥远[7]解放以后，又碰到了他们。现在对国民党的官兵已经再没有地方送了。假如不管他们，就会影响社会治安，所以非把他们包下来不可。武的包下来，文的也要包下来。前些时候上海实行精兵简政，裁减人员，闹得上海、南京都不安，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是个重要的问题。根据他们的要求，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把他们全部包下来了。这样，全国公教人员要从现在的二百万增加到三百五十万。文武加起来，就是九百万。

靠公家吃饭的人增加到这样多，是要由人民来负担的，这是件大事。但这九百万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对国家的生产建设是有利的。要告诉人民，这是胜利的负担，是推不开的。包下来的几百万人并不是没有用处的，要下决心使他们变成生产的力量。我们这样说是有把握的，在抗日的时候就实行过这种方针，现在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这样做了。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生产有个意见：首先进行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还可以搞工业生产、兵工生产等。我们相信，这样做，两三年后就会有很大的成绩。目前，公教人员是不需要三百五十万人的。我们要进行准备，使他们除做好业务工作外还参加生产和学习，成为既适应工作需要又有劳动观点和科学知识的人，成为新中国所需要的革命的工作人员。各级政府都要做好这项工作。现在的政府工作人员大多，这些人将来不一定都在机关工作，一部分人可以转到企业中去。

（二）恢复生产。国家明年的负担很大，不抓生产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年产量是二千八百亿斤，今年的产量比那时大概减少了百分之二十。明年计划增产一百亿斤。但距二千八百亿斤还很远。棉花生产的情况也是这样。整个说来，当前各方面首先是需要恢复，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毛泽东同志说过，三年五年来恢复，十年八年便发展。如果我们能在三五年内达到或超过战前水平，那就很好了。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轻工业的原料，输出的产品，现在绝大部分都要依靠农业。国家计划中的经费，除喳军事开支和行政开支，主要的是用于恢复生产。只有生产恢复以后，才能使几百万人转到企业中去。

（三）开源节流。这虽是老生常谈，但还是有道理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开支才有可能增加，赤字也才能减少。我们开源主要是依靠人民：一是来自农村的负担；二是来自城市的负担；三是国家企业的收入；四是预支，即借债。

先谈农村负担。过去我们的老解放区负担相当重，负担的时间也相当长，从抗日战争开始到现在，十二年来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目前，全国性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了，那么是不是可以减少老解放区的负担呢？提出这个要求

是合理的，但一时还不能实现。因为战争还在进行，新解放区的一切还没有组织好，土改[2]尚未进行，税收工作也没有就绪，所以还是老解放区要负担得多一些，不能减少。我们从抗战以来的经验中研究出一个比例：农民的负担是东北高、西北低、华北适中，农村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约四百斤粮食，交给公家八十斤，按军队每人每年开支合四千斤粮食计算，每一百个农民可以负担两个公家人。如果合乎这个比例就正好，超过就困难些。按照这个比例，我们支持了十二年。将来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农民大概还要拿出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作为负担。这个事实也可以说明中国农民的伟大。

城市中的负担是税收。从前几乎全部负担靠农村，现在形势变了，也要靠城市，也要由工商业来负担。但开始的时候不能把城市的负担提得很高夕要比农村少一点。现在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点四，城市负担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九，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多还是要转嫁到农民身上的。要求城市在目前负担很大是不对的，但城市工作人员要说服工商业家缴纳应该缴纳的负担。

国家企业收入占财政收入百分之十七点一。

以上三种收入还不够，还会有赤字，这就要发公债。一九五〇年整个预算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二是靠各种收入，百分之七靠公债，其他靠发行货币。这样就可以度过明年在胜利中出现的困难。是不是可以借外债呢？我们需要外援。友邦的援助我们是欢迎的，因为它是真诚的。但中国的建设主要应靠自力更生。

开支方面，国家财经计划的安排是节约的。

第一，在整个预算中，军事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陆军开支每人每年仅合四千斤粮食，总共二百一十亿斤。建设海军、空军的费用除外。

第二，行政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我们的行政开支是不大的，实行供给制[8]的每人每年平均一千八百斤至二千斤粮食，实行薪金制的每人每年平均四千二百斤粮食。现在还不能把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原来是薪金制的也不能改为供给制。两者比较，收入是不平等的，但我们不能不要求实行供给制的同志多忍耐些，政府知道他们的家庭困难，也正在设法解决一些必须解决的困难。[

第三，经济建设和文教费用约占百分之三十。一是国营企业投资，二是文教建设，三是地方建设。其中第一项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九。

第四，总预备费约占百分之十，用于临时遇到的事项，如救灾等。

从预算的分配来看，开支主要的还是用于支援战争，解放全中国，其次是用于建设，恢复生产。财政支出总共不到六百亿斤粮食，这说明我们的开支是节约的，生活水平是低的。中华民族有勤劳勇敢的传统，我们党又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开始建设新中国的时候，我们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保持和发扬这种传统。

（四）掌握政策。我们一定要在上面说的总的方向下掌握政策，进行工作，这样才能避免各部门闹独立性。我们要重视重工业，但决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的工业。重工业中，钢铁业是占第一位的，但它也不是重工业的全部。农业方面，要水利与农业生产并重，水利要配合农业。交通方面，铁路的恢复最重要，恢复得也最快，预定今年恢复到一万八千公里，现已超额两千公里，明年可以全部恢复，并可新建一些。公路、航运等的恢复放在其次。

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

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这样才能不犯本位主义，不单纯依赖国家，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成绩。

几种关系问题

现在讲六种关系，即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

（一）城乡关系。

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一方面中国革命要由工人阶级领导；另一方面，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又必须依靠农民阶级和广大乡村。要彻底解放城市，必须依靠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组织力量，积蓄力量，发动武装斗争，以乡村包围城市，一块一块地夺取敌人的阵地，最后解放城市；回过来，再以城市领导乡村，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建设。对我国城乡关系的这种辩证的处理，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革命问题的一个最成功的范例。

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上，今天我们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从我国国民经济的构成来说，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现代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乡村比重大，城市比重小，但并不能认为因此就可以取消或减弱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城市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刺激乡村的农业生产，城市以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供应保证和促进乡村的农业生产。

既然是集中的城市领导分散的乡村、工业领导农业，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依靠农业这个基础并从而忽视乡村呢？不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都是辩证的两方面，决不能取消或忽视任何一方面。我们强调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决不是忽视广大的农业生产对发展工业的作用。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任务首先要恢复农业生产，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明年计划增产一百亿斤粮食，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就可以恢复到年产二千八百亿斤的战前最高水平。这样就可以提高四忆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他们对工业品的需要和对工业原料的供应，也就可以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今年全国棉花产量为八百多万担，明年计划增加到一千三百万担。如果没有这一千三百万担棉花，一百万纱锭就得停转。如果没有粮食，城市人民就不能生活下去。京、津、沪三地一千万人口的吃穿都要靠乡村来供应。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

在城乡关系问题上，必须防止两种偏向。从老解放区乡村来的干部，有一套很好的农村生产经验，懂得如何组织农业劳动，但不能因此就说农业是重心而忽视工业，否认或者忽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不防止与纠正这种偏向，就会发生错误。农业不能作为重心，它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必须把城市工业组织起来发挥领导作用，才能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党的七届二中全会[4]决定，今后党的工作的重心应该转向城市，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城市，恢复与发展工业以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要防止另一种偏向，就是在城市中工作的同志，不能因工业领导农业、城

市领导乡村而忽视农业和乡村。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农业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工业生产要顾到农村的需要。如修铁路，首先要想到这条铁路在城乡交流、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交换中所能起的作用。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

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这个辩证的正确的方针是毛泽东思想在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上的运用。

（二）内外关系。

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小国应该这样，有四忆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更应该这样。毫无疑问，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向美帝国主义屈服。我们不但要经受这些困难，并且，正因为封锁和轰炸，逼迫着我们多想些办法，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一百零九年的斗争，牺牲了多少仁人志士，经过了多少挫折和失败，中国人民终于胜利了。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要迎接困难，“多难兴邦”。

帝国主义不同我们做买卖并不可怕。过去他们侵略我们，使我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生活过不下去了，这才闹革命。现在我们当然不能依靠他们。再说中国过去同他们做买卖并不多，抗日战争以前每年只有几亿元，抗战时期每年才不过几千万元。现在同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做买卖，对此我们不拒绝，也不强求。要打破依赖帝国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一百多年来形成的，在一些人中间是根深蒂固的。旧中国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是依赖帝国主义的；不但经济上受剥削，思想上也受毒化，这是很危险的。现在要清算、消除这些毒素。不要依靠他们，也不要怕他们，这样，自力更生的基础才会巩固。我们需要的物资大部分可以自己解决，一部分可以从朋友那里解决，决不要依靠敌人。此外，我们的物资是可以找到有利的市场的。我们明年增产一百亿斤粮食，四百多万担棉花。粮食增产了，可以增加出口，换取外汇；棉花增产了，可以减少进口，少花外汇。我们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这种真正的帮助，有助于我们自力更生。

（三）工商关系。

工业和商业比较，当然是以工业为主。那么，商业占多数的城市是不是要以商业为主呢？不，也要以发展工业为主。国家方面主要是经营重工业。我们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是以服务于工农业品的流通、服务于人民为主的，必须防止投机现象。对私人资本方面，要提倡、鼓励和帮助它发展工业生产。对私营商业，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给予帮助。解放前夕，城市的生产几乎都破坏了，只剩下商业投机，这种情况要改变过来。

（四）公私关系。

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需要私人资本的帮助和合作。除了国营企业外，还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在《共同纲领》中写上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公私兼顾”的方针。私人资本的问题，在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是必须解决的。

在公私关系上应该确定以公为主。国营经济应该是领导的成分。虽然它在国家的经济构成中现在只占百分之五，但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的

领导能够保证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凡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而不应该由私人操纵的企业都要归国家经营。国民党政府曾利用官僚资本垄断国家的经济。这种官僚资本不但奴役人民而且也窒息私营经济的发展，应该将它没收。但是另一方面，官僚资本垄断使得许多大的企业不断地集中，给我们的国家准备了集中的生产组织。这样，旧社会中的某些事物一旦到了人民的手中，便立刻变成了积极的力量。为了使国营经济的比重不断地增加和保证它的领导，政府肥百分之二十三点九的预算支出用在国营经济上。

既然以公为主，是不是就不管私人企业了呢？不，当然要管的。现在整个工业中有一半是属于私人经营的，它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在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是会帮助它的。国营企业应该起带头作用，使私人企业对我国的生产发展有利。我们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存在，但是要引导它不走旧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

（五）劳资关系。

这个问题在国营企业中不存在，在私人企业中则是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确定了“劳资两利”的方针。但这并不是把劳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在劳资关系上，我们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于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利润。我们对于私人资本采取限制政策，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要鼓励它经营，对有害的则要禁止。我们对于私人资本取得利润也有两个条件：第一，不允许有非法的利润，只许可有合法的利润；第二，不能有过分的利润，只能有合理的利润。工人不应该为了眼前的利益要求过高的工资，那样会使资方无法经营而企业倒闭，结果会弄得自己失业。我们不要为一时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工人的劳动是应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但现在一般还得工作八个多小时到十个小时。工人的生活水准应该伺中国的现有情况相适应。今天的主要问题，是先做到不失业、不饥饿。劳动条件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只能逐步改善。工人阶级应该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努力生产。我们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护劳动和限制资本。

（六）上下关系。

这里说的上下关系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集中和统一，但也不允许各自力政。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据。要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这是《共同纲领》中确定了的。比如钢铁生产，就要在工业投资、矿石生产和销路等方面对各产钢地区进行统一安排。棉花生产计划的制定，也得看各地的条件。航务计划也得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要犯本位主义，不要妨害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领导上抓得很紧，在战役的组织和战术的运用上就交给下面去办，因为他们最了解具体情况，只有充分发挥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打胜仗。打仗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

上述六种关系，各个部门都会遇到，尤其是生产部伺。必须正确解决这六种关系，才不会犯本位主义，才能有全局观念，才能使本部门的生产在统一计

划中占有适当的地位，才能使各方面的计划掌握重心，准确地加以实施。

认真向专家学本事

①

（一九五〇年四月三日）

专家协定[9]，可以不必再发公报。关于专家待遇增加经费事，已在政务会议报告过，拟在政府委员会开会时再行提及，使大家认识既请专家便要准备花钱，因此，就必须请好的、必要的，一改过去多请、滥请而又想讨便宜的作风；同时，也逼得请专家的部门赶快在一两年内向专家学好本事，免得专家走了仍然不能自立。为着花钱学乖，学本事，故协定一经签字，我们就须认真履行，认真向专家学本事；同时，也有责任帮助专家了解中国情况，了解我们政策，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工作，并解决他们生活困难，不使他们来中国一回，反而印象不佳。这就是我们情专家的方针。

---

①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电报的第二部分。

平衡收支，稳定物价

①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在估计平衡收支、稳定物价上，我这几天注意研究银根[10]吃紧、物价下跌的原因，觉得还是要将毛主席所说开始好转与尚非基本好转加以区别。毛主席说东北基本好转原因在于土改[2]、工业恢复及生产支出加大。而关内在一二年内尚不可能具备这三个条件：土改要两三年，工业恢复更慢些，现在生产支出只占预算百分之十三点：九，而消费占比例极大。东北生产开支如连上解款在内占预算百分之七十以上。因此，关内收支平衡、物价稳定的基础尚不巩固，陈云[11]所顾虑的再次波动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目前物价下跌（四月份提不上来），银根紧缩（四月份发行约一万一千亿[12]完全未发出去，银行存款据南汉宸[13]昨晚讲超过五万亿），生产萎缩（京津也发生商店卖不出货倒闭的现象），可能在夏收后好一点，秋收后更好一点，但波动（物价下跌也是波动，非健稳）仍会有的，故毛主席关于今后数年内都会有困难的估计是很必要的。

① 这是研究银根吃紧、物价下跌原因时写的一段话。

林业要统一管理

①

（一九五〇年八月六日）

现在林垦部[14]经过李范五[15]前往调查，认为森林损害甚大，如不很好整顿，东北十年后（每年砍伐四百万立方米），东蒙二十五年后（每年砍伐四十万立方米），便将无好木可伐，而森林培植至少须八十年为一期。去年东北、东蒙森林失火损失四百万立方米（等于东北采伐数目），今年大火损失二百万立方米。故从林政、林业观点来看，保林、育林、伐林如没有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只从地方经营和收入着眼，其害与水利之不统一相等，而时间性更过之。

① 这是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信的节录。

建设与团结

①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诸位代表，诸位同志：

我很高兴今天能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去年的筹备会上，我曾经和在座的一些同志谈过中国科学工作者的任务与前途问题。现在我们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成立了科学工作者自己的领导机构，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对于自然科学，我是门外汉，谈不到贡献什么意见，主要应该向诸位学习。不过自然科学工作者也会关心另外方面的一些问题，如自然科学工作的环境，自然科学工作与各方面工作的联系和关系，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岗位和前途等等。现在我就这方面的问题讲一些意见，题目是“建设与团结”。

首先讲一讲建设问题。

先从中国自然科学家本身说起。依我看，一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认识。他们在事业上下功夫、费精神，目的是为人类扫除生存中的障碍，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和发展精神生活。学医的想把病人治好，学农的想把农作物病虫害消灭，学工的想把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搞得更好，学理的为着增加人类的科学知识，使世界文化水平更加提高。一般他说，科学家是不愿意利用科学知识来毒害人类的。当然，世界上也有一些科学家不是这样，如日本的某些细菌学家研究细菌战争，做危害人类的事。但这只是极少数，而且有的是被迫这样做的，只有更少更少的人才是自觉地去做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科学家，从他们本身学习和工作的目的来说，都是为着造福于人类的。

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呢？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条件团结科学家们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相信科学家们能够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善良的，在旧中国他们被压迫了多少年，今天已经和人民一道翻身了。

自从海禁开放[16]以后，西方的文化科学进入中国。可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究竟得到多少好处？又受到多少害处？中国人自己能够掌握科学来为人民谋幸福吗？在反动政府统治下，不论是清朝、北洋军阀[17]或国民党反动派，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虽然有少数科学工作者埋头从事建设工作，如铁路、水利、工程建设都有中国的工程师自己计划、设计的，不能说中国的科学家没有个别的人获得成就，但总的来说，成就是很少的。他们的工作时常遭到反动统治者的破坏。如李仪祉[18]先生在关中兴修水利，对关中的农业尤其是棉田有很大好处，但是后来孔祥熙[19]压低棉价，大大损害了棉农利益，使他们无法继续经营棉田，水利也因此受到影响。举此一端，可见全貌。

反动政府的摧残和破坏是国内的因素，而更大的破坏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站在中国人民头上，利用科学作为剥削、压迫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手段，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帝国主义者控制了我们的经济，中国的工业生产很多是为帝国主义者服务的，农业原料也被他们掠夺了去，加上水灾旱灾连年不断，哪里谈得到真正的建设。尤其是抗日战争以来，

---

① 这是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更是数不胜数。例如，花园口的决堤[20]造成了极大灾难，创伤至今未能平复。去年淮河有水灾，今年又有水灾，直接原因就是蒋介石在花园口决堤，黄河的泥沙流入淮河，使淮河的河床增高，洪泽湖的水位高出周围的田地，因此经常发生水灾。

由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破坏，旧中国不能进行建设，科学也很难在旧中国的土壤上生长，科学家没有办法贡献自己的能力。但是有良心的中国科学家并没有放弃建设中国的志愿，不少人为中国的前途和中国的科学发展摸索道路，寻求真理。然而他们并没有成功，他们一直受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迫，理想不能实现，计划不能实行，工作不能开展，甚至连生活也陷入困境。这部科学家的苦难史，诸位比我了解得不知要深级多少倍。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中国人民翻了身，这就给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无限广阔的康庄大道。去年，人民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6]规定了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也就是规定了中国科学家的奋斗目标。这个方向和目标是很清楚的，这正是近百年来中国科学家所寻求的。

方向和目标是确定了，但道路是要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诸位都明白，我们所接收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要在这个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于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必须先打好基础才行。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接收了什么遗产呢？他们留给我们什么科学器材、设备和资料呢？太少了。这并不是说诸位科学家不努力，而是反动派不让我们做，不让我们有机会勘测地下的富源，不让我们有机会纪录中国人民在历久上的功绩。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目前我们的财政经济状况已开始好转，但要达到基本好转还需要经过三五年困难阶段，也就是恢复、整顿、调查和有重点地建设阶段，然后才能在全国规模上进行建设。

在国家建设计划中，站在科学家的岗位上，我们开始做些什么呢？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

农业方面。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中国本不是缺粮的国家，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现在进行的土改[2]，就是要使农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桎梏中解放出来。这项工作需要两年左右时间。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华北的永定河，实际上是“无定”的，清朝的皇帝封它为“永定”，它还是时常泛滥。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么用？国民党统治时，有一个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得不到支持，因为反动派不需要做水利工作，反动政府不是为人民办事的。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要开展这一工作，把全国的水利专家都集中起来也不够。兴修水利，联系到动力，更需要有长远的计划。

第二，修筑铁路。以中国之大，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与工业先进的国家不能相比。这件事也必须在恢复工作中大力来做。铁路交通首先要保证东北的粮食能够运出，调剂关内缺粮的地区。

第三，制造化学肥料。这一点侯德榜[21]先生很了解。我们要大力发展化学肥料工业，不然就要从外国进口，消耗外汇。

不说旁的事情，单说这几件大事，都需要科学家的努力。现有的专家不是大多而是不够。代表中的萨福均[22]先生，曾和詹天佑[23]先生同时修粤汉铁路，他知道中国的铁道专家也是很少的。

讲到林业，中国森林的面积，远不够一个森林国家的标准。基础大小，林政不修，森林采伐不按科学的方法，这都需要大力整顿。如东北森林地区，据调查，如果林业工作不加以改进，快则十年，慢则二十五年，就会完全毁了。不科学的采伐，没有护林和育林，森林地带也会变成像西北那样的荒山秃岭。我们需要林业专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工业方面。据初步统计，我国有六万多台机床。其中有的没有转动，有的生产安排不当，如工厂距原料产地太远、产品并非急需等。这些机床的调整与修复，也是需要大力进行的工作。从国防观点来看，工厂不能都放在沿海。过去许多工厂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现在要为人民利益服务，就要面广广大的内地农村。联系到动力问题，愈到内地，动力愈不够，这就需要勘测燃料资源。大家想一想，需要有多少科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医疗卫生方面。全国卫生会议提出普及医疗事业的问题，希望在三五年内使每一个县都有医院，每一个区都有卫生所。这就得增加九万多名医生，数十万名护士和助产士。这要用三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现在我国的中医人数没有统计，西医人数估计有三万上下，医生的人数是太少了。

国防工业方面。制造兵器、飞机等都需要专家，也感到人才不够。

总起来说，各种建设从恢复、整顿和调查开始，已经看出现有的专家是不够的。我去年说过，只要整理工作有了头绪，就会感到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大多而是太少。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今天我还不能把全国的建设计划向各位报告。全盘的计划要等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才能决定。不过现在可以肯定，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岗位是有的，他们的工作是国家急需的，问题是需要时间来合理调整。现在对科学家人数的统计很不完备，我很高兴这次会议成立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组织。有了组织，就有力量，就给我们以机会，从调查统计全国科学家人数着手开始工作。我正式提议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首先进行这个工作，政府愿给以一切物质上的帮助。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到底有多少？他们的水准、专长、职业、资历怎样？要做一个全盘的调查。这样，我们就可能更好地把他们安排在适当的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现在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不清楚，可能埋没了许多人才。调查统计对政府从事建设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调查统计之后，虽然不能人人马上都有适合自己能力和志愿的岗位，但至少可以向这个方向努力。今天安排的岗位不适当，明天就可以安排得适当些。今年的待遇差一些，再忍耐一些时候，三年左右，情况一定会好转的。我们只会一天一天好起来，不会一天一天坏下去。在旧社会，我们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受到压迫，现在精神上解放了，物质上再忍受一时的困难不算什么。我还希望现有的科学家能培养出更多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让他们跟着你们一道前进，这样，中国的科学事业才有前途。

再讲一讲团结问题。

为了有效地工作，科学家必须团结。说到团结，很容易想到“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的道理。在阶级社会中，人类是划分为阶级的。有阶级的区分，就有阶级的斗争和阶级的团结。我们的国家是多阶级的国家，今天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团结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将来阶级消灭了，还需要继续与自然界作斗争，仍然需要团结。与自然界作斗争是无限的，所以团结也是长久的。自然科学家当然懂得这个道理。

现在我们内部还有破坏团结的因素存在，所以团结问题更加重要。我们必须划清界限，分清敌友。团结谁？反对谁？团结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凡是承认《共同纲领》的都要团结。不论是私人开设诊所的医师，或是在私人工厂中服务的工程师；今天都是需要的。我们国家今天的财力有限，不能立刻建立那么多的医院，因此还需要私人开业的医生的帮助，他们对国家对人民是有益的。所以，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不管是工农出身、小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出身，我们都应该团结，对他们都要尊重，目的是要打倒共同的敌人。现在国内的敌人已经打倒了，国外的敌人还存在，尤其是帝国主义还存在，我们必须与破坏人民事业的敌人作斗争，这就是团结的前提。我们反对甘心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少数堕落的科学家，但有一些科学家是被动的、盲目的，或者是在非常不得已的条件下跟着敌人走的，我们很愿意争取他们回来，欢迎他们回来。科学家最易于接受真理，我们可以用事实说服他们。在这方面我们要进行说服工作。人民同他们没有私人的恩怨，只有对反动派的共同仇恨。

备民主阶级团结起来了，科学家一定会比其他人团结得更好。

凡是为新中国努力服务的科学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团结。为了实现和巩固这个团结，我们必须破除门户之见。自然科学是分门别类的，大家所学的不可能一样，各人所努力的方向自然也不同，但是不能因此而有门户之见，互相歧视，如学这一门的看不起学那一门的，在同一部门中这个学派看不起那个学派。我们的自然科学，有许多是从国外学来的。学医的有德日派和英美派，彼此形成门户。同样，学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农业、交通的人，也有这类门户之见。门户之见是受旧社会的影响形成的，很不利于我们的建设事业。今天我们要强调集体合作，抛弃那种旧的影响。各方面有各方面的长处，大家要彼此看到别人的长处，保持各自的长处，去掉短处，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当然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

中国共产党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是决心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党内同志尽管在大的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各人所处的具体环境的局限，相互间容易产生隔阂。如长期处在农村游击环境中，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互相隔离，产生了山头主义，形成了门户之见。又如在白区的革命工作者，长期处在秘密的环境中，容易产生只看到局部的倾向；而在根据地工作的同志，则习惯于一切公开，容易忽视秘密工作。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多，工业发展的程度不高，社会主义传统不深。在共产党内，党员的出身和成分不同，也容易产生不同的思想。因此，我们党开展了整风运动[24]。经过两三年的整风，迎来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25]，增强了党的团结，使我们党在日本投降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解放战争中更加显出了力量。以上是说在共产党内也还存有门户之见，需要整风。难道在共产党以外的团体，在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之间，就能够一下子很理想地团结起来吗？

我们不能空想，不能凭主观，消除这些门户之见一定要经过一个自觉的

过程。要面对事实，才能寻找出正确的方法来克服我们的缺点。一个科学团体中，人们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有着不同的思想与生活方式，是很不容易聚集在一起的，共产党员过的是集体生活，在战争时期生活在同一队伍之中，而科学家是一小群甚至是极少的几个人在一起工作的，因此养成了各种不同的性格。科学家的良心、骨气是可钦佩的，但是科学家的脾气有时是很难相处的，这都是一定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我们要用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要了解生活环境可以影响脾气，既然环境变了，脾气也是可以改的。

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骨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只有在共同的大前提下，个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在旧社会，反动派利用知识分子的弱点，孤立他们，分裂他们，这样来操纵他们。人民的国家给大家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逐步消灭一切束缚人类发展的阶级和反动势力，实现真正的进步和自由。以全人类的力量来和自然界作斗争，这是多大的自由，多大的个性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个性得到正确的发展。不然，这部分人的个性发展了，就排斥和压迫另一部分人，这叫什么个性的发展？在人类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少数人无止境的欲望，妨碍了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样的个性发展是专制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我们集体主义者反对这种个性发展。我们要发挥集体主义的精神，打破个人主义的小圈子，群策群力，与群众结合，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今天的胜利是经过几十年的斗争而得到的。我们今天抬头、翻身、开步走了，我们应该在团结上努力，携手共同前进。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战乱，我们是欢迎和平的。我们有信心在这一辈子能看到光明、幸福、富强的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 其功不在禹下 ”。大禹[26]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关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问题

①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四日）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将近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解放战争继续进行，我们已经解放了除西藏、台湾以外的一切地区。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打了一个胜仗，就是把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由物价波动、经济危机而造成的严重现象扭转过来了，人民生活得到了安定。这个战斗的胜利跟在战场上一样，也是用了人民的力量，上下一致努力的结果。这是我们国内两个主要的工作。在国际战线上，我们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7]。这跟反美斗争进一步开展一样重要。因为我们有了国内胜利的基础，才能取得国际上的胜利，没有国内胜利的基础，国际胜利就谈不到。在这些胜利基础上，现在我们要全国努力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过去一年，我们已经有了很大成绩，但是这种成绩还不是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毛主席的分析是开始好转，为什么叫开始好转呢？因为物价稳定还是趋向稳定，还不能说是经常的稳定。物价还有波动的情况，比如说：朝鲜问题起来了，香港谣言就多起来，有人就在那个地方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来了”，他们就在那里囤积居奇。兴风作浪，使得一个时候一部分物价又波动起来。当然。在我们控制的粮食、煤炭、花纱布三种主要生活必需品方面，物价是很难波动的，但是他们可以从国外进口货上波动起来。“所以，物价还不是那样稳定，遇到事变就又波动。我们国家经济、物资还没有达到保障从各方面都能够打败投机、囤积的人的要求，这还需要努力。必须使我们现在的物价平稳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经常的、永久的现象；必须使工业生产恢复起来，农民的购买力提高起来，工商业发展起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串通起来。而先决条件就是交通运输要便利起来，国家的支出用在生产事业上的要多起来。这样才能有基础进行经济建设，达到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目的。这一系列工作都做起来了，那才能说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28]的报告里面指出，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2]]的完成。

全国性的土地改革不是一年可以完成的，而是要三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我们过去只是在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三亿一千万人口的地区还没有进行。这不能一下进行，要分期进行，今年在一亿左右人口的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剩下的要在明年冬到后年冬才能完成，再剩下来的就是少数民族地区，那可以留到三年以后再去进行。在农村中把农民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里解放出来，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样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没有这个条件农民的生活是不会改善的，农民的购买力也不会提高。这种情况是不是估计过高了呢？并不高。东北就是例子，完全实行了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生产力解放了，生产马上增加，去年除辽东遇水灾外，粮食产量达到一千四百万到一千五百万吨，

---

① 这是在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第二部分。

今年预计达到一千七百万到一千八百万吨。这样就增加了总生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假使今年粮食生产达到一千八百万吨，那就超过了日本统治东北的任何二年，超过了他们最高的生产量。可见农业生产的恢复是很快的。东北农民的购买力也因此而大大地提高了。这不过是土地改革以后一年多到两年的时间，就能实现的。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要考虑如何把农民的粮食收购起来，供给他们日常的必需品，不然粮食的价钱会跌落，农民就会感觉到生产多了没有用。现在东北农村的问题已经不是农业生产品不够的问题，而是多的问题，是如何使他们消费，能够买到他们必需品的问题。这样就刺激了城市工业的生产，就需要有很便利的

交通运输，有很好的合作社的组织、很好的城乡交流、很好的工商业的发展。这个中心环节就是因为东北农村的生产品多了，并不是多几十吨几百吨的问题，而是多几百万吨的问题。东北是只有四千一百万人口的地区，它所需要的粮食有一定的限度，多出来的粮食就要到市场上推销，到市场上兑换工业品。

当然，东北是一个例子，因为地广，土地肥沃，生产容易。内地（关内）在实行土地改革以后，虽然不见得像东北那样见效快，但是一般的速度是会有的。就是说，一旦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农村的发展是会实现的。并且只要俄争结束了，就是没有实现土地改革的农村，收成也会好起来的，因为至少是实行了减租，封建恶霸势力被打击下去了。今年是一个好年景，除少数地区如淮河流域的皖北和河南的一部分遭受水灾，还有其他几个地区遭受旱灾以外，收成都很好。因为全国肃清了土匪，农民的生产热情提高了。这是件喜事，可以保证国家粮食、税收的完成。假如在三年左右把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完成了，那农村生产的增加是可以想见的。这也是发展工业的一个基础。

第二，调整工商业。

从今年五月以后，我们作了一系列调整工商业的事情，比如：关于劳资关系的问题，关于税收的问题，关于工商业恢复的问题，关于惜贷的问题，关于金融业的问题，关于对外贸易的问题等。这些都是遵循《共同纲领》[6]所规定的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29]进行的。五种经济成分[30]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的问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问题，都是治病的。这个病是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来。的烂摊子。它不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我们接受这样的烂摊子，把它整理起来，恢复起来，首先就需要治病。我们过去一年打了胜仗，把中国经济中最腐败的现象——投机倒把打击下去了。这也是迫不及待，必须治疗的，像人患急性盲肠炎似的，非开刀不可。上海打败了的洋钱贩子就是投机的，还有金融投机，许多银行的投机，许多囤积的投机，在许多地方我们都把它们打击下去了，这是救急。我们治病还要有根本的治疗，必须很好的调整，凡是不合理的应该使它合理，削弱了的应该把它充实起来，浮肿的也要使它消肿。这些在我们调整工商业关系上都治疗了。但是，这些调整在今天来说，还是带临时性的，还不是根本治疗。根本治疗，必须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那些经济政策逐条地实现。这就需要时间。

我们所接受的这个摊子，不仅是烂的，而且是乱的，没有条理，没有材料。中国经济极不发展，需要很好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各种勘察材料、各种统计，而这些东西常常没有，即使有也不完全可靠，也是不完全的数字。到底婴儿死亡率多大？数目不准。到底妇女健康情形如何？无处可查。现在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要自己着手调查、都应有一个可靠的材料。否则，就会出乱子。所以，调整工商业从根本上说需要很好的计划。比如：现在政府正在准备定出一个三年目标一年计划，假设是像去年提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全国的概算[31]，那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估一估差不多，可是一细摸，里面问题很多，一具体化很困难。拿工商业界来讲，要恢复任何一件事，没有材料是做不好的，没有统计也做不好，技术不高也做不好，那就必须调查、统计，这就需要时间。尤其训练技术人才更需要时间。所以说，我们工商业的恢复要有计划，更不要说建设了。如果没有材料，是盲目的，那就会出乱子。

一个革命者不仅要把旧社会破坏，而且要热情地建设新的社会。一般他说，今天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工作的同志，都是热心家，但同时必须有很好的计划，否则会出乱子，浪费财力、人力。在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可以作为例子来教育我们。在解放战争中，我们有一位热心家，要修铁路，因为运输太困难，他把粤汉路拆下的钢轨搞来，两边对修，修到当中遇到一座山，通不过，只好半途而废，又把它拆掉。你们看！这样没有修成铁路。因为没有勘察，道路怎么样，地基怎么样，遇到山怎么办，事先也不想一想修得通修不通，结果修不通，废了。另一位热心家在河北平原上修运河，把两面的水连起来，可是修到当中遇到沙滩，水下去就不出来了，那条运河也修不成。第三个例子，东北造纸厂要修一个大的烟筒，烟筒修起来了，一勘察地基需要七尺深，但是那个地方只能打三尺深，底下不稳，房子也不能修，结果烟筒也废了。再一个例子，就是天津修仓库，房子修起来了，一下雨，整个塌下去了，因为地基底下尽是水。还有一个例子，也是一位热心家要开煤矿，他把煤矿的一切设备都搞好了，也可队挖出煤了，然后找工程师一勘察，煤层不到半尺深，成本划不来，又废了。志向很大，热心可嘉，但是得到的结果是浪费了国家的人力、财力，所以只有好心肠不行。过麦我们打仗，大家都懂得，开始就是一冲。毛主席说：一冲不行，要有两冲。既要勇敢又要智慧，这样，才能打胜仗。我们解放军不仅要勇敢，而且要在勇敢基础上发挥智慧。做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群众工作也是一样。热情可嘉是参加革命的基础，但是当了干部就要用脑筋，用智慧，这样才能领导工作。我们在建设工作中也是一样，可是我们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识。

调整工商业是消极的办法，更积极的是把工业恢复起来，使工业真正发展，城乡交流，内外交流，这是大事情。没有充分的材料是不好随便下手的，这就需要知识，需要材料，需要勘察，需要统计，需要技术，总起来说需要时间。不像我们召集一个会一样，写一个通知，半天工夫，一千人的大会可以开起来了。调整工商业不是开会。确确实实需要时间，尤其中国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从各方面的观点、从需要的观点、从原料的观点、从技术的观点出发，整个这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很好的计划。这绝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做好的，需要三年五年。毛主席在去年开国典礼时说了，我们准备三年五年恢复，八年十年发展。这话是对的。

我们要恢复，要调整，首先还是要修铁路，修水利，这是根本的工作。运输便利了，才便于调整工商业，便于城，乡交流、内外交流。东北的工业商业之所以调整得快，发展得快，固然是因为土地改革完成了，农村的购买力提高了，同时也决定于城市工商业发展的中间桥梁——铁路的修复。东北铁路占全国铁路百分之四十弱一点，全国铁路三万多公里，东北就有一万四

千多公里。而关内的铁路比例大小了，这样多的人口，除去四千一百万，还有四万万三千四百万人口的地区，铁路只有一万六千多公里。这连欧洲任何一个小国也比不上，所以我们工业化的程度也就更小了。在全国来说，工业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左右是农业、手工业。东北的工业在去年就达到百分之三十五，今年可以达到百分之四十三，因为交通发达，工业发展，工业品可以深入农村，农村的粮食也可以运到铁路周围，大豆、高粱堆存仓库、堆栈。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所以，调整工商业首先需要修铁路，但铁路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修成的。西北不是来了许多代表？要发展西北，要帮助西北民族文化的发展，首先的问题是修铁路，最大的目标就是跟新疆通起来，并和内蒙古贯穿起来。这样大的铁道计划不是二二年的问题，也不是三五年的问题，是更长时间的问题。西南来的同志也关心这个问题。不但成渝铁路要修起来，汉东的两条铁路还要连起来，铁路要通过去，通到贵州、云南，另外还要通到湖南、广西，这样把西北、西南贯穿起来，西北、西南才能发展。还有福建不建设铁路就没有铁路，要联系起来，又是个大的计划。所以说，修铁路需要一个长时间。要建成中国的铁路网，城乡交流，内外交流，这样才能使工业恢复、发展。不管解决哪一个问题，都需要时间，同时也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

财力方面。我们的财力还有困难，国家不可能拿很多的钱用在工业上。因为战争还没有最后结束，台湾、西藏还待我们去解放，还需要很大一批经费；美国帝国主义还在叫嚣战争，我们不能不准备。这又是一个消费的数目。同时，一些大的工业建设和恢复经济又需要很大的投资，在这种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不可能一年一起去进行，需要分年进行。每做一件事都要用很多的钱，假使没有勘察，那就会浪费掉的。

人力方面（技术人才）。今年上半年大家感觉到知识分子失业的危险，我们也知道很多知识分子失业了。但是，我们可以预言，在两三年之内，恢复经济的工作做好了，知识分子便不是失业的问题，而是不够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充分的材料，拿现在的工业计划来说，每次都提出缺乏技术人才，而这个缺乏不是几十、几百，而是几千。几万，合起来就是几十万、百把万，解决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不是等着小学、中学、大学毕业生，而是要速成，改造旧有人员。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训练、教育、改造旧人员和知识分子学习本事的问题。这个问题，也需要时间。

物力方面。工业的恢复、发展决定于基本的工业——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我们如果没有工厂，就不能造机器，就要从外国进口机器，还有其他的东西。我们的工业应该建立在自己生产的基础上。钢铁工业是基本的，化学工业也是基本的，燃料工业也是基本的，电力工业也是基本的。没有这些基本的工业，谈恢复、发展是困难的。比如说，缺乏零件，还要到外国去买，那不行。还有地下的燃料到底搞不搞？这个材料太缺少了，有许多不可靠，还要重新勘察。

因此，无论财力、人力、物力的恢复都需要时间，有了时间才能把我们的工业恢复搞好。所以，调整工商业的基础是在这一方面，而且首先要做的是修通铁路，同时还要修水利。不然，一下淹了，一淹就是几千万亩，农村土地改革的成果也难以巩固。比如，今年皖北淮河水灾，三千一百万亩土地淹没了，九百万人口遭灾，再加上河南等一些遭灾的地方，又是六七千万人。固然中国地方大，假设是一个小国已经完了。但是，我们不能永远这样“伟

大”，每年遭受灾荒怎么了得！非要防治不可。中国的江河不是：一条，且不说小河，举其大的就有辽河、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六条，每年都有灾害。要把灾害变成水利不是：容易的事，要有力量、有时间、有勇气才行。我们计划从明年起开始整治这些水害，如果不治，那么灾害就更大。所以，毛主席说：从明年起一定要把水害一条条的治下去。把水害变成水利。现在已经开了会，许多方面的人士参加了，讨论了很久，最大的困难就是材料不够，专家也不够。因为材料不够，就不好达到我们的目的。单是这两件大的事情——铁路和水利就需要很多的财力、人力、物力和时间。所以，调整工商业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搞好的。

训练大批知识分子，学习本事，这点对女同志特别重要。因为妇女解放跟政治斗争离不开。现在政治上胜科了，政治胜利与经济胜利是离不开的。战争胜利，土地改革，使妇女得到政治平等、经济平等，但是我们必须使每一个妇女在农村有土地，在城市有职业、有技能，这是解放的关键。训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建设的一个中心问题，毛主席特别重视这个问题。苏联的经验和我们不同，因为他们国家的文化水平高，在革命胜利初期没：有强调技术，在革命胜利十年之后，才强调干部决定一切，特别是技术决定一切。我们恐怕现在就应该抓紧这句活来强调，就是要训练大批知识分子。我们的妇女干部，各民主阶层的妇女知识分子，也需要教育、提高，学好本事，参加建设，参加恢复经济的工作。这一方面需要的人才特别多，妇女也应在这一方面去努力。拿合作社工作来说，现在有两千多万社员，这就需要很大一批工作干部。这还不是学得很深的技术。而在建设方面还有更多更深的技术，我们可能不可能学呢？可能学的。现在在技术部门工作的女同志也不少，但是所占的比例数还很小，还需要增加。因为这个工作在恢复经济、建设方面是重、要的工作，所以我把它提出来，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第三，减少国家机构的行政开支。

意思就是用在工业建设方面的开支要增多。这并不是说我们国家的整个预算减少了，我们国家就不发展了，而是我们国家的预算开支根据我们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逐渐增加。这批经费我们不用在消费方面，要用在建设方面。机关的行政开支或军事开支，是要消费，掉的；用在建设方面，不管用在经济建设或文化建设上，都是生产性的，所以在这方面应当增加开支。这又不是一下能够解决的，也需要时间。为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军事开支不能减少。我们的领空还不能完全自卫，为着保卫我们的领空，还需要很大的空军力量，因此，需要支出很大数目的经费，从事这方面的建设。就拿我们修一个像样的能够起落高速度战斗机的飞机场来说，你们估估得多大支出呢？要一亿斤小米的钱，恐怕你们整个妇联的经费都没有这么多。而且，全国修这种飞机场还不是几个的问题，而是需要修几十个的问题。想想，我们国家得要多大支出！得用多少人力和器材！只举这么一个例子，我们就晓得国防建设的耗费有多么大。我们还没有海军，船舰得要多少呢？今天我们处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候，不能不防御，不能像国民党那样。假设那样，何必革命呢？为了保卫我们民主、独立的国家，就不能不加强我们的国防。所以，在这方面的经费不仅不能减少，而且还会有相当数量增加。这就消费掉了嘛！这是我们的一个困难。另外，我们的军队也不能一下减少。虽然我们国家的财政有困难，但不管怎样，战争尚未结束，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不能一下减少，只能复员一部分，绝大部分还要保留，而且，这不

是几年就可以大减的。在行政方面，有很多旧人员我们包下来了，国家政府还需要管这些人，因为不管他们就会发生失业的困难。在这方面，我们还要支出一批经费。这也是消费嘛！真正腾出钱来用在国家建设方面、经济方面、文教方面、社会事业方面去的也不能很多，这是主要的困难。所以，减少国家机构的行政开支用在建设事业方面去，这也要有几年的时间才行。

总起来说，这三方面的事情，需要时间，时间是不能缺少的。我们需要三五年时间，这比起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我们已经便利多了。苏联是十年以后，中间经过内战、经过新经济政策[32]才谈到计划经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过渡时期缩短，而且我们还可以接受苏联走过弯路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在过渡时期就有相当程度的计划，便利于我们将来的建设计划。过渡时期这样相当程度：的计划，对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来说是完全必要的，这个路程非走不可，绕不过去。毛主席看准了这个情况，所以他提出争取我们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目前还只是开始，还需要时间，需要我们努力。我们要提倡节衣缩食、精简节约，也就是这个目的。我们在战争的烽火中锻、炼了一二十年，现在革命胜利了，事业展开了，全国的局、面需要我们来担当，但我们还需要节约，还需要刻苦。所以，我们妇女组织、妇联系统，在国家中受的待遇也是很苦的，经费很困难，你们各地方的同志在这方面诉苦的特别多，也是很自然的。但大家也要懂得，任何一件事情，困难一点有好处，一方面锻炼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受这个苦，另方面也懂得工作中的困难要经过斗争才能解决。一帆风顺是不能磨炼人的。天天接近困难，克服困难，才能培养出优秀的革命工作者。一切革命工作者，尤其是妇女工作者，只有在困难中、在斗争中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意志。我们既然知道国家有困难，就要分担，使我们每个人在困难中生长出力量，帮助国家克服困难，这就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力量。我们妇女同志应该分担国家的困难，敢于克服困难，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统一财政和恢复经济

①

（一九五〇年九月三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各级政权机关成立以后，在战争已经结束的地方立即遇到一个最迫切的任务，这就是扭转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罪恶统治所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的极端混乱危险的状况。中国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差不多变成了投机商人的大赌场。为了稳定通货和物价，必须平衡财政收支和保证物资供给。而在稳定通货和物价以后，又必须按照新的条件和新的需要，调整全国的工商业，整理交通，使之力恢复生产服务。除此以外，人民政府还必须立即进行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战争所造成的灾荒和失业的救济。一切这些，就是人民政府所面对着的巨大的困难的任务。帝国主义者再三地认定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所压倒，而不得不向他们求救。但是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如同在军事和政治的战线上一样是胜利了。

中央人民政府在忍受了在解放战争扩大期间所不可避免的几个月的通货膨胀以后，在今年三月间决定用极大的努力来增加财政收入，减缩财政支出，使收支接近于平衡。为了保障这个计划的实舰，中央人民政府迅速地完成了全国财政管理的空前未有的统一。中央人民政府的计划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这样，通货膨胀立即制止了，从今年三月以来，不但不再需要增发通货来弥补财政赤字，相反地，中国人民银行存款总额在今年九月份比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份竟增加了十六倍以上。

为了维持物价稳定，还需要保障物资供给。中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国，但是腐败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却连中国所需要的粮食和棉花多年来也依赖外国输入，“加上国内市场被官僚资本家和投机商人所操纵，以致物价无法稳定。中央人民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恶劣状况。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掌握了充分的粮食、花纱布、煤炭、食盐等民生必需品，并克服了调运和贮存的严重困难，战胜了投机商人的扰乱，使全国大城市和灾区的供应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今年三月以来的全国物价已经基本上趋于稳定。最近因为夏秋季的丰收和由外国人口的某些物资的减少，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差价有些增大，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设法调节，以免农民和一部分以粮食计算的工资生活者的生活受到影响。

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趋于稳定，如同毛主席所指出的，还只是我国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还不是它的根本好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为了达到根本好转，除了必须完成土地改革[2]，大量地节减国家机构所需要的经费以外，还必须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使它从适应于囤积投机的活动转变为适应于生产的有计划的恢复和发展。为了从各方面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的经济行政机关、国营企业机关、私营企业机关、合作社组织和工会组织，已经在克服产销的盲目烃和加强产销的计划性问题上，在向私营企业实行委托

---

①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报告第四部分。

加工、订货、收购和贷款的问题上，在公私商业、金融业和合作事业的分工问题上，在解决侨汇困难的问题上，在调节劳资关系的问题上，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和商讨，并得到了初步的结果。当然，私营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与彻底的计划性是有矛盾的。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第一，在一切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我们已经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并已开始发展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第二，私营经济是处在国家经济的各种形式的领导之下，其中还包含着日益发展的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根据来说，可以使中国的经济一步一步地避免过去的无政府状态，而带有更大的计划性。

在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问题上，中国合作事业的发展已经开始具有重要的意义。据今年七月的统计，全国合作社已经有了社员两千万人以上，资金五千五百余亿元[12]，在今年第一季度购销业务的总值已达三万八千五百亿元。合作社的发展主要地是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老解放区。东北合作社一九四九年采购和推销的总值，合高粱一百三十余万吨，等于东北公营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四十。目前我国最需要发展的合作社是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和城市中的消费合作社，这两种合作社的任务，就是：保护小生产者和消费者少受或免受中间剥削，促进生产的发展，这是我国劳动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央人民政府正在拟订合作社法，以便全国合作事业能够得到健全的发展，避免过去所曾发生过的：错误。

从全局来说，由于长期的战争和战争还没有结束，并由于缺乏必要的准备条件，中国的经济事业现在还只是处在恢复的阶段。我们还缺少发展工业的资金，还缺乏对于实际情况的全般了解，在干部和经验方面也很不足。在二九五〇年，中央人民政府把财政开支约百分之二十三点九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这个数字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的建设投资都要大，但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的全部需要来说，这个数字却是很少很少。在一九五一年，这个数字还不能希望有大的增加。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恢复将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然后才能转入有系统的发展。在这三五年内，我们应当集中力量于几个重点的发展，这种发展，应当是有利于为工业化准备基本条件，即资金条件、国内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同时，对于国防建设，也需要占适当的比重。因此，中央人民政府的经济投资，将着重用在发展工农业所首先需要的水利事业、铁道事业和交通事业方面，用在农业和纺织业方面，用在一切工业所首先需要的燃料工业、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方面。

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在今年生产原粮二千四百亿斤，棉花一千三百万市担，现在估计都可能实现，或者还要超过。全国纱锭有五百二十二万锭，去年九月开动四百零八万锭，今年九月开动四百二十八万锭，拟争取于今年年内再开动二十万锭。全国铁路，至一九五〇年六月底止，已通车者达二万一千七百四十二公里，占全国铁路线百分之八十八，到今年年底，可达二万二千零十九公里。今年一月至八月，国营煤矿产量比去年同期增产百分之三十七，国营电厂可供电量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一，实际售电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八。

在过去的紧张的一年中，中央人民政府除了坚决制止经济上的混乱并开始了恢复工作以外，在救济灾荒和失业的工作上，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一九四九年中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受灾面积达一亿二千万亩，灾民四千万人，包括情形最严重的灾民七百万人。今年在皖北和河南等地方又发生水灾，灾田

仍有四千多万亩。为了直接间接地救济灾民，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年一月到九月支付了二十二亿四千万斤细粮，派出了大批干部，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救济的步骤，使受灾的人民得以安全地渡过了灾荒，这和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处理那年的水灾使人民遭受大量的死亡一事比较起来，实有天渊之别。中央人民政府在一九五〇年投资十几亿斤细粮，动员几百万人来兴修水利，这是今年灾荒减少并在全国得到丰收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四十几万失业工人（其中包括一部分失业知识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全中国人民一同进行了救济。失业只是我国经济恢复工作开始时期的一个暂时的现象，这个现象在东北已经基本上消失，在其他地方，今后两三年内也将同样消失。

改造旧海关，建设人民的新海关

①

（一九五〇年十月六日）

海关总署成立一年来，做了很多工作。把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半殖民地化的海关基本上改变过来，变为中国人民的海关，这是一件大事情。过去外国人在海关占有特殊的地位，现在我们已完全独立自主。如九龙的深圳[33]和上海等地海关的权力，我们争执了很久，现在都已全部收回。一年来，在接管旧海关，实行海关组织和人事方面的改革，废除外国税务司制度[34]，解除与海关无关的职权，起草海关法，制定新税则，迅速恢复业务等方面，海关总署完全执行了中央的政策。总之，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大门的钥匙。今后的收入，会根据出入口贸易的恢复而增加。这一切都是成绩。

以上只是说对外的一面，至于海关内部的改造，也是有成绩的。为了改变旧海关不合理的大海关主义，政务院[35]决定解除与海关无关的职权，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是海关组织的历史变革，这种变革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全国一万多名工作人员，说要改变就改变了，没有什么波动就执行了上级的指示，能够这样地约束自己，是很难得的。旧海关在各方面都很特殊，现在的海关就不同了。过去关员们接受商人请客送礼是常事。现在关员们到了船上，不抽人家一支烟，不吃人家一顿饭，这也是一年来改造工作很好的成绩。指出这一切，可以增加我们改进工作的信心。

正因为海关工作是接收了从前的旧底子，短期内老干部又不能熟悉这种业务，因而出一些乱子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些错误，今后要密切注意，努力加以改正。

对于旧海关制度，应采取分析的态度，应分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它是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统治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经济机构。这些外来的、旧的东西，一部分要加以否定，一部分要接收过来。旧海关既然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必然和政治有密切关系，不能像工厂的房产那样，整套接收过来。如美国顾问退休后，国民党每月要送他一大笔钱。这种特殊待遇几乎和英国首相的待遇相当，战争时期英皇的待遇也未必有那么高。这种剥削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不能没有中国的走狗，所以他们提高关员待遇，想在中国培养一批贵族走狗。我们年轻时反帝反洋务，海关便是主要的攻击对象，骂他们为匪犬。过去，凡是外国人办的机构，包括海关、银行。邮政局、盐务机关等，其待遇都超过了中国人民生活的水准，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有些大学培养洋务人员，学生毕业后，多数朝这方面找出路，钻进外国人办的企业。由于帝国主义的培养，使海关上的一部分人完全“洋化”，过不了中国人的生活，成为特殊的中国人，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这种不合理的待遇和人事制度，我们不能接受，必须：否定。

另一面，旧海关有许多业务行政管理制度和技术方法是有用的，我们要接收过来。例如，他们的档案保存了九十六年，许多数字是较为可靠的，对我们帮助很大。把他们的有关资料、业务经验及某些规章接收过来，对我们

---

① 这是在第五十三次政务会议上讨论全国关务会议总结报告时的讲话。

有好处。总之，凡是不合于现状的都要把它否定，凡是合于我们所需要的都接收过来，并加以改造。

海关工作人员的作风问题，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关员贪污始于清代，越到后来越坏。关员的薪俸虽然很高，然而还是要弄钱，而且是越多越好，弄钱的方法也层出不穷。过去几乎没有一个失员不贪污，海员也很少有不走私的。这是旧社会的产物。在新中国，我们不允许有贪污、走私的现象。今天，当然不能保证没有人走私，然而我们要有信心，逐步消灭贪污、走私的现象。依靠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是可以把旧作风改造过来的。大家应该注意改造工作，不要互相指责，这样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海关对旅客和上岸的海员进行检查是必要的。我们应该清楚，法律是一回事，群众工作又是一回事，这两者既有所区别，又相互配合，并不矛盾。我们是要检查上岸的人，但手续要简化。我知道有一批留学生很热情地回到祖国，船一驶过台湾海峡，他们便高唱解放歌，结果到码头后，彼关员们翻箱倒筐，大肆检查，使他们感到惊奇与失望，如同向他们头上浇了一盆冷水，这都是检查工作做得不好所造成的结果。为了提防特务，我们要检查，要有一定的手续，这是必要的，但在作法上要讲究。对于归国的海员们，欢迎会也要开。正如刚才陈云[11]副总理所说，国家立法与群众工作是有所区别又互相结合的两件事，都要好好去办。海关检查旅客的情况，请谭乎老[30]派人到天津、上海看看，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吸收海员做海关的工作人员，这个意见很正确，海员的确是很了解走私情况的，可以驾轻就熟。但数目不必太多，只要有他们参加，对工作就很有帮助。

设关的问题，应根据实际需要和有关的原则来决定设与不设。例如梧州，如果有船直通海外而不需经穗报关，就应该设关，至于是独立关抑或是分关，由海关总署看具体情况另作决定。龙州[37]暂时不要设关，因为，越南和我国之间的边界双方都守得很紧，等将来恢复了贸易之后，再考虑设关问题。

关于海关员工的薪金待遇问题，现在北京已减了百分之六十，上海也减了百分之五十。全国的关员只有万余人，薪金高一些在开支上影响不太大，不必急于再去减低，不可能要求他们的待遇如同其他单位那样低。在旅费方面，既然要调动人家，就应该适当地予以照顾。

批准海关总署关于全国关务会议的总结报告[38]。清章伯钧[39]部长召集包括交通部、公安部、海关总署、贸易部、铁道部、监委、民航局和全国总工会组成的小组开会，审查码头的手续、规章，并派人到某些海关关口有重点地检查一下，找出问题，想出解决的办法，通报全国海、陆、空各关办理。

治理淮河的原则

①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日）

淮河的事情，讨论了很久，老早就说要治理淮河，现在利用天灾之后，大家正在紧张的时候，更易于动员。水灾是非治不可的，如果土地不涝就旱，那就是土改[2]了也没有用。所以，治淮工作今天是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治淮工程虽然浩大，但我们有信心按计划完成。根据苏北的经验，他们可以动员几十万人参加治水，可见治淮的人力是有把握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要治理淮河。治理淮河的原则是：

一统筹兼顾，标本兼施

淮河应该根治，因工程太大，治本的计划不能一下全部弄出来。据水利专家说，唯独淮河的水文没有很好的历史记录，所以订计划很困难。但是，又不能不治淮河，不能等到明年才动工，必须今年就开始动工。因此，要标本兼施，治标又治本。明确了治淮的方向后，在不妨碍治本的原则下来治标。治淮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从水量的处理来说，主要还是泄水，以泄洪入海为主，泄不出的才蓄起来。新河道的四条线路还不能决定要走哪一条，但方向总算是定了。这次治水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并且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总之，要统筹兼顾。淮河是一下大水，一下干旱，水量不多，但山洪很多，水的流动又慢，因此调节水量很重要。皖北、苏北都是盛产粮食之地，不能不管。一九五一年先在不妨碍治本的方向中来治水，主要的还是治标。

二有相同事，有难同当

站在苏北的立场，当然是要维护苏北的利益，想保存归海坝以东几千万亩的土地，当地人民也不愿意大水在自己的附近过去。但是，我们不能只叫皖北水淹而苏北不淹。三河活动坝如果挡不住水，下游就不可能不淹。这叫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能只保一省的安全。三河活动坝明年不一定能修好，就算修好之后，当地人民只看眼前的利害，硬是几十万人睡在坝上，毛主席来命令也不走，那时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事情总是应该大家分担一些才能解决，哪一方面想单独保持安全部不行。

三分期完成，加紧进行

治淮不可能明年便全面开工，人才、器材、勘测等准备工作都不够，要买某些器材，也不是一下就能买到手。例如，苏北明年有五种工程要动手做，

---

① 这是在第五十七次政务会议上讨论治淮报告时的讲话。

又要开入海水道，人力便感不足。人才、技术、器材都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因此，明年只能做一部分，分期完成。但是，我们要加紧进行，应该设想到明年还要受灾。治淮的过程是由有灾到少灾，由少灾到无灾，一步一步来。同时也不能错过时机，秋汛一过就要动工，治水和打仗一样，迟一步都不行，处处要配合上天时和人力，行动要非常机灵。

四集中领导，分工合作

过去治淮机构[40]设在南京，有几栋房子，我们的治淮组织又舍不得放弃那地方，是很不对的。为了集中领导，治淮机构应该靠近淮河，搬到蚌埠才能更好地办事。今后治淮工作，以华东为主，中南为副，集三省之力一块来搞，上下游共同分工合作。在工作进行时，水利部应经常驻人在当地具体领导、监督。皖北和江苏互相争持的情况，以后还要继续注意。

五以工代赈，重点治淮

淮河治理工作，在皖北比较容易动员，因为当地灾情最重。河南也有灾，所以也热烈赞成治水。江苏就比较困难，不那么起劲。在灾区实行以工代赈，而不是以赈代工，重点在治淮工作。如果观念上是以赈代工，那么就不应该用那么多钱来赈，工作也要找强壮的人来做，工人要合乎工作上的需要。这次治淮河时，有人说为什么不治长江、黄河、汉水？原因是淮灾最急，而要治黄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有更大的计划，不是一年年勘测得清楚的。这次治淮费了很大的力气，朝鲜战争[41]爆发后，财经上更为困难，但财委[42]还是大力支持，邓子恢[43]、饶漱石[44]也很注意这件事情。

保证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总概算的实施

①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经过全国财政会议[45]的讨论，各大行政区[46]财委的同意，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座谈，业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并得到批准。

这个财政收支总概算，标志了一九五一年全国工作的总方针及其重点所在，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要为保证这个总概算的实施而加倍努力。

制订这个财政收支总概算是根据于这样情况，即：

（一）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的胜利，证明美帝侵略军不可能进攻大陆，但在朝鲜，它那无甚补充希望的兵力，如不再受严重的打击和损伤，也不会轻易撤出。解放台湾，需要准备严重的战斗。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和轰炸，帝国主义间有着严重的分歧意见，即在美国也顾虑苏联是中国后盾。

（二）因此，设想中的一九五一年的中国情况是：没有大战，援朝战争[41]继续，敌机轰炸沿海城市仍有可能，但我们防空力量在增长中，解放西藏，初步准备解放台湾，并准备应付台匪可能的登陆；大陆土匪肃清，土改[2]在新区一亿三千万人口中完成，农业增产，工业重点建设，海上部分封锁，但这将促进国内市场发展；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形成反帝新高潮，将进一步肃清美帝在中国的经济文化侵略影响，并巩固地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三）这样，在收入方面，今年农业税收依率计征[47]既已超过原估计数，而各地收成又好，故提高农业税附加比率至百分之三十，一般是可能的：一般税收在轰炸不大情况下，可较今年略增，但应一方面承认剪刀差[48]的存在，另方面准备某些税收可能的减少；国营企业收入准备从贸易上努力争取超过今年收入；清理仓库和结余必须严格执行。在支出方面，国防经费不仅居第一位，而且大大超过我们预计，经济和文化建设只能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推迟两项方针；行政业务，一方面需要继续供给制[8]和低薪制，另方面要求尽可能不扩大非十分急要的业务。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确定一九五一年概算的总方针是：既要顾到国防开支急迫需要，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如此，方能使前方胜利与后方巩固得以结合起来，稳步前进。本此要求，收入概算乃主要依靠于税收、国营企业收入和清理仓库结余，而不依靠于赤字贷款。预算赤字较一九五〇年为少，列入公债，发行与否将视银行透支情况需否货币回笼而定。支出概算，国防经费加预备费已超过总数百分之五十，而经济文化建设及行政业务费合共只占百分之四十二，已不可能再少。但必须注意：国防经费中人数是以少于五百万人计算，国防建设，兵工生产及作战费合共只一百三十亿斤[49]预算。为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继续稳定，一九五一年度各项收支只能照此谨慎规定，方不致落空，亦不致影响物价波动过大。且国防力量的加强虽为迫切需要，但必须估计到目前中国的经济基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

① 这是力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分局、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司令部党委的指示。

力量，决不能一跃而成，而只能在最大可能范围内加速我们国防建设。因之，量入为出，成为制订一九五一年财政收支总概算的主要原则。

为保证这个总概算的实施，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及军队党委切实执行下列各项规定：

（一）各项收入，各地必须负责完成，并求依率计征，能超过原来预定的数目。如沿海不受轰炸，则一般税收及国营企业收入更有增加可能。

（二）清理仓库和结余，各地必须保证做到。一九五〇年的决算不论军队、地方，应无例外地结转到一九五一年。若各地有需要，应另提预算计划，不得自由调用给余。仓库不分政府、军队，均应进行清理，限期完成。

（三）各地扩大人数，不论动员新兵、民夫、地方武装或组织新的部队，不论增加中央或地方编制，均须取得中央或军委批准后方得实行。如未经批准，即行动员增加，其开支不得报销。

（四）一切有关国防建设事业（如机场、公路、港口、炮台、仓库、油库、营房、射击场、医院、学校、防空设备等），均须遵照军委规定的计划和命令执行，并须定出工务计划和财务计划送有关上级审核；各地不得未经军委许可或因各特种兵下级司令部的请求径行建造。如违反，其开支不得报销。

（五）作战费由军委规定范围，并授权前线司令部或军区司令部负责开支报销，超出范围者须得军委批准。

（六）一切经济、文化建设及各种行政事业费，均须按预算行事，超出者须事先批准，违犯者不得报销。

（七）一九五一年的任务重大，预算经费有限，务望各级党委及军队党委严守财政纪律，注意节约，力戒浪费。

（八）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及其附件，将由中财委[42]密送各中央局、分局。你们收到这些文件后，根据本指示原则，望在适当会议上进行口头传达并下达。

执行情况望报。

关于水利工作的几个问题

①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二日）

今年先讨论水利工作。去年水利工作是有大成绩的，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根据讨论情形，我想讲几个问题。

一、治水理论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治水理论，只是那些理论对今天来说，是远不够的，是要予以提高的。中国历史上，有导江河入海，挖湖蓄水，开渠灌溉的事，也有利用水力进行生产的事，比如水磨（延安南泥湾就有个水磨，用以磨面，据说是几百年前就有了）等。过去那些治水理论，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中形成的，对今天的需要来说，就要予以大大提高才行。如宣传中国水少了，就是个新理论和新常识的问题。中国水少了，并不是自然水少了，而是可用之水少了，无力蓄水以致用，只能泄水少生灾。在宣传时，要多加解释才好。我们现在治水，还只能是蓄泄并施。再提高一步，才能以蓄为主。水可用以灌溉、航运，还可用以发电。把治水理论提高一步，治水为了用水。从现在的蓄泄并重，提高到以蓄为主；从现在的防洪防汛，减少灾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达到用水之目的。这些都需要大力宣传才行。

二、工作方针和步骤

水利工作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去做。十年二十年，到那时全国水库如果能修建起来，情况就变了，气候也改了，便可大大用水。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是大禹[26]以来从未做到的。今天治淮的方针是：上游以蓄为主，下游以泄为主，中游蓄泄并重。当前工作要与总方针配合，治本要与治标结合，如黄河大堤已高达十六米，仍要把堤加高加厚，要以治标辅助治本。这样做，与达到用水的总方针并不违背。今天，水利工作中还要有些临时性工作，增加水利时，同时要减少水害，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达到用水目的。减少水害，通俗点说，就是小雨无灾，大雨小灾，即是黄副总理[50]说的在科学限度中去进行工作。工作要时间，更要各方面配合。比如治淮，就要上、中、下游配合，要豫、皖、苏三省配合；治理长江，就要十四省配合。工作中，失去了步骤，失去了联系和配合，是不易做好的。工作还要有重点，那么做，利益大，就要服从它。

三、恰当解决一些争论问题

（一）统一性与积极性问题。生产要有统一性，但若无积极性，也做不好。去年水利工作做出了成绩，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所起的作用很大。在科学限度内，要加上人民的积极性，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旧科学家不懂得这些，计划工程时，有些不计算这个因素，有些对此估计得很不够。当然，有些事不是积极性所能解决的，比如，沙滩开运河，就超出了科学限度。生产中要有积极性，节约中也要有积极性。因此，计划工作时，在科学基础上，还要加上积极性才好。苏联专家对中国建设工作的要求有高度的统一。要求

① 这是在第六十七次政务会议上讨论水利工作一九五〇年的总结和一九五一年的方针与任务时的讲话。

统一和要求有计划性，是对的，但这要有个过程，要有时间和步骤。现在地方的积极性很高，对工作又熟悉，若不顾地方的积极性，把中央不熟悉的工作骤然集中到中央来，就会把工作搞乱。集中与分散、统一性与积极性要恰当注意才好。因统一而妨害积极性是不好的，从分散到集中需要一个过程。对各地建设工作，要有统一领导，要取消其盲目性，要以统一性和计划性反对盲目性。但是，也不能以统一性妨害了积极性。这两方面都要注意到才好。

（二）计划性与临时性问题。计划性和临时性要结合，若只要计划性不要临时性，虽不会挂一漏万，也会挂万漏千。必要的临时性，不但不会妨害计划性，相反会有助于计划性，尤其在今天情况下。但是，也不要因为临时性工作，而不看前途，失掉了计划性或减弱了计划性。比如，长江的沙市工程（即荆江大堤），在必要时，就要用大力修治，否则，一旦决口，荆江就会成为第二条淮河。因之，计划性和临时性要结合起来，不要顾此失彼。财委计划局及中央各部门除了做计划工作外，还要做“门市”工作。只有在“门市”工作取得了材料和经验后，才能使计划工作做得更切实、更完善。

四、工作重心问题

工作若无重心，不但会花钱多，收效少，甚至有时会做错了，又得拆了重做。工作时，首先要抓住重心。工作重心有了，其次是作工务计划和财务计划。这些计划工作都要有深一点的知识才行。如财务计划，就不是稍有会计知识的人能做好的，它要与工务计划相配合。这些人才主要由各部门从工作中去训练培养，只靠从外面调人是不成的。前水利学院已并入中央大学[51]，重新成立，一下做不到。现在许多大学中有水利系，但是投考水利系的人不多。若能把去年水利工作成绩宣传出去（中央人民政府第二个成绩即为水利工作），把水利在今年国家预算中占第三位的事实宣传出去，青年们了解了水利工作前途远大，白会有许多人投考水利系。

五、工资制问题

去年农民参加兴修水利工程，一面为农民的积极性，一面为义务工。我们要把义务工和工资制结合起来，把土方工程质量和数量结合起来，做一方土二斤半小米，多做多得，少做少得。当然工程进行，可与以工代赈结合起来。今年已明确指出，虽可与以工代赈结合，但结合中应以工为主，以赈为辅，不能如去年一些地方那样，以赈为主，以工为辅。当然，去年有些地方那样做，也有些客观原因。

巩固财政状况，准备经济建设

①

（一九五一年五月四日）

今年的财政状况，应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巩固。自从去年三月以后，全国物价稳定下来。虽然由于十月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41]，财政开支大大增加，受到一些影响，但经过半年来的努力，金融市场还是稳定住了，一年来物价波动是很小的。这个成果必须继续巩固。

今年的财政任务是：一方面要保证各方的急需，一方面要保证金融市场的继续稳定。各方的急需，特别是抗美援朝的开支，必须保证。但也必须加以控制，否则若尽量开支起来，即将影响全国人民的生活。比如，军事上的开支很大，但很多地方也抓得很紧，这一点在座的军队干部是很了解的。地方政府也会感到这个问题。中央对经济、行政、文教等部门的经费也抓得很紧。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不如此，就不能巩固财政状况，就不能保证金融市场的继续稳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毛主席的作风，处理一个问题，要从全面来看，要从两方面来看，不要单从一方面来看。假如单单站在一方面，说这个需要开支，那个也需要开支，什么都尽量开支起来，那就会影响全局；但如果单单站在另一方面，说为巩固金融市场，要缩减开支，这里要缩减，那里也不准开支，那就无法保证各方面的急需，也会影响全局。如果两方面都只从各自的一面来看问题，都坚持自己的意见，矛盾就不能解决。毛主席的作风是：要求两方面互相照顾，互相帮助，既保证各方急需，又保证财政状况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亦复如是，中央要尽可能照顾到地方的需要，地方要尽可能少向中央要东西。

此外，今年还打算争取在经济和文教的恢复工作上有所成就，打下两三年后进行经济建设的基础。什么时候能够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要看战争胜利的快慢而定。今年财政是困难的，但无论如何要拿出一定的力量来做，今年经济建设经费比去年增加了。许多基本的建设在进行着，比如铁路，中南、西南、西北都在修新铁路。交通，沿海及边疆在增修公路。重工业、燃料工业，如电力、煤矿、钢铁等都在进行建设。与人民生活直接有关者，比如治淮，依原计划照常进行。轻工业，要用很大力量去增加花纱布的生产，以供应土改[2]后农村的需要。勘察工作也在进行。今年文教经费也比去年增加了，工

农学校、技术专科学校都在建立着。这些都是基本的准备工作。但这是有限度的，不能再超过现在的范围。希望各级政府干部要了解。

在这样的情况下，谈谈几个原则性的问题。

第一，要继续巩固财经统一，但不应妨碍地方积极性。

去年特别强调统一，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否则即无法平抑全国物价，但也因而多少影响了一些地方的积极性及因地制宜。今年二月财政会议[52]曾经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财政收支管理系统分为三级：中央、大行政区[46]、省（市）。比如税收，按照税收制度征收，若超过任务，即留一部分给地方，

① 这是在全国秘书长会议上所作报告的第三个问题。91

使地方财政有伸缩余地。工业方面，今年三月间召开的工业会议[53]，决定在集中管理原则下，委托大行政区代管一部分，某些带有地方性的工厂，则划归地方经营。总之，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应留给大行政区、省以至县以因地制宜的权力。中央如此，地方亦应如此。过分统一的倾向是不对的，应该在适当的情况下，让地方分管，有计划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第二，一切财经工作都要有计划性，但也不应取消地方机动性。

关于这个问题，也常有争执。要求各级政府做预算，订计划，这是对的、必需的。过去打游击，一切难有计划，但也曾因此碰过钉子。现在则大不同于游击时期，工程这么大，如调查、计划不好，将会发生很大浪费。所以，必须有计划，这是肯定的。俚要有计划，要造预算，要经过批准，领钱是麻烦的。如有临时紧急任务怎么办？可以机动处理，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应有机动权。但机动性与计划性必须结合起来，才不至于超过预算太多。

第三，供给制[8]问题。

现在经济是供给制，将来必须实行经济核算制，按照预算计划办事，才有利于经济建设。由于今年仍在抗美援朝，不可能实行，准备工作也不够。工业方面，只有东北才开始做，但因工资制问题未解决，也还不行，全国更不行。但供给制也不是乱糟糟的，它也有好处，它带有军事共产主义的特点，它使私有观念、家庭观念更淡薄了。在战争完全结束后、供给制是要取消的。现在是一个过渡时期，有的实行了工资制，有的实行了一部分，有的未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并存，头绪乱，影响各方面，影响到干部情绪波动。今年编造预算的时候也曾考虑把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但由于增加开支数目很大，今年要抗美援朝，终于决定不改。下级干部供给制，是有困难的，家里有存底的，去年也卖光了，现在无法解决，迟早总要解决。在未解决之前，各级领导同志要特别注意这件事，要关心这件事，要尽可能地设法帮助一些最困难的干部，并且要向大家解释清楚，提高大家的信心，才能够团结起来很好地工作。

第四，编制问题。

希望大家遵守编制，不要超过。最近，中央常常召开各种专业会议，最后总不免提出要增加编制、人员与预算。但编制又有规定，不能增加。机动数也早用完了。这就很难办。一方面，合理地增加编制，中央不能不批准（有些部门人的确太少）；但另一方面，总编制人数又决不能超过。怎么办？办法是：自己想办法机动，自行调剂，从人员多的部门调些人到人员少的部门去。中央所以要成立人事部，地方所以要成立人事厅、局、科，就是这个道理。人事部门必须成立，以掌管调动干部。但人事部门自身就不要增加编制。一个部里常常有很多层次，部、司、处、科、股五级。一个科，既有科长就必得有科员，一个科员不像样子，必须要好几个。其实，一个科可以只有科长，没有科员。世界上并没有哪里规定，一个科里没有科员，科长就不算科长。分工要细，层次要减少，人也要少。否则，就成了为层次服务。前天，我接到中南军区一件公文，上边盖有十七个图章。这是一个典型。十七个人，每人看一遍，至少要十七天，也许还不止（若有人未看，那就是官僚主义）。我不赞成这种办法。谁管这件事，谁就拟稿，经过主管首长看看，签个字，就可以了。假如一件事情需要跟别的部门商量，一个科长也可以发个公函，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又不是发布命令指示，也不是最后决定，内部商讨是可以这样办的。总之，编制可以增加，人员不能增加，预算不能增加，但是

会要开，事情要做。人员调剂，授权各大行政区、各省市人事部门来机动，总可以挤得出来的。中央的编制就是这样，不许超过，后来也就没有超过。这样挤法，反而可以挤出一些办法，提高工作效率，多办些事。

“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

①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

目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正在各级政府机关、企业、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紧张地进行，并需要继续深入。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毒害，在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要完全地彻底地铲除这一积害，必须全社会都动员起来，特别是与贪污、浪费有密切关系的工商界要动员起来。

今天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长期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他们中间一部分代表人物，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参加过或同情过人民解放斗争。解放后，他们逐渐参加了人民中国的建设，并在国家的领导下，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因此，解放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检举的，常常以行贿、欺诈、谋取暴利、偷税漏税等犯法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不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我们国家五种经济成分[30]之一，但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人民中国并不是可以不受限制而自由发展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是承认了这个政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要在国家经济领导之下的。因之他们在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是有可为的方面，亦有不可为的方面：有被容许发展的方面，亦有被禁止发展的方面的。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容许发展；凡不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不容许发展；凡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就应由国家统一经营。这是《共同纲领》[6]规定了的。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才能成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私人经济事业如果不受限制、不受领导而任其自由发展，则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将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回复到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或殖民地的经济。非如此，即如彼，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一，不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条件下讲公私兼顾，就是说，要在符合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的和长远的利益的原则下照顾私人利益。第二，不能抽象他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资两利，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第三，不能提倡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生产总计划

---

①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上的讲话要点。

的领导。无论公与私，城与乡，中央与地方，大公与小公，都必须逐步纳入计划。否则，工农业的盲目生产，就会发生过剩与不足；商业的盲目经营，就会扰乱市场，波动物价。第四，不能容许谋取暴利，而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或议定的价格内取得合法利润。第五，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税漏税、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继续发生，听其侵蚀人民政权，损害国家财产，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几有犯者必须惩办，坦白自首者则从宽处理。人民政府所保护和欢迎的是那些拥护《共同纲领》、服从政府法令的工商业家，而不是那些不受领导和限制而想自由发展、盲目生产，贪图暴利的工商业家。中国的工商业家如果按《共同纲领》的方向发展，遵守国家政策法令，服从国营经济和国家生产计划的领导，那么，他们的出路是光明的，他们不但在目前时期可以充分地发展他们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而且在将来全国转入社会主义的时期，也一定可以得到工作的机会，并且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相反，如果有人违背《共同纲领》和国家政策法令，抵抗国营经济和国家生产计划的领导，那是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背道而驰，无疑必将遭受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正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担任领导而资产阶级决不能担任领导，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其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而资产阶级思想却不能不受到批判和改造。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今天通过《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并决定首先号召全国社会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参加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我们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进行检举和坦白运动。这不仅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树立新的社会风气上将有所贡献，即在工商界人士的自我改造上也将有所收获，并利于他们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一道前进。

大力扶植老根据地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①]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中央人民政府派遣访问团访问各老根据地并邀请各老根据地人民代表来京参加国庆节观礼，加强了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人民政府与老根据地人民的联系，表扬了老根据地人民伟大的革命功绩，提高了老根据地人畏热爱祖国和建设祖国的积极性。这一收获是很大的。

老根据地人民长期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匪帮、封建地主的残酷压迫进行斗争，贡献最大，牺牲和受到的摧残也最大。解放后经过积极生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有的地区甚至超过战前水平，但大部分老根据地因遭受战争创伤太重，且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生产恢复很慢；其中若干地区又遭到水旱灾害的侵袭，特别是南方老根据地因重获解放为时较晚，荒芜现象仍多数存在，人民生活极为困

难。因此，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必须十分重视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大力领导与扶植老根据地人民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二）加强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中心环节。老根据地多系山地，生产条件比较困难，应该本着解决群众当前生活困难与长期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因地制宜，有计划地有重点地逐步恢复与发展农林畜牧与副业生产。一般地区应以农业为主，不宜耕耘的山岳地带应以林业与畜牧业为主，但均须同时极力注意科用当地一切条件发展当地有可能发展的手工业和副业，以增加群众收入。

1．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首先要补充农具，增加耕畜，养猪养羊，以克服当前缺乏农具、耕畜和肥料的困难。从长期与全局打算，山地应不再开荒，但凡能修成梯田的坡地，要尽快地逐步修成梯田，并集中力量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在有条件的地区，修塘，筑坝，开渠，打井，扩大灌溉面积；治河，防洪，闸山沟，修水库，做好水土保持。在粮食缺乏的地区，应提倡增种多产作物如红薯、马铃薯、南瓜等；在不缺粮食的地区应有计划地提倡栽种经济作物如棉、麻、烟等，以增加群众收入。

2．发展林业：提倡封山育林，禁止烧山燎荒，滥伐林木，挖掘树根，但必须照顾群众当前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反对机械的封死，进行合理的砍伐。在有条件地区应积极发展茶、桑、桐、橡、茶油、漆、果树等经济林木及其他用材林、薪炭林，并根据当地条件发展采集药材及竹木编制等副业。

3．发展畜牧：为增加老区人民收入，增加畜力、肥料，并供应毛纺制革原料，应大力增殖牛、羊、马、驴、骆驼、猪、鸡等。提高饲养技术，奖励繁殖。加强畜疫防治，畜种改良。为此，应有计划地建立防疫组织与繁殖场、配种站。

4．发展手工业与副业：许多老根据地农村副业收入占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以上，有的甚至超过农业生产的收入。农村副业和手工业是多种多样的，必须因地制宜有计划地加以恢复与发展，合作社和国营贸易机关应尽力

[①] 这是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署名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

帮助他们打开销路，以增加老根据地人民的收入。有些地区应特别提倡土特产与农产品的加工，如造纸浆、缫丝、烧酒、打蛋等。在兽害严重地区应组织群众打猎。

5．开采矿产：老根据地多系山地，各种矿产如煤、铁、石灰、钨、锡等蕴藏丰富，在不破坏矿藏、不影响大规模开采的原则下，可以有计划地扶助当地群众按照开矿的规定作小型开采。

（三）正因为老根据地多系偏僻穷困的山区，要求得老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就必须首先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恢复与开辟交通，这是改善老恨据地人民生活的主要关键。必须分级负责，采取发动群众义务劳动为主、国家出资为辅的办法，有计划地修好老区主要的交通干线如公路、大车路、驮骡路、人行路以及河道等，利用当地一切可能利用的交通工具如大车、手推车、船筏等，并扶助群众添置这些交通工具，发展运输业。建立转运货站，把运输工作加以组织，以利推销土产和供应山区人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

2．增设国家贸易机构与供销合作社，组织私商上山，建立山区商业网，促进物资交流。合作社应以山区为发展重点之一，指导群众提高产品质量，进行规格教育，使当地土特产得到畅销。贸易公司、合作社应在对老根据地人民不挣钱甚至采取若干贴补办法的精神下，收购山货、土产，并解决油盐等日用必需品。

3．大力组织合作互助。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如互助组及养畜、造林、修滩等合作社，逐步把群众组织起来，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提倡农业生产合作社。

4.今后一般贷款应将老区列为重点之一。并应依据当地条件举办养牲畜、修水利、修梯田、购买农具等特殊贷款。举办贷款时应注意适当延长期限，简化手续，及时放发。这次拨给老根据地的特别救济费，应结合生产发出，或提出一部作为建设基金。

5．老根据地遭受的战争创伤深重，生产水平较低，人民生活很苦，为帮助老区人民迅速恢复元气，在负担上应以省为单位，适当加以调整。特别困难的老区，可宣布免纳一定时间的公粮。

（四）加强老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与优抚工作：

1．老根据地人民的政治水平一般较高，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尤为迫切，必须提倡文化下乡，电影上山，普及社会教育，并在这些地区增办小学、中学、工农速成中学和各种技术学校，以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及各种专门人才。为此，应以各为单位适当调剂教育经费与教员。

2．老根据地人民的医药卫生要求也十分迫切。卫生机关应协同有关部门在老根据地大力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宣传卫生保育知识，设立卫生站与医院，派遣医疗队巡回治疗，开办卫生医疗人员训练班、新法接生训练班，帮助中医学习，设立中药铺，并注意供应海盐、海带等以避免粗脖子、柳拐子等病症，保护群众健康。

3．在优抚工作上，首先是收葬烈士遗骸，收集烈士事迹。老根据地烈军属多，他们缺乏劳动力，生产与生活困难最多，过去有些地方对优抚条例[54]的贯彻施行较差，今后必须切实执行优抚条例，加强对缺乏劳力的烈军属的代耕工作，保证他们的生活不低于一般农民。县、区应定期召开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优抚模范的代表会议，以便检查优抚工作，交流代耕经验，进

行政治教育。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也应有烈军属及革命残废军人的代表参加。

（五）老根据地的工作是一件光荣的任务，应作为有关省、专署考绩中的一项。凡辖区内有老根据地的各级人民政府要把老根据地的恢复与建设工作作为一九五二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并组织专门委员会，指定得力干部经常注意老根据地的工作，及时检查、督促。开好老根据地的代表会，并将加强经济建设作为会议的主要内容。除重获解放的时间较晚、土地改革[2]尚未完成或刚刚完成不久者外，一般老根据地的县、区、乡人民代表会议均应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未建立区、乡人民代表会议者，应迅速建立区、乡人民代表会议，使富有斗争经验与政治认识的老根据地人民自己起来讨论与执行自己的事，选举自己的行政人员，发扬人民的积极性，“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

必须认识老根据地的恢复工作是长期性的工作。凡辖区内有老根据地的省份，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拟定切实可行的老根据地工作计划，领导群众逐步实现，并予以必要而又可能的经济扶植，争取在三五年内改变老根据地的经济面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提高老根据地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水平。

关于荆江分洪工程问题

①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送上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决定及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两个文件，请审阅批准，以便公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55]，经李葆华[58]与顾问布可夫[57]去武汉开会后，又亲往沙市分洪地区视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工程本身关键在两个闸（节制闸与进洪闸）。据布可夫设计，六月中可以完成。中南决定努力保证完成。我经过与李葆华电话商酌，并转商得邓子恢[43]同志同意，同时又与傅作义[58]面商，决定分洪工程规定修改如现稿。这样可以完全解除湖南方面的顾虑，因工程不完成决不分洪，完成后是否分洪还要看洪水情况，并须得政务院批准。至北岸分洪的根治办法及程颂云[59]所提意见，当继续研究。

---

① 这是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的信。

解决劳动就业的原则和出路

①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解决原则

一、全部登记

过去因为是救济失业工人，所以只登记了失业工人，后来才扩大到失业知识分子。现在不只是登记一部分，而是在城市中进行全部登记，并且应规定出第一批登记的时间。这要在劳动就业委员会指导下今年下半年认真进行。

二、有计划地训练

只进行登记，如果不进行有计划地就业训练和转业训练，还是难找到工作。一般粗活工人有失业的，技术工人就很少有失业的。因此，对已登记的失业人员，除进行政治训练外，还应该使他们学习一些国家所需要的技术。训练失业工人应如此，训练失业知识分子、失业旧军官等更应该如此。过去我们举办的训练班一般都是进行政治训练，讲“猴子变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常识。今后的任何训练班，都应该有业务训练，像革大[60]一类的政治学校，今年下半年也应加强业务与技术训练，这样才能使就业的条件完备。过去在训练班出来后，只懂一套政治，分配到业务机关工作的确有困难。今后如果有了业务训练，介绍就业的方向也就好办了。过去的师资训练班就比较好，因为训练的就是教师。因此，今后举办训练班，要在业务训练这方面表现出成绩来，同时也结合进行政治改造。另外，办训练班不要只在几个大城市，应扩大到一些中小城市。

三、逐步地分期地解决

既然失业伺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们就应该逐步地分期地解决。首先是先城市后农村。如果把农村剩余劳动力都盲目地吸收到城市中来，就要出乱子。当然，有一部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自流地到城市中的，但我们如果组织得好，就可能克服或减少此种自流现象，因为我们的政权是统一的，能做到这一点。黄敬[61]市长讲过，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天津附近的农民自动流向天津的很多。黄敬市长找附近地区负责同志，由各地组织农民进行副业生产，农民们也就不再到天津了。南京过去是官僚集中的城市，为官僚服务的人很多，一旦不是首都了，许多人就失业了，仅“老妈子”失业的就有八万多，失业人员总共有二三十万。一个穿皮鞋的人走到街上，准保有人拉住给擦皮鞋。就是这样，农民还是不断地自动地流向南京。所以，城乡一定要很好地联系，不能让农民自流地跑到城市中来。

就是在城市中，虽然是要包下来，但也是要逐步解决，而不能一下把一切失业问题都解决。一年之内，先准备解决四十万，也可能超过。现在有些是半失业人员，有些根本就在家中，如果我们宣传不适当，这些人都来登记，就不好办了。我们既不保守，但在执行中又要反对冒进。这一点应向大家说

---

① 这是在第一百四十六次政务会议讨论劳动就业问题时讲话的第三、四部分。

明。这个决定当然是失业人员的一个很好的出路，但同时要向他们说明，我们是要逐步解决的，并使他们相信我们可以逐步解决。我们相信有三五年的时间，城市中的失业问题可以完全解决。当然，完全解决后，还会不断地发生新的失业者，那就是长期的问题了。

出路问题

一、财经方面

这是一个大方面，因为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经济建设是我们建设的主要方面。

我国的工业、交通都将要有大的发展，而要发展，就要补充大量的工人及其他人员。铁道部现有十余万剩余劳动力，估计明年就会随着铁路事业的发展而没有剩余的了。后年、大后年，铁路事业还要有大的发展，这就不仅要吸收自己系统的剩余劳动力，而且还可以吸收很多新的工人和其他人员。重工业、轻工业等也都将有大的发展。因此，各部门应该有一个招收，训练工人及其他人员的计划，自己训练或委托劳动就业委员会训练（必须自己出教员）。这个问题，由劳动就业委员会与各有关部门很好研究解决。

在建筑工程方面，今后也需要有很大发展。工业、交通等，一般都是循序渐进的，但去年在建筑工程上很乱，“三反”[62]、“五反”[63]时停了一个时期，因此有很多建筑工人失业了，这是盲目生产造成的结果，今后要力求避免。这应由建筑工程部很好地计划、掌握。今后每个城市，每个部门的建筑计划都应该循序渐进，不然，一时工程多，一时工程少，对劳动就业问题影响很不好。本来一切建设都应该循序渐进，特别在建筑工程中更应该注意这个问题，所以特别提醒一下。现在城市建设，各部门的基本建设部刚开始，应严格遵守这个规则，财委[42]应掌握这个问题的关键。

在农、林、水利方面，在财政、贸易方面，都需要吸收大批的失业人员，加以训练使用。

在贸易方面，对外贸易、城乡贸易都要有大的发展。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需要进出口平衡。过去我们是力争出超的，这是为了改变我国在对外贸易上的半殖民地性质。我们现已把仰仗国外进口的情况转变过来了，这就表示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特权。今后的对外贸易，就并不是争取出超，而是争取贸易平衡，就是扩大贸易额，因为外汇多了，对我们并没有利。我们今后主要是扩大对外的贸易额，争取贸易平衡，换回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主要是机器）来，以发展我们的工业。这不单是贸易、合作部门的任务，需要各部门配合，因为要出口，就需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今后出口的东西主要是下列几方面：

（一）农产品：茶、烟、粮食甚至棉花，今年都能有出口。估计今年的粮食可产三千亿斤，五年后可增加百分之六十，这肯定有剩余。我们的大豆、米都可以出口，南洋[64]以及锡兰[65]、印度等地也都需要我们的米。这点我们是可以努力争取做到的。这就需要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改良种子，防治病虫害，推广新式农具，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个工作做好了，可以给人民增加很大一笔收入。

（二）矿砂：中国地下资源的勘测工作虽然做得还很差，但已经看到在矿砂方面是可以有很大的生产量的，这 是必须开采的，当然要有组织地进行。

矿砂主要是向兄弟国家出口，但也可以和资本主义国家做些平等交换。

（三）畜产品：中国有广大的草原，有习惯于从事畜牧业的民族，因此，今后畜牧业一定会有大的发展，畜产品一定可以出口。但这个时间要长一些。猪肉、鸡蛋本来可以出口，但我们不会宣传。外国人来了，就应送给他们一些我们准备要出口的东西。另外，皮毛是我们很大的一项生产，应很好地组织出口。现在准备在财委下设一个经济联络局，由他们去搞这些事。

（四）油脂：油脂的出口，可以扩大，这对农村副业生产的发展有很大便利。纺织工业部怕发展手工业纺织后影响到机器纺织工业，我看发展副业，手工业纺织还不是重点，主要应发展像油脂这一类东西。

（五）手工业产品：我们有些手工业产品，在世界上是独占的，现在已证明了，只要很好组织，即可有很大发展。有许多东西，我们一宣传，苏联等国家一来订货，我们市场上马上就不够。例如檀香扇，我们一宣传，苏联就向我们订了三十万把，而我们搜遍了市场，只找到了五万把。例如景泰蓝、地毯等，一宣传，苏联、新民主主义国家来订货，都是搜光了也不够。所以，有些独占的手工业产品的出口问题，主要是宣传问题。兄弟国家的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提高了，也就需要我们这些独占的手工业产品。当然，他们这些订货也带有帮助我们的性质。除上述几种外，其他如湘绣等等，都需要很好组织，提倡发展，生产品由轻工业部和合作社系统联合包下。不过，这也不能盲目生产，首先应考虑到要有市场才行。在这方面，还要照顾到各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例如湖南省就不是建设的重点，我们就可以在手工业方面多帮助它一些，就可以帮助湘绣的发展。刚才谈的出口的几项如粮食、畜产品、油类等，跟农业部、合作社系统、轻工业部都有关系，各部门应从这方面去照顾一下。湖南虽不是一个贫省，但人多地少，剩余劳动力多，这就必须照顾，水利部也应照顾一下湖南，把滨湖的水利工程加到建设计划里去。我们的建设计划首先是重点，但也还要照顾一下不是重点的地区。我们经常说照顾少数民族地区、山区、老区、灾区、落后地区，照顾归国华侨、军烈属等，对不是建设重点的地区也应该照顾。

二、农村方面

对农村方面，应该进一步地注意。土地改革[2]已经基本完成，今后农村的中心任务就是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系统应该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管农村工作。因为农业部管了各种农作物在技术方面的指导等工作，管得很广，有必要另成立一个专管农村工作的部门。除东北外，各省又将要恢复到战前的行政区划，各省都有了工业，不能集中精力于农村工作方面，这也需要成立一个专管农村工作的机构。因此，这个问题已经提到政府工作的日程上，只有成立了这个机构，才能有专门机构来考虑农村工作问题，考虑如何扩大耕地面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等问题。现在要解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首先还是把这些剩余劳动力容纳在农村中，不然，他们就会自动地往城市中流。因此，首先就是发展农村的农业、副业、手工业。刚才讲过的五种产品出口的扩大就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如果每年出口可增加十万亿元[12]，农村生产就可以有大的发展，这就需要很好地组织五种可大量此口产品的生产。这样，就可以把农村的农业、副业、手工业大大发展起来。其次是农村公益事业。农村利用剩余劳动力筑路、修桥、办小学教育、修小型水利、搞文化娱乐活动等都可以。今年我们取消了附加税[66]，明年把乡财政也统一到国家，从县财政项下支出。农村搞些公益事业，只要经过人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

只要对农村有利，群众赞成，我们不干涉，我们也不应该干涉。过去附加税没有取消，各种支出都成为农民的负担，所以农民感到负担很重，以致有人把归还贷款也看成了负担，那时农村公益事业也成了农民负担。据我们派下去的两个调查乡财政的小组调查，农民还是愿意搞公益事业的。今年减轻了农业税收，农民负担也就大大减轻了，办公益事业是完全可能的。生产发展了，农民就要求修桥、筑路，以接上主干公路，要求办小学教育，要求搞些小型水利，要求搞些文娱活动。这些都可以考虑由民办。我们应该准备一下，在今年省、市主席、市长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此事由参事室廖鲁言[67]主任负责准备。农村公益事业搞好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就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

三、文教方面

我们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一方面是进行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还要进行文化建设。毛主席说过：“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68]。而文化建设，又是教育、卫生当先。

（一）教育方面：这是失业人员的一个大出路。教育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普及，一个是提高。在提高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学校培养大批的新知识分子，一方面是使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继续提高。已成为知识分子的，连我们在座的大中知识分子在内，外行人很多，一讲到建设，就感到知识不够用，需要很大的提高。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也少得很，今年七凑八凑，才凑到两三万人，而我们每年平均却需要十万人，这就需要有很大数量的中学毕业生才行，这就需要发展师范教育。在普及方面，一个是学龄儿童的教育问题，一个是成年人的扫除文盲工作。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的发展，我们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过去，到底是工业救国还是教育救国，争论不休，我们是先来个政治救国，现在把工业与教育结合起来。教育部原准备在第一年吸收十五万知识分子，数量还少，气派还要大些。对于旧军官，可加以训练后让他们到扫盲队去，使他们由旧军官转变成为人师。这样农民在文化上得到了帮助，对他们的态度就改变了，他们也立了功。这对他们是一个考验，做得好不好，可由群众评判。

（二）卫生方面：这方面也要有很大的发展，可以吸收很大一个数目的失业人员。现在我们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实行普遍的公费医疗，已经感到医务人员不够，今后卫生工作还要推广到乡，这就需要吸收大批知识分子来学习卫生工作。

四、合作事业

在编制会议上，合作社方面曾答应吸收一二十万知识分子。但注意不要尽吸收年轻的，年老能做事的也要吸收一部分。各机关、各部门举办的各种训练班招收学员时，应照顾年岁较大者，不应再过严地规定年岁限制。招生章程和投考条件，须由政务院劳动就业委员会、人事部、教育部及劳动部联合成立专门小组审查批准；未经小组审查已公布者，仍须由该小组重新审查批准。

五、就学问题

各地高等学校招考新生时，可酌收一部分年纪较大尚能入学的旧知识分子或旧军官。李明灏[69]先生讲得对，只要条件可能，不限年龄，可吸收一部分。当然，太老的也不会来报考，这样大学生就可多招点，今年试一下。有些旧军官，过去是连长、排长的可以选几个，在学校中给以教育、改造。不

然，大学生就不够，今年高中毕业生只有四万。这事请人事部与教育部研究办理。在学校里，教员是不大会赞成的，同学们也会看不起他们，我们应该进行教育。旧军官经过思想改造，是可以融化的。

六、行政机关

从去年的编制会议发展到目前来看，少数部门还应紧缩，多数部门是人不够。人不够怎么办？需要增加人。在这里应该提倡送一部分青年人入学校学习，换用一部分老年人。目前某些行政机关在选送青年干部报考高等学校的工作中，仍存在着消极的、不愿选送的情况。为纠正此种情况，由教育部、人事部研究并通告各级行政机关干部：凡合于投考高等学校条件、本人又自愿升学、而为本机关所阻拦者，可准其向本机关直至中央人事部或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提出申请，并准其对本机关阻拦干部升学的错误思想和行为，提出批评，投寄《人民日报》，由人民日报社审查披露。

关于编制，去年的精神是合并，现在经过“三反”、“五反”，要分开了，形势发展的结果，财委、文委[70]还要增加几个部门。中央增加，大区要缩小，这样也好办事。在这些地方吸收人时，要特别注意。

七、增加补贴

这是缩短供给制[8]转到工资制的过程。假若做得好，明后年可转入工资制。这样，社会上的消费就会增加。东北私营工商业的增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私营工商业的增加就帮助了就业。

八、劳动改造

社会上的游民应该进行改造，公安部应负主要责任，并订出计划来。主要的应放在农业屯垦方面，要研究哪些地区可以屯垦。公安部门已经组织了近百万人的劳动改造，是有成绩的。这里有很多人才，由生活改造进到思想改造，是可以做些事的。这样，可以把社会上的游民逐渐地吸收进来。

九、临时救济

这也是带有积极意义的。总的方面是从福利着眼，将来可以扩大到老年。现在虽然作了，还是少数。这要由内务部[71]与救济总会商量进行。

另外，也要照顾到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像成立文史馆等等。工商联开会时我曾说过，在建设中很有成绩、对革命有贡献的，若年老了，无儿无女也无消费财产者，就应该实行社会救济。这样，工商业者可以无后顾之虑。总的说，就是要包下来。当然，包下来也是逐步的，每个方面开个头，就有信心。具体的问题，同意大家的意见，请安部长[72]根据讨论意见，考虑修改。

关于立三[73]同志讲的工作时间问题，公营商店是否需要采取三班制，要慎重考虑。如果公营商店从早到晚全部时间营业，有很多私营商店就会被搞垮，结果会造成更多的失业，现在国营百货公司营业时间是早十一点到晚八点，一些私营商店就是依靠十一点以前及八点以后营业。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们公营企业应该有步骤地发展，不能带有盲目性，要有约束。所以，加班等制度不要写进去了。但是，基本的带有垄断性的工商业应该掌握在国家手中，不然，来一个大波动就对我们不利。我们要有组织有领导地带着私营工商业一道前进。

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国民经济

①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目前，国内的政治形势，一般他说是好的。国家建设冲当前有两项重要任务：一项是政治的任务，要使国内各方面更加紧密团结；另一项是组织的任务，要大量培养国家建设的干部。

经过“三反”[62]、“五反”[63]运动，全国工商联筹委会已经在六月间成立，建立了工商界的全国性组织。今后在政治上要更加促进团结，《共同纲领》[6]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听说各地在传达全国工商联会议的各项报告时，个别地方有一些出入，强调了一面，忽略了另一面。这种情形，在工作中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比如工商联开会，讲工商界的困难时就会强调困难这一面。既然客观上存在着困难，汇报情况的时候，当然应该把困难讲出来。这是许可的，不能说没有顾到国家的利益。但讲困难的时候，还要看到另外一面，即私营工商业发展的一面。这就是说，必须注意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样才是全面的，完整的。现阶段我们的纲领是《共同纲领》，是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团结的要求上反“五毒”[74]，反“五毒”也是为了团结。

前途问题。过去我曾经讲过多次，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

当前中国经济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成分共同发展。五种经济成分犹如人手的五指。当然，国营经济是领导经济，有国家强大力量的支持，发展的量会更大，质也会更高。私营工商业者从国家和人民利益来考虑，对于国营经济的发展，也应该是热烈欢迎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资产阶级盼本质相同，但面目不同。因为：（一）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过去就掌握了政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后，虽然一度参加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但马上就受到排斥。（二）希特勒侵占东欧各国后，资产阶级投降希特勒，组织傀儡政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一般没有和敌伪政权合作，许多代表人物并撤退到抗战后方。（三）苏联红军解放东欧后，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一部分逃跑了，一部分则留下捣乱，破坏人民的政权，因而国家很快就没收了他们的企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除极少数人跟随蒋介石外，许多代表人物站到了人民方面。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般地是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全国解放后，在三年来的合作中，是和我们共过患难的，特别是在维持生产、医治战争的创伤、改造旧的社会经济方面，尽过一定的力量，对伺家建设也有一份贡献。所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一定的历史贡献和发展前途的。

在国家建设中，组织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毛主席曾说

---

① 这是在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后同若于资本家代表人物的谈话纪要。

过，广大的农民和城市的手工业者是两个大海。全国的农业人口约达四亿七千万人，要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化，大约需要十年、二十年。城市的手工业者也有很大数量，全国的工商户大约有四百万户，如果连摊贩在内，可能有六百多万户，其中有很大一批是手工业者，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实现合作化，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无论农民或手工业者都应该组织起来，逐步合作化，否则其中很多人将因分化而走向破产，也将影响国家的工业化。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国营经济，今后都将得到发展。私营工商业，特别是工业，一定会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国家现在投资的重点是重工业，如燃料工业、机械工业。在轻工业方面，私营工商业还有广阔的发展园地。国家工业的发展对私营工厂的改进和发展都有好处，比如国家机械工业发展了，能大量生产纺织机、造纸机，就有利于私营纺织业、造纸业的改进和发展。当然，国营和私营企业，发展的速度是不同的，在相对的比重方面，国营将会更大，但在绝对数字上国营和私营都将会不断增加。因此，不应该担心私营工商业没有发展前途。

市场问题。私营商业有一些困难，这是一时的现象。在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劳资关系方面，有些问题一时还没有调整好。但土地改革[2]完成后，农民的购买力会存大幅度的提高。农业增产后，农产品如粮食、油料、工业原料、土产、畜产等，不仅可以供应国内市场的需要，还可队大量出口。农民需要大量工业品，其中很大部分是生活资料，这不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可以包下来的。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和对工业品需求的增加，势必会刺激市场的活跃。所以，今后私营工商业一定会得到发展，首先是工业，其次是商业。当然，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是要受致一定限制的。施复亮[75]先生在天津讲演时，说到资方的三权[76]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是随个人的意愿为所欲为的。这种解释是妥当的。

私营工商业者的经营发展，不应该只是为了生活享受，而应该继续扩大企业的规模。听说目前有一部分拥有资财的人大吃大喝，使餐馆舞厅的生意繁荣，这反映了一部分人在政治上有苦闷、消沉的情绪。应该说服教育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只要正当经营，就会有前途、有出路。

利润问题和市场问题，目前都还没有完全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会有一些麻烦的，但不要怕麻烦。对市场问题，中央正委托陈云[11]同志进行研究，其中也包括这次工商联会议中提出的问题。要把这些问题处理得更好，既要照顾国家的利益，又要照顾私人的利益。工商联应该把这次会议提出的问题，提到中财委[42]研究，但不一定一次就能够完全解决。对于工业资本家，要使他们得到的利润除了用之于扩大再生产外，还能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将来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资本家仍然会保有他们的消费财产，生活水平总会比普通公务人员和工人更高。此外，还要照顾到那些三年来对恢复国民经济有贡献、今天因为社会经济改组而破产的人。他们如果生活困难，国家应给予照顾，要作出范例，使人感到“老有所归”。对正当的私营工商业者，不仅应使他们得到正当利润，而且要在政治上提高他们，使他们感到政治上有希望，认识到对国家多做贡献，是会有好处的。

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未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现

在谈“献厂”，没有必要。有人觉得这样正好可以丢包袱，这是一种消极态度。今天有人在忍受着困难积极从事生产，国家和工商联都应该给以鼓励。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现在谈“献厂”，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发生大的偏差。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

干部问题。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的建设，需要大量干部。大学生的分配要适当照顾私营企业，今年暑期曾分配了四百多人给私营企业，明年还可以增多一些，否则私营企业就难于不断地改进生产经营。今后在培养技术人才方面，除国家和人民团体负有责任外，私营企业也要负起责任来。

国营工厂的技术改进和先进经验，是应该介绍给私营工厂的。不然，同是工人阶级，在国营工厂就能掌握先进技术，在私营工厂就只能掌握落后技术，这样在整个工人阶级内部也会造成不团结。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私有工厂的人才还是远远赶不上需要的。工商业家，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也是参加国家政权的一员。除少数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和“五毒”俱全的分子外，广大的私营工商业者都是有光明前途的。

民主党派成员要积极参加国家建设

[①]

（一九五三年六月四日）

关于参加国家建设的问题。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国家建设了。民盟的成员很多是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岗位上工作的，应该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地参加建设。民主党派的责任，就是要推动自己的成员积极地参加各自岗位上的建设工作，而不是由每个党派都直接领导建设，如果那样，我们的国家建设：就成为多头领导了，就变成无政府状态了。就是工人阶级、共产党也不能是任何一个工人、一个党员都去领导国家建设，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笑话吗？有一家私营商店里的一个东家和一个店员，两方面争辩淮领导谁，店员：说，我是工人阶级，我领导你：东家说，我是店东，还不是我领导你嘛：结果是吵不清。这就不对头。工人阶级领导并不是任何一个工人部去领导，如果任何一个工人都去领导，那就是多头领导了，那就不成为一个国家了。所以无论工人阶级也好，共产党也好，必须经过国家，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经过政府机关，经过经济领导机关去进行领导。国营经济领导私营企业，并不是任何一个国营企业都去领导私营企业。如王府井大街的一个国营商店对隔壁一家私营商店说，我领导你，我让你关门你就得关们。那就不行。“如果那样就乱了。所以，一定要经过国家经济领导机关去领导。学校也是如此，共产党对学校的领导只能经过校务委员会或它的上级领导机关教育部。这就叫作民主集中制，也就是一切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然后再到群众中贯彻下去。这是我们新民主主义的特点。没有集中就没有民主，有民主就需要集中，没有集中的民主就是极端民主，就是无政府主义；只有集中没有民主那就是专制主义，个人独裁。我们要反对这两种倾向，实行民主集中制。所以，民主党派在各个机关、企业、学校参加建设工作的成员，都要服从那个机关、企业、学校的领导，一直到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最高的领导。这样，整个国家才能有计划地、有组织地、有步骤地进行建设。

民主党派在机关、企业、学校的基层组织的任务，就是要推动自己的成员在这个机关、企业、学校里面起积极分子的作用，同共产党合作，并且教育推动它所联系的群众跟我们一起前进。推动了别人进步，也就教育了自己。

各民主党派既要积极参加各种建设工作，同时也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因为我们是政党，政治觉悟总是高：一些，所以就应该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并在其中起推、动作用。过去各民主党派参加了各种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后参加国家建设，还要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矛盾。听说有的民主党派成员因积极参加各种政治运动而放松了业务，或者忙上了业务就不问政治，把政治和业务两者对立起来了。这里也有客观原因。建国三年来，政治运动很多，工作很紧，张，大家忙于运动，而把业务放松了。在座的很多位教授、就吃过这个苦，政治运动参加得多，课教不好，学生不满意，结果是过去的名教授，现在变成了

[①] 这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招待中国民主同盟七中全会代表的茶话会上的讲话节录。

受批评的教授。另一方面，我们现在要进行建设，过去学的那一套很多都不适用了，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钻研业务，而钻研业务，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据说许多位教授最近很紧张，清华大学的教授平均每人每星期要有六十个小时的工作，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用脑筋的工作每天十小时是够累的了。

这种情况很多学校都同样存在，我们政务院[35]讨论高等教育的时候研究了这个问题，准备作适当的调整。过去大家搞政治运动很紧张，现在搞建设又很紧张，如果一直这样紧张下去，不作适当的调整，那就会使大家都得神经衰弱病。听说现在年老一点的教授都失眠，不吃安眠药就睡不着觉。如果大家都吃安眠药那就成问题了，所以必须作适当的调整。现在政府机关把每天一个半小时的学习取消了，机关干部对这件事很赞成，过去的确是疲劳得很。这是一大德政。本来，政治与业务不是对立的，而是结合的，但是要结合得好，时间就不能太紧。

现在，开会大多也是一个问题，要设法调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就是政治，研究如何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也是政治学习。今后如何把紧张情形改变过来，是我们领导机关应负的责任。

在农村工作中主要是反对急躁

①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九日）

五月十六日，曾经发了一个指示[77]。这个指示，一方面指出我们农业生产的前途，一方面指出需要有步骤地干。农业生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乱来。过去存急躁情绪，想一步登天，结果犯了错误。

我们国家总是要到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而且是在走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一天天在增加着。所以，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情绪。在农村工作中，我们主要的是反对急躁。农业机械化的前途是一定要实现的。看不见这个前途，是盲目；另一面，不承认我们的落后和：不平衡的现象，就是急躁。

我们的统计规格不一，但不管怎样，我们的粮食是少的，要想一下子跳到亩产一千斤，根本不可能。同时，要达到那个标准需要出口很多的粮食，千万吨以上，世界市场是否容纳得下？

中国的富农与苏联不同，其性质虽是资本主义性质，但他们没有很大的力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暂时不能全都到城市里来，否则，就需要有相当的工资满足他们。政府的政策主妄是互助合作，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

今年的情况不要盲目乐观，现在已有灾情，但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需要农、林、水利与天作很大的斗争。与自然作斗争需要有预见，我们搞了四年，主要情况不是很朋白的，应该继续了解、分析，希望各部门注意做好调查工作。调查工作不单是一方面的，应该全面。现在农：林、水利己归第四办公厅[78]，请农村工作部把几个部门联系起来。

部门发指示，一定要与多方面商量。这样，我们的指示就会减少。少了，发下去就会得用。

农业部要抓住中共中央及政务院[35]的指示，经常检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要一般化、公式比。

---

① 这是在第一百八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一九五三年春季农业生产情况报告时的讲话。

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

①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高岗[79]同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稿改编得很好，我提不出什么新的意见。只是在开头一段，我仍认为初稿写得恰当全面，较修改稿上“在今后一个相当的时期内，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稳步地实现社会车义的工业化。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一段话为妥。上次贾拓夫[80]同志在全国劳动大会的报告上，也孤立地用过“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口号，我曾提议改了，因为这个口号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作为唯一目标来说是不完全的，其中没有包括农业集体化及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不如仍依初稿将第一段改写为：

“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已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三年多在经济的恢复和改造上的巨大成功。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党的基本任务就是：稳步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有步骤地促进农业的集体化，使我们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实现我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我这样看法和改法，不知是否妥当，请主席和高岗同志予以酌定。如果可用的话，则报告稿十八页未段第一句也须修改，并且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从革命胜利后开始的，不是从今年开始的。

还有，第八页第一行，在“水力电站和造船工业等建设”句，应改为“水力资源、电气化和造船工业等建设”，以免误会为“水力电站”。

---

① 这是致毛泽东并转高岗的信。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①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我今天谈谈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题目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就认定新民主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同纲领》[6]中虽然没有写社会主义的前途，但这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写上去还不成熟。所谓不成熟，不是说在领导分子中间还不了解，而是说还要经过对广大群众的喧传教育。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把它更加明确起来，使它具体化。

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主席近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以后又在全国财经会议[81]上，都曾讲过。他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82]

在过渡时期，对国家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还只是基本上实现，而不是完全实现；只要是基本上实现了，过渡时期就算结束了。

所谓相当长的时期，究竟多少年，不可能说得那么准。毛主席说，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过渡时期的长短，决定于是否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要看我们的努力。

离开了总路线，就要犯大错误。我们在工作中犯一些小错误，发生一些偏差，是难免的。但如果犯了大错误，离开了这条总路线，那就很危险，就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即资本主义的道路。犯这种错误不仅不应该，而且是不容许的。

现在谈几个问题：

第一，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完成这个任务要经过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曾宣布把雇工若干人以上的企业收归国有，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在战后几年也曾宣布把几十个工人以上的工厂收归国有。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电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过去我曾与盛丕华[83]先生说过，将来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

---

①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当然，过渡并不是没有困难，但应看到有利条件。首先是肯定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领导的经济，其他各种经济都要受国营经济的领导。这是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了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其中国营经济部分是处于领导地位的。

在过渡时期要把各种经济纳入国家的总计划中。这在《共同纲领》第三十三条里也早有规定。当然，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把国营经济纳入计划就不容易，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现在还没有制定出来，我们还只能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至于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纳入计划就更困难。因此，使各种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过程。

第二，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有人说，因为朝鲜停战[41]了。这个说法有一部分道理。如果朝鲜战争还在打，我们的军费开支就不能保证没有变动。现在朝鲜问题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但战争已经停下来了。毛主席指导工作有一个原则，当一个任务完成了的赋候，就要赶快提出新的任务，以免松懈下来。我们现在就应该提出新的任务。从这方面说，强调朝鲜停战这个原因是有一部分道理的。但是这不完全。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还有国际国内的各种条件。

从国际方面看，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是：新世界诞生了三十六年，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更加巩固和扩大了；旧世界尽管叫嚣扩军备战，但困难重重。形式上是两个阵营的对立，但矛盾的焦点是在旧世界的内部。这种矛盾，有和平与战争的矛盾，有民主与反民主的矛盾。

旧世界的矛盾，无论在东方与西方，是一天一天地在增长，中朝人民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把美国企图挑起世界大战的时间推迟了，这就不仅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增长，有利于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和扩大，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中民族民主运动力量的增长，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我国进行建设工作。

从国内方面看，开国快四年了，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国防力量愈益增强，各种社会改革也已基本上完成。尤其是这四年来，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基本好转，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加强，人民的积极性也更加发挥出来了。

工业生产方面，总产值如以一九四九年为一百，一九五二年则为二百四十五。今年生产如能完成或超过计划，就可达三百零四以上，农业生产方面，总产值如以一九四九年为一百，一九五二年则为一百四十八。今年的农业生产，由于去冬受冻，今年又有霜灾和虫灾，加上南旱北涝，按原定计划增产百分之六已不可能，估计可稳定在去年的水平或者略少于去年，也可能略多于去年。

关于我国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九四九年，机器工业占百分之十六点四，工场手工业占百分之七，个体手工业占百分之六点八，农业及副业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八：一九五二年，机器工业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八，工场手工业占百分之六，个体手工业占百分之六，农业及副业约占百分之六十。这些数字表明、工业比重已经大大增加，今年还会有所增长。

关于工商业中的公私比重。工业方面（包括现代工

业与工场手工业，不包括个体手工业）：一九四九年，国营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九，私营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七，公私合营占百分之二点四，合作社占

百分之一；＝九五二年，国营约占百分之五十，私营约占百分之四十二，公私合营约占百分之五，合作社占百分之二点六。从相对数字看，国营的比重上升，私营的比重下降，但从绝对数字看，则国营私营都有增加。商业方面：按商品流转总额计，一九五二年国营已占百分之五十，今年还会增加；按零售计，一九五二年国营与合作社占百分之三十二。

以上情况说明：现在开始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国际国内形势都是有利的，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但必须承认还有困难。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我们还有五种经济[30]并存。要使其能够均衡发展，并在新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系非常复杂。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件极大的工作。毛主席说，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只要把问题说通了，还是比较容易的，更繁重的还是农业和手工业问题。对于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需要用不同的形式和速度。农业和手工业是走合作化的道路，私营工商业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我们既然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

我们要在总路线的指引下，确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84]的基本任务。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我们虽然还有一点重工业的底于，但是作为工业化的基础，是很不够的。因此，不能不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苏联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时，重工业的基础比我们大，但他们仍然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我们更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因为我们的底子不行。国防工业是、要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和高级的炮。苏联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计划建设，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把机器卖给苏。联，国际形势还不像后来那样紧张，希特勒还没有上台，还可以按部就班地做。我们现在的情况与苏联当时的情况不同，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当然，我们说：“ 集中主要力量 ”，并不等于冒进。

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我们的技术人才还很不够，培养人才是一个重大的任务。要从各方面培养人才。除各种专门学校外，还要在工厂中培养技术工人，要使干部学习业务，学习技术。

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不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也无法有大的发展。当前特别是要把西南、西北和华北之间的铁路线连结起来。

相应地发展轻工业是为了保证需要。现在人民的购、买力在逐步提高，人口的增长也很快，一年增加一千万，我们要设法逐步满足人民的需要。发展轻工业也有利于伺家积累资金。当然，应该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

来做，首先要注意急需的产品，如棉纱、布匹等。如果我们只看到重工业而不看到轻工业，那就会犯错误。

必须相应地发展农业，否则无法增产粮食。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感到粮食不足。所谓不足，不是和过去的水平比较，而是从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来要求。我们的农业早已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但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则必须随时注意粮食问题，不能疏忽。国家对粮食的管理应该继续加强。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因为耕地面积有一定的限度，开垦荒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农业发展的速度要与工业发展相适应，首先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我国农业生产的手工技术很高，这是可贵的条件。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不能自制拖拉机。将来对拖拉机的使用，也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如山地即不便使用。现在还用不着顾虑使用拖拉机以后劳动力过剩的问题。粮食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农业人口需要粮食，工矿区和经

济作物区的发展也会增加对粮食的需要。此外，还要备荒，还要出口一部分粮食用来平衡对外贸易。

必须相应地扩大商业，否则也要犯错误。

对于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有步骤地进行。

总之，要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才能保证我们计划建设的胜利。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过度时期中，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在当前还不是最后的改造，而是逐步过渡中的改造。最后的改造是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把它变成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而逐步过渡中的改造，是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受到限制，成为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这种限制是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了的。孙中山先生提出过“节制资本”，也就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便它不能无限制地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唯利是图的。在中国，私人资本主义也有黑暗的一面，如“搞“五毒”[74]。对于这一面，我们必须反对。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是要受到限制的，但限制私人所有制并不是取消私人所有制，并不是取消利润。。利润分配是“四马分肥”[85]，资本家还有一份。农业也有同样情况。农业生产合作社[86]是土地入股，可以分红，但要提公积金，也是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手工业合作社也是如此。这些都不是最后的改造，而是逐步纳入总路线的轨道，逐步引导到社会主义。这样的逐步改造，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以达到“水到渠成”的地步。

毛主席说：“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67]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是在《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中规定了的。三年多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因忙于三大运动[88]、“三反”[62]“五反”[63]和思想改造[89]，这方面还用力不多。忙于其他方页的工作也是必要的，不然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基础。过去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现在进入计划建设时期，应该将这个方针和办法进一步明确化并具体化。首先要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各党派、团体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明确起来，承认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员或民主人士中都还没有明确起来。这次财经会议对这个问题又好好研究了一下，现在要在政协和政府委员会中提出讨论。首

先要在领导人物中讲清楚；在共产党内，也是先要在各级领导机构中搞清楚。不要忙于在社会上作广泛的宣传。因为“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话，如果不讲清楚，很容易被误会为马上要实行社会主义。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毛主席说，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而停止不进是不许可的，盲目冒进也是不许可的。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工业方面，高级的形式是公私合营，即企业中有公股参加，公私共同管理，公方处于领导地位，私人所有制是被承认的，但已经受到限制。中级的形式是加工订货，即原料由国家供给，产品由国家收购，由私人进行生产，私人所有制也受到限制，不能到自由市场去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了。低级的形式，一般是原料主要由私人购买，由私人进行生产，国家收购其产品的大部分，私人还能保留一小部分自销。现在已有这三种形式，将来也许还会有别的形式。

商业方面有没有国家资本主义？毛主席说，对私营商业不能简单地以“代替”或“排除”了事。当然，对私营商业中投机倒把、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应该排除。但我们认为，商业方面也有可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如对国计民生确有作用的大的私营商业公司，可以实行公私合营，利用其合理的经营管理，改革其不合理的部分，使其能为国家服务。此外，私营商业可以依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替国家批发，或代购代销。私营商业的数量很大，从大的公司到小的摊贩有几百万户，我们必须带着它们前进。至于采取什么具体形式，这方面的经验较少，还要研究。

我们要使全国私营工商业走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毛主席说：“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87]。这还不是最后的改造。这样做，在领导人物中应该不会发生震动和不安了。

目前私营工商业的比重还不小，在工业中占百分之四十二，在零售商业中占百分之六十八，在私营工商业（不包括手工业和夫妻商店）中的工人和店员约有三百八十万人（在国营工厂和商业中的工人和店员是四百二十万人）。这是国家的一大财富，对国计民生还有很大的作佣。毛主席说：“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87]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它，加以领导，国家建设工作应该把它计算在内。

我们还应该看到两种现象。第一，有些工商业家对国家还保持着很大的距离，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不允许唯利是图的，对此必须限制。第二，在工人群众中，有些人也没有看清楚这个问题，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这样就不好了。毛主席说：“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87]。要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私人工商业如能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就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部分地为资本家谋利，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关于利润分配问题，最近毛主席找在工会工作的同志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进行了研究，如将赢利作为百分之一百，比较合理的分配是：所得税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五，工人福利占百分之十五，公积金占百分之三十，资本家的所得占百分之二十点五。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适一些。所谓“四马分肥”，实际上是“三马”，因为公积金是三方面的。如果能这样做，不论是否实行了

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基本上为国计民生服务，部分地为资本家谋利。当然如果采取国家贤本主义的形式，就能更好地实现这种分配。我们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既不同于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更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中国型的国家资本主义。

要对工人和资本家两方面进行教育。在工会方面，今年五月间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90]，刘少奇同志讲了话，会议讨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对工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工作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我们这一次会，邀请了各地的工商业家来参加，目的就是要使工商业家也能了解这个问题。我们要在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栅人民团体中培养核心分子，团结起来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而奋斗。毛主席说：“ 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贤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87]

大部分资本家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还有一部分会抵抗，对这点必须估计到。毛主席说：“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 ”[87]。要区别强制与自愿，对反动阶级要强制，对民主阶级内部的事情要根据自愿，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当然，也要造成一种有利的形势，要“ 因势利导 ”。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以国营企业为最高，公私合营的次之，加工订货的又次之，这说明国营工业的优势和优越性；另一方面，还应该使私营企业有利润，使资本家对其私人所得完全可以自由支配。毛主席说：“ 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 ”[87]

有人问，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之久，不知道做了什么文章，会不会搞“ 小五反 ”？毛主席说，没有所谓“ 小五反 ”。现在不需要搞“ 小五反 ”。上海偷税漏税的事有十六万件，其中以中小的为多。偷税、漏税性质也有不同，税制上也有毛病，这些都要整顿处理，但并不需要搞“ 小五反 ”。现在要大家商量一个办法，政府来做，大家支持。文章就是一篇——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总结起来说，至少要三年到五年，才能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这并不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要几个五年计划，两者不可混同。一方面，我们反对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停止不前。现在不动将来就要痛，现在向前将来就会愉快。另一方面，急躁冒进，想一步登天，也是错误的。

国营经济是领导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被领导的，这点必须确定。国营经济不谋私利，只谋公利，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而私人资本主义还要谋一部分私利。所以，不能在一切问题上一律对待，要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私人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所以又要一视同仁。这就要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数量质量等等。这样就会使工人感到，不论在国营企业或私营企业中，工作都是光荣的。资本家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不投机倒把，不搞“ 五毒 ”，其任务也是光荣的。这样西方面就能合作了，就能实行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公私兼顾、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资两利了。

现在这样做，还不是多数人都懂得的，我们要做很多的教育工作，把这

些道理说清楚。共产党当然首先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同时还要动员工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业家，大家来做这件工作。政府部门也准备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私营工商业方面的事情，使这方面的工作更加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与国家资本主义

①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

《共同纲领》[6]已经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次会议全面地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指明国家资本主义是引导私营工商业走上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为的是把改造的性质和目标更加明确起来。

改造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

为什么要着重提出经济改造？因为经济是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建筑，如果经济不得到改造，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不能有依赖心理呢？比如由苏联搞重工业、国防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行不行呢？我看不行。我国是一个近六亿人口的大国，地下资源很丰富，如果不努力建设自己的工业，特别是建设重工业，那就不能立足于世界。旧中国的工业基础很薄弱。孙中山先生说过：我们要迎头赶上。现在我们有机会，要加紧赶，不赶就要全盘皆输，就站不住脚。今天的世界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抗美援朝[41]的胜利，打乱和推迟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时间表。但是，我们不能松懈，有备则无患。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钻空子。我们必须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建设国防工业，这是不能推迟的。工业建设不是短时期的事，例如，基本建设一百四十一项要全部完成，就需要七年的时间。有人说：“到那时也不过才赶上七七事变时日本的水平，算什么？”但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是不容易的事。如果不搞，连这个水平也达不到。总之，经济是基础，经济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础，而国家工业化又是实现经济改造的关键。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这是一百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所追求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宏伟事业。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希望大家仔细地想想这个问题。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我国便进入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中心内容，就是实行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现在的国家制度，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但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完全相同。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我国革命则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两国情况不同。我国政治上居于领导地位的是工人阶级，经济上居于领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我们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四个阶级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一直到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集中他说，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一九四九年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产值比重是公四私六，到去年底变成了公六私四。在绝对数字上公私都增加了，但国营

---

①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总结发言的节录。

增加得更多。这个趋势就说明了我国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不要隐讳这个趋势。

毛主席说：“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87]。就是说，国家资本主义是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经之路。现在要把这个问题明确化，肯定下来。至于具体化，还要做许多工作，这是今后的任务。目前，国家资本主义在工业方面有公私合营、加工定货和收购产品三种形式，以后或许还会创造其他的形式。商业方面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出现了公私合营、代购代销、代批发等形式，但现在还很不成熟，还需要摸索经验，总结提高。

国家资本主义并不就是将私人企业收归国家所有。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国家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而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至于这种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占多少，那要看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高低而有所不同。因此，不能说实现了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完威了社会主义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取消资本主义所有制，它只是有限制的资本主义，还需继续改造和提高。当然，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西欧的自由资本主义是不：同的，它不能自由泛滥。即使未参加国家资本主义的私人工商业，也不容许自由泛滥，随便关厂、让工人失业就不行，囤积居奇或销毁产品也不行，投机倒把的那就一定要受到惩治。资本家的企业所有权、用人权、经营管理权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如果资本家要辞退工人，必须到劳动局打招呼，生产管理也要和工人协商。有人说这种资本主义是新型的资本主义，这个说法不完全，如果科学地加以解释，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国营经济领导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资本主义。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私营工商业，四年来的经验证明是正确的，可行的。毛主席说：“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87]。这里所说的“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就是说，不少于三年但可以多过五年，搞不成还可以推迟，不能急躁。所说的“基本上”就是说不是全部，从数量上讲，总要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现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数量已经不少，凡是和国家经济联系合作的私营企业，就带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据七个城市一丸五二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国家资本主义从高级到低级的各种形式，上海古当地大型私营工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八，武汉占百分之六十五，西安占百分之七十，哈尔滨占百分之七十六，杭州占百分之六十三，沈阳占百分之五十五点九，广州占百分之三十二。据国家计划委员会估计，全国带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占整个私营工业生产总值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以户数来说，上海大小工厂二万多，其中国家资本主义工厂有七千多。从以上这些数字看，国家资本主义的百分比已属不小。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决定的方面是大、中企业，而不是小企业。只有大、中企业纳入了国家计划轨道，全国经济建设才能更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小企业的数量虽大，但不起决定作用。对于夫妻商店和摊贩，还要研究办法，帮助他们逐步纳入计划轨道，逐步提高。目前各种形式都要有，一般可以维持原来的形式，不要急于改变。逐步提高的内容很多，如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进行生产改革和增加生产等。

荣毅仁[91]先生关于工商界对待国家资本主义的六种态度，分析得很好。对于抵抗的一类，还要加以分析。有的是由于不了解情况，怕国家把什么都

拿去，他们还要看一个时候。对这些人就需要我们去教育、帮助。另一种，他们只喜欢自由发展、垄断居奇、投机取巧、牟取暴利，甚至和国家对立。对这些人就要给以限制，进行斗争。限制也不困难，国家的办法很多，比如他要垄断，国家就可以多开个同类的厂。当然，如果不居奇、不垄断，国家就应该允许他们获得一定的利润。

个体农业、手工业，是两个大海，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因此，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走完过渡时期。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

①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我们的工作方面很多，为什么把经济作为总路线、总任务呢？因为它是基础。毛主席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92]，军事是政治斗争的最高级的最尖锐的形式[93]。所以，政治、军事和文化工作，它的基础都是经济。没有这个，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

现在说一下在这样一个总路线、总任务、总方针下，我们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

关于在这个总路线、总任务、总方针之下，我们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84]的基本任务，高岗[79]同志在今年上半年向中央提出了一个报告，中央批准了，后来又把它具体化了，现在就具体化在国庆节的口号[94]上。

“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因为没有动力工业、钢铁工业、机器工业和化学工业等重工业，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完全独立，就谈不到国家工业化。过去中国也有很大数量的轻工业（当然跟人民的需要来比还差得很远），那是半殖民地的经济，还有一部分工业是为帝国主义加工订货，附属于帝国主义，依靠帝国主义，人家是工业帝国主义，我们变成农业中国，被剥削，被掠夺，为人家生产，致使中国人民一天一天地贫困化。因此，没有重工业，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完全独立。现在，我们革命胜利了，如果说我们的兄弟国家重工业有基础，让它们搞重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的分工是不可能的，这就等于让苏联背上一个比它更重的包袱。我国的人口是五万万八千万，比苏联的人口多两倍，苏联怎么能担负得起呢！我们不应该这样想，苏联也不希望我们这样，它希望我们也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而且是有重工业的国家。这样，才能满足共同发展经济的愿望，才能团结得更坚固更强大。我们也应当如此。发展重工业，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工业化。这一个真理，连资产阶级都懂得。在二三百年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凡是能站起来像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都搞了重工业。当然，现在的国际形势变化了，有些原来是工业发达的国家也依靠美国了。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是走这一条路的。我们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应该走更近的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集体力量就更大，更有计划，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

有了重工业以后，才能使国防现代化，经过抗美援朝战争[41]，我们的国防力量强大起来了。可是，我们还不能制造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高级的炮（如一五二加农榴弹炮、一三〇海岸炮）。在运输上，我们自己也还不能制造一辆汽车。你们曾经在工业展览会上看到有一辆汽车，那是人家的料于，我们装配的，不是真正我们自己制造的。既然我们不能制造一辆坦克、一架飞机、一门高级的大炮和一辆汽车，那我们的国防力量怎么能算强大呢？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是从苏联购入的，这就等于让苏联在国防上还要背这么大一个包袱，这也是不应该的。我们要自己生产这些东西，就要搞重工业。因此，我们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这样才能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

---

①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所作政治报告的节录。

防现代化的基础。这是不可动摇的。

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其他的都不搞了，农业不发展了，轻工业也不发展了。那是不行的，因为只有重工业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广大人民不仅需要重工业的生产资料，而且还需要一些轻工业的生产资料。因此，国家对工业（又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比例要恰当。在这个比例中间，重工业占的数字最大，但它还不是绝外的，只是集中主要力量。

“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

因为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就应该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现在，我们国家最需要的是建设人才。中国不仅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这是二中全会[4]指出来的。我们的文化很古，有五千年（或三千年）的历史了。古至古，但是现在是落后了，我们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很低，文盲很多。详细的不去说，就是这两条，即足以说明我们现在的文化是很落后的。说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高，这是事实，不然为什么中国革命成功了呢？但是，拿文化水平、技术水平来说，中国工人是赶不上美国工人的。我们的技术、文化水平是低的。我们今天要搞建设，光是政治觉悟高就不够了，还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使用机器来发展工业生产。这就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从技术工人、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到企业行政管理人才。这就需要从大学教育、中等教育、技术教育、工厂里面的艺徒教育等这样一套教育中，培养建设人才。企业的管理干部也要去学习业务，虽然不一定每一个企业管理干部都去摸机器，但是对机器的性能、规格以及生产程序和生产制度等，都应该懂得。不懂得，怎样管理企业呢？所以也要学习。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做小学生，在学习。

培养大批的建设人才，是我们现在最中心的问题。斯大林同志在苏联实行第一、二个五年计划当中，曾经先提出“技术决定一切”，以后提出“干部决定一切”。我们现在是既要技术又要干部，这两方面部需要加强起来。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95]我们过去熟习的东西快用不上了，当然经验还是宝贵的，但是不熟习的事情一天天多起来了。这就必须调配干部来领导学习和领导国家的建设工作。这个问题就是组织会议的中心问题，把你们请来就是向你们要人。培养建设人才，是摆在你们面前的第一项任务，你们要搞社会主义就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

你们会问：这不又是组织“条条”管“块块”了吗？不是的。在财经会议[81]上，最后毛主席在讲话当中已说清楚了这个道理，他们都懂了，你们比他们后懂一点，你们回到“块块”以后，他们不会向你们提出先解决“块块”后解决“条条”的问题。两者不是对立的，意图是一致的。

你们又问：既然这样，那么是否就只有经济建设给，别的不给？不是这样。所谓建设人才包含很广，文教人才也是建设人才，刚才不是说要训练干部吗？不给文教，不给大学校长，不给中学校长，那个地方没有人去领导，人才就训练不出来，所以文教也要给。当然，要有重点地给。文教要给，政法是“冷门”，政法不给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吧？政法也要给一点，政法要检查国家建设，看看出毛病了没有，不然一出大乱子就是几千亿[12]，所以也要

给，也要有重点地给。这样一说，大概外交是“冷门”，可以不给。我也要宣传一下，外交也不是“冷门”，可以让他报告形势嘛！斗争出一个国际和平环境来，这对于我们的建设就更有利嘛！所以，哪一门也要给，不过要有重点地给，要分清轻重缓急。中央组织部，大行政区[46]、省、市组织部都要掌握这一点。

要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中国是一个大国，虽然有两万四千多公里铁路，但是，以全国人口、地区来说，交通还是极不发达的。如果不把西南、西北、华北贯串起来，那么，新的工业基地就不能建设，城乡物资交流就不能发展，全国经济还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这是不行的。所谓先行企业，就是动力、地质勘察、交通运输，它们是开路先锋。所以，交通运输业在五年建设中还要占很一大的比重，投资也比较大。

要相应地发展轻工业。我们国家人口这样多，土地改革[2]以后，农民的购买力在增长着，这是全国最主要的购买力。他们需要生活资料，需要生产资料，我们购买了他们的粮食，就应该供应他们轻工业产品。但是，我们现在轻工业的比例是不大的，尽管花纱布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上。因为我们的纱锭太少（以全国人口算，一百个人只有一个纱锭），还是跟不上农民需要的增长，还需要大大地发展。如果私人企业家愿意把游资拿出来，把他分配到的利润拿出来投资轻工业，对国家是有利的，我们欢迎。我们今天不能把主要的投资放在轻工业上，只能相应地发展轻工业。所以，只能逐步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完全满足还要相当长的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不行的。

农业更需要发展。我们的交通运输业不发达，轻工业不足，同时我们也是一个农业不足的国家。我国人口之多是世界第一，现在已经是五万万八千万了。拿这个数字来和美帝国主义斗争，会增加我们的信心。人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但是，优点中也带来了困难，这样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其中，农业是负担的一个主要方面。因为人民首先需要的就是粮食，衣服可以穿破的，可以少穿一件，而粮食每天要吃。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农业的发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只能逐步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我们的农业发展很不平衡，在地区的分布上，有的地区人口很密，每人平均得不到一二亩地：有很多地区则人口极少，移民也不容易一下都移了去。所以，在长期内发展生产要靠增加单位面积产量，这就需要我们很大的努力。我国的人口还在增加着。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我们现在的粮食，以粗粮算，每人每年平均五百斤左右，当然今后还会增加，但增加的数目不会太快。如果五百斤粗粮折成细粮仅仅够吃，而这个够吃是平均计算，实际上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也很难调剂，有些缺粮的地方还是不够吃。就是移民，也不能每年移一千万，世界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因此，还是要在本地增加生产。我们的粮食产量，要求每年增加百分之六，去年在前年的基础上，增加到了三千二百七十多亿斤。今年遇到灾荒，粮食产垦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六，即增加二百亿斤，那是很费劲的，恐怕增加不了这样多。但是，粮食的消费却增加得很快。过去，农民过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现在他们生产了粮食，要求改善一下生活，每人每天多吃一两米并不算多，全国四万万八千万农民合起来一年就是一百多亿斤。我们每年增产的粮食也不过是二百多亿斤，如果将粗

粮折成细粮才一百多亿斤，而农民每人只要多吃一两米就给吃掉了。这是说的农村。城市工业人口增加了，也需要粮食；经济作物地区也需要粮食；灾荒地区每年也都需要救济粮。另外，我们还要争取一部分粮食出口，换回机器。中国拿什么东西向兄弟国家（这是主要的）甚至向资本主义国家换回机器呢？主要是农产品。在出口的六种东西中，就有粮食、油籽、牲畜、土产、经济作物五种是农产品。粮食的生产跟不上需要的增长，这种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存在。因此，要用极大的力量注意发展农业，注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地方党委，特别是省以下的党委，除去一些城市搞工业外，主要的力量都应该放在农业方面，这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有很大的作用。

商业也要发展。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的购买力提高了，需要量也增大了，需要供应的东西多了，所以，商业也要相应地发展。今年上半年，由于我们对市场估计不足，我们部分地退出了一些市场，私人商业发展了：有的东西少收购了一点，市场上出现了脱销现象；这是一个错误。应该扩大我们的商业，扩大城乡、内外物资交流，逐步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

所谓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就是说，互助合作运动要根据自愿两利的原则，逐步地由低级到高级，不能性急。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就能够证明给农民和手工业者看：个体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不如集体；个体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合作不如集体农庄。当然，照现在的情形看，还没有做得那样好。这是因为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技术很高。这一点我们自己不应该妄自菲薄。比如农业，我们每亩地平均产一百七十八斤粗粮，而苏联的机器生产只有一百七十二斤。我们农业、手工业的生产量能不能再增加呢？还可以再增加。张鼎丞[96]同志在福建的调查就证明了这点，劳动互助就比单干的产量高，生产合作社就更高。只要证明给农民看，那么，农民就会走上集体化、合作化的道路。现在，我们的国营农场还有缺点，成本很高，这都是由于经营不善所致。

手工业也是一样，要证明给手工业者看，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产量、质量就会提高，成本就会降低，销路就会推广，因此大家分的红利也就会增加。这样，大家就愿意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了。

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条必由之路。这个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在二中全会的决议上就指出了国家资本主义这种经济成分。在《共同纲领》[6]中就具体地指出了加工订货、公私合营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现在就要把它明确，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就是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这条道路。首先是工业方面，要吸引私人资本主义从包购包销逐步提高到加工订货、公私合营，要证明给私人资本主义看，和国营合作，利润就是比自产自销的大，只有这样，才能引导私人资本主义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事实上，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国营经济由于全部都是计划经济，利润最高；公私合营的企业，由于经过了生产改革、民主改革[97]，工人的生产情绪高涨，利润自然就多；加工订货、包购包销差一点；自产自销当然就更差了。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因为那些自产自销的企业，民主改革、生产改革没有进行，或者进行得不彻底，工人生产积极性不高，当然生产就不能提高，利润就少。这就证明给工业资本家看，只有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对他们自己也有利。

盈利怎么分法呢？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四马分肥”[85]：第一是国家收的所得税，第二是工人得的福利金，第三是工厂保留的准备扩大再生产的公积金，第四是私营工业家的利润[87]。

毛主席亲自调查过一些典型的工厂，也跟一些市委书记谈过，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国家的所得税占百分之三十五，工人福利金占百分之十五，公积金占百分之三十，资方的红利占百分之二十。资本家所得的少了一些。

根据现在私营工厂的情形，陈云[11]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四种情况：第一种，企业有利可得，但是，资本家独占盈利，或者拿一部分盈利引诱工人，只是劳资分肥，国家既没有得到所得税，工厂也没有留公积金，这种情况是不好的；第二种，因为民主改革、生产改革都没有进行，企业得不到盈利，也就谈不到分盈利；第三种，资本家分得的利润多一些，不是百分之二十，而是百分之二十五，甚至比百分之二十五还多一点，这是比较正常的；第四种，国家所得税是百分之三十五，公积金也保留了百分之三十，但是工人的福利费却多了一点，因此资本家就分不到多少盈利，有的甚至少于百分之十，这样，资本家就不愿意经营厂子了，这种情况是不好的。

对这四种情况，要分别加以处理：第一种，要打破资本家独占盈利或者劳资分肥、损害国家的作法，要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第二种，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使企业得到利润，然后再去分肥；第三种，正常状态的要维持下去，即使资本家分的利润多于百分之二十五，就让他多一些，这样可以影响其他资本家也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第四种就要说服工人，使他们认识到，这些工厂如果实行了“四马分肥”的办法，那么，主要的还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了，只有部分是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私营工厂的工人和国营工厂的工人是一样的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一样的光荣。资本家如果服从“四马分肥”的办法也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了。这样，就可以使大家都愿意走国家资本主义这条道路。

这样一个办法，首先在工会进行了讨论，并作了决议，传达下去了。最近，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也都宣布了，并且也和资本家讨论过了，他们觉得这个办法好。当然，也不可能一下使所有的资本家都赞成，有的是赞成，有的还要观望一下，看一看。毛主席说：可以看，已经看了四年了，你再看四年嘛！相信能够保证他部分的利润，稳住了，他就会走这条路。因为自产自销，如果投机，就要干涉；不投机，就可能不那么稳。总之，要引导、督促资本家走这条道路，首先是大资本家。因为他们现在多数已经加工订货、代购代销了，公私合营的较少，三者加起来百分比是很大的。几个大的城市都超过了半数以上，有的则到了百分之七八十（这是以产品的产值来说）。中小工厂的户数虽多，但产值不如大工厂的多。

在没有宣布这个办法以前，有些资本家说：国家资本主义好是好，有利可图，但是无利可得。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企业得到了盈利，但是工人主张增加公积金，扩大再生产，不给他们分利润，这还不是有利可图、无利可得吗？我们说，还是应该使他们有利可得。不过，不许他们唯利是图。唯利是图，就是一利是图，只对资本家有利，那是不许可的。

我们公开地给他们讲，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一个受限制的、不完全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哪些方面受限制呢？二中全会的决议上已经说了，就

是在市场的分配上、在经营的范围上、在劳动政策上、在税收政策上都要受限制。所有这些都限制了私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是自由泛滥、自由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垄断，垄断就出危机，危机就出战争，战争就出贫困和死亡，这是资本主义循环的规律。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因此资本主义要受限制，这是肯定的。

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不完全的资本主义。比如，资本家有一个工厂，能不能不得到政府同意，不得到工人同意，随便就关厂，随便就出卖呢？那不行。要得到政府批准，要得到工人同意。资本家生产的东西，能不能像美国资本家那样，麦子多了就烧掉，咖啡多了就丢到海里去呢？不能。如果那样，不就是完全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了吗！现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一种受限制的不完全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因此，我们就有这么一个条件，逐步地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

毛主席说，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期待三年、五年，至少三年、五年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98]。现在大城市轻工业产品，有百分之八十是属于资本主义这个范围的。在这百分之八十产品里面，有百分之八十的产品由国家收购，其他百分之二十归他们自产自销。所以，全国的私营工业有三年、五年的时间，一般可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当然，毛主席还加了一个“至少”，就是说，不能少过三年，可以多过五年。上面又加了一个“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那就是说，把产品的总值数量大的这些工厂纳入，那些中小的就比较难，户数虽然多，产品总值不多，那就得慢一点。

关于商业。过去觉得商业好像不容易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曾经说过排除商业。现在看起来，这样不够了，我们可以利用它，也可以改造它。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商业当然要排除。比如，我们现在就要以法律把粮食批发商、投机商取消。但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或者今天还需要它周转市场的商业，我们还要跟它合作，尤其大的公司也可以公私合营，现在已经有五十多个公司公私合营了。也可以由国家规定价格，叫它代购代销。也可以让它遵守国家规定的价格，代我们批发。这些正在摸索中，比起工业那套办法来，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还不多，还要继续摸索。

总之，对商业我们也需要有很好的处置。能代替的当然要代替，但还有很大数目我们一下不能代替，因为它还有很多店员、职员等等，我们一下还包不过来。商业对发展经济还有好处，我们应该尽量利用、改造。这就是怎样来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条道路现在是确定了，我们做得好，可以在这样一个道路上稳步前进。

三年、五年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并不等于说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最后改造。完成对私营工商业最后改造，要国有化，那还得相当长的时期。两者要区别开来，不要把它混同起来。因为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还没有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取消，只不过是动摇了，或部分变更了。最后改造，是要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取消，只是把个人带进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资产阶级既然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承认国营经济领导，这个可能性就增长了。这是毛主席根据中国的具体环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然，总的真理还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搞社会主义。但是，对中国资产阶级用这样一个方式来把它逐步地改造、变更、取消，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发展。

我们经过这四年工作，证明是可能的，而且这种可能性一天一天在增长。

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还要跟整个社会改造结合在一起。刚才讲了经济，还有文教，还有政法，还有军事，要在各方面造成一个形势，甚至连家庭形势都要改变。许多大资本家的子女都在学校里学习，大学毕业成了国家的干部后，就要为国家服务，到那时他还要什么家里的遗产呢！当然，这里面不会没有乱子，也不会没有抵触的人，但是多数人都可以改造过来。所以，要从整个社会的改造造成这个形势。这是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的。

要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它们今天的作用还很大，不可忽视。农业是大家很了解的，除了合作化以外，还有个体农业（单干户），不要忽视他们。中国的个体农业、手工业这种生产方式，增加产量还是可能的。个体农业可以深耕、细作、积肥、锄草，增加产量。手工业在今天的作用也很大，据中央农村工作部调查，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在某些地区几乎百分之八十是由手工业方面供给的，现代化工业供给的还是少数。就是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手工业数量也还占很大比重。它们供应人民的需要，是辅助工业供应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今天日用品工业的发展还不能很快，还要有步骤地相应地发展。因此，手工业辅助工业供应的关系就很大，不能忽视。而且我们手工业还包括手工艺，将来对现代化工业都有帮助。

刚才说了，私营工商业的作用是很大的。这一点，我们单从工人数目上也可以看出。据总工会调查，私营工商业的职工、店员有三百八十万，国营工商业系统的职工、店员有四百二十万。这两个数目相比几乎相近，国营的数目并没有大过私营数目多少。当然，国营工业的生产量是很大的。国营工业的生产量连上公私合营、合作社经营的，去年已到了百分之五十八，而私营是百分之四十二。因为私营的没有民主改革，同时它是分散的，小厂多，所以工人也用得多。我们对私营工商业不能忽视，要发挥它们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生产增长，使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

上述这些，都是整个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所应注意的一些重点。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为了保证我们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比重的稳步增长，也就是为了保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为什么一定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没有生产的发展，片面地提出生活的改善，那是会发生错误的。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提高了，退不下来，结果成本就高，为国家积累资金、建设新企业就少，生产就不能发展，工业比重就不能增加，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就不能增长。不进则退。这样，同样给工人带来困难，甚至失业；给农民带来贫困，生活不能得到改善。这个道理，过去党中央已经讲过很多次，我就不详细说了。军需工厂生产力过剩部分应

移交政府有关部门经营

①

① 这是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的信。

（一九五四年一月五日）

总后关于军需工厂生产力过剩的报告[99]附上请例。我意，基本方针应是：将军需工厂精简到适合国防需要和保留一定比例储备的生产力的程度，其过剩者应移交给政府有关部门经营管理；为有步骤地实施此方针，可采用一些过渡办法，如报告中建议的一、二、三等项。至于八小时工作制应予考虑，但亦应与计件工资制结合进行。以上均为我个人不成熟的意见，请高主席[79]邀集总后及政府中各有关部门（如商业、纺织、轻工业、劳动等部）会商一下，并提出具体解决方案交军委、政务院[35]审核。

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①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间，中央人民政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6]的规定，先后完成了全国大陆的统一，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2〕，进行了广泛的和深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00〕和各种民主改革运动〔97〕，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着重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经济，初步地调整了公私营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随后，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就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84]，着手有系统地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部工作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对于计划的许多细节还在进行补充和修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大家已经知道的，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是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

① 这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内工作部分。

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当然，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贪图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

我国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迅速地完成了工业恢复的任务，在恢复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六点九。在建设期间，工业发展的速度当然要低些，但是一九五三年工业总产值仍然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五四年预计现代工业的总产值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四点二倍，如果再加上农业和手工业，那么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二点二倍。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旧中国是不能够设想的。

拿几项最重要的工业产品的一九五四年预计产量来同一九四九年产量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的动人的数字：电力一百零八亿度，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二点五倍；原煤八千一百九十九万吨，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二点六倍；生铁三百零三万吨，等于一九四九年的十二点四倍；钢二百十六万吨，等于一九四九年的十三点七倍；金属切削机床一万三千五百十三台，等于一九四九年的八点五倍；水泥四百七十三万吨，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七点二倍；棉纱四百六十万件，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二点六倍；机制纸四十八万吨，等于一九四九年的四点五倍。当然这些产量还是很少的，但是它们的增长状况表明，只要坚持努力，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在工业的发展中应当指出三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是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在一九四九年，这个比重大约是百分之十七，而在一九五四年预计将近百分之三十三。第二是生产资料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一九五四年消费资料的产值预计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三点一倍左右，而生产资料的产值却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五点七倍左右。生产资料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在一九五四年预计将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上升为百分之四十二点三。第三是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由于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一年一年壮大，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开始成批地转为公私合营工业，这一比重在一九五四年预计将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十七上升为百分之七十一左右。这就是说，没有转为公私合营的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只占百分之二十九左右了。

这些统计表明我们的国家正在向着工业化的目标前进，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

我们原有工业的基础虽然薄弱，却是目前我国工业产品、工业利润和工业人才的主要来源，忽视这个基础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基地和工业企业，发挥它们的潜在力量，增加生产品的产量和品种，使它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培养人才和供应设备，并且供应人民的需要。但是我国原有的工业究竟是非常落后的、零散的、不平衡的，因此，为了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就必须主要地依靠新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和改建的重大工业建设项目约有六百个，大家知道的苏联协助我国建设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就是其中的骨干。在这些项目中，有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企业、煤矿企业、石油企业、各类重型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飞机制造厂、电力站、化学工厂等。这些建设项目的完成将使我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使我们可以自己生产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采油设备、锻压设备，自己生产汽车、火车头、拖拉机、飞机，并且将使我们有新的工业区域和工业基地，使我国目前工业分布上的不合理状态开始发生变化。这些项目的大部分将在一九五八年完成，其余部分需要将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一九五三年全国完成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较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六，一九五四年计划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又比一九五三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八。一九五四年新建、改建和续建的重大工业建设项目共有三百个，预计在本年内可以有五十一个重大项目完成建设。在苏联协助我国建设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中，已全部或者部分完工并投入生产的有十七项，包括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薄板厂，阜新的海州露天煤矿等；正在施工的有三十四项；其余都正在设计，不久就可以开始施工。

根据上述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规定，关于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规定，关于优先发展国营经济、鼓励和指导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定，并不是空谈，而是我们正在实现着的活生生的事实。全国的劳动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英勇奋斗，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的祖国的面貌。我们一定可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有计划的工业生产和工业建设对于我们是一个完全新的课题，我们必须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从最近几年的事实看来，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是有进步的。我们的工业管理的水平正在逐步提高。各工业部门在实行计划管理、建立责任制度、改进技术领导、扩大地质勘探力量和基本建设力量等方面都得到了许多成绩和经验。广大的职工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劳动竞赛运动，在技术上也有了不少的发明和创造。依靠管理人员和职工群众的共同努力，一九五三年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三，同年中央五个工业部的产品成本比一九五二年平均降低了百分之三点二。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自满。我们既然是在开始学习，必然要遇到许多困难，而且已经遇到不少困难。我们还必须克服许多工作上的缺点。我们的年度计划并不是都完成了。例如一九五三年中央六个工业部的基本建设计划就只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四点三。水力涡轮、原盐和糖的生产计划也没有完成。没有完成计划的建设单位和生产企业更多。例如根据重工业部的检查，重工业部一九五三年总的产值计划是超额完成了，但是它所属的生产企业却有百分之二十五没有完成计划；并且，如果从生产总值、成本、利润、劳动生产率四种指标来检查，全面完成四种计划的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三十。此外，有些企业的计划定得过于保守，很容易超额完成，失掉了指导生产的意义。最突出的如沈阳染料厂一九五三年竟完成了利润计划的五倍以上。这些严重的情形在其他的工业部也同样存在，有的甚至更严重。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来改变这些情形。

目前工业方面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计划性不足。我们现在还有许多计划不够准确，不够完整，常常互相脱节，并且常常变动。很明显，这里有很多客观的困难不容易在短时期内克服。但是毕竟有不少供应、生产、销售之间的不平衡，不少产品的品种、规格的不合需要，不少建设工作中的勘探、设计、施工的不能衔接，不少交通运输、工业城市规划和工业建设的不相配合，是由于主观努力的不足和工作中的错误而来的。这方面的状况必须尽可能改善，以减少国家的损失。各个企业、各个主管部门和国家的计划统计机关必须系统地全面地研究生产和需要的情况，研究建设工作中各个环节的情况，进行反复的周密的平衡和计算，加强各有关部门相互的配合和协作，并充分地吸收广大的职工群众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规定各种指标，订出先进的确实的计划。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还必须进行深入检查，及时地发现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以保证国家计划的全面的完成。

工业方面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由于许多部门和企业不重视节约资金、不重视管理财务成本而形成的巨大的浪费。《人民日报》今年八月七日发表的太原热电站建设工程中的浪费情况，就是一个惊人的例子。这个工程因为盲目采购材料积压资金一百四十四亿余元[12]，因为没有及时向国家申请调拨物资损失二十五亿七千多万元，因为材料使用的浪费损失十八亿余元，因为劳动效率过低损失二十三亿五千多万元，因为工地临时建筑标准过高浪费二十三亿元，而因为工地物资散失和购置家具的浪费所造成的损失还不在内。这种情形在目前的基本建设工程中还远不是少数。不少的基本建设工程还没有规定适当的建设标准，而有些城市、机关、学校、企业又常常进行一些不急需的或者过于豪华的建筑，任意耗费国家有限的资金。许多工业企业在生产中由于管理机构庞大、管理不善、原材料使用不当、劳动组织不好、劳动纪律松懈、产品质量低劣、对生产安全注意不够等项原因也造成国家的巨大损失。按一九五四年的计划指标计算，单是中央的六个工业部加上地质、建筑工程、铁道、交通、邮电、林业六个部，只要降低基本建设的建筑安装成本的百分之一，就可以每年为国家节约二千八百亿元；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工业的生产成本只要降低百分之一，就可以每年为国家节约八千四百亿元；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要提高百分之一，就可以每年为国家增产一万六千亿元。因此，为了增加国家资金的积累，为了消灭浪费，一切国营企业和建设单位必须全面地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国家的计划，贯彻经济核算制，建立严格的节约制度，力求降低成本。

技术力量的不足和技术管理的不善，也是工业方面的重要问题。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我国工业中原有的技术力量很弱，我们现有的高等学校所能培养出来的技术干部，在数量上、门类上和质量上都还不能在短时期内满足工业和基本建设的需要。在这个情况下必须更加合理地有效地使用和提高现有的技术人才，加强技术组织工作和在企业中培养技术人才的工作，以便提高现有的技术水平和企业管理的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新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并保证完成现代化的新企业的建设和掌握这些新建企业的生产技术。但是恰恰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许多工业企业和工业管理机关没有正确地分配技术人才，没有把他们组织起来合理使用，没有在技术工作中建立必要的制度，没有严格地贯彻操作规程和技术安全规程。许多企业虽然注意了一般技工的培养，但是还很少注意技术人才和高级技工的培养，对于技术试验和研究工作也注意不够。这就使许多本来可

以解决的技术问题也变得不能解决或不能正确地解决了。这些混乱状况必须迅速克服。各个企业应当用大力开办技术训练班和各级业余技术学校，组织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认真学习技术，研究和推广苏联的先进经验，特别是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从设计、施工、安装直到开工生产的技术经验，并且在广大职工中有领导地开展技术革新运动。

加强计划工作，加强节约，加强技术管理，这些就是工业部门的迫切任务，也是交通运输业、邮电业、水利、林业和各个进行基本建设的部门的迫切任务。这些任务，大部分也是商业部门和国营农业的管理机关所必须注意实现的。

我国的农业在土地改革以后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五二年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农业在一九五三年因为有较重的自然灾害没有完成计划，但是粮食的产量仍比一九五二年略高，棉花的产量也超过解放以前。今年因为长江和淮河流域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农业生产计划也不能完成，但是今年夏季麦子丰收，大部地区秋季也可望丰收，全年的粮食和棉花产量仍可超过一九五三年。预计今年的粮食产量可以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一点五倍，棉花产量可以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二点八倍。

农业的发展对于工业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影响。许多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和食品工业的原料是由农业供给的。工业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粮食、油类和其他副食品都依靠农业。工业所需要进口的机器大部分需要用出口农产品去交换。许多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是农村。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历年都用很大的力量在经济方面、水利方面和技术方面帮助农业的发展，而农民也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发展互助合作，努力增产粮食和各种技术作物，并且踊跃地把他们的产品供应给国家。我国在过去两年内不但战胜了灾害，而且农业生产能继续有所发展，市场能继续保持稳定，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向全国五万万农民表示感谢。

但是农业的发展显然还赶不上人民和国家对于农产品的需要。为了使农业能够更快地和更有计划地发展，必须逐步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逐步改变农业中的落后的个体经营，按自愿的原则用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的生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在过去一年内已有空前的发展，参加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农户已经达到全体农户的百分之六十。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今年八月已经发展到十万个，预计明年春耕时将达五十万个以上，参加的农户将达一千万户以上。我们希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全国可以有半数以上的农户和土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

为了保证增加农业的产量以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在发展合作化的同时有系统地推广新式农具，推广抽水机和水车，推广良种，改进农作技术，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并且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必须适当地增加棉花和油料作物的播种面积，使棉花的生产能够赶上工业需要，油料的生产能够迅速达到和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

为了解决耕畜役畜不足、肉食供应不足和肥料不足的困难，并且为了扩大皮毛的生产，必须努力发展畜牧业和饲养业。对捕鱼养鱼事业，也应当注意发展。

在水利方面，国家在过去几年内修建了很多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对减轻水旱灾害、保障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今年的防汛斗争中的作用更为显著。尚未全部完成的治淮工程超额地负担了防洪的任务。荆江分洪工程

[55]、官厅水库[101]和独流减河入海工程[102]，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防洪的效能。今年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洪水是历史上少有的，比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九三一年大得多，但是人民所受的损害却少得多。依靠汛区人民的奋斗和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保持了武汉、南京、蚌埠、天津等重要城市和苏北平原、淮北平原、荆江大堤的安全，减轻了广大农田的受灾程度。全国被淹的农田约占全国农田十分之一即一亿六千余万亩，经过排水、救苗和补种，成灾面积已经缩小一半。在成灾的八千余万亩农田中，有三千万亩在短期内尚难排出积水。现在政府在灾区正继续用大力进行救灾、排涝和抢种工作，在非灾区正组织超额增产运动以弥补灾区减产的损失。对自然灾害的斗争是我国人民的一个长期的艰苦的任务，我们在水利方面必须作更多更大的努力。今年的洪水也暴露了过去治水工作的不少缺点，例如防洪设计标准一般地偏低，个别工程修得不够安全，有一个时期比较忽视治理内涝和农田水利的工作。今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排涝并重的方针，继续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同时积极兴办农田水利，以逐渐减免各种水旱灾害，保证农业生产的增长。

林业对供应建设事业所需木材和防止水旱风沙灾害都有重大的意义。我国的森林资源是不足的，除了必须加强国家的造林事业和森林工业、有计划有节制地采伐木材和使用木材以外，还必须在全国有效地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护林造林运动。

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有重要的作用。同农民一样，手工业者也正在迅速地组织生产合作社。据一九五三年底的统计，已经有三十万手工业者组织在四千八百多个生产合作社中。这样的合作社今后应当更有计划地积极发展。

交通运输业和邮电业在过去五年内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铁路正线的通车里程一九四九年为二万一千七百公里；由于历年修复和新建了不少铁路，今年预计将达二万五千五百公里。宝鸡成都线今年可以由成都铺轨到广元；兰州新疆线今年可以向西铺轨到武威西北的怀西堡。全国公路的通车里程今年将达十四万多公里。工程艰险、意义重大的康藏公路将在今年内全线初步通车。海上运输和内河航运也都有发展。在邮电事业方面，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通信网，基本上适应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不断提高运输能力以适应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需要，是交通运输业的主要任务之一。我国铁路客货周转量每年都有增长，今年预计可以等于一九五〇年的两倍以上。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运输需要，除了必须增加线路、改进设备以外，还应当改善经营管理，发掘运输的潜力，特别是要进一步缩短车辆和船舶的周转时间。此外，合理发挥水运对于陆运的配合作用，并逐步消灭过远、过短、对流和其他不合理的浪费的运输，不但可以节省整个运输能力，而且可以大大减少运输费用。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各个有关的经济部门必须共同努力。

五年以来，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有了巨大的发展。在一九五三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已经增加到三百二十五万亿元，等于一九五〇年的一点八倍，对外贸易也达到一九五〇年的一点八倍。国营商业已经可以掌握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的全部或大部，并且管制了全部对外贸易。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在今年上半年已有基层社三万一千余个，社员一亿六千五百五十二万余人，成为国营商业的强大助手。目前，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在社会商品零

售总额中的比重已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在批发总额中的比重已占百分之八十左右。

由于人民消费力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消费品生产发展的速度，形成了供应和需要之间的不平衡。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实行了粮食、油料、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以及棉花的计划收购，以便调节供需关系，稳定市场物价，保障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建设。这些措施完全是必要的。适时的。这些措施既保障了广大城乡消费者的利益，也保障了广大农业生产者的利益，仅仅对于少数投机者不利，因此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对于重要消费品的计划供应，在消费品生产没有充分发展的一个时期内，不但需要继续实行，而且品种和范围还可能扩大；对于重要生产品的计划收购，更将随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当然，这是极其复杂的工作，也是人民生活中和社会经济中的巨大的变化；在开始实行的时候，工作中难免发生暂时的缺点，而人民也难免感觉暂时的不便。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不再受好商投机倒把所形成的物价飞涨和生产停顿的痛苦，希望用合理保证供应全国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商业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投机商业，那么，我们就会承认，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是国家所必须采取的办法了。

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工作的发展以及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的发展，根本改变了国营商业的地位。国营商业在过去几年只占国内市场的一小部分，现在已经占了主要部分，成为全国商业活动各方面的领导力量了。商业部门现在必须担负起计划和安排全部国内市场的责任，必须根据社会购买力和社会商品之间的平衡，根据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的经营比重和相互关系，决定社会商品的流转计划，决定对整个私营商业的改造和安排的步骤。但是，我们的商业部门的工作还没有能够伺国内市场这一巨大的变化完全适应，因此在工作中不免有些被动。商业工作中的这个缺点，以及在许多商业企业的经营中对供需状况调查研究不够、管理费用过高等项缺点，都必须迅速克服。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部分。经过几年来的工作，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现在已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根据客观的发展来看，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主要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来进行。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在一九五三年已经达到一九四九年的九倍多，预计在一九五四年又将等于一九五三年的两倍多。但是中级形式的加工、订货和包销可以替公私合营准备有利的条件，所以也是很重要的。这方面已经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今年上半年，在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沈阳、重庆、西安等八个重要城市中，接受国家加工、订货、包销和收购的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已占这些城市中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随着粮食、油料、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实施，大批私营的粮食店、食油店和棉布店已经改为国营商业的代销店和经销店，使私营商业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份得到迅速的增长，并且开辟了逐行逐业改造资本主义商业的道路。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个斗争和教育的过程。为了做好这个工作，还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改造资本主义企业使它们最后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企业；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改造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思想，尽可能使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起积极的

有益的作用。

五年以来，国家的财政状况有了显著的变化。我们不但很快地改变了收入不敷支出的不利情况，实现了财政的收支平衡，每年还保持有一定的结余以充实国家的信贷基金。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是在收入和支出都有了很大增长的情况下取得的。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中的收入，不包括上年结余在内，等于一九五〇年的三点六倍。同时，财政收入的来源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四年，农民缴纳的税款所占的比重从百分之二十九点六降低到百分之十三点四，而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缴纳的税款和利润所占的比重却从百分之三十四点一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六点一。财政支出随着收入的增加也有了很大的增加。一九五四年预算中经济建设的支出等于一九五〇年的六倍半；经济建设费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从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增加到一九五四年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四。五年来国家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经费共达三百二十八万亿元，其中在一九五三和一九五四两年合计就有二百万亿元。这说明我们依靠全国人民的支持，已经为工业化事业积累了必要的资金，那些幸灾乐祸地断定我们不能克服财政困难的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是完全破产了。一九五四年预算中国家用于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的支出等于一九五〇年的四点九倍。这部分的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从一九五〇年百分之十一点一增加到一九五四年预算的百分之十四点七。同时，财政支出中的国家机构经费即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所占的比重已从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六十点八降低到一九五四年的百分之三十点七，其中国防费从百分之四十一点五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一，行政管理费从百分之十九点三降低到百分之九点六。以上这些情况充分他说明了我们国家的预算是和平的、建设性的预算。

财政工作中的迫切任务，是继续贯彻合理的税收政策，鼓励人民以多余的资金存款、储蓄和购买公债，加强企业的财务管理，节约国家的行政经费，加强财政监督和财政纪律，保证建设时期所必需的后备，总之，就是努力为国家工业化事业积累更多的资金，并更合理地使用这些资金。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斗争。我们的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人民的财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监督我们的财政收支的权力和责任。我们希望各位代表监督政府工作人员并同政府工作人员合作来反对浪费资金的现象，反对机构庞大的现象，反对违反财政制度的现象，反对不爱护国家财产、不严格节约和不努力增加资金积累的现象，反对偷税漏税和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反对贪污的行为。反对这些现象和行为，也就是拥护社会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社会的早日实现。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大家都看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过去几年来我们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一个重大收获，是稳定了金融和物价，保证了广大人民生活的稳定。今后国家应当继续努力，保持物价稳定，使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

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生产的发展，劳动就业的人数逐年增加，一九五三年全国公私企业的职工已经达到一千三百七十四万五千余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现象已经大大减轻。人民政府不但对于原来的国民党政府机关中的人员和官僚资本企业中的职工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避免了失业

现象的增加，而且大力地进行了帮助失业者就业的工作。从一九五〇年七月到一九五三年底，仅由各地劳动部门介绍就业的，就有二百零七万人。但是，由于我国生产还不发达而又人口众多，劳动就业的问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还是会存在的。我们将在今后继续执行过去几年来行之有效的政策，使这个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几年来，职工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根据中央五个工业部门的统计，一九五三年按货币计算的平均工资比一九五〇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职工的劳动条件和福利设施也有重大的改善。上述五个工业部门为职工直接支付的劳动保险费、医药费、文教费和福利费平均相当于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六。一九五三年享受劳动保险待遇的职工已有四百八十余万人，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教育工作人员已有五百二十九万余人，其他中小企业中的职工也多半同企业订有劳动保险合同。国家为职工建筑的宿舍，一九五三年即有一千二百万平方公尺。企业和工会所举办的福利和文化设施也不断地增加。由于国家用了很大的资金改进工矿企业的安全卫生设备，职工因工伤亡率正在逐年减少。

很明显，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或者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或者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我们应当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

工资制度在过去几年内有了一些改进，但是目前仍然相当混乱，而且平均主义现象还没有克服。平均主义是一种鼓励落后、阻碍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共同之点。平均主义妨害职工学习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很有害，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平均主义。企业中的奖励制度现在也很混乱，必须加以整顿。同时，在政府机关和某些国营企业中，同工资制并存的还有供给制〔8〕的待遇办法，这种办法在革命战争时期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它同按劳付酬原则和经济核算制是矛盾的，在今天已经是害多利少了。因此，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定出妥当的方案，争取在几年内使全国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达到基本上统一合理，并且把供给制逐步改变为工资制。

几年来，由于土地改革的完成，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农业税法的改进，农业贷款的增加和农村信用合作的发展，广大农民的生活在衣食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善。农村居民的购买力，一九五三年比一九五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但是，因为我国农业生产落后，已耕地面积不足，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低的，在遇到灾荒的时候，更会感受很大的困难。五年来国家财政用于救济方面的经费，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共有八万亿元，一九五四年有三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用于农村的。今后政府应当在积极地发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提高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继续注意帮助农民，包括个体农民在内，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几年来，我们开展了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粉碎了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减少了疫病的发生和流行，增进了人民的健康。同时，医药

卫生事业也有了发展。到一九五三年底，中央卫生部所属医院共有三千零六十八所。全国病床数比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增加了百分之四百一十一。妇幼卫生工作的开展，使产妇和初生儿的死亡率大为降低。但是我们的卫生工作特别是工矿卫生工作还大大落后于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应当积极加以充实，并逐步实现各级卫生部门对工矿卫生工作的统一领导。此外，我国有几十万中医散布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并且同他们合作来把中国原有医药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加以整理和发扬。

我国学校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同解放前最高水平相比，在一九五三年年底，全国高等学校学生数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即达到二十一万六千余人；中等专业学校学生数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五，即达到六十六万九千人；普通中学学生数增长了百分之九十六，即达到二百九十三万余人；小学学生数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即达到五千一百五十万余人；幼儿园幼儿数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二十六，即达到四十二万五千人。各级学校学生中的工农子女成份逐年增加。在为培养工农出身的新知识分子而创办的工农速成中学中，一九五四年的学生数比一九五一年增长了三借。几年来我国在学校教育的制度、内容和方法方面，已经作了不少的改革，这些改革的顺利进行是同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有成效的，今后仍然应当根据具体的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进行。大家公认，具有革命思想和科学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工作中的作用，现在已显得更加重要了。

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门应当首先集中力量发展和改进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已有很大的发展，今后应当着重质量的提高。中小学教育中都应当注意劳动教育，以便中小学毕业生广泛地参加工农业劳动。我国的科学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在过去几年内部有了不小的发展和重要的贡献。在今后，为了使科学研究工作能充分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使文化艺术活动能够适应人民群众的广泛需要，政府必须大大加强对这两种事业的领导。

在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问题上，中央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了特殊的注意。帮助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各民族能够逐步达到实际上的平等，是我们历来所主张和执行的政策。在过去几年内，经济部门和财政部门用公平合理的价格组织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资交流，发放了各种贷款扶助少数民族的农牧业生产，对各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的改善起了重要的作用。卫生部门派出了大批的卫生工作人员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制止或减轻了疫病的流行，并且建立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一九五三年在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有县卫生院三百零九所，另外全国还有少数民族医院三十八所。各少数民族的高级和中级的卫生干部已经有二千七百余人。在教育工作方面，一九五三年全国已有少数民族小学生二百五十四万六千余人，中等学校学生十六万三千余人，高等学校学生五千五百余人。经过学校和其他方法培养出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已有十四万余人，这是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各位代表！如上所说，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当然是不够的，必须继续加强。但是我们在目前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首先把它同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起来。大家知道，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要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是一个很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毫无疑问，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无论在经济方面或者财政方面，都是有很多困难的，我们决不能够轻视这些困难。什么是我们克服困难的道路呢？从最根本的方面说来，这就是要依靠我们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当目前国家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建设重工业、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都必须把注意的重点放在长远利益上面。我们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为着我们于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我们是有充分的信心来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的。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这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一切破坏经济纪律、劳动纪律、财政纪律和损害公共财产、浪费国家资金的现象，在我们这里都是不能容许的；一切只顾个人不顾社会、只顾局部不顾全体、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权利不顾义务、只顾消费不顾生产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必须反对的。因为这些都损害我们国家的生产发展，因而也就损害我们将来的幸福。

要精简编制

①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编制问题，各部部长在，谈一谈。

这三年，中央级党、政、民机关，主要是政府机关的编制膨胀很大。自政府成立到一九五一年一直控制在二万人，章乃器[103]部长为不超过这个控制数奋斗了两年。两年半以后，章部长不管了，大堤溃决，一下由二万人增加到八万人。实际上现在是七万七千人，由大区上调的一万多人尚未全来，还未定，如果来了，就是八万七千人了。开始搞建设就由二万增加到八万，这是没有人管编制的结果。

我们国家发展的特点，是从农村到城市。在农村时是供给制[8]，不讲编制，看需要，但超过饱和点了，也要搞精简，经常为精简奋斗。到城市以后，我们没有经验，趋势是在不断扩大编制。毛主席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说，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104]。要节减行政经费，就要精简编制。要精减，一是公教人员，一是军队。国防现代化，军队也是要精减的。在这方面，相对数字是在逐步减少，但实际上，绝对数字是在增加。现在，我们把干部集中在机关里，层次很多，面也铺得太大。过去苏联提倡面大些，层次要少。现在苏联也在提倡面不能大，要小。我们要学习苏联的经验，层次要少，面也不要太大。开始搞建设，专也不能那么专，一个组能办的就不要分成两个组。各部门必须紧缩。过去形式上也有人抓精简编制，实际上是没有抓紧。这个问题不解决，把很多有本事的人放在机关，没有事情做，闹情绪，闲人比工作的人还多，还需要有人为这些人服务，减低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企业中干部不够，学校中学生人数不够。干部不是推下去，而是抓上来，这个趋势是很危险的。这不利于钻研业务、培养人才。至于更直接的实际问题是房子不够，满足不了干部住房的需要。我们建筑房屋增加的数字比较高，苏联在一九二一年没有这么高的建房率。苏联莫斯科的人口比我们北京人口多，但北京比苏联莫斯科每年建筑的行政用房多两倍。这在我们的预算中，经济建设的建筑工程减少了，而消费增加了。这是不利的。房子确实不够。少数人的房子可能宽裕些，可以挤出一点来，但不能解决多数人的问题。房子不能适应要求，原因就是编制太大。我们应当学习苏联，但住房问题不能学习今天的苏联，要学习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二年的苏联。要使住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就要像军队一样，文职人员也要实行薪金制，所有人员都要按编制办事，房屋、水电费要按规定缴纳。现在政府八万人中只有四千人是供给制，为什么不可以都改为薪金制呢！部氏级的干部和各位副总理也可以改供给制为薪金制。中央一实行，地方慢慢也就能实行。另一个中心环节是编制，一定要精简，要紧缩，面不要太宽，层次不能大多，要规定组织形式，确定如何分工等等。提议恢复编制委员会[105]。从我起，不管哪个部门，不能随便批编制，一定要经过编制委员会的审核，今

---

① 这是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三次会议上讨论编制问题时的讲话。

后要用这一条来约束。不然，一个司长也可以调人来，调来就要房子，那怎么成。

编制、薪金制，这是两个主要环节。人要推下去，不是抓上来。分下去，多下去，批公文就少了，事也少了，具体指导就多了。把一部分青年人送到工厂或学校去，这是个方向。

编制委员会，我提议由贺龙[106]副总理负责。根据工作内容决定组织形式，办公机构就是人事局。龚子荣[107]同志也参加编制委员会，委员会名单由常务会议决定。要大刀阔斧，坚决贯彻精简编制的精神。在国务院第一次会议上，我就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具体办法不行。贺副总理可以隔一天来院办一次公。要通令各部门，从今天起，擅自增加一个人算是违反国务院全体会议的决议。监察部长和司法部长要带头执行。

节约和改善生活

①

（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

一节约问题

我们国家大、人多，因此，需要支出的方面也就多。但是，我们总要集中人力和财力，用在主要的建设方面。在今天来说，苏联帮助我们建设的一百四十一项，去年十月、十二月增加了一点，今年还可能增加一点，大概有一百六十一项[108]，以及环绕它的还有几百项，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主要方面。当然，现有的生产也要配合，农业也要跟它均衡地发展，商业要调整，等等。我们要有计划地进行建设，要节约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把它们用在主要方面，不可能事事都搞，百废俱兴。这是我们在五年以前就讲过的，现在更重要。不要因为我们现在经济恢复了，就懈怠了这方面。节约的观念，在我们现在要加紧建设的当中，是一个最中心的问题。要使我们的干部和人民都要有这样一个观念，节约一点，就是对于国家建设增加一分，对于国防力量增强一分；浪费一点，就是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害。要用这个观念经常地教育我们的干部和人民，因为这是很容易疏忽的。国家大了，稍微不留神，就要浪费一批人力，或者物力，或者财力，对我们建设就不利。

首先说一说人力。我们国家的人力很多，劳动力又过剩，难道我们还怕人力不够吗？不是这样的问题。不是人力的数量问题，也是人力的数量问题。这话怎么讲呢？如果我们把人力用在消费方面，人力很多，对我们就很不利，国家的行政开支就要大，国家用在生产上、建设上的开支就要小。如果只重量不重质，那我们建设就慢，就不能提高，在这个原子时代，我们就不能很快地掌握高度的技术。所以，不论从量和质来说，我们都要节约人力。现在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一种人多势众的想法，总觉得人多好办事，不管是国家机关或者企业，这都是不对的。我们承认，我们国家机关有一部分是由于接收了旧社会的底子，不能不包下来。但是，这在今天已经不是主要的了，主要的是我们国家机关里头总是人浮于事。就是说，几个人能办的事要十几个人来办。多而不精，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缺点、主要的毛病，必须加以精简。如果说，我们一切按计划办事，那么，我们国家机关编制的计划总是经常要膨胀的，企业计划的人事方面也是经常超过定额的。这种现象，当然也反映我们国家的剩余劳动力多，容易吸收。但在这方面我们如果不注意节约，那么，量一多，质一定更差，妨碍我们建设。

就国家机关来说，我们的行政机关一百六十多万人，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求精减，而不是要求扩大。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必须引起在北京的同志和朋友注意，我们中央级机关现在是一天一天庞大，头重就会脚轻。当然，人口最多还是在乡村，我们讲的是行政干部，这样会头重脚轻。把很多质量比较好的干部集中到上级机关里头，下面的干部质量就弱。我们国家这样大，

---

① 这是在干部会议上所作《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的报告第二个问题的一部分。

讲建设，不仅是工业，还有农业。如果广大的基层干部质量差，质量比较好的干部都归在北京机关里头，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个现象是今天一个很大的毛病。很多人拥挤在机关里头没事做，闹情绪，而下边没有根得力的人办事，这是很危险的。所以，现在不是把人往北京调，而是应该从北京把人分下去。应该转变这个趋势，不是把人向上边增加到机关里来，应该从机关里把一些强的干部输送到企业、学校里去工作、学习。这是有可能条件的。新的机关成立，应该从原来分出来的机关互相调配，不应该增加编制名额。最近，国务院成立了编制工资委员会[105]，就是要从中央到地方把编制也纳入计划的轨道里头，规定它的定员定额。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人才节约，用在最得力的方面。

企业也是一样。现在基本建设各方面用的职员、工人数量都是很大的。当然，可以说一个工厂准备锻炼出一批熟练的工人、工程师，为了准备第二个新的厂，这是许可的。但是，也还有很多是吸收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到工厂里来的，而城市还有一部分失业的。所以，在企业中也要紧缩。首先要录用的就是从其他企业里转过来的，其次要录用一部分失业的，还有的是从各个机关转过来的。

更重要的是，今年部队开始试办从志愿兵役制转到义务兵役制，这就要有一部分战士复员回到生产中去，也有一部分干部要转业到其他职业当中去。国家机关、企业单位，还有文教机关，应该首先录用从军队里转业过来的干部，不应该再到农村中去吸收人到城市里来。这样，才能使我们人力的调配合乎国家的计划。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文教机关也是这样。我们文教机关现在缺的是教员。教员的待遇一般他说也比较低一些，准备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应该提倡机关多余的人员或者是部队转业的人员很高兴地去担任教育岗位上的工作，来给我们训练大批的新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方面的人不够，可是另一方面，文教机关有很多拥挤不堪的单位。比如说文工团、剧团，那些地方就是人很多。一个剧团，三四年没有演出一次戏；一个电影队三四年没有放映这一次电影，都是青年，堆在那个地方。把这些青年耽误了四五年，到了快三十岁了，再学自然科学就困难了，糟踏我们青年的一代。我们自己过了五十岁，再学自然科学总是困难的，现在听一听讲原子能的课就不大容易都懂得，不应该叫中年人和青年一代再跟我们一样了。我们当然是不得已抛弃了自然科学，去从事革命，那是非革不可的。现在可以搞建设了，又不让青年学习，这不论是在中央或地方，都是不对的，都应该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青年一代，现在正是要多多地学习自然种学知识、提高社会科学理论水平的时候，应该多往这一方面去钻。

我们的人力不仅仅是在国家机关、文教机关、企业、部队，在其他方面也还有很大数目的人，需要我们改造。农业方面，就在农业本身中来改造，有一万万以上农户的农民要改造。商业方面的从业人员有九百五十多万要改造。手工业方面也有一千多万需要改造。还有私营工业要改造。这些改造，不管是农业的、商业的、手工业的、私营工业的，都要在各行各业自己本身改造。这都是国家要负起责任来的。对六万万人负责，使六万万人实现国家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必须逐步解决。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在人力分配上的计划性。大概我们全国就是这样几种分类的数目字：全国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有一百六十八万；文教人员有二百八十万；

企业的人员，就是职工，公私都算在内，有一千四百多万。这三部分人合起来，如果都叫职工的话，就是一千九百万，这是一个数目。第二个数目，刚才说了，商业的从业人员，就是说个体的和私营商业的人员有九百五十多万。第三个数目，手工业者和手工业从业的人员有一千多万。还有私营工业家，数目比较少，有二十万上下。加在一起，大概有四千万的样子，当然，他们都还有家庭。家庭有的是夫妻两个都做事，父子都做事，有的不是，所以，不能都算成四口人，如果照三口人来算，就是一万万二千万的样子。其他四万万七八千万，都是农业人口。各行各业的人口安排、全国人民的生活安排，这是一件大事，我们如果讲计划，就要有一个全面的设想。我们对于人力如果没有很好的安排，就会出现不是这一方面有失业就是那一方面有失业。现在我们搞了三年计划，得出了一条经验，即不论是建设，不论是改造，都要在本行本业里想办法，才能安排得好，逐步地安排，逐步地改造。因此，我们的人虽然多，但要用在得当的地方，能够发挥他的能力，又不至于失业，只有按部门逐步地改造。这是一个需要节约、需要计划的问题。

物力也是如此。中国的物力，说起来是物产丰富，但是也不能那样简单地看。绝大多数的物资、矿源我们都并不晓得，我们的勘察力量还是有限的。旧社会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资料，我们这几年才发展了地质勘察队，才到全国各个地方逐步地进行勘察，全国的普查还需要时间。所以，中国到底有多少物资、矿源，我们今天还不甚了了。已经有的物资供不应求，发展工业，发展农业，都感到物资不是过多，而是不够。这就必须很好地节约，浪费是不许可的，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有害的。

在这一方面，我们基本建设上有许多是条件过高，是浪费的。我们的城市建设，有的也是条件过高，是浪费的。拿工厂来说，第一汽车制造厂[109]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个设计有些条件是过高的，不合乎今天中国的水准。比如说一般的住宅，只能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来合乎今天的要求。不能这样说：你建出来不要使后代子孙骂你，说你建得太坏了。这样说是不科学的。你有什么办法把我们今天建筑的宿舍都能保持几百年呢？就是能保持几百年，几百年以后还不是要垮，还不是要重建。一个时候是一个时候的需要。总觉得条件要高，这个想法常常影响我们建设的计划。我为什么讲第一汽车制造厂呢？因为在东北也好，在许多地方也好，我们建的宿舍一般说是比较注重实用、经济，不大注重美观的，这是对的。可是，有那样几位朋友有看法。我就听到一位印度朋友说过，这个人是一位医生，叫做索克[110]，他说，中国的宿舍太简单了，这是要犯罪的，后代要骂的。他也是这样一种观点。可是他到第一汽车制造厂看了以后，回来告诉我说：现在我的问题解决了，那个地方的确是为工人谋福利的，后代都会满意的。但是，他这一句话，使我倒有另外一个想法：那个地方一定是条件过高了。后来一打听，果然如此。最近听同志们说，工人不愿意去住那里的宿舍，因为不大适合工人的生活方式，虽然有洗澡间等等，由于太麻烦，又不实用，楼房又太高，工人感到不大便当。这是说的基本建设的工房。还有厂房，本来用不着钢筋，可以用混凝土，也统统是钢筋结构，这也是浪费。

至于说到城市建设，北京就应该批评，而且首先应该批评国务院本身。国务院领导下搞的北京饭店，那个大礼堂盖得富丽堂皇，猛一看，觉得不错；再一想，有点问题；过久了，就更觉得有问题。这一件事情倒是一位缅甸的总理提醒了我，我很感谢他。在那个大厅里面，我请他吃饭，他问我：这个

大厅是作什么用的？把我将住了。我说：大概有时开会用一用，吃饭用一用。马上我又说：我很感谢你，你启发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使用率一定太低了。现在北京饭店礼堂要证明它的使用率，无论如何高也高不了一个月十八次。可是，收费却很高，四个钟头要收几百万[12]，谁出得起。总之，城市建设，搞一个礼堂也好，一个饭堂也好，到底使用率如何，没有设想过。拿北京来说，很多礼堂闲在那个地方，旅馆、招待所闲在那个地方。可是，宿舍却不够。不合理的情况很多。最严重的少在城市建设上，就是讲华丽，北京饭店的礼堂也是一个。本来，这个事情在政府里讨论了，中共中央也同意了、也批准了的，是这样一个意见：我们现在讲建设，第一是实用，第二是经济，第三是在可能的条件下照顾美观。这本来是两年前（一九五三年）讲的，现在苏联同志也这样讲，证明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对的。可是，我们的设计专家不赞成，政务院[35]决定了也没有效，他做他的。我们看一看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大楼，那是城堡式的；北京饭店礼堂，那是宫殿式的；还有的军事机关的大楼现在也是官殿式的。盖那么一个帽子要增加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伪建筑经费，完全顾外表，不顾内容。把钱花在这些形式上，又不实用，又不经济。顾外表，不顾内容，那还不是不实用；钱花多了，当然不经济。住的房子没有，可是搞了很多礼堂，这些要检讨起来很多。现在我们请国家建设委员会薄一波[111]同志来收集这样的材料，也要在中国搞这么一个检查运动。三年以前搞过“三反”[62]、“五反”[63]，一波同志领导那件工作是有成绩的，现在再请他来搞一次检查，很必要。因为这是浪费我们的物力、财力，算一下那是很厉害的。有些是属于我们无知，人家画了一个图，我们没有考虑，就去搞了；但有些实在不是属于无知，思想认识就是错误的，建筑思想上有很多问题。

今年我们搞国家基本建设，搞城市建设，如果不适应刚才说的情况，又不节约人力、物力、财力，那会浪费很多。所以，现在我们要搞国家计划，一定要把整个中国的生产、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地、全面地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必须逐步地进行，不能一个计划一下子就把全国六万万人民的生产全部纳入计划的轨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全面地计划，这样才能实现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这就需要中央各部门，直至地方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各个方面的投资都要逐步纳入计划，各个方面的生产也要逐步纳入计划，使我们的财政分配、人力分配、物资储备和工资分配都要逐步地全面地纳入计划轨道。这是一件伟大的工作、建设的工作。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范围来看，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不但今天在座的（今天几个地方差不多有六千干部来参加这个会议）每个人不能把自己例外，就是我们每个人领导的工作、参加的工作也不能例外。当然，这个计划，要能够作到全面，那是要逐步搞的；要作到均衡，那是很大的工作、很长期的工作。但是，今天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新的情况更需要我们节约人力、物力、财力。

二改善生活问题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目的就是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可是，我们必须认识改善的步骤。现在生活改善有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是合

理化第一，第二是普及第一。

什么叫合理化第一？我们现在生活的水准有许多不合理，比如工资，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调整。拿国家工作人员来说，在一百六十八万人里面，有三分之二实行了工资制，三分之一还是包干制，就是补贴制，这就不合理，我们国家的行政工作效率就受到影响，人事制度就受到影响。现在军队已经提出要实行薪金制，提到人大常委会去了，可能很快就要被批准。如果军队实行了薪金制，第二步准备在国家机关也普遍实行，把那三分之一的补贴制也改成工资制，准备在今年七月一日开始实行。据我们调查，这三分之一大概有五十二万多人，其中有五十万人是十七级以下的干部，他们并没有得到补贴制的一些好处，像孩子多的可以有保育费、保姆费。因为十七级以下的大部分是县、区的干部，或者是青年干部，在机关里，是副科长、科员等等，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没有结婚，多数家庭在农村，没有脱离生产，得不到这种待遇。而跟他们条件相同的，拿了工资，收入数目却不同，差别很大。几年来，我们对这一部分实行补贴制的干部的待遇是不公平的。实行补贴制的干部数目虽然有三分之一，但改为工资制待遇，增加的经费并不太多，一年只有九千多亿元，如果从今年七月一日起实行，只要五千亿元就解决了，这是绝大部分干部赞成的事情。当然，也可以设想，今年的工资不再提高，集中力量进行建设。如果这样，原来拿工资的那三分之二的同志的生活水平今年就不能提高。但是，我们有道理说服他们。因为他两三年来都是拿的工资，比拿补贴的十七级以下的干部总是多拿了一点，现在只有半年，那些原来拿补贴的人增加到他这个水平，他总不能说不对吧。我们让那些两三年以来拿的很少的人这半年跟他拿的一样，这是很公平的，他没有活可说。

剩下来的只有两三万十七级以上的干部，这些人是得到供给制[8]的好处的。他们儿女多，有保育费，还有一些不计算的待遇，比如房子、水电等等。一旦实行工资制，这些东西都要自己担负，可能她们有一个时候的困难，但是为了整体利益，个人应该节约一些。并且我们还有一个初期的办法，就是实行了工资制以后，对那些子女多的人还给一点帮助，今后新生的子女要是多起来，那就有了限制，三个以内的，他自己料理；三个以上的，最多津贴两个；五个以上的，就不管了。这就要在我们的干部中伺提倡邵老[112]提议的节育的办法。这样，中国人口是不是就减少了呢？大家相信，这是不会的。在城市中，国家工作人员与工厂职工，懂得多子女不仅是物质上的负担，首先是精神上的负担，教育不好。多子女的人在这一方面也要讲一点节育。

国家工作人员，教育工作人员，还有科学工作人员，在工资上都要加以适当的调整。过去如果说我们把许多科学家用在恢复经济的工作上，用在实用的科学上，比如，地质学家去做勘察工作，去教育青年勘察人员，这是需要的。现在要抽回来，研究地质理论，从事科学实验室的工作。重点转移了，我们对科学家的待遇也要提高一些。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宝贵的种子，他们可以培养很多青年科学人才，所以，这一部分人的工资要稍加调整。

在工厂企业里面，工资问题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几年来还没有解决好。今年要用一年的功夫，为明年工资的调整做准备工作。要在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我们的工资制度也能达到合理。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情况，刚从农村中出来，或者是刚转业的，被吸收到工厂里面来做粗活的徒工，工资起点高，或者是升得快。真正的技术工人的工资反而升得很慢。这也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当然，如何合理，需要研究。

总之，工资问题是生活改善的一个基本问题，需要合理化。所以，首先还不是增加很多工资，而是首先要合理化。有了合理化的基础，然后再逐步地改善，应该这样前进。

什么叫普及第一？就是说我们生活要改善，总应该照顾各方面，不应照顾少数而已。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农村中生活基本上比以前有改善，因为粮食生产增加，虽然现在征购[113]粮食，但农民手上的粮食还是增加的。农村生活有改善，我们也曾做了一些调查。最近，陈云同志亲自到他的本乡做过调查[114]，的确生活比以前有改善。在我们干部中，如果与农村有联系，去做个切实的调查，会相信这个道理的。生活有了改善，这是主要的。可是，总有不少缺点，工作落后，或者地区落后，或者地区一部分工作落后，总有百分之十的落后现象，这种情形就需要我们改善。总之，我们先要照顾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这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方向。这种事做了没有？我们在做，还需要继续做。比如，农村中反映，对我们的干部，第一可爱，第二也不喜欢。为什么他们可爱呢？因为真正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干部是当先的。比如，去年大水，各处反映都是这样：不管哪级干部，包括当县长的，当专员的，或者是中共的县委书记，都是亲身参加抢险，防洪、踏水车泄水、筑堤，甚至被淹死。凡有困难的时候，干部都是当先，这是革命的好传统。所以，人民称赞，人民感觉我们的干部是可爱的。有了困难，农民就说：总是饿不死人，一旦缺了粮，就会得到救济。这就说明，我们的干部是关心农民生活和农民疾苦的。但另外方面，由于工作多，干部不善于处理自己的工作，有时官僚主义滋长起来，作风就差了。所以，农民有这样的批评：过去革命的时候，干部天天有说有笑，天天在一起；现在到了县政府、县委，不大容易看到他们了。这种脱离群众也是真的，值得我们警惕。当然，因为工作很忙，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天天与群众在一起。总起来说，农村中好的现象是基本的，群众拥护我们这个人民政权，这个人民的江山是巩固的，不管美帝国主义怎样叫嚣，蒋介石怎样胡思乱想，它是攻不破的。但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不少缺点，要经常检查，去掉灰尘。

我们必须照顾人民的生活，在农村中如此，在工厂中如此，在机关里面也要看到下级干部生活还是很苦的。虽然房子盖了这样多，富丽堂皇，但干部住的地方还是不够，还是困难。因此，任何一件事必须着眼于普及的方面，不可能要求我们的水准提得大高。这个话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我们学科学技术，迎头赶上，掌握原子能的技术，要求很高；另一方面，生活水准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得很高，换句话说，生产、技术的发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错了；应该生产、技术的发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还要慢慢来。这就是说，我们的领导同志要积极地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凡是妨碍这方面的，要尽量改正。我们从人民群众中来，离开得久了，就满脸灰尘，就忘记了艰苦朴素，这一点，我们的高级干部要时常敲警钟，要互相警惕。

首先是要照顾普及。从社会主义国家参观回来的人都知道，他们的社会生活水准今天我们不能一下子达到。人家有高度的技术，有高度的劳动生产率，自然生活水准就应该比我们高。我们不能把他们的生活水准搬过来。所以，我们的高级干部应经常想想这样的问题，才能使我们眼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结合，局部的利益和整体的利益结合，生活改善的重点放在合理化，放在普及，不是先求提高。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问题

①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陈云同志的报告[115]，已经把毛泽东同志在两次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的内容传达了，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六点意见[116]。我没有多少要补充的。下面就讨论中发现的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一关于中国民族资产

阶级两面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很早就明确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民主革命的实践证明这个分析是正确的，民主革命胜利后在《共同纲领》[6]特别是在宪法上又明确肯定了这一点。刘少奇同志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对此解释得也很清楚。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还有没有积极性一面的问题，在一些同志中仍然经常发生疑问。比如在“三反”[62]、“五反”[63]的时候，《学习》杂志就曾发表文章说，资产阶级积极性的一面，早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敲了丧钟。最近，在全国开展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我又收致一封自称是上海私营工厂工人的来信，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提出目前资产阶级还有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他认为资产阶级现在还是向我们猖狂进攻，说资本家利用三权（所有权、用人权、经营管理权）抵抗改造，还说赎买政策[117]最可恨，花了这么多钱给资本家！他认为资产阶级同地主一样，也应该打倒，怀疑资本家是不是能够改造得好，等等。他要求《人民日报》公开答复这些问题。我们先不管这个写信人的动机如何，但是，可以肯定，类似这样的思想在一部分工人和党员干部中间也会存在。因此，对这些问题要加以回答。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由它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剥削工人，这是它黑暗、消极的一面。所以我们要逐步地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并消灭这个阶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我们还应该利用它积极性的一面，一直利用到这个阶级被消灭为止。我看这是合乎辩证唯物主义的。

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有它的积极性一面。政治上，他们对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参加的、同情的或者是采取了中立的态度。经济上，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只有反抗这种压迫，从政治上找出路，才能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就是因为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只斗争，不联合。后来中央到达陕北纠正了这个错误，端正了政治路线，我们的革命运动才有了进一步蓬勃的发展。

那么，现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到底还有没有呢？应该肯定地说是有的。

从经济上说，旧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虽然不

---

① 这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大，但它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还是起了作用的，增加了生产，活跃了市场，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柜台上的货是满满的。这跟苏联十月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怠工破坏、生产停顿的情况是不同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个积极作用到今天还是存在的。他们的企业还在生产。在商业零售方面私营虽然只占四分之一，但在城乡商品流通中还起着一部分作用。比如，旅大市有一百三十万人口，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绝对优势，但私营的小工厂还有三百多户，私营商业连同小商小贩在内还有七千多户，手工业者还有一万多户。这些私营工商业，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我们不能一下子统统把它拿过来。既然这样，是让它停顿在那里被挤垮，让工人、店员失业好，还是让它在我们领导下发展生产，多生产一部分产品好？毫无疑问，他们的积极作用应该继续加以利用。当然，私营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一定要在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之下，并且要逐步地把它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最后进入社会主义。

从政治上说，我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成为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的矛盾。但是，中国的领土还没有完全统一，国际帝国主义还经常向我们挑衅。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跟我们共同走了一段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又跟我们在一起，在今天的反帝爱国、和平建设事业中，资产阶级还是能够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是可以发挥他们在政治上的积极作用的。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对于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积极性，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同时也要限制它消极的方面。积极方面利用得越多，消极方面限制得越大，就越利于对它的改造。我们要把它的积极的一面利用到最后，把它消极的一面加以消灭，将这个阶级的分子改造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或工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在一天天地发展。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

二和平转变，反复斗争

我们的宪法指明，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能够保证我国通过和平的道路来消灭资产阶级，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把整个社会引导到无阶级的社会。在国际上，我们有可能争取一个和平时期，推迟帝国主义所要发动的战争。在这样国内外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转变成为全民所有制，把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转变成为集体所有制。这种可能现在是一天天地增加了，这种现实是一天天地多起来了。开国以来，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就没有采取没收的办法，而是采取赎买的办法。有人也曾设想，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采取置之不理、挤垮的办法。这样做是不行。因为这样搞，受害的首先是我们的国家和工人阶级，国家的税收、产品就减少了，工人就会失业，至少是减薪嘛！而且挤垮它，反使我们背了一个大“包袱”，还要给他们一大笔救济款。采取赎买政策，我们每年付的定息[118]比这要少得多。所以，不论是没收或挤垮都是不适宜的。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和平赎买、和平转变。这样做，马克思注义是允许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资产阶级能够向工人阶级和平屈服，那是最便宜不过的了[119]。列宁曾经设想在俄国实行和平转变，但是没有实现。因为当时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对它实行封锁和

干涉，国内又进行内战，资产阶级采取了怠工破坏，所以那时苏联很难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一九二一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发展。我们中国今天所处的条件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同我们有过合作的历史，又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因而有和平转变的可能。我们用赎买的办法花钱最少又不损害生产，对工人阶级，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有利的。

我们采取赎买政策，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120]，最后是要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因此，同资产阶级必然地要发生矛盾和斗争。和平转变并不是没有阶级斗争。相反，阶级斗争依然是尖锐的、激烈的、复杂的。凰是，今天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会把阶级斗争处理得更好，促使和平转变胜利地实现。陈云同志提出的六点意见，就是要有步骤有秩序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可能一下子全都安排得尽善尽美。我们不能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春得那么容易，应该承认是有些困难的。但是，应该肯定过去六年进行改造的成绩。否认这种成绩，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六年来，公私合营企业的产值已经占到资本主义企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把加工订货算上，就占到百分之。七八十。在大城市，国家资本主义比重还要大。在批发商业方面，凡是国营能够控制的物资，基本上都控制在我们手上了。在零售商业方面，经销、代销已经达到了四分之三以上。六年的功夫，我们就取得了这样的胜利，应该说成绩是大的，速度是快的。

但是，必须估计到，要把一个阶级消灭，要使剥削阶级分子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分子，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决不会那样痛快。一个共产党员立志为革命牺牲，但一些错误的思想还常常会有反复。在整风的时候，也是几天几夜睡不好觉。自己犯了错误，还要难过一番，何况是掌握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分子呢？他要丢掉那些东西，哪有那么痛快的呢？刚才陈云同志讲了：两位陈副总理给他们讲了几点钟，还不如老婆的一席话。有一个资本家，他说剥削怎么不好，讲他祖宗三代是怎么剥削，把人家的工厂吞并过来，讲他那个阶级是应该消灭的。大家听了都感觉他的话是有诚意的。可是，另一个人又跟他说：哎呀！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些工厂，一下子在你手里丢掉了，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也是很自然的，这就叫反复嘛，动摇嘛！这才合乎实际。这一类事情是经常会有的。现在工商业家能够把自己的剥削根源挖一挖，挖痛一点，这是进步的表现，我们应该欢迎和鼓励。但是也不要希望太高。一席话就想把资产阶级变过来，那是唯心的。我们要经常做工作，使他们认识国家富强对他们的好处，引导他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特别是要使他们懂得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认识前途，掌握命运。社会主义改造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不仅要帮助他们懂得道理，还要造成一个势所必至的大势，逼上梁山。这几年，我们已经造成了这个形势，把私人工商业的大部分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凡是纳入这个轨道的企业就有希望；没有纳入这个轨道的，原料、生产、销路、运输就都有困难。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现在资本家一只脚已经踏入社会主义的门槛，另一只脚不跟进来也不行了。

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过程，也是改造资本家个人的过程。阶级消灭，个人改造，最后都变成工人，得到一个愉快的前途。但是，这项改造工作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即使资产阶级消灭了，思想

斗争也还是长期的。

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同时也要改造我们自己。因为你不受他的影响，还要去影响他，改造他，这就需要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改造。只有把我们自己头脑里那些残存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清洗清洗，才会用坚强的社会主义思想作风去影响他。

三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陈云同志提出的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规划是一个很大的计划。我们要全党动员，特别是省、市党委和各有关部门要用很大的力量来做。大的私营企业，工人集中，生产技术比较高，改造会比较快，但这是少数。而大量的中小企业，要把它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就需要时间逐步安排。我们采取赎买的办法改造私营工商业，中小企业觉得很好，会一窝蜂似地都要来。我们能不能马上接受他们呢？不能。经济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们的国营企业也还要一步一步地发展，大量的私营中小企业的改造更需要时间。企业合营以后要改组，有的是大发展，有的是小发展，有的要淘汰。对淘汰的企业也不能不管。所有这些问题，都要统筹兼顾，恰当安排，求得合理的解决。

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一定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要分地区、分行业、有步骤、有秩序地加以安排。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和省、市及其他大城市党委首先要抓紧这个工作，党委书记要有专人负责。政府有关部门一直到各个事业机关、企业机关都要注意这项工作，才能互相配合加强领导。毛泽东同志提议召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只要大家统一认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就一定能够做好。

四积极宣传，做好准备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在党内需要统一认识。中央将作出指示发到各级党委去。同时对工人群众也要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改造资本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历史责任。在工商界也要进行宣传。毛泽东同志说要在工商界中间培养出一批核心分子，通过他们去教育工商界的人。我们党和政府也要去直接教育他们。对工商界的家属子女也要进行宣传。青年团、妇联要做工作。报纸也要进行公开的宣传。

除积极宣传以外，还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不能性急。要告诉资本家不要怕共产，告诉这些核心分子，并不是要他们带头马上共产，而是要他们准备共产，不怕共产，也向别人宣传不怕共产。思想认识提高了，大家的抵触就少了。不要事情还没有做，一听到风传，来一个破坏生产，那就很不好了。农业合作化不是要防止“三叫”吗，不要人叫、牛叫、猪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当然不能用这“三叫”了，但是如果弄得人叫，机器不叫，企业停产、减产，就对我们不利了。因为他不晓得前途如何，以为共产就是要把他的东西统统没收了，这就容易产生一些混乱。因此，我们要去各地进行广泛深入的传达解释，要做大量的工作，绝不能轻率。对每个问题的分析都要全面。强调一方面，忽视另外一方面，就会有片面性、主观性，一定要充分注意。

最后，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消灭资产阶级，并把资本家改造过来，不但有全国的意义，而且具有世界的意义。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把这项工作做好。

科学是关系经济、国防和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①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

为着适应国家建设的急速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在数量上加以扩大，在业务水平上加以提高。

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目前是比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小得多，同时在质量上也要低得多，这是同我们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的。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

我们经常说我国科学文化落后，但是并不经常去研究究竟落后在哪些地方。同志们！我想在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科学方面的事情，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生产过程正在逐步地实现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各种高温、高压、高速和超高温、超高压、超高速的机器正在设计和生产出来。陆上、水上和空中的运输机器的航程和速率日益提高，高速飞机已经超过音速。技术上的这些进步，要求各种具备新的特殊性能的材料，因而各种新的金属和合金材料，以及用化学方法人工合成的材料，正在不断地生产出来，以满足这些新的需要。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保证了生产过程的进一步加速和强化，资源的有用成分的最充分利用，原材料的最大节约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

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泉源，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同时，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就像其他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个革命，正如布尔加宁[121]同志所说过的，“就它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

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我们要记着，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一起，无论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现在还很难确切地估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使我们的科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现在就必须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就是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122]，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

① 这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报告的第四部分。

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地就可以达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

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首先打破那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 中国在科学方面的落后反正不能马上改变，反正需要靠苏联的援助。 ”不错，我们需要靠苏联的援助来改变我们的落后。但是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利用这种援助呢？一种办法是没有全面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碰到什么问题就去请教苏联。派到苏联去学习的，不是科学家，而大部分是中学毕业生。其结果是一辈子不能脱离依赖和模仿的状态，是无限期地加重苏联科学界的负担，是妨害了我国科学的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也就是影响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科学力量、经济力量、防卫力量增长的速度。另一种办法是作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有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的最新成果，尽可能迅速地赶上苏联水平。这就是说，除了紧迫任务请求苏联援助，并从苏联援助中学习技术以外，对于凡是我国科学上需要向苏联学习的部门，都应有计划地派出比较成熟的科学人才向苏联学习，或者请苏联专家来我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研究的基础，务求最短期间可以在苏联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在国内展开继续研究和培养干部的工作。这样，就可以最有效最合理地利用苏联的援助，促进我国科学的有计划的发展，使两国科学事业有可能比较快地建立互相协作的关系，也就是促进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科学力量、经济力量、防卫力量的增长。后一种办法是中苏两国科学家所多次建议的、也是我们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办法。

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以脱离实际，任何脱离实际的“ 理论研究 ”都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这种情况不但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同样地也表现在社会科学方面。目前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分配的力量，比在自然科学方面分配的力量，按照我们国家的需要说来，更加薄弱得不相称。例如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是一百七十二个人，目前实际上能用大部分时间进行科学工作的有半数以上；在社会科学方面是五十一个人，目前实际上能用大部分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却只有几个人！

上述的这两种倾向是互为因果、互相结合的。我们必须彻底纠正这些不正确的倾向，改变这些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状况。

国务院现在已绎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在制定这个远景计划的时候，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

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

什么是最迅速最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呢？

这样的道路就是：第一，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最迅速地派遣若干组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苏联和其他国家去作一年到两年的实习，或者当研究生，回国以后立即在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分别建立发展这些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并且大量培养新的干部。同时，按照需要，每年陆续派人去实习和研究。第二，对于一部分学科，向苏联和其他有关的国家聘请若干组专家，请他们负责在最短期内帮助我们在科学院和有关各部门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干部，或者同我国科学界进行全面的合作。第三，有计划地组织大批科学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向现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学习，把他们当作导师来利用，而不要当作普通工作人员来利用。在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企业的建设和生产过程中，有系统地组织大批技术人员研究和掌握其中的新的技术原理，并且加以迅速的传授。第四，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第五，各个高等学校中的科学力量，占全国科学力量的绝大部分，必须在全国科学发展计划的指导之下，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大量地培养合乎现代水平的科学和技术的新生力量。第六，政府各部，特别是地质、工业、农业、水利、运输、国防、卫生各部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同科学院进行合理的分工和合作，共同扩大科学界的队伍，并且负责把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介绍到实际应用中去，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为了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一年的时间是很容易在空谈和拖延不决中间浪费了的。因此，党中央要求：在今年四月底以前，必须确定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适合于这个远景计划的今明两年的具体计划，以及为了实现这个远景计划和今明两年计划需要马上调集的第一批科学力量（包括需要派遣出国的科学人员的名单，需要聘请苏联专家的人数，需要由其他岗位调到科学研究岗位的人数和主要人员名单等），并且尽一切可能，争取在今年六月底以前实现派遣和调动的计划。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中扩大科学研究工非和扩大培养科学力量的计划，必须在今年暑假以后，就着手加以实现。

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增加各个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图书费并加以合理的使用，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极大地改善外国书刊的进口工作，并且使现有的书刊得到合理的分配。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并且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

以上所说的原则，一般地也同样适用于文化教育的其他部门。一切文化教育部门都应该作出从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的发展规划，并且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加以实现。

我们的发展科学文化力量的计划，必须是一个既提高而又扩大的计划，因为不但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必须有一定的数量才能适应各方面的需

要，而且质量一般地也只能在一定的数量的基础上产生。

为了扩大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首先必须按计划增加高等学校学生的名额，还必须注意培养现有的一般知识分子，不断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他们不但是高级知识分子极为重要的后备军和合作者，而且如前所说，在数量上比高级知识分子多得多；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区和各个工作部门中，对于国家建设担负着巨大的责任。中央各个部门和各省市必须分别定出专门的计划，帮助他们的进修，使他们的业务能力得到迅速的增长，并且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提拔到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去。

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状况

①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

关于我国目前国内状况，它的特点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是“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123]。

全国人民奔向社会主义，到处都出现一片欢欣鼓舞的景象。全国几万万农民行动起来，响应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农业合作化，掀起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全国手工业的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也跟着进到了高潮。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重庆、西安、武汉、广州等大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部公私合营、手工业的全部合作化和整个郊区农业的合作化已经陆续实现。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在全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我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积极性空前地高涨着。全国工人群众正在为超额完成一九五六年计划和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广泛的社会主义竞赛。同对，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已经在机关内和社会上有步骤地展开[124]。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运动也正在广泛地开展。所有这一切，都反映着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正在空前高涨。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整个地将要提早和超额完成，我们国家在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方面，也将获得更可靠的保证。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够提早完成。到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底为止，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增加到一百九十多万个，入社农户达到七千多万户，已经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再有一九五六年一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然后再经过两年，即到一九五八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

我国农业合作化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它经过三个发展步骤。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许多革命根据地中，就大量地出现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个别地区已经产生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处在它的初级形式和由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过渡的时期，而农业生产互助组已经绝大部分地进入了初级社。不难了解，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初级社升高级社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只要如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25]所规定的升社的各项主要条件都具备了，农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要求改变这种生产资料的半私有制，以便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生产获得更大更快的发展。

面临着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和它正在引起的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个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草案，向全国各级党的组织和工人、农民、科学家、各界爱国人士征求意见。

对于这个草案可能有两种担心：有的人可能认为这个草案所规定的指标保守了，担心会束缚了农民增产的：积极性；也有的人可能认为这个草案所提出来的任务大大了，担心农民的负担过重了。我想，第一种担心是不必要

---

①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

的，因为这个草案是目前我们发展农业的最低纲领；如果在实践的过程中，由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广大农民积极性的发挥，提前和超额完成了这一计划，那正是我们要争取的目标。

关于第二种担心，我们可以简单地考察一下农民的力量。现在全国有将近一亿二千万农户，每户如果按一个半劳动力计算，全国就有一亿八千万个劳动力。按照：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每户一个男劳动力一年做二百五十个工作日，一个女劳动力一年做一百二十个工作日，合计每户一年就有三百七十个工作日，全国一年就有四百四十四亿个工作日。农民直接用于田间的劳动，大约占他们全部工作日的三分之二。这样，全国农民每年就还有一百四十八亿个工作日，可以用于其他各项增产措施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合作社农民的收入将大大增加，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也将日益扩大，这就有可能将一部分资金投入农业的基本建设，创造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在全国农业合作社大发展和农业增产的条件下，如果每个男女劳动力一年的工作日能够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那么，每个农户每月就可以有三十元到六十元的收入。因此，资金的来源也不会有多少困难。

当然，要完全实现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还必须进行很多科学研究工作，还必须全国各界的通力合作和各部门的互相配合。我们相信，在座的各位在完成这个伟大任务的斗争中也一定不会吝惜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我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也已经开始到来了。到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底为止，全国已有手工业合作社七万多个，社员二百多万人，约占手工业从业人员七百八十五万人的百分之二十五强。再经过两年即到一九五七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手工业是很发达的，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是现代工业的有力助手，在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服务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手工业的生产比农业集中，商品性大，改变所有制比较容易，广大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也很高。因此，完成手工业的社会改造和技术改造的时间，可能而且应该比农业稍快一些。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我国手工业有经营分散、散布面广、行业复杂、一般技术落后、社会经济性质不同等特点。因此，在进行社会改造和技术改造的全面规划的时候，不仅要使它的规模和速度同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规模和速度相适应，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掌握手工业各种不同的复杂情况，正确地执行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在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来以后，要充分利用地方原料，利用废品废料，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生产更多更好更符合国家和人民需要的产品。应该注意保持过去手工业者十分关心他们自己的产品质量和市场销路的优点。在合作化以后，凡是不宜于集体生产的，就应该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对于手工业的产品，国家只能将那些适合于由国家包销的产品，进行加工订货，大部分产品还应该由手工业合作社或者手工业者根据原有的市场联系和新的市场需要，自己推销。还应该注意某些手工业在手工艺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和历史传统，在合作化以后，必须使它的工艺水平更加提高，优良的历史传统能够保存下来并且得到发扬。有些特殊好的手工业和手工艺业，如果一时不易组织合作，就让他们单于；如果在加入合作社后，一时难于调整，就让他们原封不动，待摸清情况后再行调整。总之，手工业在改造以后，品种只许加

多，不许减少；货色只许更好，不许变坏；技术只许提高，不许降低。同时，更应该注意把手工业的供产销计划尽可能地纳入国家的首先是地方的工业计划之内，防止由于改造而使生产脱节。只有这样，才能够积极发挥手工业对于现代工业的助手作用，才能够表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农业合作化迅速发展的影响下，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在一切私营企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按行业的全部公私合营的阶段。到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底为止，资本主义大型工业以产值计算，已有半数以上实行公私合营；资本主义商业以营业额计算，已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实行公私合营。进入一九五六年以后，全国大中城市就都掀起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在一切私营企业中实行按行业的全部公私合营，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步骤。我们国家自成立以来，就开始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不同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但是，由于这些改造大部分还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例如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改变还不很大，私营企业中的生产力就仍然受着这种生产关系的束缚。随着国民经济的有计划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的发扬，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特别突出地暴露了出来。现在按行业实行全部公私合营，由国家按照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制度进行有计划的企业改造，并且主要地采取定股[126]定息[118]的办法来处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样，就基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剩下的只是给予资本家以一定的股息了。

中国民族工商业者所以能够这样踊跃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政策起了决定的作用。人民政府大力地优先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使资本主义经济一步一步地变为受国家管理的、受国营经济领导的、受工人阶级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滋长，随着私营企业内积极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人店员群众的督促，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发展，民族工商业者也日益觉悟到在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只能接受改造，通过和平转变，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国家所采取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案，也是民族工商业者能够接受的，因为国家在处理资本主义所有制上面，还给这些工商业者以一定时期的股息，同时，在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中，还进行全面的人事安排。这样，就使民族工商业者看到，在将来资本主义所有制完全消灭以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是有充分保障的。在政治上，我们国家不仅给民族工商业者以选举权，而且积极地向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使他们懂得必须遵照社会发展规律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且帮助他们自觉地实行自我改造，以便由今天的剥削者变成明天的劳动者。

应该指出，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还只是进一步深入改造的开始。我国除了大型的私营工商业户以外，有几十万分散的中型的和小型的工商业户，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只能首先在法律上批准公私合营，在合营以后，还有清产核资、经济改组、企业改造、生产安排和人事安排等等一系列的工作要去认真地进行和完成。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必须十分注意不要轻易改变原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办法，并且必须善于保存原有经营方式中一切好的经验，作为历史遗产加以继承和发扬。对于数

量极大、分布极广的小商店，在合营以后，应该继续实行代销拿手续费的办法。代销也可以作为公私合营的一种形式，因为它的货源主要是由国家供应的，进销计划是国家批准的，企业是专业公司领导的，而手续费又类似社会主义企业中的计件工资制度。对于那些分散的肩挑小贩，不要急于改变他们的经营方式，因为这种经营方式对人民是方便的，也是受人民欢迎的，应该在长时期内将它保留下来。总之，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它的最终表现是生产的发展和提高。因此，在实行合营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保证生产和营业的正常进行，绝不允许在生产和经营上发生混乱现象，造成国家和社会财富的损失。合营企业的职工、工程技术人员和工商业者，必须注意保持原有的好的品种、货色和质量，决不许可不经领导机关批准，随意并厂并店和调整商业网，轻易改变服务制度和人事制度。应该在中央和地方统一的领导和安排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工作，以保证社会主义的改造工作能够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希望到会的各有关方面的人士，分别向广大职工、工程技术人员和工商业者讲清楚这些道理，协助政府做好这一工作。

以上所说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状况，表明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途程上，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胜负是已经被决定了。这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 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 ”[123]。

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①

（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

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毛主席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123]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如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都可能拖长一些。所以不论从地区或从部门看，都会有不少尾巴，彻底实行民主改革的工作也还很多，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

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

① 这是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的发言。

经济建设必须注意平衡问题

①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日）

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

陈云[11]同志已经把结论做了。

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127]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我们要自力更生，要靠自己，首先就要进行很多平衡工作。搞生产就要联系到平衡。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设和物资的平衡问题已经搞了很久，可以先按照现有的物资情况（钢四百四十二万吨、水泥六百四十七万吨）作个框框，进行分配，定下来。不够时再设法开源，争取从增产、进口、库存、节约、减少出口、调剂六个方面想办法。

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平衡工作还是由薄一波[111]、张玺[128]同志负责搞。这是件麻烦事。保证重点建设的次序也不是死的，要实事求是。有的没有材料，只好不建。给商业部王磊[129]同志一点钢，他拿去可以活跃市场，积累资金，也有利于重点建设。

① 这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没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时的讲话节录。

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

①

（一九五六年五月三日）

从社会制度来说，我们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中间道路的。但讲到国际关系，就不能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好，非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不好。如果。两种制度的国家再搞成铁板两块，互不来往，互相攻击，那就不是和平共处了，就会推动战争了。那样就会使国际局势紧张，而不是和缓。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这是一回事，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阵营一切都好，非社会主义阵营一切都不好。从社会制度来说，两种制度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在全世界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世界的前途，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是说，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国家就没有可学的地方。因此，在国际关系上，还要有另一条，那就是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因为有这第二条，我们就必须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这样，我们的制度就会更优越，我们就能在和平竞赛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应该承认，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有短处才比出长处来，有缺点才比出优点来。有好的才有坏的，有白的才有黑的。任何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也有不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应该有批判地学习，不是盲目地学习。有批判地学习，就是要学人家的长处和优点；不盲目地学习，就是不要把人家的短处和缺点也学来。应该说，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因为它首先是学人家好的东西，不会把自己好的东西丢掉，也不会盲目地学人家坏的东西。敢于提出这个口号，证明是最有自信心的，是自尊的、能自强的。

苏联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首先要向苏联学习。这一点是肯定的，不容许动摇的。我们并不因为这次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就说苏联也有错误，就不学了，那是不对的。我们只要读过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30]的文章，就会懂得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就会辩证地历史地看问题。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不犯错误，是不能设想的，犹如说革命可以不犯错误一帆风顺地成功，是不能设想的一样。但是我们首先应该承认，苏联还是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了，把法西斯打败了，这些都是最大的胜利。而这些胜利，是在斯大林领导的时期取得的，斯大林是领导者，他也有份。所以我们肯定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们同时也承认斯大林的确犯了严重错误。所以我们说他又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131]。对于他的错误，我们应该很认真地研究，避免重犯。所以，肯定他说，首先还是要向苏联学习，凡是我们不懂不会的，都要去学。但要有一条：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二十年来，我们所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

① 这是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节录。

（或者说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创造性地运用它，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际中有发展。因为情况变了，环境变了，它就会有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共同的，基本的就是那么几条，具体化了就会有发展。这样认识才不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我们不仅要向苏联学习，向兄弟国家学习，而且要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学习，包括向和平中立的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家学习。就是日本、英国和美国，它们也有长处，我们也可以学。除了它们的国家制度我们不学以外，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的。过去，我们在学习中的确有过一些迷信。好像只能学社会主义国家的，不能学其他国家的。比如拿学李森科[132]作例子，就可以证明。听说国内外对李森科的学说是有争论的。我们不能因为李森科的学说产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就认为一定不会有错。前天，我对科学院的同志说过，可以先把科学和政治分开，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二者结合起来。这是怎么讲呢？比如李森科的学说，应该先从科学领域内研究一下，看哪一些是对的，哪一些是不对的；再把李森科否定的那些学说研究一下，看哪些是对的，不应该否定的，哪些是不对的，应该否定的；然后再拿中国的科学家比如胡先■[133]批评李森科的文章看一看，到底批评得对不对，或者是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这样就把科学和政治分开了。然后再把科学和政治结合起来，不使科学和政治脱节。在科学问题上，共产党应该服从真理。共产党不服从真理，那就不是共产党。如果共产党不服从真理，共产党会被推翻的。要有这个勇气和信心，对于凡是不合真理的，我们就承认是错误，这就解决问题了。如果李森科不对，批评他的人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要把我们共产党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贯彻到底。你的道理站不住，你就要修正它。一定要懂得我们是常常会犯错误的，我们的长处就是能够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敢于承认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不断地改进。

在学习中，我们还要防止自卑，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行，那也不应该。我们虽然落后，但也有可以自信的地方。我们的国家是落后的，但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是可以创造出智慧的。劳动产生智慧嘛，我们还是可以赶上去的。当然也不要有一点成就就骄做。我们是一个大国，由于我们的努力，社会主义建设可能发展得更快一些，可以少走苏联的一些弯路，这就可能产生新的骄做自满。如果现在我们还没骄做，到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有几千万吨钢了，骄傲的危险就会来了。我们要时常看得远一些。骄傲自满总是危险的。而且我们国家这么大，容易有大国主义的倾向。我们在有的国家工作的同志，就常常不自觉地表现出大国主义的倾向。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不会发生错误，事实上是发生过的。现在，国际活动增加了，人来人往很多，各部门就需要经常地检查这个问题。

预算应该放在可靠的基础上，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①

（一九五六年六月五日）

今天的会议增加一项临时议题，研究关于将向人大会议[134]提出一九五六年预算报告的问题。三月份通过的预算数字，现在又有出入，动用结余增加到九亿元，数字太大了。这就发生一个问题，预算是否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这个报告[195]提到人大会议上，内容本身就有问题，如果说可靠，自己都不大相信。比如基本建设投资一百四十六亿元就很难完成。各部发言时如果一定要提出这个数字，人大代表间起来，如何答复？因此，预算数字一定要减一减。

收入方面，各省、市反映税收打得太满，过去还努力争取完成，今年就没有劲了，因为反正是达不到。我们的预算应该放在可靠的基础上，争取超收。

对预算有两种思想：一是打得很满，让大家设法完成；一是放在可靠的基础上，争取超过。头几年采用第一种方法是对的，因为在经济恢复时期潜力很大，财政收入的底我们摸不太清楚。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以后，我们对情况的估计差不多了，打得过满就完不成，去年的情况就是明证。

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明知原来的预算完不成，又在报告中列出去，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没有告诉他们实际情况。我们把问题都说出来了。首先要认识这是发展中的困难，成绩还是主要的。在人大会上的报告和谈话要肯定这一点。

现在谈谈具体问题。同意将富春[136]和一波[111]同志的办法相结合，预算一律削减百分之五。收入减去五亿八千六百万元：支出减去十亿元，其中军费减去二亿元。削减文教经费有困难，科学研究和干部训练经费大些，可以减去六千五百万元。七亿三千五百万元归一波同志负责削减，其余二亿六千五百万元（军费和科研、干训费）归我负责削减。税收实际上达不到预算收入的数字，削减下来，吴波[137]同志可以放心了。一波同志负责削减的七亿三千五百万元要好好计算，预备项目还是可以搞些，跨年度是允许的，不然就造成浪费。

预算数字一定要削减。但是不能平均都砍百分之五，有的可以多砍，有的不能砍，总的要求是砍去百分之五。

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

① 这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急躁冒进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①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二日）

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了各项工作，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

在这种高潮的形势下，应该加强计划性。首先搞生产计划，然后搞人力、物力计划的平衡，最后搞财政预算。反过来预算又会影响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这就告诉我们：“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138]

这段话是比较精炼他说出来的。我们这样提，如不解释，会发生一些误解。反保守的好处已经说过了，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全面发展。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现在，人们对财政和生产方面有两种看法：一是打得稳妥，争取超过；二是多打，再力争。我看多打、再力争的好处不多。上次同河北省的负责同志谈话，他们说打得差不多，还要努力完成。其实打得大多了，无法完成，也就干脆不完成了。这不外乎是对人大会议的不负责任。因此，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虽然今年预算支出已经削减了十亿元，但打得还是紧张。向人大会议[134]提出的这个报告是工作报告，我们可以以此检查和推动政府的工作。人大开会时，希望财政部要作详细的解释。

---

① 这是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三十次会议讨论《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草稿）》时讲话的节录。

关于体制问题

①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关于体制问题，我说点带原则性、理论性的看法。

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提出十大关系[139]

这十大关系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来，特别是进行经济建设以来工作经验的总结，是在三大改造，[127]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生产关系有了根本性改变，生产力将大大发展的形势下提出来的。生产力大大发展，要求生产关系改变。三大改造取得胜利，生产力又会更大发展，需要我们动员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因此，在各种制度上也就需要作相应的改变。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中心。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前提下提出了分权给地方的问题，以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便于动员全国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也提出过授权地方的问题，但那时还在进行民主改革，而现在是在三大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为进一步动员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提出的。我们要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分权，理解经济建设、社会关系、党内外关系等。这是个带原则性的问题。

二、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是为了发展生产，不是为了缩小和妨碍生产

有些部门有这样的顾虑，怕分权后分散力量，影响生产、基建、技术和计划。会不会带来阻碍和分散呢？不会的。毛主席比喻说：我们过去背个筐子，现在挑个担子。过去背五十斤，现在可以担一百斤，重量可以更大，生产更增加。如果过去中央背六十斤，分权给地方以后，看起来中央少了，但两头加起来就是一百斤，还多四十斤。分权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生产，而不是减少生产。过去，力量没都用上，厂矿动用二百元以上就要报中央批准，给地方的权很少，使得地方有力无处用，限制住了。现在是全部用上，生产会发展起来。换句话说，过去担子一个人挑，现在很多人挑，可以大大发展生产力。应该承认，现在主要的不是把现有的分掉，而是要地方搞更多的生产，搞更多的事业、企业。因此，中央要分一部分给地方，主要的是为了增产，而不是分产，这是大原则。我们是在太原则下采取具体措施。中心不要放在分现有的厂矿企业，而主要的是使地方有权，有权才能动员。地方除了有党权、政权（就是行政权）以外，还要有人权、财权，有权就能增加生产。这点要说清楚。有了这样一个原则，中央各部就不要担心自己管的都分下去了，地方不要怕分不到多少东西。

三、集权与分权问题

适当分权给地方就会更好地集权于中央。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苏联过去集权多了，地方权小了，这是一个经验教训，是一面镜子。马列主义的原则是，上层建筑一定要同经济基础相适应，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各种制度，要有利于把一切积极力量动员起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从这方面着想。我们的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即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

---

① 这是在国务院关于体制问题会议上讲话的第一部分节录。

中才有力量，在集中指导下发扬广泛民主，才能发扬得好。这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相反相成的，不会发生解决不了的矛盾。多多发扬地方民主，就会大大巩固中央领导。否则，中央集权也是官僚主义的、空洞无物的。最集权就等于无权，碰到的事管一下，碰不到的事就管不上。

《十五贯》[140]中坐在巡抚衙门的周忱[141]虽有权，但那是官僚主义的权。他说得好，已三审定案，哪里还需要他审问呢？到时他批准就是了。集权起来，闭眼批公事，那叫有权吗？我看无权。说穿了，官僚主义是最不懂得集权的，是办不好事的。官僚主义不知道实际情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利于国家，不利于人民。况钟[142]到群众中去调查，去接触实际，就能发现问题。所以，要善于使用权力。我们要变无权为有权，把权分给地万，中央有权，地方也有权，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抓些空洞的权、官僚主义的权。这个原则要说清楚，不要怕把权力分到地方上去，必须把权分下去。工厂厂长来找部长办事，有时被看门的顶回去了。《光明日报》对这类事情曾有过揭露，我们知道这种事情后就不安、难过。而这种事可以说每个部都有，每天都有。昨天，我听北京市说，毛巾、裤衩涨价了，工人代表找彭真[143]同志，说工资还没有增物价就涨了。商业部应该查清楚这件事。我在人大发言回答问题要有这一项物价问题。每发生一件这类事情都要你亲自解决那不可能，怎么办呢？就是从中央到地方按级负责，大家都有权。黎元洪[144]说：“大家有饭吃。”这是一句老好话，现在是大家要有权。

我们常说社会主义国家也有阴暗面，就是那么几个人办事，别人都闲起来，从总理办公室、秘书厅到各部，你们可以调查一下，总有一部分人没有事做。青年人朝气勃勃，积极肯于，这是可喜的，要给他们事情做，就要给他们一定的权。不要大权都集中到一个人之手，否则就坏事了。苏联过去就是过分集权于中央，进一步集权于斯大林一个人。我们的分权是有一定的范围的，是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出来。这就是民主。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鼓掌，但有时候对民主就注意得不够了。我们在三大改造以后，毛主席就抓住这个问题，使大家有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对这一点，我想说透一点，不要怕分权。

四、搞体制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有几个文件提到了这个精神，是对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两句话是互相联系的。一切工作，规划要全面，而做一定要有先后，也可能发生偏差。我们搞体制也是一样，不会十全十美的，也会发生偏差。因此，必须要加强领导，不断地来纠正偏差。当然，要尽量减少偏差，能防止的尽量防止。全面规划与加强领导必须密切相结合。规划要全面，执行时要加强领导，纠正偏差。各级领导要经常检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原则，修正错误。不要以为全面规划了就没有问题了。

五、统一计划，分工合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

计划是要统一的，但要有分工，有了分工还要有合作。计划要统一，如农业生产全国有大的指标，各省市也有指标，要统一，该种蔬菜的种了粮食对国家对人民就不利嘛。要分工，还要合作。下两句更重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适于这个省，这个省就做；不适于那个省，那个省就不要做。如糖厂，适于广东，广东就搞。棉花少的地方，就不要搞很多纺织厂。办大学，如广东可以搞一个，别的地方没有条件就不一定搞。城郊种蔬菜有利，就种蔬菜。不要刻板的文章，不要图案化。大家对重工业的方案比较满意，觉得

有些分权了。但对轻工业的方案就有意见，中央部门觉得地方的轻工业已经很多了，可以少分，地方就觉得分得少，如纸张等可以多分给地方。我的意见重点放在增加上。我和李烛尘[145]部长谈食品工业，他主张多分，中央管得多了不好。森林工业部罗隆基[146]部长也认为应把小的森林工业交给地方，他们想通了。新部长比老部长容易通，很有见解，他们受了十大关系的影响。许德珩[147]部长也对我说，水产主要靠地方。他们都是白纸一张，愿意少抓，我们抓权多的就不愿意放。毛主席说，现在中央各部就好像抱了一抱鸡蛋。你们说是糊里糊涂的官僚主义，我再加一个忙忙碌碌、明明白白的官僚主义。我觉得很难过，不知你们怎样，自己明知抱着一抱鸡蛋，为什么不腾出一只手来？我看宁可少管些。各省、市也要注意，官僚主义会出售给地方。你们自己不要抱着一堆鸡蛋，那时你们会两面受攻，上面攻你，下面攻你，我们只有下面攻（当然上面还有党中央和人民，但总与你们不同）。总之，要作分析，不要图案化，每省一个样子都可以，搞体制的原则只有几条，具体方案可以每省一个。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经常的现象，平衡是暂时的现象，平衡了就又会发生新的不平衡。这是矛盾论。整个世界经济就是不平衡的，每个国家的经济也是不平衡的。事物就是在矛盾中前进，在不平衡中生长的，克服一个不平衡，又会产生新的不平衡。因此，在我们国家不可能用一个办法各地都实行得通。

不仅因地制宜，还要因事制宜。这也是句成语。粮食现在统到中央，将来可以适当放下去一些。农业税将来也可能放在下面。棉花也可放到地方。中小学由地方办。有些大学将来也可以双重领导，甚至以地方为主。

要因地制宜，就是不要一律，各省市不可能都一样。要因事制宜，就是有些事可以多集中在中央，有些事可以多放下去。有这两条，我们才可以把普遍真理与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够照顾得全面。

六、改进体制，逐步实现

这次我们研究体制，不是我们过去没有体制，开国以来就有体制，现在是要改进体制。有的同志说，过去是中央集权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我说这是辩证的，过去是集权多了，但没有很好地运用权力。过去的体制那样集中是有必要的，搞五年计划，大家都没有经验，中央搞了三年才由人大通过，通过了马上又改。当时搞计划大家都没有经验。分权早一点当然可以，但有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财经会议[81]以后来了个高饶事件[148]，不能不强调集中。以后又搞宪法，搞计划，搞肃反。现在来研究体制不是太晚，条件成熟是到去年底和今年初，最关键的还是三大改造的进行。如果能够在改造的高潮时看到当然更好，但不是那么容易。财政的集中，稳定金融，统购统销[149]，稳定了物价，这是很大的成绩。外国人对我们印象深的就是很短的时间稳定了物价，虽然我们现在个别商品有涨价的现象，但总的是稳定的。过去的体制是集权多了，分权少了，但我们也有些权没有人管，应该很好地分了所以现在要改进体制，总得作个全面的规划。

这个改进不是一下于实现，而是逐步实现。七月份拟出大纲，还要经过四五个月的准备，就是说今年准备，明年试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会有更好的改进。在执行中要不断地改进。实行一个时期，又要有改进，要不断地改进。不要急，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急躁冒进，也。不要右倾保守；要逐步实现，不要求之一步登天。

工资制度的改革

[①]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这次工资改革，主要从制度方面解决了四个主要问题。

第一，取消工资分和物价津贴制度，实行直接用货币规定工资标准的制度。

对于工业、基建、交通运输等企业，在规定工资标准的时候，是将各地区物价生活水平的指数、现在的工资实际情况和正确地安排产业之间、工种之间的关系等三个因素综合研究和平衡的。每个工种的同等级工人的工资标准，都规定了一定的幅度，以便于不同地区、不同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来选用。例如钢铁冶炼一级工人工资标准从最低的三十元（适用于贵州遵义锰矿厂）到最高的四十二点四元（适用于上海各炼钢厂），最低与最高之间的幅度为百分之四十一。

对于国家机关和非工业部门，是以现行的货币工资标准为基础，加上今年提高工资标准的指标，作为第一种工资标准。然后再根据各地区物价生活水平的指数，在第一种工资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比例，共将全国划分为十一种工资标准区，每种工资标准之间的幅度是百分之三，十一种工资标准之间的幅度是百分之三十。对于少数物价特别高的地区，除了采用最高的工资标准以外，再根据实际的物价生活水平，增加一定数额的生活费津贴，或者实行实物供应的办法。生活费津贴应该随着物价的变动进行调整。关于其他洋贴正由劳动部有关方面研究。

采用上述的办法，就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工资分和物价津贴带给工资标准的混乱现象，而使货币工资标准能够更好地反映各地区的实际物价生活水平。

第二，改进产业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工资关系。

对于产业之间的工资关系，根据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技术的复杂程度和劳动条件的好坏，同时照顾到历史的条件，作了比较适当的安排；对于那些重要的、技术复杂的、劳动条件比较差的产业，规定了较高的工资标准。在这次工资改革中，重工业企业比轻工业企业的工资一般地有了较多的提高。中央八个工业部中的国营工业部分，六个重工业部的平均工资增长百分之十五点六，两个轻工业部的平均工资增长百分之十二。

对于地区之间的工资关系，根据发展重点建设地区，同时又照顾到某些沿海地区的工资也能稍有增长的原则，进行了初步调整，重点建设地区的工资标准一般地有了较多的提高。从几个地区的国营机器制造业平均工资增长的比例来看，黑龙江增长百分之二十，山西增长百分之十九，湖北增长百分之十八，天津增长百分之十，上海增长百分之十九。

对于国家机关和非工业部门各类人员之间的工资关系，也做了若干调整。除了小学教员、供销合作社人员、乡干部的工资标准提高较多以外，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标准也有较多的提高，同时对其中有重要贡献的规定

[①] 这是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关于工资问题的报告》的第二部分。

了加发特定津贴的制度。例如北京的教授和科学研究员现行的工资标准最高的是二百五十三元，新拟的工资标准提高到三百四十五元，比国家机关七级干部的工资标准高出二十三元，比现行工资标准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国家机关各级人员的工资关系也做了若干调整，采取了中级多增、高级少增或者不增、低级适当增加的原则，以缩小最高级与最低级工资标准之间的差距。按照新拟的工资标准，十四级工资标准增加百分之十三点二一，一级工资标准不加，三十级工资标准增加百分之十一。一级同三十级工资标准已经由原来的三十一倍缩小为二十八倍，以后还要继续缩小。

经过这次工资改革，各方面工资关系部将有适当的改进。

第三，改进工人的工资等级制度。

对于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繁重劳动与轻易劳动，在工资标准上规定了比较明显的差别，使计件工资标准高于计时工资标准，高温工资标准高于常温工资标准，并下工资标准高于井上工资标准。适当地扩大了低等级工人与高等级工人工资标准的差额，例如钢铁冶炼业现行的八级工人的工资为一级工人的工资的倍数平均是二点八七倍，新拟的倍数是三点二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工资待遇上的平均主义。

第四，改进企业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制度。

对于企业的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采用按照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规定统一的工资标准的制度，同时为了照顾到目前干部的条件和现行工资的实际情况，每个职务可以分为若干等级，高一级职务和低一级职务的工资等级线，可以交叉。例如，四川钢铁冶炼业的一等厂的正副厂长和正副总工程师的工资标准，统一规定为一百三十元到二百一十三元，而车间正副主任、主任工程师的工资标准，统一规定为一百零四元到一百五十七元。在两级职务的工资标准中，有二十七元的交叉。对于技术人员，除了按照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评定工资以外，对于其中技术水平较高的，加发技术淬贴；对于有重要贡献的高级技术人员，加发较高的特定津贴；有些高级技术人员如果现行的工资标准高于新定的职务工资标准过多，还可以另外规定单独的工资标准，使他们的工资仍然能有所增加。

实行统一的职务工资制度是一个比较重大的改革步骤，必须有准备地逐步推行。如果某些地区或者产业由于条件还不成熟，实行确有困难的时候，仍然可以单独规定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但是必须注意与实行职务工资制同类技术人员之间的工资水平适当平衡，不能差别过大。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和教训

[1]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我们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吸取这些经验和教训，就使我们有可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做得更好。现在，我只就近年来我们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所感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由于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难以完全预计到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新的情况和问题，因此，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而由年度计划加以调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基本上是正确的，过去四个年度计划的安排，大体上也是符合于当时的具体情况的，因而有可能保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但是应该指出，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的计划，部分地发生了偏低或者偏高的缺点，造成了工作上的一些困难。

我们在制定一九五五年计划的时候，由于前两年农业歉收，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而且在当年的节约运动中，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的投资。同时，还由于基本建设计划变动的次数多，下达迟，因而计划完成得比较差。结果，不但在财政上出现了过多的结余，并且在重要的建筑材料方面，如钢材、水泥、木材等，也出现了一时的虚假的过剩现象。如果我们能够更早地准备一些预备项目，及时地扩大建设规模，或者有计划地增加某些物资的储备，物资一时积压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我们对以后发展的情况估计不足，把一时的物资过剩当作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因而用出口的办法来解决钢材和水泥一时多余的困难。显然，这是不恰当的。

当我们制定一九五六年计划的时候，由于上年度农业丰收，社会主义改造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定得比较高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对于基本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能力进行适当的平衡，因而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大了一些。同时，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也出现了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结果，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经验还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

---

[1]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第一部分的节录。

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采取了加速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来促进农业的增产，并且相应地发展了轻工业的生产，这就使国民经济的几个主要部门在发展中避免了互相脱节的危险。但是我们在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这个关系的时候，也曾经部分地犯过错误。例如，在一九五三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在建设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偏向，结果，影响到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一九五六年初，当《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25]公布以后，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这些偏向，都被党中央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

在这个时期中间，也曾经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就是某些重要工作过分突出，以致同有关方面脱节。例如，在一九五六年初，我们为着加速发展农业，曾经过高地估计了双轮双铧犁和锅驼机的当年需要量，制定了过高的生产计划，虽然这两种产品的计划经过一再修改，压缩产量，但是计划仍然过高，结果不但消耗了过多的钢材，造成一九五六年钢材供应更加紧张的情况，而且使某些机械工厂发生了一时赶工增产、一时闲工减产的现象。又例如，在我们的建设中，某种工业企业由于前进过快，所需要的原材料无法全部供应，因而发生了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的困难。当然，在我们开始进行工业建设的时期，这种情况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预料到这样的困难而更加妥善地进行安排，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几年来，我们在建设事业中，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的关系，也作了大体适当的安排，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缺点的。有一段时间，我们重视了中央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地方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我们重视了内地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近海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今后，我们应该经常地注意调整上述的关系，避免发生片面性。

以上说明，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今后若干年内，我国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还会是很大的，为了应付歉收，就必须有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储备；为了满足我国建设和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的需要，就必须有器材和原料的储备。此外，我们计划工作还缺乏经验，计划常常有不全和不准的缺点，即使计划当时订得比较准确，也可能由于难以预料的因素又产生新的不平衡。例如，一九五六年由于采用新技术，提高了平炉和高炉的利用效率，矿石和焦炭便供应不足。为了消除或者减少在执行

计划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平衡现象，也必须保留必要的后备力量。

这几年来，国家储备的物资虽然还不很多，可是对于保证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需要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一九五六年的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也曾经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但是应该指出，我们过去对于物资储备的重要性还认识不够。正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当一九五五年某些物资略有多余的时候，就不适当地出口了一部分；到了一九五六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又感到这些物资的严重不足。

必须认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物资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的多余是暂时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建立物资储备制度，由国家储备必要的物资，特别是比较缺乏的重要物资。同时，各个国营企业也应该有适当的储备。当然，不论是国家的或者是国营企业的物资储备，都应该加强计划性，规定合理的定额，逐步增加，不能要求一下子增加很多，以免妨碍当前的生产乔日建设。并且，我们也要反对把由于盲目生产所造成的产品积压，当做国家的物资储备，因为这种做法，必然会造成国家资金的积压和浪费，也是对生产和建设不利的。

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多年来的经验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未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不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开辟财政来源，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或者单从节约财政开支着想，保留过多的后备力量，都将限制经济建设的充分发展，这是不对的。

我们在制定财政收入计划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到积累和消费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在制定财政支出计划的时候，除了必须根据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进行正确的分配以外，还必须考虑到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考虑到意外的需要而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避免把支出定得过分紧张。如果只顾建设的要求，不顾财政的可能，不顾设备、器材和技术力量是否能够供应，而提出过高过大的拨款和投资的计划，显然也是不对的。

同志们常常喜欢争论应该不应该有“财政框框”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不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观地定出一个“财政框框”来限制经济的发展，这当然是错误的，应该反对这样的“财政框框”。但是，如果财政计划符合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体现着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正确关系、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之间的正确关系，那么这样的财政计划，无疑地应该严格执行，决不能够当作“财政框框”盲目反对。

在这里还要指出，我们在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有许多是同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分不开的。有些领导同志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主观地处理问题和布置工作，因而所作的决定就很难正确，甚至发生错误。而上级的官僚主义，又助长了下级的命令主义。

现在国务院各部门机构大，层次多，因而公文多，电报多，表格多，弄得下级机关疲于奔命。而有的部门的领导同志，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部门发了些什么指示，作了些什么规定。这样的官僚主义的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在我们政府的工作中，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决不容许我们有丝

毫的骄做自满。应该看到，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我们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

[①]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编制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50]，应该以第一个五年计划[84]可能达到的成就作为出发点，联系到大约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122]我国要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这个基本要求，实事求是地估计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内外的各种条件，进行全面的规划。这样，才有可能使计划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

党中央委员会提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应该是：（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有人问：既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日益发展，并且在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出现了经济和技术的广泛合作的可能性，我国是否还有必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呢？我们认为，我国目前的情况虽然同苏联建国初期在经济上处于孤立无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极有利的条件，但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要很大的国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因为，从国内的要求来说，我们必须迅速改变国民经济长期的落后状态；从国际的要求来说，我国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并且可以增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因此，那种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

另一种关起门来建设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不用说，我国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长时期内还需要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同时也需要同其他国家发展和扩大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而且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事实表明，不仅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的协作范围将不断地扩大，而且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

为了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

[①]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的第二部分。

须继续扩大冶金工业的建设，大力推进机器制造工业的建设，加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建设，积极进行工业中的落后部门——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无线电工业的建设。同时，还必须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首先是进行工业的技术改造，以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

经验证明，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的，它必须有各个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延缓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将极大地影响重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发展农业，求得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互相配合。为了使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按比例地互相协调地发展，我们又应该妥善地安排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工农业生产和运输、商品流转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地安排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关系，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以便把一切积极的因素和有用的力量都组织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来。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基本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将有可能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财政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由第一个五年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因而第二个五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就将比第一个五年增长一倍左右。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初步计算，一九六二年比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将增长一倍左右，其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产值都会有很大的增长，但是生产资料产值增长的速度将会更快一些；农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到一九六二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数字增长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这里应该加以说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所列举的增长百分数，都是以第一个五年的计划数字作为基数进行比较的，并没有把可能超额完成的因素计算进去，因而增长的百分数就显得高些；等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以后，如果以一九五七年实际达到的数字作为基数，那么现在建议中的增长百分数将有可能相对地下降一些。例如：在建议中提出的我国的钢产量，一九六二年计划达：到一千零五十万吨到一千二百万吨，这个数字同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产量四百一十二万吨作比较，将增长一点五倍到一点九借，但是，如果同现在预计的一九五七年产量五百五十万吨作比较，那么就增长将近一倍到一点二倍。

上述关于基本建设的规模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我们认为是适当的，是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应该相信，只要我们善于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就能够取得伟大的力量，克服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像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胜利地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主要问题

①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150]的具体方针和指标，在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151]中，都已经提到了。这里，我只扼要他说明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主要问题。

一合理地积累和分配资全

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我们可能积累多少资金和如何分配资金。我们的资金积累较多，分配得当，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会较快，国民经济各部门就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因此，合理地解决资金积累和资金分配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国民收入是全国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物质财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全部国民收入都归劳动人民自己所有。劳动人民把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用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部分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用作积累。在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必须使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保持适当的比例。消费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人民不利的。

第二个五年的国民收入将有可能比第一个五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由于我国国民经济还很落后，农业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大，人民生活的水平还比较低，因此，积累部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可能也不应该有过多的和过快的增长，但是可以稍高于第一个五年已经达到的水平。这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积累的总额，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会有比较多的增加。

在解决了资金积累的问题以后，还必须解决资金分配的问题。考虑到目前的国内条件和国际条件。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有必要和可能适当地降低国家预算中的国防和行政费用的比重，而提高经济和文化教育支出的比重。第一个五年国防和行政的费用，约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左右，第二个五年应该争取降低到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样，经济和文化教育支出所占的比重，就有可能山第一个五年的百分之五十六左右，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从而保证我国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在分配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时候，应该保证工业和农业能够得到较高速度的发展。在投资总额中，工业投资所占的比重，可以由第一个五年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二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左右；农业、水利和林业的投资所占的比重，可以从第一个五年的百分之七点六提高到百分之十左右。此外，还应该注意

---

①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的第三部分。

安排运输和邮电部门，文化、教育、科学和保腔部门，城市建设部门和商业部门等的投资，使它们保持适当的比例。

在分配工业投资的时候，还应该在轻重工业之间进行适当的安排。第一个五年由于我国的轻工业还有很大的潜力，因此计划规定轻工业的投资占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十一点二，在执行过程中略有增加，这样的比重是适当的。考虑到第二个五年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若干轻工业品的生产能力将会不足，我们认为，有必要适当地提高轻工业投资所占的比重。但是，由于某些轻工业企业的生产潜力，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特别是大量的公私合营企业，经过改组安排以后，有可能进一步地增加生产，手工业在实现合作化以后，也将进一步增加生活消费品的生产，因此，我们在安排轻工业投资的时候，还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

二正确地安排基本建设计划

关于基本建设，除了上面已经说到的必须合理地分配投资以外，还应该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

第一，关于加强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建设问题。

在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中，应该特别注意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建设。

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是建立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帧主要环节之一。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84]期间,许多大型的精密的机器和成套设备都还不能够制造，这种状况使我国建设所需要的机器和设备有百分之四十左右依靠进口解决。因此，努力发展机器制造工业，特别是发展我们所需要而又缺乏的各种重型设备、专用机床、精密机床和仪表等制造业，是今后工业建设的一个重点。我们应该争取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机器设备的自给率提高到百分之七十左右。

冶金工业是重工业的基础，如果没有强大的冶金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也是困难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生产的钢材大约只占国内需要量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而许多特殊品种的钢材，全部或者几乎全部要依靠进口解决。因此，努力发展冶金工业，是今后工业建设的另一个重点。我们应该争取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钢材和主要的有色金属的数量和品种，都能够基本上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部门的需要。

在重工业各部门中，不仅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需要努力发展，而且还有许多薄弱的环节需要加强，许多空白需要补足，例如，稀有金属的开采和提炼，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等等，都应该当作我们进行建设的重要方面，给以足够的注意。

为了发展重工业，必须继续加强地质工作，并且使地质普查工作和重点勘探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争取发现更多的新矿区和矿种，探明更多的矿产储量，以满足工业建设当前和长远的需要。

第二，关于生产力分布问题。

为了合理地配置我国的生产力，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且使我国工业的布局适合于资源和国防的条件，必须在内地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工业基地。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不可动摇的方针。加强内地工业的新建设，也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进行

华中和内蒙古两地区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基地的建设，积极进行西南、西北和三门峡周围等地区以钢铁工业和大型水电站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的建设，继续进行新疆地区石油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的建设，并且加强西藏地区的地质工作，为发展西藏的工业准备条件。

同时，我们必须充分地利用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我们在内地进行工业建设所需要的许多原材料、设备、资金和技术人才，都需要近海城市原有工业来供应和支援。可以说，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是我国工业化的出发点。我们充分利用并且加强近海地区的工业基础，不但是为了适应国家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也正是为了在内地建立更强大的工业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继续加强东北的工业基地，充分利用和适当加强华东、华北、华南各地区近海城市的工业，以发挥他们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当然，我们在充分利用近海城市原有的工业基础的时候，应该注意合理性，避免盲目性。这种合理性就是：改建那些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建的企业，而不是改建一切的原有企业；在工业企业已经比较多的城市，一般地应该少建新的企业；新建和改建的企业，必须注意到原料来源、产品销售、生产技术和运输方便等条件，并且注意同其他地区的合理分工。

在工业地点的分布问题上，不论是内地的工业或者近海地区的工业，我们的方针是既要适当分散，又要互相配合，反对过分集中和互不联系的两种偏向。

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合理分布，我们将要建设许多新的城市和扩建许多原有的城市，为此，应该加强城市的规划工作和建设工作，求得同工业建设相配合。

第三，关于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结合问题。

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开工建设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要开工建设的许多规模巨大的工业企业，是组成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骨干。但是在建设大型企业的同时，还必须建设许多中、小型企业，以便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增产更多的工业品，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有人认为，建设大型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比较合理，因此应该多建大型企业而少建中、小型企业。又有人认为，建设中、小型企业需要的时间较短，发挥投资的效果较快，因此应该多建中、小型企业而少建大型企业。我们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某些工业部门和在某种条件下，建设大型企业是合理的，而另一些工业部门和在另一种条件下，建设中、小型企业就比较合理。在每一类企业中，一般他说都应该有一些大型的企业作为骨干，又应该有许多中、小型的企业来配合。

为了使企业的建设更加合理起见，凡是有必要也有可能分期建设的大型企业，可以考虑分期建设；凡是资源有余并且有其他条件的中、小型企业，可以进行全面规划，为以后的发展预做准备。同时，在规划中、小型企业同大型企业相配合的时候，应该首先利用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原有中、小型企业以及手工业，以发挥他们的生产潜力。

三发展工业生产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产值在内）增长百分之九十点三；党中央委员会建议，一九六二年

比一九五七年原计划，工业总产值应该增长一倍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所以有可能保持比较高的速度，是因为：投入生产的新建和改建的企业将会增加，大多数原有企业将采取增产的技术措施或者进行技术改造，公私合营企业将要完成经济改组并且基本上实现国有化，手工业除了少数的以外，将完成合作化，同时，农业发展也有可能保持较高的速度。

关于发展工业生产，我在这里只说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发挥工业企业的生产潜力问题。

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按照大体的计算，到一九五七年，由新建企业和改建企业所生产的，将占百分之十五左右；而到一九六二年，由第一个五年和第二个五年内完工的新建企业和改建企业所生产的，将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因此，加强组织工作，充分发挥这类企业的作用，对发展工业生产有重要的意义。

新建和重大改建的工业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从开工生产到达到设计的生产能力，是要有一段时间让技术人员和工人掌握机器和设备的性能、熟悉工艺过程的，但是，只要充分发挥技术人员、工人和职员的劳动热情和智慧，这个时间是可以缩短的，而且，设计文件上所规定的企业的生产能力，有些是可以超过的。根据一九五六年四月的统计，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陆续投入生产的限额以上[152]的一百四十一个工业建设单位中，已经提前达到并且超过设计能力的就有三十个，可以提前达到设计能力的有三十三个，可以按期达到设计能力的有七十一个，不能按期达到设计能力的只有七个。这就是说，大约有接近半数的企业，可以缩短时间而提前达到设计能力。在这方面的例子有：改建的沈阳风动工具厂，原估计要四年的时间才能够达到设计能力，实际上建成的第二年就达到了，预计一九五七年的生产量有可能超过设计能力一倍以上；新建的抚顺铝厂，在一九五五年初正式投入生产，当年的产量已经达到它的设计能力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左右。可见新建和改建的企业，有很大的生产潜力。为了充分发挥这种潜力，首要的问题是加强生产准备工作，特别是人员培养、技术准备、组织协作和原材料供应等工作。关于这方面的具体经验，有关部门应该加以研究、总结和推广。

但是决不能够说，有了新建和改建的企业，我们就可以不注意原有企业的生产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原有企业生产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许多新建和改建的企业还需要依靠原有企业的协作和支援。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条件，分别地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一部分企业有计划地进行改建或者进行技术改造，对另一部分企业进行调整和增添某些设备，对其余的企业继续改善经营管理，以进一步发挥原有企业的生产潜力。

第二，关于推进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问题。

推进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和促进技术的发展。但是，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随着我国工业水平的提高，并且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和可能条件，逐步地和分别地解决，不能盲目从事和勉强进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原有的综合性工厂的作用，使他们的生产适应于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在机器制造工业中，开始按照产品种类建立了一些专业分工的工厂，同时调整了一些原来产品种类过于复杂的机器厂，使这些企业初步地走

上了专业化，这都是完全必要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除了应该新建一些专业化的工厂以外，对于各类新建和改建的企业，应该对他们的产品方案进行合理的安排，既要避免产品种类过于复杂的缺点，又要避免不适当地追求专业化的偏向。对于原有企业，我们一方面应该适当地调整某些企业的产品方案，使生产比较合理；另一方面仍旧应该保留一部分综合性工厂。对于大部分公私合营的企业，我们应该让他们继续保留原有的产品种类，以适应社会多种多样的要求，并且适应国营企业对协作的需要。在一个工业区或者一个工业城市内，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和可能，统一组织某些锻件、铸件和标准件的专业生产。在推进工业生产专业化的过程中，应该防止产品种类减少的偏向。

随着工业生产逐步地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协作任务也就越加繁重和越加复杂。这就必须进一步纠正那种只愿单干不愿协作的思想。凡是必须协作和可以协作的企业，应该在年度计划中规定具体的协作任务和订立协作合同。

第三，关于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品种问题。

许多工业产品、特别是某些轻工业产品质量不高和品种不多，已经成为当前工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并且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已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没有疑问，我们很多重工业产品和轻工业产品，质量是不断提高的，品种是不断增加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工业产品都如此，甚至某些产品质量在不断下降，品种在不断减少，这种现象必须大力加以纠正。

工业产品质量低和品种少，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技术水平不高和设备落后的缘故，但是，这并不能够说我们就没有可能来提高我国工业品的质量和增加工业品的品种，更不能够以此做为质量下降和品种减少的借口。我们有些工业部门，对产品质量和产品品种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缺乏长远的规划和有效的措施；在检查计划执行情况的时候，常常偏重于检查产量计划完成的情况，而忽视检查质量计划和新种类产品生产计划完成的情况；产量超过计划有奖励，质量提高了和种类增加了却得不到奖励。所有这些，都是造成我国当前工业产品质量低和品种少的重要原因。除此以外，在轻工业产品方面，工厂所生产的成品，过去由商业部门包购包销；质量好的和质量不好的、新产品和旧产品都是一个价格，或者价格相差很少。这些制度和办法，也都助长了企业忽视产品质量和产品品种的偏向。因此，在当前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各个工业部门，应该制定出工业技术的长远发展规划，积极地组织产品设计的力量和加强对新产品设计和试制工作的领导，加强企业的技术管理工作，改善原材料的供应工作，实行产品质量奖励制度；特别是应该发动广大职工群众，为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品种而努力。同时，商业部门应该逐步地实行某些商品的选购制度和按质分等论价的办法。

四发展农业主产

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粮食产量五年合计达到二万二千亿斤左右，一九六二年达到五千亿斤左右；棉花产量五年合计达到二亿一千万担左右，一九六二年达到四千八百万担左右。一九六二年比一九五七年原计划，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这些指标是考虑了下面两方面的情况提出的。一方面，除了个别的地区以外，农业将会完成高级形式的合作化，这样我们就能够进一步按照《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

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25]的规定，广泛地采取各种增产的措施和推广各种增产的经验；同时，灌溉面积和耕地面积将会有所扩大，化学肥料的供应将会有所增加，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将会有所进步，这些，都将促进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各种自然灾害还都难于避免，许多为害严重的河流还不能得到根治，更大规模的垦荒工作还不能全面地展开，农业机械化的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又使我们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要求有更高的速度。当然，我们应该充分地利用上述的有利条件，争取农业生产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得到更大的发展。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应该特别注意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问题。

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是要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依靠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逐步地改进农业生产的技术，兴修水利，增加肥料，推行先进经验等，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实行各种增产措施的时候，我们又必须采取国家的工作和合作社的工作互相结合的方针。

从兴修水利说，一方面，应该由国家和地方举办若干大、中型的水利工程，如黄河、淮河、海河等流域的治本工程和各地方的防洪、防涝工程；另一方面，应该由合作社大量地举办小型的水利工程，改善原有的水利设施，加强水上保持的工作。在低洼易涝的地区，应该研究和进行各种防涝、排涝的措施，改变耕作制度，以减轻内涝的损害。

从增加肥料说，一方面，应该由国家积极发展肥料工业，并且争取多进口一些化学肥料，以增加肥料的供应；另一方面，而且是主要的方面，应该由合作社和社员个人广泛地养猪积肥，有些地方是养羊积肥，并且制造绿肥和积聚其他的自然肥料。

从推行各种技术措施和先进增产经验说，应该积极开展技术指导工作，一方面，吸收外来的先进增产经验，并且根据科学的试验和研究的成果，因地制宜地加以推广；另一方面，也应该积极注意总结和推广当地的先进增产经验。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地指出，推行技术改进的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必须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步骤。这几年来在这个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有些地方发生了机械地搬运甚至强制推广的毛病，造成了不好的结果。今后任何增产的措施和先进的经验，不仅必须先经过试验，证明确实有效后再逐步推广，而且在推广的时候，还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规定适当的实施步骤；同时，在推行这些措施和经验的时候，还应该征求当地农民特别是有经验的老年农民的意见，不应该强迫推行。对于当地的耕作习惯，也不应该粗率地加以否定。

第二，关于发展多种农业经济问题。

粮食是保证人民生活和发展整个农业经济的基础，我们必须加以足够的注意。这几年来，各地方重视了粮食和棉花的增产，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有些地方却因而对其他农业经济一除棉花以外的各种经济作物、畜牧业、林业、水产养殖业、蚕桑业和各种农家副业的增产注意得不够，加上有些农业产品和土特产品受了收购价格偏低的影响，结果使农业经济不能够全面地和充分地发展，从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到农民的收入。因此，各地方以至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规划自己生产的时候，都应该根据当地的历史情况和当前情况、自然条件和经济技术条件。农民的生产习惯和生活习

惯等等，对农业的发展进行全面规划，以免发生单一化和片面化的倾向。在畜牧区、林区和水产区，应该分别以畜牧业、林业或者水产业为屯乙进行规划，同时根据可能的条件发展农业和其他副业。

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们必须采取许多具体办法。凡是农民有经营习惯而又为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生产，应该继续经营并且加以发展，凡是社会迫切需要，特别是有重大经济价值的产品，例如亚热带作物和热带作物、出月需要的各种农产品和副产品，除由国家或者地方统一经营以外，还应该鼓励合作社经营，曲国家进行技术指导。凡是不必要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的农家副业，应该鼓励社员单独经营。商业部门应该合理地规定农业产品和副业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改善收购制度，同时，有关部门应该帮助合作社适当地恢复农村中的某些农产品加工业。

五发展运输业和邮电业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内地和边远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都需要大大地增加运输和通讯的能力，要求我们必须以铁路为重点，相应地进行全国运输网和通讯网的建设。这就向运输和邮电部门提出了巨大的要求：一方面，应该对原有线路和设备进行必要的改建和技术改造；另一方面，应该继续进行新的线路的建设，主要是西北和西南两个地区的铁路、公路的建设，沿海、长江的港口的建设，同时还应该增加必要的运输和通讯的设备。运输和邮电部门应该根据上述两方面的要求，分别轻重缓急，进行全面规划，以保证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中所提出的关于运输、邮电方面的各项任务。

目前，在某些线路上已经出现了运输和通讯的紧张状态，这主要是由于设备能力不足所造成，但是也应该看到，某些运输和通讯的线路和设备，还存在着一定的潜在能力没有被发掘出来。因此，运输和邮电部门，还应该积极地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和加强运输、通讯的组织工作。

由于我国近代运输工具不足，运输线路不够，并且分布得很不平衡，而我国现有的木帆船和兽力车等民间运输工具数量大，分布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重要的辅助运输力量，在有些地区，目前还是主要的运输力量。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和适当发展民间运输工具，并且逐步地对他们进行技术改良。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们还应该把近代运输工具同民间运输工具结合使用，以适应运输增长的需要。

六加强商业工作

改善人民生活，不仅要增加人民的货币收入，而且要使他们能够买到相当数量的和合乎需要的商品。根据大体的计算，一九六二年供应城乡人民的各种日常生活消费品和一部分生产资料的数量，即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比一九五七年原计划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这是商业部门的一项繁重的任务。商业部门必须继续加强收购工作和销售工作，继续贯彻执行对主要生活必需品的统购统销政策。[149]，合理地设置商业网，并且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在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从对外贸易方面说，应该有计划地组织有关物资的出口以保证国家建设所必需的设备和器材的进

口。

商业作为联系生产和消费、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纽带，不仅担负着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和一部分生产需要的任务，担负着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任务，而且也担负着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任务。由于价值规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还起着一定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更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正确地掌握物价政策，就可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市场的物价一般是稳定的，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的比价大体是适当的，这就表明，我们的物价政策是正确的，它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设的发展，并且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但是，在物价政策的执行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有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的收购价格定得偏低，或者有时高有时低，影响到这些产品的增产，甚至使某些产品减产；某些轻主业产品在质量和品种方面的差价大小，影响到这些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品种的增加。这些缺点，都已经发现并且逐步地进行了纠正，但是还没有完全克服。在今后，我们对物价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调整。

正确地掌握物价政策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经济情况比较复杂的国家里，对物价的调整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而不能轻率从事。比如，不适当地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对于工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对于保持各种农产品之间正确的发展比例，都会有不利的影响；不适当地降低工业品的销售价格，有可能引起商品的脱销。因此，这种不适当的提价或者降价，都将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物价方面将继续采取稳定的政策，同时，对某些不合理的物价进行必要的适当的调整。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我国占居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适当的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为了适应上述情况，防止由于统一过多过死而发生产品质量下降和品种减少的现象，现在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商业方面，将采取许多重要措施。例如，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等等。采取这些措施，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

七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实行企业改组和人员安排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方面，我只说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小公私合营企业和手工业、小商业合作组织的改组问题。

大型的公私合营企业，因为合营的时间比较早，他们的生产和经营已经逐步地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经营管理制度也一般地进行了初步的改造。但是大量分散的中小型的新公私合营企业，还需要进行适当的改组和安排。许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在实现合作化以后。也需要进行必要的改组和安排。这样，才能使他们在比较合理的条件下进行生产和经营，以逐步地适应国家的计划管理的要求。我们在对他们进行改组的时候，必须注意防止和纠

正过分集中的偏向。

从工业方面说，小型工厂固然有它的缺点，但是他们在生产经营方面比较机动灵活，容易适应多样的、经常变化的需要，因此，凡是经营合理并且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小型工厂，都应该保存下来，不应该草率地加以合并或者取消。手工业合作组织一般地不宜过分集中，应该根据发展生产、适应社会需要、增加社员收入的原则，使大社、小社、小组同时存在；某些制造性的行业，特别是许多修理性、服务性的行业，都应该让他们继续保持分散活动和原有的经营特点，以便于直接为居民服务，同时便于吸收家庭辅助劳动参加生产。有些手工业可以在手工业合作组织的领导下，继续独立生产，也可以让他们完全自产自销，不必勉强组织起来。

从商业方面说，商业机构的分布应该最大限度地便利居民，因此更不应该过分集中，而应该适当分散，并且采取多样的经营方式，为居民服务。我们的商业领导机关，过去往往多考虑自己管理的方便，而少考虑如何便利居民，因而发生了集中过多的偏向，不适当地集中了和取消了一些小商店和小商贩。这种偏向，应该迅速加以纠正。今后不论在城市居民区或者广大农村中，都应该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销、甚至完全自购自销等等方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第二，关于工商业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安排和改造问题。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公私合营以后，我们应该培养和提拔优秀的职工参加企业领导，同时还要吸收原来的工商业资本家和小业主，担负一部分经营管理工作或者领导工作。在实行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以后，资产阶级分子在企业中具有资本家和职员的两重身份，因此，公股代表应该同这些资方人员很好地合作，发挥他们的特长和积极性，并且在工作的过程中，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克服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帮助他们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把他们逐渐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而不应该对他们采取歧视的态度，这样做，对企业、对国家和对工人阶级都是有利的。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应该使企业中的职工懂得这个道理，把团结、教育和改造资方人员当作一件重要的任务。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几十万资方人员，绝大多数都有一些生产技术或者经营管理经验，其中有一些人有相当高的生产技术和相当多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于他们的生产技术和有用的经营管理经验，我们必须充分加以利用。公股代表在这方面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

八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的许多建设事业将要更多地由地方负责兴办或者要依靠地方的努力配合来完成。因此，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是我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条件。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民民主专政已经更加巩固，这就使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国务院在今年五月到八月曾经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对于当前存在着的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作了检查，对改进国家行政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

决议草案[153]，现在正在广泛地征求各方面意见。

在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的时候，应该实行以下的原则：（1）明确地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2）凡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而带全局性、关键性、集中性的企业和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的企业和事业，应该尽可能地多交给地方管理：企业和事业在下放的时候，同他们有关的计划、财务管理和人事管理一般地应该随着下放。（3）企业和事业的管理，应该认真地改进和推行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或者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的管理方法，切实加强对企业和事业的领导。（4）中央管理的主要计划和财务指标，由国务院统一下达，改变过去许多主要指标由各部门条条下达的办法。（5）某些主要计划指标和人员编制名额等，应该给地方留一定的调整幅度和机动权。（6）对于民族自治地方各项自治权利，应该作出具体实施的规定，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7）改进体制要逐步实现，某些重大的改变，应该采取今年准备、明年试办、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面实施的步骤，稳步进行。

为了有效地实行上述的各项原则，我们认为，中心的问题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因为地方比中央更加接近企业和事业的基层单位，更加接近群众，也更加容易了解实际情况，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就能够更好地把地方上的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

为了更大地发挥地方积极性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现在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少数民族工作。凡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该成立自治地方而尚未成立的，都应该按照宪法规定，积极地帮助他们成立自治地方。应该严格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各项自治权。应该大量培养和提拔民族干部，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管理各种事务的能力，使他们在工作中能够真正当家作主，有职有权。不论在少数民族聚居、杂居或者散居的地方，他们的民族平等权利、宗教信仰自由、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都应该受到尊重。对于那些还没有文字或者文字尚不完善的少数民族，应该积极地帮助他们创制和改革自己民族的文字。

九培养建设人才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进行国家建设和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就必须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第一，关于建设人才的培养和分配问题。

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这几年来，我国培养建设人才的工作是有显著进展的，但是从国家建设的要求来看，我们在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所培养的人才，在数量上、尤其是在质量上和门类上，还难以满足需要。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并且根据“掌握重点、照顾其他”及需要和可能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全面规划。

要做好建设人才的培养工作，必须正确地处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过去几年，我们有片面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的偏向，这是必须纠正的。从教育部

门说，应该积极地发挥力量，在保证一定质量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增加学生的数量。从用人部门说，应该考虑到真正需要和实际可能。不要提出过多过高的要求，以免由于盲目地增加数量而降低学生质量。

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应该实事求是地而不是主观主义地调整科系和设置专业，切合实际地改进教育比划、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学方法，以便使培养的人才能赂更加适应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具体妄求。目前在发展和提高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方面最大的菌难，是缺乏师资和学生质量不高。因此，必须从高等学校毕业学生中间抽调适当数量的优秀学生，培养更多数量的研究生，并且有重点地选派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和教师出国学习我们缺乏的学科，以增加师资。同时，必须相应地发展和办好高级中学和初级中学，以提高学生的质量。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现有的图书和仪器一般都还不够，应该逐步地加以补充；这些学校在发展中所必需的校舍，也应该加以解决。

培养建设人才还必须发展业余教育，从职工中吸收有条件深造的人员到夜校或者函授学校学习，逐步地培养他门成为高级和中级的专门人才。学习必须真正出于本人自愿，并且要分批分期地进行；各单位要保证学习的人有必要的业余学习时间，学习的时间不要太长，学习不要过紧，以免妨碍生产和职工的健康。在科学技术人才不足的情况下，对建设人才的合理分配就更加重要。在分配建设人才的时候；对生产、建设的需要和科学研究、师资增加的需要；都应该首先保证重点，同时照顾其他方面；并且应该继续纠正那种对科学技术人才分配不当和用非所学等不合理现象。

第二、关于加强科学研究工作问题。

最近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集合了全国几百名优秀的科学家、草拟了今后十二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154]，分别地提出了自然科学方面和社会科学方面最重要的研究任务；这是提高科学研究工作，保证我国许多重要的科学和技术方面在今后十二年内能够接近世界上先进水平的极重要的措施，应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早日完成这两个规划，并且组织全国科学研究的力量，有步骤地实现这两个规划所提出的任务。由于这些任务十分繁重，现有的科学研究人才不足，而现代科学和技术又在一日千里地发展着，也由于当前我国科学研究的重点，大多数是我们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甚至是缺门，因此，我们应该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重要方面的问题，防止百废俱兴，平均使用力量的偏向。

为了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必须逐步地建立和健全中国科学院和各业务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加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做到各方面分工合作，密切结合。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置，应该在地区上合理分布。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同国家的各项建设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在科学研究中，要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以充分发挥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为了发展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还应该及时地解决必需的图书、资料、仪器和试验场所等问题，积极地改善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条件，并且进一步地密切国际间科学研究工作的联系和合作，收集和交换国内外科学和技术的资料。

十进一步改善人民主活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发展生产和增加国民收入的基础上，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中，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是常常不容易安排得好的。因此，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

在这里，我要着重地说明以下的问题：

第一，关于改善职工物质生活问题。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这样的增长速度，同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是相适应的。根据前面所说的经验，我们必须在年度计划中，经常地注意保持工资增长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适当比例关系，使职工韵工资水平能够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较均衡地上升。并且，在规定各个年度的职工工资增长计划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到生活消费品生产和供应的可能性，以避免工资增长同物资供应发生脱节的现象。在调整职工工资的时候，必须贯彻执行“按劳付酬”的原则，进一步改进工资制度。

为了改善职工的物质生活，除了进一步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以外，现在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应该根据可能的情况，采取实际措施，逐步地改善职工居住、安全、医药卫生等方面的条件和适当地增加其他的福利设施。在这方面，国务院已经拟定了若干具体措施，并且将在最近期间公布施行。

我们应该继续反对对职工生活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事实上，有许多增加职工福利的设施之所以没有举办，并不是完全因为缺乏财力和物力的条件，主要是由于某些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员对职工生活的改善，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应该指出，有一些福利事业是不需要增加国家预算的开支就可以举办的。只要我们能够克服官僚主义的作风，更多地关心群众生活，并且认真地执行国家的计划和各种规定，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把改善职工的物质生活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办得更好。

第二，关于改善农民物质生活问题。

为了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调整国家积累和合作社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正确地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注意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的公共积累和社员个人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正确地解决合作社收益的分配问题。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的农业税应该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并且将把农业税的正税和附加税统一征收，以简化税制；同时，我们要求所有的合作社贯彻执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55]的规定，使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用一般地不要超过章程上的比例定额。这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能够完成农业的增产计划，就有可能使农民的全部收入在五年内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将继续从各个方面来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生产，对水利建设和农业的投资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很大的增加，农业贷款也将有所增加；同时，国家仍将规定一部分专款作为农村救灾的用途。对于许多自然条件不好的山区和老根据地，今后国家应该特别注意帮助当地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第三，关于提高人民文化生活水平问题。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于文化要求的增长，我们应该按照建议规定，继续努力扫除文盲，发展小学教育，开展工农群众的业余教育，逐步推行文字改革。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开展群众的文化工作，发展新闻、出版、广播、文学、艺术、电影等事业。在举办这些事业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质量的提高。

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必须采取积极而又稳妥的步骤。几年来，我们在扫除文盲、小学教育、社会文化和出版等项工作中，都曾经发生过或者保守、或者冒进的毛病，使工作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今后我们必须吸取这一教训，根据需要和可能，实事求是地开展文化教育工作。

开展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充分地依靠群众的力量，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过去文化教育工作常常有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毛病，今后必须加以纠正。要在工作中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凡事都要和群众商量。对于那些真为群众所需要、确有条件和群众自愿举办的事业，如民校、识字班、俱乐部、业余剧团等，我们应该给以支持和帮助，并且加强领导，当然，在运用群众力量的时候，必须经常注意爱惜民力和时间，不要随便增加人民的负担。

第四，关于增进人民健康问题。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发展卫生医疗事业，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并且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

几年来，爱国卫生运动在改善环境卫生、减少疾病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近年来，我们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有些放松，今后应该继续大力开展这一运动，并且使它更加深入和经常化，以进一步改进城市和乡村的环境卫生，减少各种传染病和职业病的发病率。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推广治疗血吸虫病的经验，有计划地分期分区地消灭危害严重的地方病。全国城乡的基层医疗组织，在预防和治疗疾病方面，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今后卫生部门应该加强对他们的领导。

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目前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例如：在医院工作中，由于管理不善，收费较高，因此使目前有限的病床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而且使有些群众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疗养病床缺乏统一管理，造成很大浪费；此外在公费医疗制度和医务工作制度等方面也还有不适当的地方。为了消除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卫生部门应该认真地调查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

我们应该在广大群众中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有效地增强人民的体质，并且提高我国体育运动的水平。在开展体育运动的时候，必须根据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学习的具体情况和体质条件，有区别地和有步骤地进行，避免要求过高过急和一般化的毛病。

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于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

十一继续厉行节约

克勤克俭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一切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

和合作社，都应该厉行节约，使人力、物力、财力都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一年以前，党中央和国务院曾经号召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克服非生产性建设过多、生产性建设成本过高、工程和产品质量不好、物资损耗很大、以及机构庞大和人浮于事等等不良现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应该指出，节约的方针并不是在一切部门中都贯彻得很好的，浪费现象仍然存在；同时，在厉行节约和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过程中，由于片面的节约观点，或者由于只追求多和快、不重视好和省的偏向，使工程和产品的质量也发生了不少的问题，有些要返工重修，有些会降低效用，甚至变成废品，这样，不仅不能够达到节约的目的，反而又造成了浪费。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国家建设规模的扩大，我们在物资供应、资金来源和技术力量等方面，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而厉行节约，合理地使用物力、财力和人力，正是克服这些困难的一项重要办法。应该承认，计划的好坏，对于节约或者浪费起着重大的作用。计划所造成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计划所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因此，各级国家机关和企业部门应该首先做好计划工作。一切企业单位，都应该加强定额管理工作，推行各种合理的先进定额；加强技术管理工作，提高产品和工程的质量，减少废品、次品和工程质量事故；贯彻执行责任制度，克服无人负责的现象，以防止浪费和发挥节约的潜力。一切事业单位，都应该减少不必要的事业开支和人员编制，加强财务管理和稽核工作，以缩小事业经费在预算中的比重。一切合作社，都应该继续贯彻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

在国家行政机关方面，应该继续克服机构重叠和人浮干事的现象。现在，在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一般地说，机构部还过于庞大，人员还是过多，而这种现象，上级机关比下级机关严重，大机关比小机关严重。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各级机构和机关人员继续进行调整，精简行政机构，把机关人员适当下放，把非生产人员调往生产单位。这是目前在国家机关方面实行节约方针的有效办法。

十二加强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和协作，扩大国际间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合作和联系

为了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除了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以外，还必须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运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我们一贯努力加强同伟大苏联的团结，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并且同他们进行全面协作和互相支援。我们也努力发展同那些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特别是同亚非各国的经济合作、贸易来往、文化和技术的交流。

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互助协作关系，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的基础上，并且以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比水平为目的的。

如前所说，不论在我们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或者在我们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我国都在各方面获得了苏联的巨大的和真诚的援助，同时，也获得了各兄弟国家的重大的援助。这种援助，帮助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以比较高的速度向前发展。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还将继续给予我们兄弟般的大规模的援助，特别是那些由苏联和许多人民民主国家帮助我们设计和装备的大企业，将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进一步奠定基础。过去，我们在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先进的建设经验和科学技术方面，得到很多好处，今后我们还必须同样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我国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我们必须很好地尽这份责任。我们有义务向各兄弟国家供应他们在建设中所需要的许多农产品、畜产品、矿物原料以及某些机器设备和工业产品。我们必须努力增产，或者适当节约国内的消费，来保证这些产品的供应。为了同其他国家进行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我们也有必要妥善地计划我们国内的生产和消费，以便保证必要的出口。

几年来，我国同许多亚非国家在经济、技术和文化各方面的合作和联系日益密切。特别是从亚非会议[156]以来，这种合作和联系有了更广泛的发展。我们绝大多数亚非国家都迫切要求消除长期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因此深刻地体会到彼此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进行合作的必要。我国一贯主张在平等互利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基础上同亚非国家进行这种合作，在经济上和技术上促进彼此的独立发展，在文化上发扬各自的特长并且互相观摩学习。这种合作有助于保障亚非各国的民族独立和扩大和平地区，因此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建设。尽管这种合作的范围现在还不很大，但是，重要的是亚非各国已经开始合作，并且正在扩大同拉丁美洲各国的联系，而这种合作和联系毫无疑义是有广阔的发展前途的。

我们也愿意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发展经济上、技术上和文化上的联系。我们一直在努力扩大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并且愿意把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中有用的东西吸收过来，为我们的建设事业服务。尽管美国对我们实行禁运，并且强制许多国家对我们采取同样的政策，但是这个彻底违反各国人民利益的政策，已经遭到各方面日益强烈的反对。这个不合理的人为障碍，迟早是会被扫除的。

我们主张扩大国际问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合作和联系，不仅是为了加速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还因为这将为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奠定可靠的基础。因此，这是完全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完全符合于和平事业的利益的。

争取外援，但不依赖

①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

我们要争取苏联的帮助，但要去掉依赖思想。如果苏联有困难，或在某些方面还留一手，那就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主要是自力更生，但不放弃争取外援。过去我们党内一些同志有完全依靠苏联的想法，在党外朋友中这种思想也发展了。我们要靠自己，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当然很好，没

① 这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关于苏联援助我国第二十五年计划建设项目谈判情况的报告时的发言。

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我们也要建设社会主义。这样说，并不是不尊重苏联，不团结苏联，苏联的帮助是重要的，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人民，这和尊重、团结苏联是两回事。有时我们的一些同志把苏联的帮助说成是决定的条件，这是不对的。

关于苏联的帮助，我同意陈云[11]同志的意见，苏联基本上是帮助我们的。但是，有时帮助的方法有毛病，他们也有主观主义。批判斯大林不能不对苏联的领导群发生影响。苏联有些同志可能已有自觉，有些同志可能还。没有自觉，我们旁观者清。我们向苏联提出五十五个援助项目的要求是带有试探性的。苏联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需要各国党的支持，结果没有很好地考虑就答应了，现在一算又搞不了，不给也不好说，只好提出推迟时间。这次去苏联谈判，他们正开经济协作会议，苏联领导着眼于自己方面，东欧国家可以搞的，苏联就想少搞一些。这也影响到我们，苏联也让我们少搞一点机械等等。因此，现在答应下来的一百零九项也还会有变动。苏联同志不了解，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搞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成的。斯大林过去倒讲过这样的话。他对毛主席说，你们各种工业部门都要搞起来，要担负起保卫东方的责任。苏联帮助我们，从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互利的。赫鲁晓夫两年前来中国就说，苏联帮助中国不是无私的，就是为了自己。赫鲁晓夫虽然有时租鲁，但这些话说得很好，很直爽。我们应该把苏联的主观、客观条件都分析一下。

我们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苏联现在也有困难，过去有些不该答应的答应了，有些项目推迟了，有时还有在某些方面留一手的情况，但总的来说，还是帮助我们的。我们也要考虑苏联的困难。他们有缺点，那是要改的，我们也可以把问题提出来。我们同意苏联来信的原则，但我们可以作一些调整。苏联来信中说，向中国提供最先进的独一无二的设备，那我们就要最先进的独一无二的。苏联答应给我们的，还有些不是最先进的独一无二的，我们提出来，他就得考虑，但也要准备他不给。不给，也不要泄气，我们自己搞。

搞经济工作要看到问题的本质

①

（一人五六年十一月九日）

一九五六年度各种计划指标到底怎样，我们觉得应该说冒了。虽然后来控制了一下，纠正了几项，但“上马”就跑，而且是千军万马，齐头并进，“下马”不那么容易。在三大改造[127]高潮之下，各部门提出的计划都是大的，从乡政府到各部的司、局都想多和快。二月的财政、计划会议[157]是促退会议，但已不能挽回。从二月的促退会以后到现在，国务院会议每次都在“下马”，总是了不好，速度、质量都受了影响。表面看来，预算收入三百零七亿元、支出三百零七亿元是平衡的，但这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我们搞经济工作要看到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赤字。一笔是动用了上年的结余。过去每年动用结余是采取转账的方式，预算上过去不写的，后来主张写上预算，用到哪里也列入预算。今年的情况不同，真正动用了，实脉上去年的结余已经贷出去了。怎么动用呢？就是发票子，估计到年底要增加票子发行量十二亿元。另一笔是动用了信贷。银行贷款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期的，将国家存款、个人存款等贷出，这种信贷周转是可以的、需要的；另一种是长期的贷款，其中一种是贷出去可以收回来的，一种是收不回来的，收不回来的就需要列入国家预算。今年农业贷款就有十九点七亿元收不回来，预算上没有，而银行已贷出去了，这部分是挖仓库的物资来弥补的。表面看来预算是平衡的，而实际上赤字有二十至三十亿元。

用货币和物资来表现，货币发行增加了十二亿元，收入存款二十二点五亿元，共三十四点五亿元，支出也是三十四点五亿元，看来似乎平衡了，但多发行了十二亿元票子。仓库的物资比去年多销了四十亿元，老底子多销了二十至二十二亿元。多销有些是正当的，有些是不正当的。多销了什么东西呢？二十三亿米布匹，一度布票管理放松了，问题较大，但是如果不多销，人民拿钱买什么去！粮食多销了六十四亿斤（其中由于灾荒多销了二十二亿斤，农村多销了二十亿斤，城市多销了二十二亿斤）。有的该多销，有的不该多销。十、十一月粮食销售要加以控制，按定额销售。农业生产资料多销了七亿元，这就是双轮双铧犁、锅驼机及其他新式农具等。商业部多销了二十多亿元物资，回笼了票子。三十亿元赤字就是多发票子十二亿多元，多销物资二十亿元。现在人民手中还有多少票子？大约十亿元。总之，今年的预算赤字二十至三十亿元，现金是二十至三十亿元，仓库物资挖出去二十至三十亿元，人民手里还有十亿元票子，其后果都将影响明年。

今年的钱多花到哪方面去了？今年的计划各方面都大了，但基本建设投资是主要的方面，批准投资一百四十亿元，执行结果一百四十亿元以上。按历年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的情况（一九五三年六十五亿元，一九五四年七十二亿元，一九五五年八十二亿元），一九五六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以上，虽然应该大长，但不能长那么多。由于头三年设备、设计不能到，后两年会有大的增长，但不能塔长那么高。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中间增长慢了些，一

---

① 这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讲话的第五个问题。

九五四年增长不多，一九五五年增长慢了，如节约下来的钱多建些房子就对了，去年钢材、木材、水泥都多。去年步子慢了，就影响今年长得更高，如果去年是九十多亿元，今年一百二十亿元左右就比较恰当。今年基本建设多用了二十亿元上下。基本建设中也不只是重工业冒了，轻工业、农业、林业、水利建设也冒了。

重工业中有些可以不做。二机部成都技工学校二千多学生，有一百多人要来北京请愿。他们要来可以让来，不必阻止。有问题就要负责解决：第一，不要为自己辩护，有错就承认；第二，把他们的情绪引导到积极方面来。技工学校办这么多，没有房于，没有教师，怎么不出问题！

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

①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

八大[158]以后，对明年的计划数字已经修改多次。明年是很难安排的一年。必须早一点把明年计划的方针定下来，取得全会同意。今天，我想讲一讲几个方针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根据刚才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我们从国际事件中所取得的教训，联系到我们的建设，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犯而且有的已经犯了沙文主义[159]的错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这种错误，就是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这样的错误在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产生，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也可能产生呢？当然可能避免，而且应该尽力避免，但是也有可能产生，并且有些萌芽在过去的工作中已经发现。例如，对周围兄弟国家的大国主义的个别事件，对兄弟民族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也产生过领导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事情，我们领导者的生活和工作制度有些特殊化官僚化。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建设中时常注意这些问题。

第二点，也就是刚才少奇同志说的，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毛泽东同志在这几个月常说，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此外，在中国还有中国的特点，那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从上到下，凡叫“长”的，就容易被人家看得特殊一点；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土壤上实现以后，如果不有意识地经常地排除某些旧的社会习俗。它就会经常来侵蚀我们。

要重工业，又要人民。人民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人口众多，这有它的好处；但是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左右，增长量并不大。农业合作化可以使我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复种面积。今年这么大

---

①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

的灾荒，我们的收成还是比去年增加了，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我们也要看到，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总是增加得慢。不能把这方面的工作看得那么容易。昨天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要提倡节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160]同志的，后来邵力子[112]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我们的党和青年团要用一定的力量宣传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广大人民所需要的，首先是城市人民所需要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使大家都就业，工资的增长也不可能使职工养活很多的家庭人口，我觉得甚至提倡晚婚也是有好处的。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大关系[139]是党的八大的指导方针。在三大改造[127]高潮出现以后，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各部门、各省市向中央提出了各种报告和要求。毛泽东同志到各地同各省市的同志接触，少奇同志在北京跟各部的同志接触，以后毛泽东同志又跟各部的同志谈话，觉得需要正确地解决这十大关系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够安排得更恰当。这些关系的许多方面在八大报告中都提到了。但是我们要认识，这十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前五种关系直接联系到建设。比如农、轻、重的比例究竟如何才恰当？现在还不可能回答得很完满，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使这三者的比例安排得比较恰当。一个时候恰当了，过一个时候还要修改。

第三个问题，八大规定的建设方针是，“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方针，把过去的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的提法具体化了，提出了建设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太小的国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国家。而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就是大国也不可能什么都有。美国算是一个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大国吧，但是有的东西它也没有，橡胶就没有。苏联也有它没有的东西。另外，所谓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是一定要有很高的产量呢？当然，产量是要高一点，但是不一定很高，这个任务的实现是决定于东西的有无，不决定于是否有很高的产量。从这样的要求来看，我们觉得八大的决议上写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时间可能要长一点。

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比如，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三千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八大的建议[151]已经把这个要求改变了，我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定在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上，将来如果执行得好，有可能超过，但是现在不

能定到三千万吨。因为定到三千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更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陈云[11]同志曾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既然达不到，就应该允许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外再加两年。我说，甚至可以设想加两年不够再增加一两年。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我仍的计划就好安排了。不然，讨论起来，远景规划的几个数字就把自己框住了。

此外，还有两点也想提出来请大家考虑：

第一是关于八大建议的数字。这只是个建议，有某些达不到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修改？我觉得是可以的。过去说计划就是法律，这实际上行不通。当然，计划成为废纸也不对。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建议中有些数字当时觉得是恰当的，现在发现还有矛盾需要解决，那就应该解决，我想这是许可的。

第二是关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125]。这也是一个建议，是一个草案。在草案提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存些东西在实际执行中还要修改。实际上，某些数字已经勾掉了。草案现在执行快一年了，事实证明有些是需要重新研究的，这些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的。比如扩大耕地面积，要求十二年内开垦一亿四千万亩显然是有困难的。如果每年开垦一千万亩，就要投资五亿元。这五亿元的投资，明年度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今后也不是每年都可以挤出来的。至于其他的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各种条件的配合，还不去说它。

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四十条，是规定了每年进度指标的。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

第四个问题，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估计。八大已经作了简单的估计，在制定明年计划的时候，大家又很容易联想到究竟应该怎样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大家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这好像也是老套子了，但从实际中摸索到最后，觉得还是这样说好。

第一，从生产指标方面看，今年的多数指标都接近了五年计划的指标。到明年，四十六种工业指标中有三十九种一定会超额完成预定的计划，估计只有七种完不成，实际上，真正完不成的就是石油。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指标，这不就是一个成绩吗？当然，农业比工业差一点，值得我们重视。但是，尽管有两年特大的灾害，粮食和棉花还是可以完成计划的。八种农产品中主要是麻、大豆、油料作物不能完成，这是我们没有安排好。同工业相比，我们对农业的重视和安排不够，农业量大面广，有时也不容易考虑得很恰当。

第二，从基本建设方面看，投资超过了计划数字。设计项目中，苏联设计的主要项目多数是完成了，我们自己设计的主要项目多数也都完成了。苏联设计的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主要是国防工业，我们推迟了，当然也有其他的项目。至于自己设计的项目，有些是不应该设计那么多的，这是我们工作上有错误。但总起来说，在这方面基本上也是有成绩的。

第三，从预算上看，我们打得比较更稳当一点，财政支出超过得不多。

所以，整个看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大体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这方面不多说了。

另一方面应该承认，错误也不少。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第一次制定五年计划，不可能一下子制定得很恰当。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五年计划是粗线条的，然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不断地修改，而且每年的年度计划还要修改。计划不那么准确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去年的基本建设搞得少了一点，还有一点余力，结果是多余的器材减价出卖，钢材出口，水泥减产，木料也减价出卖了。这当然是不恰当的，是比较大的错误。至于小错误，各个部门都会有的。计划问题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就是到现在提出明年年度计划的时候，也不能说我们的缺点就都发现了。希望在全会分组讨论的时候，大家能揭发出更多的错误缺点，这对明年度的计划和今后的建设工作有好处。明年的计划到执行的时候，还会发现有些订得不恰当，还要在摸索中不断地改正。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做全面总结的时候，就可以得出更多的经验教训，就会比八大时的认识更完全更深入。

现在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变化，有的是由于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修改，有的是由于经验和知识不足而犯了错误。我觉得这两点值得谈一谈。

首先是形势的变化，当我们开始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朝鲜战争[41]还在进行，那时候设想，应该加紧发展的不仅是重工业，国防工业也要乎行发展。一九五三年停战以后，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又出现台湾海峡局势的紧张，整个世界局势怎样还要看一看。直到日内瓦会议[131]、万隆会议[156]以后，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设想今年、明年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有些生产规模可以缩小。这也是很自然的。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加强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比如炮。有一个厂也行，现在先打底子，将来再发展数量。设想可能有一个和平时期，容许我们把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起来，这是最好的，我们把方针摆在这上面。但是我们还要准备另外一种可能，即发生战争，这决定于敌人是否要冒险。如果今后十二年内发生了战争，那怎么样呢？那不是我们犯了错误吗？到时候打起来军火少了，后备力量动员起来又没有军火，大家就哇哇叫了。可以设想一下，战争就是来了，敌人也不能马上解决问题。敌人打来了我们会先受一点损失，但他们爬上大陆以后，还是要打长期战争的。我们顶多犯那样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把这个问题提到政治局，我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说法，把它提到中央全会，大家也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算错误，我们大家一道犯，到那时候将功折罪，戴罪图功。只有这个办法，不然就徘徊歧路，东边走几步又回到西边走。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所以非下决心不可。中央政治局谈到明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对就下了这个决心。这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我们有的步子加快了，有的步子放慢了。

第二是由于我们的经验和知识不够，在有些项目上犯了错误。现在看起

来有些错误犯得有点可笑，但是当时的确没有弄清楚。比如说，请苏联设计的项目，以为能够提早给我们设备，提早一两年完成总是好的，而没有分清哪几种快对我们有好处，哪几种快会给我们背上包袱，凡是各部提出要加快的，报到国务院，报到中央，总觉得应该批准。像汽车厂就加快了，明年度可以生产一万八千辆到两万辆，可是这就要有很多的器材进口，同时要供应很多的汽油，这就要花外汇。现在汽油没有那么多，就将减少汽车产量。减少生产，劳动力就要闲置。外国朋友参观长春汽车厂[109]时说，你们生产能力多了，一定要闲置。内行人一看就懂。原来还打算建设第二个汽车厂，现在要推迟了。再比如铅加工厂和机械厂，军工部门有的，民用工业部门可以不搞，可以结合起来共用，现在和平时期可以用作普通的民用的机械生产。过去没有很好地考虑，这样就闲置了一些资金。

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尽管成绩很大，可是应该承认，缺点错误也不少。缺点错误已经知道的固然不少，但可能还有我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揭露出来的，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在这方面多提一些意见。

艰苦奋斗，建设国家

[①]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

我们利用现在国内外一切有利的条件，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目的就是要建设我们这个国家，把她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放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不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尽管有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有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有了和平的环境，那还是会错过时机或者浪费力量的。

为什么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几个数目字，就说明不是轻易可以建设得好的。六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的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可耕地只有十六万万亩。拿我去过的南亚的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162]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的，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倍。我国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到三亩。城市人口不算，三亩多一点，要是五口人一家，一家就是一公烦，而人家总是一公顷半或者二公顷，乃至于十几公顷。至于欧洲国家的人均耕地那就更多了！据调查，我们除去可耕地，可开垦的土地数目还不到可耕地数。当然，这是现在已经调查出来的，还有很多没有调查好的，可能要比这多。但是，一个短时期内，不管第二个五年计划[150]，还是第三个五年计划[163]，我们大量开垦的希望不大，可能性不大。因为要投资，又要移民，由公家去迁移很大数目的人民，不仅是投资、交通有困难，就是生活习惯也有困难，而原有耕地集中的地方增加的可能性更小。这样一个农业的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的人口，来建设工业，就有困难。我们要争取十五年的时间，就是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国，如果不艰苦奋斗，那不是轻易可成的。

毛主席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164]上说得很清楚，过去三年的经济恢复和四年多的经济建设，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希望能够好好地总结，不至于像我们在革命过程中犯那么多严重的错误。这句话语重心长，值得我们深思，尤其我们各级做政府工作的，更要时常警惕。不能说建设比革命容易，当然革命成功是艰难的，但现在建设就更艰难。我们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好像困难就少了。在某一个意义上说，建设比起万里长征[165]来，可能是困难要少一些。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在我们这样落后的经济基础、落后的文化基础上，我们的知识这么有限，我们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这么少，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所以，不要把我们所从事的新的工作看成那么容易，认识里头是有矛盾、有困难的，我们才能钻进去学习，才能想办法解决矛盾、克服困难。不仅我们老一辈，就是对年轻人也应该使他们懂得建设工作中的困难，把事情看得那么容易，那就会栽跟头，而且会学不好的。

我们面对着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的任务。我们现在对于积累与消费比例的问题，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的问题，农业与工业比例的问题，

[①]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总结发言第三部分。

人力、物力、财力的平衡问题，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现在我们快要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了！这就是说，给我们的任务很紧急，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前进。当然，解决不是一下子都解决好，就是要比以前了解的更多、总结的经验更多，才能更好地前进。我们面对着提高人民生活的问题，城乡人民生活接近的问题，还有这次会议上许多人谈到的教育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能够一下子解决得很好。当然，我们承认，在短短七年的恢复期间与建设期间，我们不可能把这些规律一下子都摸清楚，是要遇到一些困难，犯一些错误的。而且，有一些情形也不完全是错误，事物的发展是要经过一些波浪的。比如说，我们过去的四年建设，投资也好，物资分配也好，人力调动也好，是有些高低的。一部分是搞多了，或者保守了，但是另一部分也是需要有些伸缩的。初期建设增长的速度不可能那样子平衡，不可能那样子均衡地而且按比例地增长。没有丰富的经验，总要有些波折。现在已经有了四年的建设。快要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结果，需要把这些经验加以总结，如果我们再不认识这个问题，那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这次许多委员提了很多意见，都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不管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或者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推动增产节约的运动，这一切问题的解决，关键还是在于领导，在于中国共产党各级的领导、政府各级的领导、各种企业事业部门的领导，同时在于各级人大的领导及政协的讨论和监督。在建设中所发生的错误，不外乎我们从去年就强调指出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作风上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的性质还是属于这样一种性质。所以，毛主席曾经在宣传会议[166]上提出来。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要重新提倡整风。这对于我们党政机关、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国家的工作干部很有必要。批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作风上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是整风的中心问题，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整风的问题就要放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了，当然要经过一些准备阶段，今天不打算多讲，只是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活一点有好处

①

（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十二日）

大煤矿，国家开办；小的，合作社、私人都可以开。由陈郁[167]搞个具体办法，把过去的规定改一下，这样有好处。

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我看除了铁路不好办外，其他的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如三轮车、摊贩等都可以采取自负盈亏的办法。加入合作社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其余的个体就让他个体。有些私人办的小学，也可以让它办下去。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私营的。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

盐场封闭问题，由食品部[168]狄景襄[169]同志负责研究一下。小盐场让其开放，应该马上开放，可以搞个类似小煤窑的办法，不要因噎废食。一切东西都靠国家生产不行，各方面都应该有百分之几的自由活动，太死了不行。不仅商业方面如此，工业方面也可以如此。资本主义复活不了。

---

① 这是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十四次和第四十六次会议，上讲话的节求。

关于香港问题

①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力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

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对其在香港的企业则不要去变动它。但过去已经公私合营的，如南洋烟厂，再转回私营也不必要。没有合营的不要合营，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62]、“五反”[63]那样的搞法。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经济力量会更加强大。所以在香港的人，一般不要回来，在那里发展这个阵地有好处。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他们当中如果有些人主动坚决要求回来，可以同意。但不要动员他们回来，要让他们留在那里经营自已的企业。我们可以同他们内外合作，不使人家吃亏。至于有些人一时还不相唁我们，对我们的政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责怪他们。如果内地有一些人想出去，也是允许的。毛主席说，这一条我们过去就是不放心。现在应该是来去自由，不加歧视。香港的生活方式，当然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带有腐化性。有些朋友想要出去过一阵也可以，我们不要抓得那么紧，但也不是主动去号召。不要强留一些人在内地，有些人在外面过一阵还会回来的。凡有爱国心的人，我们就欢迎。对他们不要强劝回来，也不强留。

我们过去对有些事情处理方法上有些问题，但不能说大的方面做错了。有偏差可以纠正，如对外贸易，应该管制，但不能管得太严。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过去我们搞得比较死，但总的说是对的，否则上不了轨道。现在既上了轨道，有些政策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变。

---

① 这是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的节录。

应该有计划地生育

①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

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人口多。人多了会引起种种问题。大力宣传节育，可以使邻国安心。有人担心我们人口多了是否会侵占别人领土？中国不会走罗马帝国的道路，不会侵犯别的国家。中国人民愿意和平建设，更希望和平共处，首先是与日本和平共处。但是，应该有计划地生育。有计划地生育，人口有计划地发展，不但可以使人民体质更加健康，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且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也是有作用的。

至于节育，当然要尊重人格，也应当根据人民的觉悟，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进行时应当强调协商，而不能强制，夫妻也应当协商。在今天，中国哪种人对节育的要求多呢？还是城市中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工厂中的男女工人都有这种要求，迫切地需要帮助和指导。因为他们愿意自己的家庭幸福、生活美满；希望自己的儿女都有机会受到教育，身体健康有所保障。目前在乡村中虽然要求节育还不是那么迫切，但也逐渐地有了要求，值得注意。

在旧中国，人民的生殖力很低，人口增长速度很慢。其原因是：（一）劳动人民贫穷，生活极苦，不能结婚，或者结婚较晚，结过婚的因生活困难也无法生儿育女，常有弃婴或溺死婴儿。（二）由于卫生条件很差，无法求医就诊，还经常发生瘟疫流行，因而婴儿和产妇死亡率很高。（三）旧中国有着数不清的灾难，如水旱灾荒，没有人管，很少治理，结果是人民生活不能安定，身体抵抗力降低。（四）由于长期内战的原因，使得人口减少。

解放后，新中国在这四方面的情况都有了新的变化：（一）人民的贫困现象比以往旧的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月前还是很贫穷，而结婚的人多了起来，所以人口增长快了，年轻人结婚早，因而生子女也早。（二）卫生条件大大改善，许多烈性传染病消灭了，不少疾病正在设法防治，死亡率降低了，当然目前的卫生工作还不是那么尽善尽美。（三）新的政府负责治理灾害，无论水灾、旱灾等等都管起来，对受灾地区，政府负责救济，死亡率也因之降低。（四）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战争，抗美援朝[41]是一时的、局部的战争，并且早已停战了。

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统一过。这八年来，新中国比旧中国人口确实增加得快。我们不与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初叶相比较，只以国民党时期统计全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数字来比较，一九五三年全国人口就升高到五万万七千五百万人了。最近这三年差不多每年增加一千三百万人，三年差不多增加四千万人了。如果这样增加下去，估计在十年内即可增加一亿三千万人，到一九六〇年全国人口将会达到七亿。

我也同意晖峻[170]先生所讲的人口多是件好事。但人多却有人多的问题，人口多了会带来很多困难，特别是对国家建设。中国主要人口是在农村，六亿四千万人口中就有五亿四千万在农村，而农村又主要是内地十八省人口多。在这些人口多的省份里，每个农民平均只有三商地，一个五口的家庭，

---

① 这是会见日本医学代表团时的谈话节录。

平均也只有十多亩地，比日本平均耕地还要少。在内地可以耕种的土地，几乎都耕种了，很少有荒地，就连西北高原，沙漠，南方的山地、梯田都种上了，可耕土地再也不能增加。只有东北、西北的北部一些地方还有一些可开垦土地，可是这些地区又都是少数民族所在地区。中国人口的分布极不平衡，民族分布也不均等，我们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他们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却占全国土地的百分之六十。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但只占全国土地的百分之四十。这几年来人口的增长主要的还是汉族，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变化多。少数民族人口少，生育率也低，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变化不大。所以，我们提倡节育主要是在汉族。少数民族地区，土地虽然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但这块地区中。高山、沙漠、草地和未开垦的地区很多，如果开发这些地区，也需要很大的经济投资，而又不能把汉族人民大批地迁移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还需要照顾民族间的关系，所以不能找此出路。既然汉族人口多，可耕面积不能增加，而人口又增长很快，这就会产生矛盾。如何解决呢？只有一条，那就是适当地节制生育，也就不得不在人口问题上注意起来。

刚才已与长桥[171]先生谈过，我们人口多，只能在我们的土地上解决，只能在自己的国土上找出路。就如上面所说，在自己国家年向少数民族地区移民，还需要很慎重，难道对国外就可以草率从事吗？因此，我们必须加紧节育，一方面人口不断地增长，另一方面要照顾到人民的健康和生活的改善，同时还需要建设我们的国家，建设工业，发展教育，培养后代。如果生孩子多了，学龄儿童一定多，现在有几百万，以后还可能到一千万以上。生出来不教育不行，教育就得办学校，不仅仅是小学，还要办中学、大学。国家对教育投资大多会影响经济建设，这个问题也不得不注意。国民教育是普及教育，普及教育的基础是小学，如果生育减少，入学儿童也会相应减少。但是，无论是经济建设、教育、生活，都必须重视起来，都必须在目前所仅有的土地上担当起来。这就是我们节育工作的全部真象和根据，这就是我所要讲的道理。

关于向科学进军

①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以往一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我国科学事业有了重要的发展。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154]已经制订，并且已经作为试行草案，付诸实施。在自然科学方面，已经试制了一九五七年的年度计划。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已经成为常设机构。各方面科学研究机构有了较大的发展，科学工作者的队伍也有了扩大。科学工作体制的原则已经确定。科学工作中的协作制度，已经开始推行。关于图书仪器等科学工作条件的问题，已经或者正在拟定方案，逐步加以解决。有些重要的科学实验设备正在建设中。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功率为七千■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能产生二千五百万电子伏的 a 粒子的回旋加速器，止在加紧建设中。科学研究，一年来也有不少成就。所有这些，都鼓舞了广大科学工作者向科学进军的热情，同时，各部门、各地方对科学事业也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

在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却有人说，中国科学事业在解放后比国民党时代落后了，甚至有人说，今后十二年不是赶上国际水平的问题，而是补过去十二年课的问题。好像从解放以来，我们在科学方面不仅没有丝毫成绩，而且是倒退了一样。我们能够同意这种说法吗？请看事实：第一，现有科学事业的规模，虽然离我们国家建设的需要还很远，但是，无论在研究人员、机构、经费和设备各方面，都比国民党时代大得多。第二，在科学技术的水平方面，也不是国民党时代所能比拟的。首先是许多老的科学研究机构在研究工作上有了新的发展，同时，许多新的学科建立起来了，特别是发展了一些与工业建设和国防直接有关的学科和新技术。高等学校也开设了大批新的专业。第三，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特点，是科学和生产的密切结合。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在国民党时代，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衰落，科学家们虽然也做了些研究工作，但是无法在生产上发挥作用。解放后八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部门向科学研究部门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们科学家们在这方面就有了充分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才能，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的科学研究力量，还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第四，全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的指导下，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斗争中。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在国民党时代是完全不可能设想的。社会科学有强烈的阶级性，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采取批判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第五，科学队伍也在迅速壮大中。老科学家们经过思想改造和工作实践，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一般地都提高了。留学生陆续回国，增强了各门学科的力量。大批高等学校学生毕业，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准备了雄厚的后备力量。根据以上种种，怎么能说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比国民党时代还落后呢？还要补过去十二年的课呢？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中国科学家在国民党时代非常困苦的条件下所做的努力和获得的成就，而且我们从来就把他们这些得来不易的成就作为中国科

---

① 这是在第一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的一部分。

学财富的组成部分。说新中国科学落后于国民党时代的人，无非是否认我们科学家八年来的成就，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罢了。

对于科学规划，有人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科学事业不可能作全国性的长期的规划，只能由科学家自发地分散地进行。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在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邀集了几百个科学家，集中他们的智慧，制订出我国科学发展的初步蓝图，使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了大体的轮廓和途径，这是十分必要的。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同自然界做斗争。如果不把我国现有

的科学力量适当地组织起来，密切地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作出比较全面的和长期的规划，那么，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就没有了方向，就不可能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当然，这个规划，以后必须根据各种新的情况，不断地加以补充和修正，甚至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即使如此，也不能否定这个规划的必要性，因为没有今天的初步蓝图，就不可能有将来日益完备的科学工作计划。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科学事业，也必须是有计划的。在国家规划之外，无疑也应该允许科学家从事他们自己所专长的某些研究工作，以便充分发挥科学家的潜力。但是，反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性，使科学事业陷于无政府状态中，这对社会主义，对科学事业本身都是不利的。

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各有关部门必须协调地进行工作。政府今年在医学、农学和机械等方面，已经制订了较好的协调方案，并且已经部分地见诸实行。这种作法，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且加速了科学工作的开展，以后应该加以推广。有人只赞成本部门科学工作的发展，不赞成甚至要求限制其他部门科学工作的发展，他们往往反对协调工作，甚至拒绝国家对人力和物力的合理调配，这是一种严重的本位主义作风，应该加以批判。全国科学研究力量，应该统筹安排，一方面是适当分工，另一方面更

重要的是密切协作；一方面是提倡“百家争鸣”，另外一方面也要反对因门户之见而妨碍协作。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应该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的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基地。这是组织我国科学队伍的原则问题，我们要求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认真地提倡协作精神，推行协调方案，迅速克服本位主义的不良作风。

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努力的结果。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目前许多领导人都不是科学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有人甚至认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存在是不信任中国科学家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来就教育自己的干部不断地在工作中学习自己所不熟悉的事情，逐步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做好工作。对于科学事业的领导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领导，另一方面是政治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领导。对于学术问题，我们从来不主张用行政命令进行干涉，我们的领导方针是“百家争鸣”，就是通过科学界的自由争论和客观实践来解决学术问题。对于科学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方针、政策、计划等方面，更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八年来的事实，已

经证明了这一点。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就是管理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措施的机构，它负责统筹安排中国科学院、高等学饺、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地方的科学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的工作。十二年科学规划，是几百位中国科学家集体劳动的成果，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大部分也是科学家，这怎么能说是不信任中国科学家的表现呢？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于科学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因为学术上的专业是分门别类的，而世界上同时精通各种科学专业的科学领导干部是不存在的。这种理论，对科学队伍只能起瓦解作用，是不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的。

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

[1]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

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民族繁荣的基础上前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有民族繁荣，所以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比封建主义更优越。历史证明，过去许多兄弟民族不是走向繁荣，而是走向衰亡。为什么？就是因为过去的反动统治者采取歧视兄弟民族，以至削弱和消灭兄弟民族的政策。两千年来历史上有记载的兄弟民族，有些现在不见了，其中有的可能向远方迁移了，有的可能和汉族或者和其他民族融合起来了。这些变化的情况，还有待历史学家的研究。

上面讲过，满族从几十万人变成了几百万人，吸收了汉族的文化。满族建立的清朝政权，统治了中国近三百年。清朝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清朝起了统一的作用。另一件事就是繁荣了人口。中国人口的增长，在清朝是相当大的。这是它有功的一面。但是，它不是繁荣所有民族的人口。例如在清朝统治下，汉族人口增长了。可是对某些兄弟民族，它的政策则是削弱。如蒙古和藏这两个民族，在清朝的时候人口是减少了的。蒙古民族在最盛的时候据说有四五百万人口，但是到了清朝就减少了。藏民族在唐朝时是很强大的，有很大的发展，曾到过陕西的关中北部、长安附近，到过甘肃的南部，还到过四川、云南，人口据说有四五百万。现在藏族人口合起来不到三百万。这两个民族，显然是在清代削弱了。这说明，封建主义的民族政策是要削弱别的民族的。

帝国主义更是如此。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总是把当地的民族搞得很穷困，穷困以后就要衰弱了。大家知道，帝国主义是从西方来的，起初主要是英国和法国，队后是美国。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对任何殖民地的原有民族，都是采取削弱的政策。例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到美洲殖民，把原来占当地人口多数的印地安人削弱成了少数。又如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到非洲殖民，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力图削弱非洲的黑人民族。只有不甘心于做殖民地奴隶、奋起反抗取得胜利的民族才慢慢好了，如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等，所以，从世界史上可以看出来，不管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都是削弱被压迫民族的。反动统治者不仅压迫本民族的劳动阶级，削弱它统治的其他民族。东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比西方落后，曾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削弱的地位。只有争得民族独立，他们才能免于被削弱。在民族政策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根本不同。我们要帮助各兄弟民族的繁荣，必要的时候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民族也给予帮助。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绝不能说这个民族是优越的，那个民族是劣等的，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种族主义的想法。德国法西斯认为日尔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说德国日尔曼血统是最好的血统，这是极端反动的思想。我们认为，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有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

---

[1] 这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三部分。

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世界上所以有些民族比较落后，这是环境造成的，是因为没有给他们发展和锻炼的机会。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所以，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我们的根本政策是要达到各民族的繁荣。以往的历史发展使有的民族削弱了，人口减少了，有的很落后，生活水平很低，这是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后果。我在前面讲了清朝对西藏的政策，如果讲到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代，那就更反动了。尽管孙中山先生提倡五族共和[172]，到了蒋介石，首先就不承认回族，把他们叫做生活习惯特殊的人。国民党连民族都不承认[173]，更谈不到帮助各民族发展了。这种对待各民族的反动统治、反动政策，我们历来是反对的。

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是对民族繁荣的很多不利的条件。我们必须把这些不利的条件逐步地去掉。要去掉这些不利于民族繁荣的条件，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社会改革。各个少数民族过去由于处在反动统治下面，被反动统治者所压迫，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得不到增长，生活得不到改善，使这些兄弟民族不能够发展。我们新中国就是要帮助各民族发展，这就必须实行一个根本性的措施，就是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是我们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性的问题。汉族也要经过改革才能够发展。我们所说的社会改革，最根本的是经济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因为要建设社会主义，要人民生活富裕起来。要富裕就要有工业，一个民族没有工业不可能富裕起来。因此，我们中国要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使生产发展。而要工业化，就得首先在农业上实行改革，把农业上的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废除。农民得到了解放，才能够使农业经济得到发展，才能有工业发展的基础。农业能够大量增产，才可能积累资金，才可能供给工业原料，才可能解放劳动力参加工业生产。只有建立起工业基地来，这个民族才有发展的基础。所以每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经济改革。现在，各兄弟民族地区绝大多数实行了土地改革[2]，有不少兄弟民族进一步实现了农业上的社会主义改造，组织了农业合作社[86]，这就一定会使农民的生产力得到解放，能够在合作社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基础上大大增产，这样才能够促进工业的发展。可是还有不少兄弟民族，经济改革或者还没有开始，或者还没有完成。经济改革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改革，即土地改革，第二步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不进行经济改革，维持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多数的人民还是奴隶、农奴和封建制农民，生产力就不能够解放。生产的东西大部分被剥削去了，劳动者本身还是穷困的，他们就不可能有增产的积极性。在我们新中国这个社会里，许多地方不但封建制度不存在了，连个体经济制度都不存在了，进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了，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孤立地处在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的统治之下，这怎么可能存在下去呢！它是一定要受到外界的影响的、例如，凉山彝族地区的改革，就是受了外界的影响。奴隶娃子起来了，他们要求改革。现在凉山彝族的一些头人也同意改革，愿意放弃剥削。改革以后，他们还可以得到政府很好的待遇，生活得到保障。如果他们不赞成改革，就要被奴隶娃子推翻，什么也得不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西昌坝子实行了土地改革，就不能不影响凉山。大家都是在一个民族大家庭里，土地改革也好，社会主义改造也好，浪潮起来了，都会互相影响。不可能设想，某一个地方能够长期地永远地孤立在一个地方“单干”。我们要对现在还处在剥削者地位的兄弟民族上层分子说清

楚这个问题：如果他放弃剥削，他所得到的好处，比反对这个改革所得到的要多得多；如果他抗拒改革，被群众起来推翻了，他就得不到好处，或者得到的少了。如果他赞成改革，国家和政府会照顾他，群众可以对他宽大些。这是一点。另一点，如果从长远来看，他继续长期剥削，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孤独地搞下去，终归要失败，而且剥削越维持得久，他将来失掉的越多。谁要幻想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长期地保留他的剥削，甚至于过那种极度豪华的生活，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全中国都不那么豪华，少数人要那样豪华是不能允许的。我们主张，各个兄弟民族的人民，包括他们的上层分子，觉悟到需要改革的时候，再去改革。某些地方推迟改革，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改革，更和平地改革，更有准备地改革，但总是要改革。一定要把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改革只是一个先后问题，缓急问题，而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不改革，民族就要贫穷。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是要大家幸福，包括兄弟民族上层分子也要得到真正的幸福。改革就是使大家都幸福，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改革后的一个时候，上层分子不能像过去那样生活便当，用钱也不那样方便了，因为收入是有一定数额的了。但是，前途是有保障了。将来工业更发展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更提高。这一点，我们要对所有兄弟民族的上层分子也讲清楚。

前面已经讲过，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我们有这样一个气概，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真正平等友爱的气概。我们不能使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如果让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这就是不平等，就是错误。

这种改革，不仅是经济制度的改革，也会影响到别的方面。因为经济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也要受影响，就是说，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响。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思想也要适合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

有的宗教界朋友担心，既然经济基础的改革会影响到思想方面，那么，是否也会影响到宗教呢？经济基础的改革对思想方面有影响是必然的。但是，思想方面的变化，不会像政治制度的改革那样发展。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最慢的。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现在我们只把宗教信仰肯定为人民的思想信仰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不管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大家一样地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共产党内有很多农民党员，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参加合作社，干得很积极。他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在组织上是按合作社的章程办事，并且许多人是乡政权的干部。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都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要求，但是，一到了晚上，有的就怕鬼。你说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不怕鬼，我就不相信。人的思想有各种各样，只要他不妨碍政治生活，不妨碍经济生产，我们就不要干涉。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至于将来发

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但是，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没有宗教形式。宗教界的朋友们不必担心宗教能不能存在。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现在应该担心的不是宗教能不能存在，而是民族能不能繁荣。

民族繁荣是我们各民族的共同事业，对此不能有任何轻视。只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荣。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这里要顺便说一下，就是有些兄弟民族还需要增加人口，但汉族人口增加得太快了，所以汉族地方要提倡节制生育。

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的意见

①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着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全民性的整风运动。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指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174]。

从六亿人口出发，就是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农民是人民中的最大多数。我国不仅农业落后，工业也很落后，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经济面貌，必须改造落后的农业，要改造落后的农业，又必须首先大力发展工业。这是因为有了一定的工业水平，才能够为改造农业提供必要的条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84]期间，我们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也就是为改造农业创造条件：也正是由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有了一定发展，我们才有可能在现在和今后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井举的方针。

我国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必须从统筹兼顾全国人民生活首先是工农生活、适当安排城乡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工农生活能够逐步地得到改善。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就是对工资水平的安排，不能单纯从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而必须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只有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才能与我国相当低的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减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加强对知识分于的：改造；要正确地安排生产与生活的关系，逐步地缩小工农生活水平的差别，减少城乡矛盾，巩固工农联盟，逐步调整工人阶级内部的工资关系，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老职工与新职工、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工种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合理化，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

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意思。但是，绝不能将“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误解为可以不根据实际需要，盲目增添人员，随意扩大编制，把三个人的工作分给五个人做；也不能误解为可以不根据按劳忖酬的原则，不加区别地对于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实行一样的工资待遇。如果这样做，不仅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积极性，反而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不利于发展生产和改进工作。合理的低工资制应该是：适当地保证广大职工必要的物质生活需要，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职工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我们既要反对脱离农民的城乡生活相差过大，又要反对不合按劳付酬原则的平均主

---

①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的第二部分。

义。

我们在今后必须将劳动就业和精简机构、改革工资制度和逐步改善职工生活、整顿劳保福利和各项生活待遇，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统一安排，既要有长远的全面规划，又要有稳妥的实施步骤。同时，在目前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就应该经过领导动员群众辩论，将凡是能够由一个地区、一个单位自己解决和改进的问题，实行边整边改，逐步解决。

现在分别就几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一劳动就业和精简机构问题

解放以来，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卫生防疫工作的发展、国家救济工作的进行、和平的生活环境四种因素在起积极作用，我国人口的增长是很快的。根据人口普查和么安部历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台湾和海外华侨不算在内，一九五二年全国人口约为五亿七千四百多万人，到一九五七年净增六千六百多万人，达到六亿四千多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九千二百多万人（包括由农村转入城市的人口），农村人口五亿四千八百多万人。城镇人口比例力百分之十四点四，农村人口比例为百分之八十五点六。人门平均每年净增率约为百分之二点二。预计到第二个五年末，全国人口肯定地将超过七亿，到第三个五年末，很有可能接近八亿。这还需要在这个期间努力进行计划生有的宣传、教育和指导等措施，将人口每年平均净增率控制在百分之二点二以内，而不是每年递增百分之二点二，才能办到。我国人多是好事，但是，由于我国的工农业落后，生活资料增长还比较慢，也给安排劳动就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我国旧社会遗留的失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妥善处理新增加的青年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仍然是一个严重的任务。

初步估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50＝期间，城市新增的　青年劳动力中包括大学、中等专业毕业生和一般到达年龄的青年在内，需要就业的将有六百多万人。而第三、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比现在还要多。对于我国人口的这一发展趋势，必须有充分认识，才不致缺乏预见。

根据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各项指标估算，职工总数约‘需增加五百五十万人。在增加的职工总数中，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人，需要从附近农村吸收，这样，约可安排四百四十万城市劳动人口就业。在六百多万需要就业的城市劳动人口中，大约还有二百多万人必须从各方面采取措施进行安排，主要是面向农村山区，参加农林业生产。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为了今后能够更好地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劳动就业，目前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各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首先就应该精简机构和精减人员，合理地安排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的比例，并且将精减出来的机关职员和非生产人员尽量设法下放到农村生产中去，一部分人员可以转为生产工人；如果地方需要的话，一部分人员也可以调到下层机关中工作。以北京市为例，在北京市委统一领导、统筹安排的原则下，已经初步拟订了精简的过渡方案，目前正在对下放人员进行动员和安排的试点工作。北京市所属政府、党群、国营工业、手工业、商业、建筑业、国营农场、高等学校、市政、福利等部门，共有行政管理人员和教职员约十四万五千六百一十人，计划精减四万四千八百八十六人，约占全数百分之三十。各企业、事业单位精减的人员大部分可以

留在本系统内自行安排，充实基层生产单位，一部分安排不了的人员可以参加郊区农林业生产；行政、党群系统和高等学校抽调出来的人员，除下放到基层单位以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中小学校工作以外，主要是参加郊区农林业生产。最近已下放参加农业生产的有二千四百一十六人，到其他基层单位工作的有八百一十六人。

北京市这种初步的经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可以妨行。除中央机关应该由中央全面规划以外，凡是分设在各地的中央直辖的企业和事业单位，都应该经过所在地党委统一安排，拟订出精简的初步方案，一方面通知中央主管部门，另一方面进行试点工作。如果行之有效，并且又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率，那么，在那个地方就可以推广。

为了安排城市多余的劳动力，首先是安置从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精减出来的职员和非生产人员，必须队多方面开辟劳动就业的出路。

第一，他们的主要就业方向，应该是下乡、上山，参加农林业劳动。有许多地区反映，目前农业合作社的劳动力还是不足的，大中城市和工矿区附近的农村，劳动力更感不足。根据北京市的计算，全市郊区共有四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共约有四千个生产队，每个队约可安置三个人，平均每个社约可以安置三十人。现在全国共有七十五万个社，只要每个社能够安置五个人，全国就可以安置三百多万人。当然，全国各地农村需要劳动力的情况是不平衡的，而且必须有计划地分期地进行，才能安排适当。从现在起，各省市都应该利用整风机会，实行试点，在取得经验后，就应该积极推广。今后全国各地必须采取积极发展农林业生产、巩固农业合作社的方针，大力提倡深耕细作，兴修水利，积肥造肥，发展副业，开发山区少垦荒造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实行多种经营。农林业生产发展了，不仅可以减少农民进城，而且可以大量容缎城市多余的劳动力。同时，还需要采取鼓励下乡上山的‘各种政策和措施。例如，整顿职工福利待遇，实行请假探亲办法，缩小城乡在油、肉、布供应上的差别，建立高等和中等学校在学和毕业的学生必须参加体力劳动首先是农。林业劳动的制度，等等。

第二，贯彻执行退体制度和新学徒制度。根据估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超过劳动年龄的职工，绝大部分是城市的职工，每年约占城市现有二千万职工的百分之零点六五，五年大约有六十五万人左右。如果这一部分人大部实行退休，他们所得到的退休金平均约占他们原工资的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在实行新学徒制度以后，学徒津贴降低，每个退休职工余下来的工资，可以多吸收一个到两个学徒，这样就大约有一百万左右青年劳动力可以就业。为着鼓励年老职工退休，可以采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吸收他们的子女就业的办法。

第三，扩大城市就业的门路。除了手工业、服务性行业可以容纳一部分劳动力以外，估计实行新学徒制以后，这些行业还可以多吸收一些学徒。此外，还可以组织废、物利甲、废品回收等方面的生产，安置一部分劳动力。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参加家务劳动也是光荣的。我们应该提倡妇女参加家务劳动，造成一种社会风气。家庭妇女能够勤俭持家，把家务搞好，使丈夫子女能够积极从事各种劳动，同样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而丈夫子女所得的工资，也有她们家务劳动应得的代价在内。

第四，控制城市人口的增加。新建的工业和基建项目，应该适当地分布在沿铁路线、沿河流的中小城市，接近农村，不宜于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同

样，新建的中学也应该尽量分布在乡镇和农村，不宜过分集中在城市，以便利农民子弟走学。同时，在中小学校中应该加强农林业生产的教育，使学生毕业后容易留乡参加农林业生产。目前我国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已经有十三个，上海已达七百万人口，北京已达四百万人口，今后对于大、中城市的发展规模必须进行研究规划，教育职工尽量将家属田在农村，动员已经进城的家属还乡生产，努力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

第五，在工业建设的方针和技术政策方面，也要考虑到便于安排劳动力的因素，全面计算投资和经济效果。在建设项目的安排上，不能单纯追求大企业，一般应该采取大、中、小结合的方针，并且有些项目应该以中小型为主，自然也有些项目是以大型为主的。这样，既可以在有决定性的企业上采用现代技术，又可以大量建设中小型企业，增加生产，安排就业。在一般的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中小工矿企业中，不应该追求过高的机械化，而应该充分利用人力、畜力和现有设备的潜力。

劳动就业、精简机构、面向农村山区的问题，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艰巨任务，而改造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一项重大任务。在这些问题上，困难是存在的，但是，依靠我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从多方面开辟就业和改造的门路，这些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合理地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就一定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积极作用，就一定能够更顺利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二工资问题

根据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资问题的分析和前面所讲的处理劳动工资工作的原则，现在对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资水平和工资制度问题提出下列几个意见。

第一，工资水平的安排。

八大建议[151]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职工平均工资将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但是，根据现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生产、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消费资料的增长指标的综合估算；同时，考虑到目前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职工的工资水平已经偏高，为了调整工农关系、新老关系，这一部分职工的工资只能少增、不增甚至略有下降；加上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的新职工绝大多数将实行新学徒制度，新的普通工、勤杂工的工资待遇和新的高等、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参加工作后的工资待遇，因此，全体职工平均工资在今后五年内将不可能达到八大建议中预计的水平。这就是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约有五百多万新职工的工资水平将低于现在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在现有二千四百万职工中，约有百分之二十的职工不增加工资，约有百分之八十的职工增加工资。这样做，五年内职工的平均工资，如果增长百分之十的话，那么，约有百分之八十的现有职工的平均工资将可增长百分之二十二左右；如果增长百分之十五的话，那么，约有百分之八十的现有职工的平均工资将可增长百分之二十九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大多数农业生产合作社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到一九六二年每一农户年平均收入比现在的年平均收

入三百元左右提高三分之一，而职工的平均工资五年内提高到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五，那么，工人和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相差的距离就会比现在缩小。究竟如何规定才恰当：将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进一步加以平衡后提出。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适当增加工资的条件下，应该对工资和福利作全面安排，改进工资制度和福利制度。改进的方向应该在提高工资水平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直接工资的比重，适当减少附加工资和福利补贴的比重。由于约有百分之二十的职工不增加工资，而过高和不合理的福利待遇又必须调整，这无疑地将会影响到一部分职工的收入。因此，对于这些措施，必须采取谨慎的步骤，并且对于职工的全部收入和支出进行全面的计算分析，该增加的增加，该调整的调整。不论增加或者调整都应该进行周密地调查研究，经过群众的充分酝酿讨论，有计划地分步骤地进行。在今后五年内，应该做到现有职工中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能够或多或少地增加收入，有技术的老工人能够有较多的增加。

第二，工资制度的改革。

实行新学徒制度，是工资制度上一项比较重大的改革。关于新学徒制、职工退休、请假探亲、普通工和勤杂工的工资待遇等六个文件草案都已经印发了，这里不再多讲。但是，应该说明，这都是草案，请大家提意见，有些标准，还是需要斟酌的。

工资制度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必须由劳动部组织专门机构进行全面研究，并且争取早日拟出改革方案，提到厂矿职工群众中进行广泛讨论。这里我只讲几个问题。

一、工人的工资等级制度。目前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级别少，而级差较大，好处是可以鼓励学习技术，但是，在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的工种中，普遍实行八级工资制，是不合适的。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根据不同产业、不同工种（先进和落后，复杂和简单）具体规定不同的工资等级，有的需要增加等级（如技术复杂的工种），有的需要减少等级（如技术比较简单的工种），不宜强求统一，级基系数也应该做适当修改。但是，在同一地区，性质相同的工种的工资等级制度应该统一起来。

二、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工资制度。这三方面干部现行的工资制度是不统一的。现行的国家机关干部工资制度，采取一职数级、上下交叉的办法，基本上是符合我国情况的。但是，升级制度上有比较严重的毛病，在大鸣大放中职工对去年升级面过大、升级标准不明确、升级不公平等方面的意见很多，必须加以改进。一九五六年大多数企业干部实行了职务工资制，由于企业、科室分类太多，造成干部工资标准过于复杂，工资标准规定过高，出现了领导干部增加工资过多的偏向，虽然已经纠正了（中央决定厂级干部工资增长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三，科级干部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但是，在制度上和工资关系上还遗留了许多问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改进。对于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干部的工资制度和工资关系，也应该进行合理的调整和安排。

三、计件工资制度。计件工资制度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积极作用，这是肯定的。但是实行计件工资制度，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产供销正常、成批生产、便于定额计算等等，那种认为计件工资制推广得越多越好，而忽视必要条件的思想和作法都是错误的。目前实行计件制的企业，有的条件不

够，有的计件面过宽，加以定额落后，定额管理工作薄弱，结果产生许多流弊，不仅影响产品质量下降，浪费工资基金，而且助长了职工中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的发展，影响职工的团结。今后必须具体研究每个企业的条件，凡不宜实行计件工资的就不要勉强实行，实行面过宽的应该缩小，有条件实行的应该加强定额旨理工作，克服目前计件工资工作中的各种缺点。

四、奖励工资和各种津贴制度。目前全国实行的各种奖励、津贴制度，有许多对生产起了积极作用，问题在于名目繁多，彼此重复，有不少是与生产无关的，而且奖励、津贴发放的面很广，金额也高，浪费很大。一九五六啤的全国工业工资总额中（不包括附加工资和福利补贴等）标准工资为百分之八十九点四，计件超额工资为百分之二点三，奖金为百分之二点一，津贴为百分之三点七，其他（保留工资，停工工资，生活费补贴等）为百分之二点五。从上述平均数字来看，似乎问题不大，但是，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悬殊很大。例如鞍山钢铁公司一九五六年的工人工资总额中，计件超额工资占百分之十五点一二，奖金占百分之四点八六，津贴占百分之五点二，而标准工资仅占百分之七十四点一三；建筑安装和交通运输企业的情况也大体类似，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今后应该结合标准工资的调整，全面地整顿各种奖励、津贴制度，取消各种不合理的奖励、津贴，建立确实对于增产节约有鼓励作用而不是助长职工中经济主义倾向的奖励制度。

有许多同志建议建立工龄津贴制度。工龄津贴对鼓励职工安心于自己的职业，稳定老职工的工资收入，照顾老职工的生活，是有好处的。但是实行的范围、津贴的标准等等都需要慎重考虑，在研究整顿各种津贴制度的时候，应该对于工龄津贴问题也进行系统研究，以便会同提出调整方案。

三劳保福利问题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对职工的劳动保险和福利事业是国家的长远方针，今后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但是，根据前面分析的劳保福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劳保福利工作和制度应该着重整顿。整领的方针是：简化项目，加强管理，克服浪费；改进不合理的制度，适当降低过高的福利待遇；同时提倡少花钱、多办事：提倡依靠群众集体的力量，举办福利事业：提倡用互助互济的办法，解决职工生活中的某些困难问题。

第一，劳动保险。

从几年来的情况看，劳动保险制度的建立基本是正确的。但是，制度还很不完善，某些劳保待遇有不切合实际和不够合理的地方。全国总工会已经提出修改的意见，拟将其中考虑比较成熟的部分，首先进行修改，经职工群众讨论后，由国务院发布关于劳动保险待遇的暂行补充规定，付诸实施；同时，进行全面研究，准备修改条例。

总工会建议扩大劳动保险实施范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统一实行劳动保险，取消现行的公费医疗和其他各项有关办法，以减少职工中的矛盾。这一建议，将由国务院召集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后决定。

第二，医疗问题。

目前企业享受劳动保险医疗待遇的职工和一部分职工家属，国家机关、文教、事业单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职工，加上实行劳保合同的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总数共约二千五百万人。

一九五七年在国家机关、文教、事业单位享受公费医疗的七百四十万人中，全年共计门诊一亿一千一百万人次，平均每人每年门诊约十五次，而根据十几个较大的城市调查材料和湖北、河北、四川等省的典型调查推算，在市民中平均每人每年门诊只有三点五次，农民只有二次。每次门诊的医药费平均一点五元，共需经费一亿六千六百五十万元。公费医疗的职工每年平均每千人占用七张病床，共计五万一千八百张。以每床每年利用二百九十六天计算，共计一千五百万天。每天住院费平均三元，共需经费四千五百万元。门诊和住院两项合计共需二亿一千一百五十万元。由于制度不合理，管理不善，公费医疗中的浪费是极其严重的。不仅经费上浪费很大，而且在医疗力量、设备和药品上浪费更大。目前全国共有二十六万张病床（不包括军队），其中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共占用十六万七千五百张，军队康复病人占用床位一万多张，精神病和麻疯病占用一万四千多张，优抚二百八十万人占用二万张。以上共计占用二十一万张，仅有五万张病床是供一般市民和农民使用的。

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和克服浪费现象，今后卫生医疗工作的方向应该是：

一、为六亿人民服务，城乡兼顾。扩大门诊，举办简易病床。

二、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工作。医院和疗养院逐步交地方统一管理，党的工作一律交地方领导。

三、降低医院和疗养院的设备标准，适当降低药品价格。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实行少量收费（门诊、住院和药品），取消一切陋规（如转地治疗由医院开支路费，住院病人外出由医院开支车费等），节约经费开支。

四、改革医疗制度，便利人民就医（如实行上午、下午、晚上三班门诊制度）。加强医务人员教育，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医疗态度。

五、私人诊所，不宜过早过急地实行联营。

第三，职工住宅收费问题。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职工住宅基建投资四十四亿元，建设职工住宅共约八千万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单价为五十三元）。职工住宅的建设速度这样快，但是仍感不足，到一九五六年底，还有约二百五十万职工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发生住宅紧张的原因，从全国情况分析，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由于职工某些福利待遇过高和规定的不合理，影响职工家属大量涌入城市。

二、在工业企业和城市建设中大量拆除原有房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仅一九五六年北京、武汉、太原、兰州等一百七十五个城市就拆除旧房二百四十八万平方米。

三、一般房屋造价高了，影响建筑面积的增加。

四、城市房租政策和住宅管理制度很不合理，公房房租偏低，管理不善，制度不严。根据国家统计局一九五六年职工家庭收支调查，住公房的职工平均每户每月负担房租二点一元，占家庭收入的百分之二点四，占本人的工资百分之三点二。国家收回的租金，一般只达应收租金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

为了缓和职工住宅的紧张，除了整顿各种福利待遇和采取其他措施以加强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并且根据可能适当地增建职工住宅以外，应该提倡由职工自建一些标准低的住宅。为鼓励职工自建住宅，可以由本企业事业单位给以一定数目的贷款，分期扣还。同时，还必须适当地提高职工住公房的

收费标准。租金一般地应该包括折旧、维护、管理三项费用。据财政部按照三项费用计算，一般平均每平方米每月应收租金约为零点二五元。按照每户十六至二十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计算，每月房租泅至五元，一般占职工工资收入百分之六至十，平均百分之八左右。调整公房房租办法，拟分步骤进行。第一步，凡未收租的一律收租，收租太少的应该提高，最高不超过平均每平方米零点二元的水平。第二步，达到应收租金的水平，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待第一步行之有效一年后再议。对住民房的职工房租补贴，也应该采取措施，逐步取消。关于调整房租的具体做法，可以由各省市人民委员会自己决定。

住房不够的问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才能逐步解决。必须制定严格的房屋分配制度和管理制度，并且运用群众路线的办法，依靠群众力量来监督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第四，企业和机关福利费。

目前企业和机关福利费都是按照工资总额的比例提成的。由于企业、机关职工人数和平均工资水平不同，常常有苦乐不均的现象。关于企业、机关提取福利费的办法，以及企业的其他福利待遇的整顿（如食堂、托儿所、交通费补贴，困难补助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由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才能提出整顿方案。关于解决福利问题，还应该在职工中提倡依靠集体力量，实行互助互济的办法。

为了便于地方政府统一调剂同一地区各类企业的职工福利待遇，举办地区性的集体福利事业，原则上应该变更中央各产业部门由企业奖励金中提成的办法，改由地方提成或者分成。至于具体的提成或者分成的比例，将由财政部会同各有关产业部门研究，并且提出方案。

应彻底改变北京的都市面貌

[1]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四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四月十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商定：

一、今后每年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增加一定数量的市政基本建设投资，首先把东、西长安街建设起来。今年先拨款在西长安街建筑一二幢机关办公用的楼房，即诸北京市进行安排和列入规划，建成以后，由北京市统一分配使用。

二、今后中央各机关所有在北京市、郊区内的办公用房和干部宿舍，除中南海地区范围以外，一律交由北京市统一管理、调剂和分配。中央各机关在这次精简机构和干部下放的时候，应当按照国务院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的通知，将多余的房屋腾出，交由北京市统一调剂分配，各单位之间不得私相授受。同时，请北京市对于全面调整中央机关用房问题，加以研究，在今年第二季度内提出计划。

三、在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过于分散。同时，要注意和长远建设规划相结合。应当建筑什么，哪些应当先建筑，哪些应当后建筑，建成以后又如何使用，都要有明确的目的性。

四、东单通往建国门的马路，要在今年拆通，请北京市列入今年的计划和着手进行。

以上请予审议和批准。如批准，请即转告北京市委。

[1] 这是致中共中央的信。

外贸工作十四条

①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

外贸工作值得总结一下。去年十二月我同各口岸外贸局长讲了十四个问题[175]。对这十四个问题，今天打算把题目念一念，有的地方加一些新的材料。

一、和平经济政策

我们对外是和平共处的政策，决不向外扩张。当然，如果人家攻来，最后我们还是要反击的。我们的对外贸易也是这样，不是向外扩张的。我们的对外贸易政策，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

二、内销为主，外销为辅

这一提法有点毛病。不是原则不对，而是构词不对。就整个讲，我们当然以国内市场为主。比如一九五九年社会购买力六百五十亿元，出口七十九亿元，很明显，出口只占少数。不仅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这样，就是美国也是这样。一九五八年美国国内商品零售额二千亿美元。出口一百七十九亿美元，只占百分之八点九，如果除去军火出口部分，一般商品出口大约是一百六十三亿美元，就更占少数了。英国是依靠对外贸易较多的国家，但其国内贸易也是占多数的。当然，西欧也有一些国家外贸占了很大部分，但一般说，总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怎么能以国外市场为主呢？不过，“内销为主，外销为辅”这样提法容易引起错觉，特别是在货源紧张的时候，有的人就可能会不重视外销。我们固然以自力更生为主，但还要以争取外援为辅。国内市场固然量大，但是必须重视对外贸易。我们从中央到地方，都要重视对外贸易。

三、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这里所说的争取外援，是对兄弟国家来说的。对民族主义国家，是援助他们经济独立发展的问题。对帝国主义国家则是经济斗争的问题。我们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外援对于我国的发展和建设，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四、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保证“五先”

进出口多少，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各项工作在国内要落实，出口当然更要落实。出口是两方面的事情：你要出口，还须看人家要不要。但是，一旦双方成交，签了合同，就应该交货，不交货就造成失信。所以，外贸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超过实际可能是不行的。去年外贸方面就有不量力之处，结果很被动。对今年出口计划，必须按照中央三月十八日的指示[176]保证“五先”。那就是要保证出口商品安排在先、生产在先、原材料和包装物资供应在先、收购在先、安排运输力量在先。外贸首先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在计划既经确定之后，则要保证“五先”。

五、重合同，守信用，重质先于重量

订了合同不守信用，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受到损害。去年外贸方

---

① 这是同各省、市、自治区财贸书记和国务院十七个部负责同志谈话纪要的第一部分节录。

面与资本主义国家订了十一万七千个合同，撤销的将近有五千个，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由于对方不履行合同，也有一些是我方没有履行合同，对于我方签了合同交不出货的，人家就叫喊起来，弄得我们负担很重。以上是讲对资本主义国家方面。

对兄弟国家，他们一般是守信用的，我们过去本来也是守信用的。去年因为出口搞得多，也就欠得多，弄得今年欠交更多。今年的日子的确很被动。

所以，要定一条原则：要么不签合同，签了合同就必须守信用。

对兄弟国家的贸易协定是国家签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买卖是各地口岸一笔一笔做的，不可能每笔都由中央或者外贸部批准，因此，各口岸必须把道理同干部讲清楚，不要随便批。你们要注意这件事。各地对外贸工作也要像对农业、交通一样开四级干部会议。请你们回去也开个外贸会议，不仅要外贸局、公司的科长级干部参加，也要找一般干部当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他们敢说话，说错了也不怕；同时还要吸收一些抱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现在下面办事，有时候出了事情，一查是科员、科长办的，有些事经理并不知道。因此，外贸工作要做好，也要动员群众，不动员群众，政策贯彻不下去。

这里还要讲一讲出口商品一定要重质量。现在出口商品中大约有百分之几的东西质量很差，有些东西很不成样子。对此，进口国家的反映很不好。一个苏联工人来信说，他们夫妻因为新婚，买了一对我国出口的幸福牌金笔，回去一用，一支漏水，一支不出水，“幸福”变成不幸福了。对这对夫妇来说，的确给他们带来不愉快。来信说，这种东西只能卖给蒋介石。其实，这样的东西即使卖给蒋介石也不行。苏联外贸部告诉我们，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二百八十多封群众来信，反映中国商品质量不好，说过去中国货的质量很好，现在如此，很是痛心。不仅兄弟国家有此反映，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反映。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有些东西，吹得太过分了，这也不好。比如香味花布，洗几次以后就没有香味了。香港有一个时期对香味花布搞得很热闹，现在却不香了。为什么不在事先老实说清楚呢？我们不要求一时之香，而要求永远之香。出口商品的质量是很重要的，对外贸易一定要保证质量。

六、对兄弟国家要合作互助，共同发展

兄弟国家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例如，今年我国向兄弟国家订购的电站设备就有一百八十万千瓦，这些设备将来全部投入运转后，可以发电九十亿度。我们去年全部电力供应量只有二百七十五亿度，今年计划四百亿度。如果今年订购的电站设备部能在今年安装好，对实现四百亿度的指标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应该看到兄弟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我们当然也应该帮助兄弟国家。月前，我们虽然谈不到供应设备，但是我们的农副产品对他们也很有用。他们要求供应猪肉、油料、粮食、饲料等等，而且要得很急，但是今年我们交货的情况很不好。由于猪肉交货不好，近来弄得我很窘。我看还是要帮助他们一下，想办法交货。

这就是说，对兄弟国家要合作互助，共同发展。

七、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平等互利，帮助他们的民族经济逐步地向独立方面发展

我们帮助民族主义国家，不要求附带政治条件。我们认真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77]的第四项。而且我们不强求卖给他们消费品，我们要对他们逐步增加生产设备的供应，逐步地帮助这些国家民族经济独立发展。从许多事实看来，帮助这些国家民族经济独立发展，还是对我

们有利的。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要搞好援外项目。

八、对和平中立国家的政策是互通有无，加强往来

争取和平中立国家很重要，对和平中立国家应该做些生意。

九、对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追随者的政策是，经济关系服从政治关系，经济斗争服从政治斗争

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这一类国家，我们要考虑使贸易往来对我们有利。买卖可以做，但我们对这些国家要随时掌握气候，经济斗争必须服从政治斗争。

十、贸易协定和合同的签订要有区别

兄弟国家希望同我们订立长期贸易协定，有些东西是需要有长期贸易协定的。但是，现在我们对第二个五年计划[152]还没有摸清，还要看两年再说。所以，现在只能对一般的品种如大型的、精密的机械等订长期协定，重要的还是年度的协定和合同。同时，年度贸易额的增长不能太大，有些合同宁可作为协定外的临时协议，不能作为年度贸易额的基数，以免第二年退不下来，使贸易额增长过大。比如，去年补充进口很多，只能作为协定外的临时协议。

对兄弟国家有援助的协定，有长期的贸易协定，还有临时的贸易协议。

十一、价格要有原则

一般应该实事求是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办事，不要压低价格去同民族主义国家和兄弟国家竞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有伸缩幅度，但不应降低过多，也不应抬高过多。

十二、贸易展览要少而精

贸易展览要少而精，不要搞得太多。过去出去展览很多，现在背了“包袱”。现在有一条原则：宁肯少些，但要好的。听说在莱比锡展览，我们有一种机器不敢开动。这事应该追查一下。过去出国展览前要经过几道审查，现在似乎不像过去那样仔细了。

据说，现在我们的展览品有三种：礼品、展品、产品。第一种，礼品，是向“十一”、“五一”献礼的东西，这应该称赞，以鼓舞积极分子的情绪，但这些东西还没有定型，绝不能拿出去展览。第二种，展品，一般是定型的，但不成套，不等于产品。展品要定型的才能展出，但不能出口。出口的只能是第三种：真正定型了的而且能够正常生产的产品。

十三、出国访问，要学些东西回来

我们要跃进，要向人家学些东西。任何访问都要带些经济性，派些真正搞科学、技术的人去，学些东西回来。不要像去年那样出口推销小组满天飞，去年派出五十多个推销小组，二百多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出国访问一定要向人家学一些东西回来，人家有一技之长都要学，就是将来真正强起来，也要谦虚。

十四、参加国际会议必须请示

国际会议很复杂，有的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我们决不参加；有的我们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不承担义务；有的作为正式成员参加。所以，凡是参加国际会议，不论中央各部或各地，都必须事先请示。

目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四项任务

①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总路线[178]，根据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要求，根据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提出以下四项任务。

一更快地建成我国独立的经济体系

我们的国家很落后，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我们不仅经济上落后，而且生活水平以及科学文化水平也不高。要摆脱这种落后状态，就得很快地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这包括工业、农业、财政、贸易、文教、科学、国防等各方面。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分秒必争，加快进行建设。

我们这么个大国，不可能设想一切要靠苏联帮助来解决问题。如果靠到苏联身上，苏联根本不能担负。以前，苏联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不是也建立起社会主义了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呢？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时期和斯大林初期的条件好得多了！我们现在建国十年的情形，比起苏联在一九二七年的情形大大地好了，生产指标、基本建设、科学等方面的条件都比他们当时有利。这就给我们一种可能，更快地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我们设想，如果能够在八年（就是第三个五年计划[163]内，或者到一九七二年（就是第四个五年计划[179]，很快地建成独立的经济体系，那么对社会主义阵营，对反对帝国主义斗争，都是有利的。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一旦建成独立的经济体系，战争来了我们也就能应付了。当然，这里面还包含一系列的事情要做。要继续进行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社会主义改造，风为还有些残余，如经济上的定息[118]。

二更快地把尖端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搞起来

按现代化的标准来说，现在我国的国防工业已经落后了。我们要搞尖端国防。尖端和国防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战用在战争上，不作战就可用在和平建设上。尖端的国防，即原子、电子、导弹、航空要更快地搞起来，从而建立起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力量。形势逼人，要求我们更快地掌握尖端技术。要掌握尖端技术，就要大搞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十年来，我们的建设有了一定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要尽快地掌握尖端技术，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力量。我们要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不仅表现在生产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社会基础上，包括城乡、工业和农业、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等。独立经济体系是全面的，不只是生产指标或者生产品种的问题。

三加快建立强大的自然科学技术队伍和社会科学理论队伍

搞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尖端技术，没有人才是不行的。要建立经济体系，

---

① 这是在黑龙江省委组织的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节录。

掌握尖端技术，关键在于人才，一个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一个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大量的是自然科学方面，少量的精的是社会科学理论队伍。我们理论队伍固然缺，科学技术队伍也缺，两方面都要加强，特别是科学技术队伍需要量很大。

人才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培养出来的，而要一天天教育出来。我们现在就要加快这个速度，办法就是正规与速成相结合。正规是循序而进，把书本知识、生产知识搞得比较牢靠一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走速成的道路，激发青年的朝气和敢想、敢说、敢做的勇气，搞创造发明。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凡有创造发明成为人才的，大部分都在青年时代[180]。怎么速成？就是打破过去的陈规，实行“一主、二从、三结合”，发动大家办教育。工厂企业、教育机关、研究机构都要搞生产、教育和科学研究，各以本业为主，以其余二业为从，三业结合起来。企业就以生产为主，但是可以办学校、搞研究，而且应该办学校、搞研究，这就是以生产为主，教育、研究为辅；学校里也可以办研究所和附属车间，以教育为主，以生产、研究为辅；再就是研究机构，以研究为主，但也可以办学校，办附属车间和附属工厂，也是一主二辅。这样，我们办学校的、搞生产的、搞研究的就多起来了，教育和科学的发展就会更快。据东北调查，三千人以上的工厂有二百个之多。这样的工厂里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至少有一二百人，可以办学校。反过来，像李昌[181]的工业大学、刘居英[182]的工程学院，办附属工厂、研究所也毫无问题，而且可以办预科[183]。东北有一百三十多个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二百多个，大家动手，学校就可以多起来。学校的学生从哪里来呢？也打破一个陈规，就是招初中毕业生和工厂的具有初中毕业程度的工人。把初中毕业生或者相当于初中毕业程度的工人招来，两年预科、三年本科，这种高等专门学校五年毕业。正规要七八年，三年高中、四年或五年大学。现在只要五年，缩短了二年到三年。如果明年开始招生，一九六五年就可以用了。这样，就可以大大增加科学技术人员，就可以解决科学技术人才不足的问题。这是一条“腿”。另一条“腿”即正规学校，还要继续发展，不改变。同时，要打破一个陈规，实行寒假招生[184]。为什么一定要暑假招生呢？仅在暑假招生，有很多娃娃七岁都满了，还不能进学校。寒假招生还可以把初中已经念了两年半的优秀学生招进来，读预科。这样，人就多起来了，一九六五年以后情况就会好一些。

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设想不产生广大的建设人才，问题就在于我们抓好科学、教育这一环。所以，发展科学、教育，也是现在一个中心的任务。毛主席在南方开会时，特别提出这一项[185]。我们就要安排具体工作来实现它。我看首先要把校舍搞起来。希望东北三省管计划、管建设的同志安排一下，有些项目宁可少搞，不十分急的宁可推迟，也要先把校舍搞上去，多办一些学校。中国有一句俗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人当然不需要一百年，但是应该重视这项工作。要造就广大的人才，在培养人才方面还要加一把力。

四加强党的团结

要不断开展党内整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团结全党，首先是团结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和县这四级的干部。这个团结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处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

要加快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尖端的国防力量，要培养大量的建设人才（包括理论人才），要加强党的团结。这四项任务都是有决定意义的。希望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尽管在国际上还有些问题，但这是暂时的、局部的。只要我们加强建设，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因为我们党是团结的，力量是强大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理论要用实践来证明，实践将证明我们坚持的理论是正确的。

订计划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

①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方才与几个主要部门的同志谈了一下，更觉得为力争完成二千零四十万吨钢的指标，必须确保计划内的质量、品种和炼焦煤、生铁、钢材的分配数字，并且必须使钢的前后左右能够协同前进，不要造成寅吃卯粮、毫无余地，左支右绌、前后脱节的形势。为防止这一情况出现，既要保重点厂矿地区，又要瞻前顾后，为明后两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63]留有余地，打下新的基础。关于缩短战线，方才在会上已谈过，待回来后再谈文教和内外贸问题。

以上想法，请你酌定。

① 这是致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的信。

关于促进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

①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日本人喜欢用三原则，现在我也说一个三原则，这就：是中日贸易的三原则。这个三原则是在同岸信介[186]敌视中国的政策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过去中日双方曾经搞过民间团体协定，想通过民间协定来发展中日贸易。经过岸信介政府这一段时期，证明这种做法行不通。岸信介不承认、不保证民间协定的实施，并且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来破坏它。我们不能容忍这种行动，只好将中日贸易来往停了两年多。根据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中日贸易如果能够逐渐恢复起来，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但是，池田[187]政府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现在提出贸易三原则，就是：一、政府协定；二、民间合同；三、个别照顾。

首先，一切协定今后必须由双方政府缔结，才有保证，因为过去的民间协定，日本政府不愿给以保证。至于政府协定，总要在两国政府向着友好方向发展，并且建立起正常关系的情况下才能签订，否则不可能签订。关于两国政府的关系，还是坚持过去我们说过的政治三原则。过去的政治三原则并不是对日本政府有所苛求，而是很公平的。这就是说，第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并不敌视日本，并且承认日本的存在，高兴地看到日本人民的发展。如果双方进行谈判，当然以日本政府为对手。但是，日本政府对中国并不如此，不承认新中国的存在，而且相反地敌视新中国，承认台湾，说它代表中国。日本政府也不以新中国政府为谈判的对手。第二，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美国这样做，日本追随，我们当然反对。第三，不要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我们这个三原则是很公道的，反过来看就清楚了。第一，中国政府并不敌视日本，愿意同日本友好；第二，中国政府只承认一个日本，并不搞两个日本，而且要谈判总会以日本政府为对手；第三，总是鼓励、支持和帮助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为什么日本政府不该这样做呢？新的日本政府，最近有些讲话是不好的，我们还要看一看。一九五七年我当外长，一九五八年陈毅[188]副总理当外长，两次谴责岸信介政府的对华政策[189]，都是根据岸信介很多敌视中国的言论和活动才这样做的。所以现在对池田政府也要看一看。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得出结论：两国任何协定都要通过政府来签订，民间协定没有保证，这包括贸易、渔业、邮政、航运等等。

其次，是不是没有协定两国之间就不能做买卖呢？不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是可以的，可以签订民间合同。比如日本某企业同中国某公司双方表示友好，又根据双方需要，就可以谈判签订合同，做一笔定期的生意。如果合同履行得好，双方关系也好，两国政治环境又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把短期合同变成比较长期的合同。这是从前途方面着想的。

再次，是个别照顾。这样做已经两年了。中小企业有特殊困难，日本总评[190]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进行斡旋，这是对的。今后

---

① 这是同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谈话的节录。

还可以继续服顾，并且根据需要，数量也可以增加一些。

日中贸易促进会[191]可以根据上述中日贸易三原则，对你们认为友好的、有可能做的、对双方都有利的生意，可以进行介绍。可以同我国的国际贸易促进会[192]接洽，他们懂得这个三原则。个别照顾，中华全国总工会也知道，可以找总工会谈。铃木[193]先生回去以后，也可以同日中贸易促进会的有关公司的朋友们谈谈。

进一步总结经验，抓紧解决目前的主要问题

①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三年大跃进[194]的经验，应当进一步总结，目前主要应当抓紧解决以下八个方面的问题。

一、调整十大关系

总路线[178]是在毛主席提出的十大关系[139]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目前仍有继续调整十大关系的必要。

首先，工农业关系。工农业关系是国民经济的根本比例关系。目前农业落后，影响工业发展；反过来，工业建设规模过大，占用劳动力过多，又影响农业发展。北戴河会议[195]决定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缩短基建战线、增产节约和压缩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等，都是调整工农关系的重要方针和措施，今后还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进一步调整工农关系。

第二，轻重工业关系。轻重工业关系是关系到市场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大问题，千万不可忽视。必须坚持政治挂帅，但仍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去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为了提醒大家重视农业和轻工业，曾建议将重、轻、农的顺序改为按农、轻、重的顺序排列[196]。

第三，沿海与内地关系。解放初期，对沿海地区的发展注意不够，现在沿海又搞多了些，应适当控制和调整。但内地的发展，必须结合当地人口、交通、资源等条件，进行全面研究和安排。

第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近几年来，国防费用已有很大压缩。必须注意加强国防力量，保证发展国防尖端所必需的原材料的试制和生产，在生产上为国防做必要的准备，以防万一。即便不打大仗，每年也还要担负一定数量的军事外援任务。

第五，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这方面存在问题不少，主要是大集体侵占小集体利益，集体侵占个人的劳动所得，对群众必需的生活资料照顾不够。

第六，中央与地方关系。分权到哪一级，应当重新研究。

此外，民族关系、是非关系、敌我关系、国际关系等等，也应当研究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例如，西藏的社会改革中，干部有急躁情绪，在刚刚完成土改[2]甚至尚未完成土改的地方，搞“明组暗社”[197]。又如，党内外关系，也值得注意。全国有一千七百万党员，不过占人口的百分之三，但是社[198]、队[199]当家的几乎全都是党员。许多社党委代替了社委，队支部代替了队委。实际是党委、社委一揽子，党社合一。党领导一切，并非党包办一切。在这些地方，党包办代替了一切，群众没有或很少有发言机会。这势必造成党脱离群众的恶果，应当提到党员与非党群众合作问题的高度来看待。

二、明确所有制

农村有：“共产风”[200]，城市也有“共产风”。农村约三分之一的地区，把所有制搞乱了，城市也有“一个指头”的问题[201]。农村的“共产风”

---

① 这是在一次汇报一九六一年计划的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主要表现为：大集体共小集体，集体共个人；城市的“共产风”主要表现为：化大为小，化公为私。关于纠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中央已发了指示[202]。对于城市的“共产风”，还应当进一步检查和纠正。

三、注意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分配与节约

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从一个人说如此，从一个社会说也如此。因为，归根结底，一切物质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创造一定的物质财富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越少，社会劳动生产率也越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就是说，农业的发展水平是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国民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又取决于：

（1）农业能提供多少粮食给工业和城市。

（2）农业能提供多少劳动力给工业和其他各行各业。

（3）农业能为工业提供多少原料。

（4）农业能为工业提供多大购买力。

（5）以上的四条，又决定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在我国目前农业机械化水平还非常低的条件下，农业的发展速度不能不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因而，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配置，就成为计划经济中最重要的比例关系之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改善劳动组织，调整生产关系，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更重要的是，保证劳动力持续劳动的能力和延续后代再生产的能力。近三年来，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却被忽视了。毛主席多次强调要有劳有逸，劳逸结合，而有些同志却热中于无休止的日夜苦战。其结果是削弱了生产力，破坏了生产力。要保证劳动力能够持续地有效率地劳动，必须有四个要素：

（1）保证必要的生活资料，即吃、穿、住、用、行。

（2）劳动力的计算和合理分配。

（3）劳动、睡眠、休息时间的合理安排。

（4）坚决防止和克服无效益的劳动。

四、留有余地，藏一手

过去订计划是不留余地、扩大缺口，今后必须坚持留有余地、缩小缺口的方针。过去宣传上常常是说多于做，今后必须坚持多做少说、藏一手的方针。

五、全国一盘棋

工、农、商、学、兵，条条、块块全面纳入计划，分别轻、重、缓、急，全体排队，不得有任何例外。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六、调整体制

体制下放的原则是对的，但权力下放到哪一级，哪些权力下放，应根据近三年来的实践经验，进行研究。在一个时期内，上三级即中央、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应适当集中权力；下三级即地、县、社三级权力应适当收缩，并应适当分给生产队[203]、生产小队[204]、作业小组以生产和生活管理权。工矿企业的权力也要适当收缩。

七，制订计划的方法和步骤

过去订计划，是从头到脚，先确定指标，后平衡计算。今后应坚持从实际出发，从脚到头，经过平衡、计算，最后确定指标的方法。具体步骤要计

算和考虑：（1）原料，（2）材料，（3）设备，（4）维修配件，（5）进口可能，（6）运输，（7）技术，（8）布点，（9）投资，（10）指标。

八、合理布局

争取若干年内，六个大区基本上建立起具有不同水平、不同特点的经济体系。

布局必须贯彻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的方针。但是，如果已搞了大的，而生产任务又吃不饱，则应先让大的吃饱，再搞中、小的。

在布局时，必须考虑到人口、劳动力、交通、生产与基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灾区与非灾区、品种质量、市场、购买力等条件，分别轻、重、缓、急，统一安排。

当前建设中的几项任务

[①]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日）

我们当前建设中的几项任务。

一、要过农业第一关

毛主席很早就说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主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当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主导方面，但是不能忽视我们的基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工业水平和机械化水平都很低，五万万多人搞农业生产，如果不把农业生产增长起来，工业生产就没有巩固的基础。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是经过将近百年的发展的，现在的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它用少数人搞农业生产，就可以供应全国的粮食，而且还可以出口。它解决了农业机械化问题，我们还没有。我们有五万万多人在农村里面，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劳动力搞农业生产，生产粮食供应城市。

我们工业的发展，要看农业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农民能够供应多少商品粮给城市和经济作物区，就能够办多大的工业。因为办工业的本身不能出产粮食。当然，我们现在有代食品，这个可以搞一部分，但是大量地生产粮食还是靠农民。

（二）农业能够提出多少劳动力到城市办工业、交通、文教等。

（三）农业能够生产多少工业原料。工业原料不仅是轻工业用，如棉花、烟叶、糖料、油料、麻、茶、丝等等，而且还供应一部分重工业用，比如钢丝绳就要用麻绳作心，甚至于现在建筑工程也用竹筋。

（四）农业能够提供给工业多大的市场。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生产出来的东西，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主要是销在农村，农村是最大的市场。我们应该以国内市场为主。比如，美国这个向外侵略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商品销售主要还是以国内市场为主。

（五）农业能够提供多少人来发展运输。本来这一条可以跟第二条结合到一起，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机械化落后的国家，必须把运输单独列成一项，因为各种工业，最后都要归结到运输问题上。我们现有铁路三万多公里，连新铺轨的路线是四万公里的样子。我们的运输量是很高的，去年接近七亿吨。全国物资的调动，主要不是依靠铁路，但又是依靠铁路。这个话怎么讲呢？因为最后一个环节是靠铁路送到全国大城市里去。我国现在约有四千个城镇，其中大、中城市共一百八十三个。四千个城镇共有人口约一亿三千万，可是一百八十三个大、中城市就占了八千万人；另外的三千八百个城镇是五千万人。东西要运到一百八十三个大、中城市里，都要经过铁路、轮船、码头。像湖北的宜昌、沙市没有铁路，物资调运就要经过轮船。怎样运到铁路、轮船上来呢？以前全是手工业的运输，如头顶、肩挑、背驮、手推，这是人力运输：还加一部分畜力运输，如用大车运、马驮、驴驮，牛驮、骆驼驮，

[①] 这是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扩大会议上所作《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任务的报告》的节录。

等等。我们的城市规模那么大，分布那么广，供应的东西那么多，需要很多的运输力量来为之服务。所以，我们必须认识运输这个问题。

要使工业发展，我们就要认识工农业关系和城乡关系，这是一个主要问题。按马克思的观点来说，集中的一句话就是农村能够供应多少商品粮给城市，就能够办多大的工业。我们遇到灾荒，情况就变了，要把农民的口粮提出一部分来给城市作商品粮。实际上不是商品粮，农民还不够吃嘛！是挤出来的嘛！要使商品粮增加，农民够吃且有余粮，那么，我们就得过农业关。我们在陕北曾经做过这个事情。那时是抗战中期，皖南事变[205]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提倡自己动手搞生产，结果就能够自给了。延安的生产运动[206]，一九四一年就开始了，大搞是一九四三、一

421 九四四年，在陕甘宁边区[207]搞生产的最高峰只有三年，即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当时我们提倡“耕三余一”，即耕三年，余一年的粮，黄任老去参观过[208]还记得，这一提倡果然做到了。等到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向延安进攻[209]，我们撤出延安，在陕北打游击，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即使是最艰苦的横山山区，老百姓家存的粮食都是满缸满仓的。我们就靠这个打了三年的解放战争，胡宗南的部队无可奈何。你说不能够余粮，我们就做到了嘛！当然，那时局面小，陕甘宁只有一百四十万人，现在有六亿五千万人，难道不能搞吗？这又是王熙凤的话[210]，大有大的困难。这样大的国家，六亿五千万人，这个地方不闹灾，那个地方又可能闹一点；这个地方工作好，那个地方又可能出一点毛病，必须把全国农业部搞好。要把干部的思想搞通，好好搞农业生产，过好农业这一关。

我们对过农业第一关的要求不能太高，比如说，可以要求每人平均拥有八百斤粮食。过去大跃进[184]，头两年不大了解情况，下面有一些浮夸，报得多了一些，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多。如果每一个人要有八百斤粮食，以后到了七亿人口，或者人口增加得更多了，差不多要六千亿斤粮食，这是个相当大的数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耕地少，种粮食的现在不过十二亿多亩，我们当然还要开荒。另外，我们的耕地有一个缺点，虽然国家大，但人口密的地方耕地少，人口稀的地方耕地多，一时又不能移民，有这样一个矛盾。能够有六千亿斤粮食商品粮就可以增加了，余粮也可以有些了。所以，必须争取过农业关，首先过第一关。这是一项任务，必须全国努力，不仅要搞一般的粮食生产，而且还要搞商品粮的基地。因为有一些地方，的确水利条件好，肥料条件好，再加上一点化肥、机械，就可以多搞。那些地方多供应一些商品粮，工业才能更有发展的余地，不然就被农业拖住了。因此，农业机械化，就必须成为首要任务。

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就指出，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排队[196]，首先要使农业过关，也要注意市场供应，发展轻工业，同时加强重工业。因为看到大家都忙重工业，他特别强调农、轻、重的次序。现在看来，这个方计是对的，必须集中力量支援农业。

在农业的耕地上，我们搞工业，搞一个工厂，常常占很多平坝子。比如，兰州、西安、洛阳、郑州、成都等地被占用的一些坝子，都是好地方；河南的新乡、河北的一些平原，动得更多；山东、江苏、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也都有很多耕地被占用。这几年开荒的亩数与被工业、交通（铁路、公路、机场）、学校、机关所占用的耕地亩数折合起来，全国耕地总数减少了八千

万亩。我们的国家虽然大，但是好地、平原并不是那么多，而且这些地方人口又很密。这一点我们有些人没有注意到，所以影响了农业。必须重视农业，搞商品粮，这样才能更快地打好我们的工业基础，一旦有事，农业才能够自给。

粮食生产是不是就没有潜力呢？并不是。我们算一算，全国种植粮食的耕地是十二亿亩，加上复种面积大概是十七亿亩，搞得好还可以多一点。就拿十七亿亩说，每亩产三百斤，就是五千一百亿斤。如果水利、机械、化肥搞得好，平均每亩三百斤不是难事，世界上比这个产量高的还多嘛！现有的耕地加上复种，每亩产三百斤不成问题，五千一百亿斤不是难事，当然这需要做工作。不单是这方面，另外我们还要用就地开荒和边疆开荒这两条来增加耕地，所以增产的可能性很大。美国每亩的产量比我们高，欧洲有几个国家像丹麦这些地方，单位面积产量也是高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做到，它那样的所有制、那样的制度都行，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表现优越性呢？所以说，有工作问题，有时间问题，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经过一段时间，是肯定能做到的。我们还有八字宪法[211]，如果做得好，就能够更辩证地解决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违农时这些问题。过去有些地方对有些问题还没有摸清楚就普遍推广，因而出了一些偏差。为了达到增产的目的，走了一些弯路，这也是难免的，但是我们领导上要注意到这些方面。

为了要使农业过关，我们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全力支援，从水利、机械、化肥、劳动力、供应各方面来支援农业。还有运输也得机械化，这样就能够减轻人力、畜力的负担，不然也会更多地占用农业劳动力。

二、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

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我们提了多年，现在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认识，就是六十年代的工业体系。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需要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到底是什么内容、什么范围、什么水平？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千八百万吨钢，从数量上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一千八百多万吨，德国希特勒[212]时代也不过是这样的数目，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只有几百万吨钢。可是，那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工业水平，现在是六十年代的工业水平了，是原子、电子、喷气这样的水平了。这样的工业水平，品种也多了，质量也高了，规格也严了，技术也复杂了。因此，我们所要求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就比以前更加先进。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满足于照抄老的。在数量上达到一定的水平时，必须转向质量，求质量、求品种、求规格、求技术的跃进。不这样，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有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国家。

我们全国分了六个大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这六个大区作为一个协作体系，就是全国协作。一个大区本身有它独立的部分，有它需要协作的部分。因为中国之大，要几个经济区相互协作。比如运输，南方没有煤，要从华北、东北运过去：铁矿石要从南方运到北方来；粮食，夏收的时候从中部在北运，秋收以后又要从北部往南运。一个大的协作区如果不能有最低限度的自给是不行的，但是又要相互协作，不能要求每一个大区都能够独立，全部都自给是不可能的。所以各大区又要有协作的部分，又独立，又协作。形成这样一个全国的工业体系，时间恐怕还需要十年左右，因为要从六十年代的水平来看，我们应该看长远一点，如果完成得更早一点那就更好。这点在三年大跃进中我们有更深的认识。事情总是从摸索和认识

的过程中逐步提高的。

三、要突破尖端技术

现在是新技术的时代，就是说经过新的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已经是原子、电子、喷气的时代，超音速的时代。我们在尖端技术上要像攀登珠穆朗玛峰那样前进，这就需要提高我们的工业水平。必须在好的农业基础上、好的工业水平上，尖端技术才能突破，不然是不可能的。当然，也可能单独搞一项，那是不能持久的。我们可以在尖端技术这方面努力，但必须是平衡的，当然不是绝对平衡，是相对的。农业要发展，工业水平要提高，然后突破尖端技术，这三者是相互有关系的。

在掌握尖端技术这方面，要靠科学家、劳动者、知讽分子大家一起努力，要靠党的领导、国家的领导。曾经有人问过，你们什么时候槁出来？我说，我也不晓得。这是老实话。但是，搞得好，也许快噢！我们必须努力突破尖端技术。我想，中国人民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能够取得抗美援初[41]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因此尖端技术我们是一定能够搞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工人会贡献出他们的力量的。

四、培养专门人才

我们国家需要一批专门人才。广大的劳动者是我们的基础，但是还得把他们的水平提高。在社会科学方面也好，自然科学方面也好，我们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专门人才，这当然不是说尖端人才的数量，是指一般人才的数量。比如说，现在小学、中学、高等学校的学生加在一起是一亿一千多万人，其中小学生接近一亿人，中等专业一千多万人，高等学校接近一百万人。还有已毕业的人。这几年教育的发展是相当快的，问题是要提高，在普及的基础上需要提高质量。要从数量的大跃进转向质量的大跃进，我们在培养人才这方面也是如此。从数量的大跃进转向质量的大跃进，这点很重要，希望在座的许多知识分子贡献出力量来，大家好好搞搞这件事。国家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人才都需要，但是需要量更多一点的还是自然科学方面，特别是工业方面。

我们是有造就一批专门人才的可能的。十年来，我们学了不少，有不少留苏的学生回来，也有不少留学西方国家的人回来，现在很应该在这方面多做工作。我们不仅是在报纸上百家争鸣，发表一些理论性的、学术性的文章，更需要埋头苦干，多做实验室、生产车间的工作。我们要多做一点，少说一点，这很重要。我们很希望全国的专门人才，包括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的、理论的、实践的，都能够提高。在知识分子工作方面，要团结、教育大家来努力提高。这一年因为供应上困难，我代表国务院说，对大家照顾得很不够，希望朋友们如果遇到困难可以告诉我们，应该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因为大家贡献了力量。

五、要坚持勤俭建国

我们国家在胜利以后虽然遇见一些惊涛骇浪（像朝鲜战争），但是一般地说在我们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是比较顺利的，我想大家会同意我这样的说法。如果解放后十一年跟解放前二十二年的战争时期或者是跟建党以后的二十八年的时期来比，那是顺利得多了。可是，毛主席在开国前夕就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早就预告过我们：“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213]而我们大家在这十一年顺利

的环境中，艰苦奋斗的作风有时候疏忽了，现在遇到这些困难，就会觉得好像不那么方便。实际上，我们想一想，不要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它在国内战争时期、新经济政策[32]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节衣缩食。很多朋友一九二八年、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五年在苏联呆过，那个时候他们的供应比我们困难多了，但他们硬是咬紧牙关，节衣缩食，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起来，然后才应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了胜利。我们战争胜利后十一年是比较顺利的，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时代还有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当然，帝国主义国家也要看时机，它也要有准备。我们也要有准备，如果我们搞得好，那就有可能推迟或制止战争的爆发。因此，就必须勤俭建国。

我们现在应该节衣缩食，应该有这个决心，来把国家建成真正名符其实的强国。我们过去已有十一年的努力了，再有一个十一年，到一九七二年，那是第四个五年计划[179]了，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要建成一个强国就应该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更可以把社会主义推向前进，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在灾荒的时候，提出口粮低标准、瓜菜代，这是需要的，不仅是今年就是明年还是应该如此。节衣缩食，“常将有日思无日”，有粮食的时候节约一点，到了困难的时候就好办了，否则就很不利。当一九五八年棉花丰产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点错事，规定一九五九年每人发二十四尺布票。我是总理，应该有责任的。发了那么多布票，当然大家都赞成、喜欢。可是，每人二十四尺布票，这不是简单的事！每人一尺布票，六万万八千万人（现在大概接近六万万八千万人，也可能多一点）就要七十五万担棉花，每人十尺就是七百五十万担，二十尺就是一千五百万担。去年只收了一千八百万担。我们不能只穿衣裳，还有计织品、棉絮，还有棉农留棉，还有工业用布（我们现在轮胎用的布数量很大），还有包装，还有一部分出口，等等，多了。我们国家大，不能跟那一百万、两百万人口的国家比，他们决定多发一尺布票不算什么，我们六万万八千万人的大国，每人多发一尺布票却是相当大的数量！没有想到这一点，是有错误的。所以，去年就降到每人十八尺布票，也还是降少了，如果去年降多一点，今年要好一点。这是一个很深的教训。这也是出于良好的愿望。但光凭良好愿望还不行，良好愿望还必须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不能跟客观实际有距离。所以，应该想到“常将有日思无日”这句古话，现在有，要想到没有的时候，多节约一点就好。

现在有很多东西都用购物证，对这个问题有些朋友有意见，我要讲几句。我们这样的国家，用购物证很必要，因为在一个时期内我们的东西还不会那么丰富。我们又要搞农业，又要搞工业，不可能把轻工业搞得太多，不然工业水平、尖端技术就不能上去。因此，市场供应量有一定的限度，普遍的供应只能用购物证来解决。比如普通糖，每人一个月二两，还有粮食、蔬菜、标准布等，都实行普遍定量。虽然少，但大家都买得到，这是当前社会主义的基本供应方法。另外，我们搞点高级的，如高级糖果[214]，价格高一点，工资高一点的或有余钱的人，要买就买高级的，反正多出几块钱。他买了以后，国家可以回

笼货币，这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累。我们的东西多了，普遍的供应就增加，高级的东西就减少，或者是高级东西的价格就降低一点，这两者是随着物资的增加而缩小距离的。现在有高级糖果，将来东西多一点，我们再搞

一点别的高级品，比如普遍供应的布票很少，可以另外搞一点高级纺织品，工资多的人和单身汉可以多买一点。当然，也不要什么东西都有高级品，那也不行。

我们国家节衣缩食的表现，除了供应量比较低以外，还有一个是实行低工资，这也是节衣缩食的一个方面。实行低工资的办法是计时工资加奖励，以计时工资为主，奖励为辅，多劳就多得一些，可以给奖励。计件工资在有一些部门可以采用，现在主要的是计时工资加奖励。因为实行低工资，全民就业面就大。现在全国的职工有五千万人，这个数量是大了一些，以我们国家现有的工业水平来说，这个数量是不大适应的。因为我们只有一千八百多万吨钢、四亿二千多万吨煤、七亿吨左右的铁路运输量、六百多亿度电，这样的水平，职工的人数就太多了。我们从去年到今年已经压缩了一部分职工，打算今年到明年再压缩一些。压缩下来的人，一部分回到农村，一部分下放，一部分转到农村。所以，精简工作是可以做的，这并不妨碍全民就业，因为被精简下来的人回到农村去，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在城市中工作的人如果下放，带工资下去，依然是国家供给，不过不在上层机关，是到基层单位去工作、劳动。总之，我们对城市人口的增长要有控制，现在农村需要劳动力，而且农村又直接生产农、林、牧、副、渔的产品。

我再说一遍，勤俭建国就是要从节衣缩食、低工资、低标准、全民就业等各方面来使大家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使我们的国家更快一些建设好。

六、要坚持增产节约运动

我们不仅要勤俭建国，还得增产节约。三年大跃进，我们的确积累了相当财富，这一点我们应该承认。我灯出去参观，看到新的工厂、新的企业、新的事业，如农村中的社办工业、社办事业，的确是高兴。正因为我们的财富增多了，就更要增产节约，不许浪费。要坚决反对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不断增产节约。增产节约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针，是一个权杆。不断增产节约，才能使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地建成。要从各方面来增产节约，如技术革新、经济核算、严格的管理制度、节约人力物力、反对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劳动纪律等等。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要经常提醒，我们的生产部门有很多物资积压，每清理一次仓库，总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本部门用不着、别的企业能够用的；每一个机关都有一些东西积压，这些积压的东西清理出来可以给新建立的机关使用，而我们现在每建立一个新机关，就购置一批东西，虽然我们已经进行了控制，但有时候又购置了一些。我们国家大，东西是全民的，所以必须爱护国家财产，这是宪法上规定了的。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劳动纪律，另一方面要爱护国家财产，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七、要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加强理论学习

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任何事情在弄不清楚时就不要乱说；弄清楚以后，就可以提意见，容易下决心，也可以找出办法来。但是，光有调查研究工作，没有理论指导也不行。没有理论指导，就会妨碍我们去进行调查研究。做一件实际工作，做了一年、半年，可能还看不出问题来：调查研究了几百条，也可能我不到关键。另外，还有一个调查研究的方法问题，这就是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武器来进行调查研究，这样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进行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采

用民主集中制，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坚持真理，不断地修正错误，继续前进。这就是实践跟理论的结合。调查研究是把实际问题用理论加以提高。最近，毛主席又在提倡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因为最近三年大跃进，伟大成绩使我们高兴，但是的确有许多事情跟实际有些不那么切合，是浮在上面的。我们要深入下层，这在一九五八年不是提倡过的吗？我们要真正去做调查研究工作，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来提高。调查研究工作必须加强，政府工作人员要这样做，党的领导人员也要这样做。我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国务院的人，如果愿意进行调查、参观，我们应该帮助组织。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六亿五千万人口出发，问题就会解决得好。

八、要加强国内大团结

如果要把工作做好，那就必须把全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团结起来，把坏分子孤立起来。在我们的队伍中，要互相帮助改造、帮助学习，这样来团结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加强国内团结，跟国际团结是有联系的。抓强国内团结、国际团结，就能够战胜敌人。

上面所讲的八项任务都是重要的，其中主要的是前面那四项任务。

关于食堂和评工记分筹问题的调查

①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主席给李井泉和陈正人同志的信[215]六日早上我就看到了。我到邯郸之后，听了三天汇报，就到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有五天了。五天中，我找了公社[198]、大队[203]、生产队[204]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现在有下面四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一）食堂[216]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217]，只赞成把五保户[218]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86]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我明天还要看一个食堂，八日返回北京，帮助陈总[188]解决出席日内瓦会议[219]的一些问题。以后再给主席写报告。问题解决了之后，我还要返回邯郸。

我到邯郸之前，已经派许明[220]同志带领一个工作组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天。

---

① 这是在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调查期间给毛泽东的电话汇报记录。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①

（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

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像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帐，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221]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鼓真劲。有的劲就不是真劲。像你们所说的两个工厂，一个厂踏踏实实地干，说他“没劲”，“冷冷清清”，一个厂在那里造假，却说他是“轰轰烈烈”。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说，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因为有上游，你才争上游。主观能动性要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我们提倡鼓干劲，不是鼓假劲，而是鼓真劲。鼓干劲也要实事求是，有的就是鼓假劲。比如有的提倡苦干几天几夜，过年也不休息。你在那里鼓劲，他就苦战，你走了，劲也没有了，他照样休息，照样过年。

做实事。做了实事，就有实效，否则强迫命令，就会搞一些不实在的东西。这几年《人民日报》宣传了许多不恰当的口号，如拔白旗[222]等，他们已经做了检讨。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要调查研究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浮夸风气，不易一下子改变过来。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乡，开始群众不敢讲真话，有人封锁了真相。我也曾到一个地方搞调查，去之前，先派了办公室的同志去，后来发现反映的材料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天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当然这一层不是

---

① 这是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讲话的第四个问题：检讨的目的。

一道墙，是一张纸。你们也都是老革命了，参加革命都有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你们鼓掌，我心里就不安。现在造成的这种形势，一定要改变，下决心改变。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

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在战争年代，军队讲民主，就能打胜仗。规模最大的是解放战争，那时军队也最讲民主，仗怎么打法，作战方案怎么定，允许连队讨论，提出意见。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创造，也是全军的创造。军队能够讲民主，为什么党内不能

439 讲民主呢？我以为要按党章办事。少奇同志在七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小平同志在八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都讲到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但这几年有的同志把它搁到一边去了。当然有些事情是中央带的头。比如开电话会议，是中央先开的，以后一层一层开下去，电话会议又无法讨论，只能层层下压，这是不对的。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的修改党章报告，对党内民主生活都有过说明。乱斗争行吗？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随便捕人、打人，都是不行的。当然有些是属于违法乱纪性质的，这不只是党内问题了。违犯了国家法律的，要按国法处理。

我们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尽快恢复起来，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要恢复起来，现在被搁在一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通都要恢复起来。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

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

①

（一九六二年二月七日）

我现在就谈谈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

第一，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

一九六一年，全国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减少工资开支，是有很大的成绩的。这是全伺上下一致、各级同志努力的结果。中央决定，一九六二年上半年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七百万人，其中职工要减少五百万人。在上半年精减的指标实现以后，下半年还要考虑提出新的精减计划。这是克服当前困难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精兵简政，有利于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有利于改善城乡关系，巩固工农联盟；也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还有利于加强基层工作和生产第一线。

一九四二年、一九五〇年，当我们在经济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毛主席都曾经号召全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并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今年上半年精减五百万职工是可能的。

就工业生产部门来说，如果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劳动生产率计算，完成今年的工业生产指标，只要一千二百万职工就行了，而现在工业的职工却有一千六百零四万人。当然，这不是说所有厂矿的劳动生产率都降低了，有不少厂矿的劳动生产率还是逐年提高的。现在的工业底于已经大起来了。四年来，增加了许多新的重要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虽然目前由于原料、材料和燃料的困难，开工不足，可是从发展来看，又是必须保留的。因此，不可能完全按照一九五七年的比例减人。但是，今年上半年减少二百多万人是可能的。在一千六百万工业职工中，中央直属企业的职工占凹百万，地方工业企业的职工占一千二百万。所以，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工业部门必须共同下最大的决心，按照一九六二、一丸六三两年的生产任务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坚决实现这一精减指标。

就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部门来说，上半年要求减一百多万人，其中，基本建设减八九十万人，交通运输减二十多万人。

就财贸部门来说，上半年要求减八十万人。商业队伍要转业一部分，还要退回一部分去经营集体所有制的商店或者个体的“夫妻老婆店”。两项合计共约一百三十万人。但是，为了加强商业队伍，要从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和军队吸收一部分骨干，从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吸收一部分毕业生，两项合计共约五十万人。这样一出一进，可以净减八十万人。

就农、林、水利部门来说，上半年要求减二十多万人，实际上可以超过。现在许多国营农场把一些农村人民公社[198]包进来了，社员要求退回到集体所有制。黑龙江就有这个问题，比如北大荒，把整个县都包进来了。社员用力拿固定工资，生产积极性反不如从前高，因而产量降低了，商品粮减少了，应该让他们回到原来的公社去。

---

① 这是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就文教部门来说，上半年要求减二十多万人。

现在全国的行政人员有三百一十五万人。据调查，备县这几年都增加了人。现在近一百万人的大县，行政人员（包括公社干部）就有一千七八百人；五十万人左右的中等县，行政人员就有一千一二百人；十多万人的小县，行政人员也有六百多人。我们要求各县下决心减它一半。许多县的同志都支持这个意见，他们说，只要上边“拆庙子”，他们底下就可以减人。如果平均一县减四百人，一市减七百人，全国二千个县、二百多个市，至少可以减一百万人。

精兵必先简政。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首先要裁并机构，要“拆庙子”，同时要“搬菩萨”。这次会议后，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准备制定一个党、政各级组织形式和编制的方案，定下来以后，从中央到公社，都必须坚决执行。

企业单位，有生产任务的，要按照一九六二、一九人三两年的生产任务定员。过去所说的综合生产能力常常算不清楚，还不如先按照今年、明年的生产任务定员，以后生产任务增加了，再招回来就是了。没有生产任务的，或者生产任务少的，该关的关，该并的并，该缩小的缩小，该撤销的撤销。有些企业，已经实事求是地根据工业七十条进行“五定”[223]的，可以按照“五定”的定员减人。所有的企业单位，都必须大力精减非生产人员。精减下来的人员，应该尽可能参加农业生产。合乎退休条件的，可以退休。对于无法处理的一部分老、弱、病、残的职工，除去退休的以外，应该在编制以外妥善地安置他们。多余的干部，有一部分可以集中学习一个时期。老、弱、病、残的干部，有的可以改做轻的工作，不能工作的可以在编制以外养起来，其中长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更应该适当安置。

企业中进行精减的时候，要注意保留技术骨干。

在编制、定员和地方保留的机动数确定以后，就不能再增加人了。再增加一个人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以后国家就按照编制和定员发粮食、发工资。

中央机关和部门，要带头精兵简政。希望各级组纵也要认真地进行精简工作。根据国家计委的调查材料，中央各部门在天津一个地方的办事处、材料站、研究设计机构等等，就有一万一千多人，在全国就有十七万人。我们认为，这个数目可以大大地减少。在省、市、自治区都有它同中央各部相应的厅（局），各部的许多工作都可以由省、市、自治区的厅（局）去办夕为什么还要设办事处呢？中央各部在地方上设办事处，地方又在北京设办事处，地方之间也互设办事处，这种十分不合理的状况，必须坚决改变。

今年上半年压缩七百万城市人口、精减五百万职工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工作要比去年困难得多，也可能发生一些问题。各地要认真做好这件事情，要力求避免发生问题。但是，我们要认识，如果不坚决把人减下来，困难就会更大。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要减现在的城镇人口，减现在的职工，还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在人口多的城市，在人口密的地区，应该提倡节制生育、计划生育。至于人口稀的地方，像江西省的农村，或者边远的省、自治区，比如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那些地方多增加一些人是好的。这也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我们必须下最大的决心精兵简政，必须做细致的、扎扎实实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中央关于继续减人的决定，已经发给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们看过了，会后就要下达。

第二，争取农业增产，主要是粮、棉、油。

增产要有个次序，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农作物都恢复和发展起来。今年首先应该抓粮、棉、油。为着增产，大家首先要保证贯彻执行中央的各项政策和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224]。要十分注意保护人力、畜力、地力，再不能削弱了。

我们要从各方面支援农业，尽最大的可能，保证农业上最急需的生产资料。急需的化肥，急需的农药，急需的中小型农具、车、船和机械维修材料，我们要努力供应。做工业工作的，做市场供应工作的，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伺时，地方同志也要根据可能，依靠自力更生，就地取材，修复和补充一部分中小型农具和农村的运输工具。要把有限的材料用在这方面，靠自己解决一些困难。

要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八字宪法[211]，特别要抓紧肥料、水利和中小农具。

要保证粮食包产指标和粮食征购任务落实到生产队[204]，征购任务略留机动。地、县的同志在定粮食征购任务的时候，要留一定的机动数，就是要在国家规定的征购量之外，多征购百分之十左右。有这么一些粮食，对于弥补灾区征购量和国家供应量的不足，很有好处。

我们做商业工作的，做工业工作的，要尽最大的努力，按等价交换的原则，保证农村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供应，以利于农产品的收购。地方同志在夏收、秋收时，要保证及时收购，同时安排生活。这是毛主席在去年提出来的。去年的经验证明，凡是哪一个省、哪一个地方按照毛主席这个意见办的，哪个地方的情况就好一些。

第三，努力增加工业生产，首先是增加能够供应市场的工业品的生产，同时，保证完成煤、木、矿、运的任务。

必须保证中央的各项政策、中央工业指示八条[225]。工业七十条草案在工业交通战线上都得到贯彻执行和认真试行。计划部门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按照重视品种、质量和成龙配套的要求，对国民经济认真进行综合平衡，努力做到计划落实，不留缺口。工业部门要保证集中力量生产国家计划内最急需的产品，首先是城乡市场最急需的产品和维修器材。在上述前提下，要把有限的原料、材料和燃料集中使用在产品质量好、消耗定额低的企业。有些工业产品由于原料、材料供应不足而无法配套出厂的，就应该停止生产，不要扩大积压；有些工业设备由于附属设备不能配齐而无法进行运转生产的，就不要提早安装，以免损坏主要设备。

现在原料、材料工业上最中心的问题是煤的生产、木材的生产、矿山的建设和生产。目前运输是紧张的，短途运输尤其紧张。拿汽车来说，大概三分之一不能用，三分之一待修，只有三分之一能用。民间的运输工具损坏的也很多。所以，今年除了要抓煤、木、矿石的生产和建设以外，还要抓好运输工作。

各地、各厂矿布置生产，必须保证计划内的生产任务，并且在计划内还要有先后次序。至于增产，必须在保证不增加而是节约原料、材料、燃料和人力的条件下进行。增产的东西，必须是国家急需的品种，而且一定要保证质量，绝不允许盲目增产，粗制滥造。如果在计划外要求新增加原料、材料、燃料的，必须经过省、市、自治区审核，提到中央批准以后，才能够布置生产。

对各种设备，要保证维修，减少损坏。现在一方面许多设备损坏了，没有材料维修，另一方面又在制造新的同样的设备。汽车、拖拉机等许多机器设备部有这种不合理的情况。我们应该首先把能够维修的设备逐步地维修好，减少它们的损坏，发挥它们的作用。否则，从整个经济效果看来，是很不利的。

此外，对国防工业需要的设备和材料，也要实事求是地分别轻重缓急，积极供应。

第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坚决“下马”。

基本建设战线，必须缩短。基本建设项目和基本建设工作量的安排，必须严格控制在国家投资总额以内，不难超过。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要给地方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机动金额和器材，由地方自己安排建设项目，报告中央审核批准后，列入国家计划。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可以在这个机动金额内向地方提出建议项目，供地方选择参考。鉴于今年国家计划在原料、材料和燃料的分配上尚有比较大的缺口，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和落实。因此，各部门、各地方在安排基本建设项目和基本建设工作量的时候，要主动地保留四分之一的投资额，暂不进行安排，以免由于原料和材料供应不足，而造成新的窝工和浪费现象。

国家计划外的基本建设项目，不论是中央的或者地方的，不管有多么重要，都必须一律坚决停下来。各主管机关认为非续建不可的项目，也要在报请中央审查批准、列入国家计划后，才能动工续建。

各主管部门，要维护好停建工程，要尽力做到减少停建工程和设备器材的损失。要整顿基本建设的队伍，集中使用基本建设的力量，搞好那些计划内的续建工程。

第五，要统一、全面、彻底、合理地进行清仓核资。

这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搞好调整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央决定全国统一进行一次清仓核资的工作，把全国企业、事业、机关、学校、军队各单位的仓库做一次总的全面的清理，重新核定一次资金。不分中央和地方，不分哪个行业，统统要彻底清理，不准打埋伏，不准讲情面。在机器设备上，不管是通用设备，还是专用设备，都要清理出来。不准只把专用的设备拿出来，叫国家背“包袱”，把通用的设备放在自己手上，到处去周转。在生活用品上，各单位如有积压，也都要清理出来。不准留好的、新的自用，把坏的、旧的送出来，而应该把坏的、旧他留给自己，把好的、新的交给国家商业机关，以便供应市场和出口。

清仓核资以后，再进行合理分配和处理。本单位有用的，可以留下自用，别的单位有用的，给别的单位；应该修理的修理，应该储备的储备，应该回炉的回炉，应该交国家商业机关的交国家商业机关。这样，也可以替各单位卸掉一些“包袱”。

关于清仓核资的工作，中央将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发下去。

第六，大家一起走“前门”，反对走“后门”，搞好市场供应，争取财政收支平衡。

我们要规定合理的制度，使大家都走“前门”，这样，就能够更有效地反对走“后门”。这是搞好当前市场供应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必须在计划内千方百计地安排城乡市场上最急需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生产。为这些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材料、燃料，要在计划内优先供应，以便逐步地把市场

稳定和活跃起来。

现在职工的实际工资降低了，我们要保证职工工资的百分之六七十，能够按照国家的价格得到最必需的生活消费品。除了必须按人口定量供应的商品以外，要有一部分商品实行按工资收入的比例分配。其办法，就是要使每个职工能够以占工资额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货币，到国家规定的商店，选购他们自己需要的商品。这样。就不至于把所有的商品都按人口平均分配了。这个办法。已经在太原、上海试点，据说反映还好，我们要总结经验，逐步推行。实行这个办法，要有一定的物资力量。今年的工资总额约二百二十四亿元，百分之五就是十多亿元，百分之十就是二十多亿元，拿出十亿到二十亿元的商品实行按工资收入的比例分配，是可能逐步办到的。

商业部门要恢复和规定一些规章制度，要恢复和加强专业公司的业务，统一组织有关物资、特别是三类物资[226]的供应，减少采购人员“满天飞”的现象，这样，就更有利于反对走“后门”的斗争。“满天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违法走私，投机倒把的；一种是因为缺少一点物资，国家不能供应，就到处去想法子采购。这两种情况要加以区别。如果我们国家商业机构的某些专业公司，能够经营这些物资的购销和转运的业务，后一种情况就可以逐步消除了。

要整顿商业机构和进行商业条例[227]的试点。

要恢复银行的现金管理制度，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管理。各级党政机构，企业、事业单位，任何负责人员，无权在制度规定以外动用银行现金。各级财经机构，要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平衡信贷的工作中，努力实现中央关于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的方针。

第七，坚决还账，努力承担国际义务。

尽管我们有这么多的困难，可是我们的志气不衰。我们欠债必还，国际义务必须承担。这十年以来，我们欠了七十六亿五千三百万元的外债，到去年为止，已经还了四十六亿元，还差三十多亿元未还。我们这件事情做得并不坏。外债分三笔账：第一笔账，是抗美援朝[41]的军事欠款，这笔数目最多：第二笔账，是经济建设中我们从苏联方面贷了一些款；第三笔账，是这几年进出口贸易做大了，我们出口不了那么多东西，欠了一些贸易款。这三笔账主要是欠苏联的，也有一小部分贸易款是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虽然一穷二白，但是人穷志不穷，账一定要还。这点账我们还得起，大概到一九六七年就可以还清。

国际义务必须承担。现在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一天比一天重起来了。除了政治上、道义上的支援以外，还有物质上的支援。我们现在已经订了条约，协定、合同的，有六十九亿多元。其中，援助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是朝鲜、越南、蒙古、阿尔巴尼亚，占百分之八十；援助民族主义国家的占百分之二十。到目前为止，已经用了三十七亿多元，还要用三十一亿多元。我们必须勇于承担国际义务，同时又要实事求是。勇于承担，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这是我们的志气，我们的义务；实事求是，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要说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后做，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我们什么都行了。同时，我们帮助他们，是要增强他们自力更生的力量，不是削弱他们自力更生的力量。

还账和援外这两项，都需要我们增加出口物资和设备。我们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在出口商品的收购和生产上，保证按量、按质、按时地完成国家规定的计划。

第八，建立新秩序，树立新风气。

这几年，我们的工作成绩很大，但是，有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搞乱了。我们要把搞乱了的秩序恢复起来，并且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秩序。打个譬喻来说，人民大会堂建立起来了，就必须有新的秩序，不能拿管理怀仁堂的秩序未管理这个大会堂。七千多人开会，我们中央办公厅就要做很多的组织工作。这个建筑是我们大跃进[194]的一个成绩。它规模大，能够开万人大会。建筑这个大会堂，锻炼了我们的技术力量。建筑人民大会堂用的原料、材料和设备，几乎都是国内生产的。电气设备、通风设备、扩音设备都是第一流的。建设速度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这就证明我们的技术力量确实提高了、跃进了。首都在国庆十周年搞十大建筑，是可以的，但是，决不能全国到处搞十大建筑，年年搞十大建筑。假使每一个省都搞，那得用多少力量？这是只许上行、不许下放的。可是，这几年全国各地非生产性的楼、堂、馆、所确实搞多了，中央一级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这种建筑，必须停止：这种风气，必须改变。

要建立新秩序，树立新风气，首先要根据民主集中制劝原则，在上下通气、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要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加强调查研究，贯彻群众路线。

今年要遵照毛主席的提议，做好工、农、商、学、兵、政、党七方面的工作。现在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规章制度，党政机关的工作，也要搞出一套规章制度来，以建立新的工作秩序。

要根据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底就提倡的三十二个字的领导原则办事。这三十二个字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228]。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就是说，党委要领导一切，要掌握大权，但不是把一切事务都包起来，如果那样，就会变成事务主义，大权就旁落了，真正的大政方针、政策、计划倒没有人管了。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任何人的独断专行。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就是说。党委决定以后，交给各方去办，然后党委再检查，不能代替包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就是说，办事不能违背中央的政策和党委的决定，但不是所有的小事都要向党委请示，都要书记点头，而自己可以不负责任。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就是说，党委要抓紧调查研究和督促检查的工作。这样，党委抓紧重大的事情，从事务中超脱出来，就能把工作领导得更好。

要反对“五风”[229]、“五多”[230]，特别是要反对生产上和工作上的瞎指挥。这几年，一些领导机关，出的点子太多，出的花样太多。我看，目前少出一些不成熟的点子，多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这对于整顿生产和工作的秩序是有好处的。

要提倡勤俭朴素，反对铺张浪费，压缩集团购买力。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要反对特殊化作风，恢复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树立新风气。

各单位办农场，搞农副业生产，决不能再挤农民的耕地。譬如，兰州、西安、洛阳、郑州、邯郸、保定铁路沿线，许多厂矿都大得很，厂里有很多空地，马路两旁有很多闲地，完全可以搞农副业生产，不应该再向公社要耕地。任何单位都不许化大公为小公，更不许化公为私。机关生产只能搞农副业生产，绝对不许搞商业投机。

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把方便让给人家，困难留给自己；要一

心一德，同甘共苦。毛主席在七大就语重心长地提出要大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几年，我们有些不够谦虚，也不那么谨慎，讲工作常常只讲成绩，不大讲缺点了。毛主席常说，连队里指导员作报告，总要讲形势、任务、成绩、缺点，这是历来的传统。我们要恢复党的好传统，恢复党的好作风。

抓紧以上的八项工作，做好这些工作，才能克服困难，实现以调整为中心的一九六二年的任务，也才能为实现十年奋斗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目前经济形势与国民经济计划调整

①

（一九六二年三月八日）

一目前的经济形势

讲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比如，农村工作，现在比过去懵懵懂懂的状况好得多了，农村人民公社有了六十条[224]，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204]，干部认识了缺点，吸取了教训，等等。在其他方面，也制定了具体的政策。现在，情况比较明，方法比较对，决心也就大了。所以说，总的形势是好的。

讲到经济形势，就应该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少奇同志说把困难估计足够，比估计不足要好得多，就是多说一点困难，也没有多大害处，要鼓励各种不同意见都说出来。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争论以后，由中央做决定，个人还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在行动上必须一致。

关于经济形势，讲下面六点。

（一）农业生产情况严重的不平衡。有好的，有坏的。也有中间的，差别很大。现在有十七个省、一亿人口的地区闹春荒，最困难的有五千万人，每人每天五两以下粮食。由于粮食层层包死，余缺不能调剂，加重了渡荒的困难。

口粮不够，不能不影响到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生产。今年计划棉花种植面积六千万亩，每亩产皮棉三十多斤，争取生产二千万担，收购一千六百万担。但是，如果不采取适当措施，口粮问题不解决，农民不愿种棉花，计划就无法实现。口粮不够，也影响到耕畜，有些地区不仅不能很快恢复，而且还有可能继续减少。口粮不够，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至于农具，铁制的搞好一点，可能恢复得快些；木制、竹制的则要恢复得慢些。

从各种情况看，农业的全部恢复，可能五年还不行。我们要争取快，但要准备慢。毛主席对工作的安排，向来都是对最坏的可能性作充分准备的。

（二）必须承认，工业生产力部分地遭到了破坏。这个问题，我同有些部门的同志有争论，一九六一年同煤炭工业部就争论过。有一位负责同志长时期不承认煤矿的生产能力部分遭到破坏，他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说，煤炭生产上不去，只是因为缺少坑木、设备和配件，比如，房子是好的，只是缺少桌椅板凳。我当时说，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这几年煤矿生产能力破坏得相当厉害，即使国家可以充分供应物资，“房子”也需要重新修补。这种情况，各部门都有。如鞍钢的生产能力，也遭到一定的破坏。瞎指挥，技术革命中的缺点、错误，都使工业生产力遭到一些破坏。

现在生产不配套，半成品大量积压，维修力量不够：计划上许多东西有缺口。

---

① 这是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中央早就决定不准搞计划外的基本建设，但是，有的地方还在“上马”，包括楼、堂、馆、所。现在做的不少事情，不是缩小矛盾，而是继续扩大矛盾。

还有，职工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体质差了，影响积极性。

企业和机关，一直到现在还是人浮于事。不少部门和企业，还撑着那么一个架子，不愿精简。

一九六〇年我还想怎么把大家的劲鼓起来，到了一九六一年，我了解到不是干部、职工松劲的问题，而是许多问题没有能解决。当时有人说要反对干部松劲，我就不同意。

（三）市场供应紧张，货币实际上贬值，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我们一定要制止物价上涨。但是，解决市场问题，根本改变现在的状况，不是短期能够办到的。

（四）财政收支、信贷、物资的平衡，也有很大问题。财政有赤字，信贷不平衡，多发了票子，挖了库存物资，算起来一共可能有三百亿元左右。

（五）国家、老百姓的底子都亏了，粮食已经没有多少库存。陈云[11]同志说，农民的底子不如开国初期。我看是这样。

（六）总的说来，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这是讲它的主要性质，而一般地仍可称它为调整时期。

二今年的计划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是我向中央提出的。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

怎样转？有八条。

（一）经济计划工作要从以工业、交通为重点，转到以农业、市场为重点。

（二）按照当前最急需的安排生产。比如，农业需要的中小农具、肥料，就要优先安排生产。

（三）工业要按短线安排生产，使生产的东西配套，再 不容许出半成品。

（四）从现在起就要搞综合平衡。国家计委要搞综合平衡，各个部门、各个地方都要搞综合平衡。

（五）按节约原则安排生产，把材料用于质量好、消耗低的企业。要讲究经济效果，讲究经济核算。

（六）要更加强调自力更生。一年多以来苏联就不给我们主要设备了，今后情况恐怕也还是这样。因为外汇不够，从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也只能进口粮食。

（七）国防工业要循序前进。

（八）基本建设规模还要缩，投资还要削。基建的安排不能扩大矛盾，而要缩小矛盾。一九六二年的投资（现金支出）必须控制在四十五亿元以内。

三工作步骤

属于全民所有制内部的问题，看准以后，就下决心，雷厉风行，赶快动手，采取紧急措施。如银行的集中统一管理；改变粮食层层包死的办法，实行下死上活的办法；冻结所有交际处的物资；等等。属于国家和人民之间的问题，如高价商品[214]等，更加要慎重，看准了、有了充分准备以后再动手，没有看准、没有准备好，宁可慢一些。

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任务

①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对国民经济工作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231]。这个方针，是在当前的条件下，具体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78]的方针，是一个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长远打算的积极的方针。它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主要的是，要适当地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相互关系，生产和基本建设的相互关系，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国防事业的相互关系，积累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以及财政、信贷和物资的相互关系。各个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的内部，也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在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了一个非常大的发展以后，进行全面调整是十分必要的。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在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一个中心环节。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下降的影响最大。没有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多年来的经验完全证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工业为主导，而以农业为基础。我国有广大的农业，农业现在的生产水乎又是很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的发展不能不受农业的限制，也就是说，工业的发展规模，绝不能超过农业提供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可能性，也绝不能挤掉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只有当农业生产提高以后，我国工业的发展才能得到更有利的条件。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进农业的生产条件，适当地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加强各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对农业的支援。这样，农业生产力就能够逐步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能够逐步地提高。所以，我们必须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196]。重工业必须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化学肥料、木材、燃料等等，来不断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农业施够为工业和城市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原料和其他农剧产品。轻工业必须尽可能力农村提供越来越多的日用品，以利于发展城乡交流，逐步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增加国家建设资金的积累。

一九五八年以后几年，重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这是大家感到高兴的事。但是，重工业内部各行各业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为了适当地发展轻工业，为了协调重工业内部各行各业的关系，我们必须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有些重工业部门的生产指标，必须大幅度地下降。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第一，如果继续采取过去那样高的速度发展重工业，势必妨害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妨害轻

---

① 这是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部分的第二节。

工业的发展，这不但对人民的生活不利，而且重工业本身也不可能继续高速度发展。第二，重工业内部的填平补齐，要花很大的力量，只有把那些过分突出部分的生产指标降下来，才能加强那些薄弱的部分。第三，某些产品产量的下降，是为了提高它的质量和增加它的品种。质量提高了，品种增加了，即使数量较少，也会得用得多。例如钢材，就是这样。第四，维修好国民经济各部门急需维修的设备，是目前的一项重要工作。而要维修好设备，也必须适当减少某些产品的生产，以便腾出一些材料和生产能力，生产必要的部件、配件和零件。所以，我们在一段时间内降低重工业的某些生产指标，正是为了使整个国民经济在长远时期内能够更好地前进，使现有的生产能力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这几年，我们施工的建设项目很多，有些已经建成和部分建成，有些已经停建，有些还在施工。即使那些已经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有许多还没有建立必要的协作关系，或者设备还不配套，或者还缺乏原料、材料，都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进行大量的工作，才能逐步地发挥作用。因此，现在一般地不应该再增加新的项目，而且，对还在施工的项目必须逐个地进行审查，坚决地停建一切应该停建的项目，推迟一切应该推迟的项目，以便集中力量，建成那些十分必要的重要项目，并且使那些已经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配起套来，逐步地发挥作用。今后几年内，我们都要根据这个方针来安排基本建设，这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农业、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调整，商业方面。财政金融方面，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也都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工作。

一九六〇年以来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行的情况，大体如下。

在农业方面，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我们除了在改进农村人民公社[198]的工作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以外，还采取了一些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有效措施。一九六一年，我们继续进行这些方面的工作，并且从城市动员了约一千万人下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最近几年从农村到城市来的，他们回去以后，加强了农业生产战线。由于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224]，由于实行以生产队[204]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农村的形势就开始好转。虽然由于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的夏收很差，但是全年的粮食产量比上一年要多一些。在许多地方，家禽、家畜的数量，目前正在逐渐上升。

工业的调整工作是从一九六一年开始的。我们在这一年较大幅度地减少了重工业的生产任务，缩小了基本建设规模。我们努力增加日用品的生产，恢复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共中央制订的国营工业企业和手工业的工作条例草案[232]，对于改进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对于改进手工业生产，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工业生产下降的情况已经基本停止，产量开始稳定，有的开始上升，不少产品的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增加。

这几年，我国职工人数增加了很多，就业面扩大了，使一部分家庭增加了收入。但是，职工人数和城市人口增加过多，工资总额增长过快，而农业和轻工业又减产很多。这样，商品供求之间就出现了差额，城乡供应都比较紧张，职工的实际工资有所下降，人民生活发生困难。

在商品不足的情况下，国营商业部门和有关部门做了不少的工作，加强了农副产品和工业日用品的收购；在灾区和非灾区之间组织了某些生活必需品的调剂；压缩了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学校、部队的集团购买力。

腾出了一部分商品供应市场；基本上保证了城镇居民最必需的粮食、蔬菜、食油、食盐、煤炭、日用品等的定量供应。定量供应城乡居民的商品，价格基本上是稳定的。

由于连续三年灾荒，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我们减少了粮食的征购数量。一九六一年我们从国际市场进口了五百万吨粮食。大家知道，全国解放以后，我国不仅不再进口粮食，而且每年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现在进口粮食，虽然一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状况必须尽快地努力加以改变。

一九六〇年冬天，各地方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这对于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农村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现在，各地方正在根据这一段时间的经验，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管理。一九六一年，许多地方又恢复了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

一九六一年，在城市中，国营商业除了平价供应的商品以外，开始出售糖果、糕点等少数几种高价商品[214]。这是在物资不足、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差额过大的情况下的一种临时性措施。

随着经济各部门调整工作的逐步展开，我们对教育、科学和其他文化事业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适当地降低了它们的发展指标。在科学研究、高等教育方面，由于试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规定草案[233]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234]，工作开始有了改进。

应该指出，我们对于调整工作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后，政府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在有些方面贯彻不力，调整不够全面，没有迅速地在应该后退的地方退够。没有迅速地在应该加强的地方足够地加强。现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工作的实践，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调整工作的必要性和应该采取的措施、步骤。

在一九六二年，我们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次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当然，这并不是说，全部调整工作今年就可以做好。我们应该在今后几年中，把调整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但是，今年的工作做好了，就能够为以后的调整工作打下可靠的基础，就有可能争取较快地完成调整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九六二年是调整国民经济的极关紧要的一年。

当一九六〇年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150]所规定的一九六二年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的时候，国家计划委员会即着手拟订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由于在一九六一年继续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且灾情更重，由于在调整工作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还有许多情况没有摸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所以，我们编制两年调整计划的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国务院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国务院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确定以后，把这个计划连同财政预算，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常委会审议批准。

这里要说一说当前调整工作的任务。这些任务，是在一九六二年要做的事，其中有些也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还要继续进行的。

为了做好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国务院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各行政部门的全体干部，加强调查研究，继续摸清情况，按照中共中央既定的方针、政策，在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特别要抓

紧完成增产节约、精兵简政、稳定市场、改善供应这几个方面的任务。具体说来，有下列十项。

第一，争取农业增产，首先是争取粮食、棉花、油料的增产。

一九六一年，我国农业生产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但是，好转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是很不平衡的。有一部分地区生产上升，大部分地区生产已经稳定下来，还有一部分灾情特别严重的地区，生产情况仍然不好。从现在的条件看，全国大多数地区要恢复到原来最高的生产水平，还需要作艰巨的努力。我们应该用一切可能的力量，争取一九六二年有一个比较好的收成。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首先必须增产粮食。有了粮食，才能比较迅速地恢复经济作物的生产，才能保护和增殖耕畜，发展家畜和家禽。在努力增产粮食的同时，要适当安排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保证它们逐年有所增产，以便逐步增加城乡人民的布匹、食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合理安排种植面积和人力、畜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各级政府和农村人民公社，在安排的时候，要很好地同生产队商量。

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203]和生产队，要继续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更好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把一切可以利用的零星小块的土地尽量利用起来，力争多种多收。要抓紧水利、积肥、选种、修补中小农具、田间管理和防治病虫害等工作，尽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要切实保护好耕畜，做好牲畜的配种繁殖和兽疫的防治工作。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都要正确地领导生产，在推行各种增产措施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吸取群众的经验。

国营农场必须加强管理工作，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牧业产品的商品率，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应该注意保护林木，努力植树造林。应该努力发展畜牧业和渔业。

各级政府应该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对于农业所急需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制造和维修中小型农具、车、船的材料，制造化肥、农药的原料、要尽可能优先保证供应。

各级政府在安排农产品征购任务的时候，要同时安排好群众的生活。

第二，合理安排轻重工业生产，尽一切可能多增产日用品。

为了适当满足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扩大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改善市场供应的状况，我们在安排工业生产的时候，应该首先注意安排日用品的生产。轻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当然要努力增产日用品；重工业部门，凡是有条件的，也应该尽可能地增产适合市场需要的日用品。

由于农产品原料不足，在日用品的生产中，应该尽可能利用重工业部门生产的原料、材料。有些轻工业和重工业都需要的原料、材料，在分配的时候，应该先照顾轻工业的需要。轻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应该使那些原料、材料消耗低而产品质量高、品种多的企业，能够优先得到供应。

一切轻工业企业和手工业单位，一切重工业企业，都要厉行节约，争取用较少的原料、材料，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对于一切可以利用的废气、废物，应该注意回收，充分利用。

重工业部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增产更多的化肥和农药，增产更多的中小型农具和适合需要的、质量更好的农业机械。同时，还应该为轻工业多提供原料、材料。重工业部门应该努力增产目前特别感到不足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并且要根据国民经济各部门设备维修和配

套的需要，有计划地安排急需的备品、配件、零件和必要的辅机、主机的生产。

重工业各部门应该根据上述任务和可能条件，进行调整工作。对于那些不是当前急需、原料材料供应不足的产品，应该降低它们的生产指标，并且对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进行必要的裁并。对于那些当前各方面急需、而又供应不足的产品，应该努力增产。对于煤炭、木材等，为了保证它们能够在一定水平上持续生产，应该妥善安排它们所必需的材料、设备和投资。重工业各部门在调整工作中，都必须注意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成龙配套。

工业部门对于国防建设所必需的材料和设备，要注意组织生产。

一九六二年工业方面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切实按照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一切工业企业，都要加强责任制，加强技术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加强劳动保护，在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这几个方面，做出显著的成绩。

交通运输部门，应该进一步整顿好运输秩序，并且切实安排好短途运输。对于车、船和铁路、公路、航路，要做好维护的工作。

第三，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目前基本建设战线仍然过长的情况，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是不利的，我们计划再减少一些不是十分必需的基本建设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腾出一定数量的材料、设备和人力，用到最急需的方面，特别是农业生产方面，而且可以集中力量，使那些最重要的建设项目，能够建成投入生产，发挥作用。

鉴于过去对基本建设项目和投资的管理不严而造成战线过长的教训，今后，一切基本建设项目和投资，都要列入国家计划。基本建设项目，都要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逐项地分级地审查、批准；没有经过审查、批准的，一律不准动工。列入国家计划的项目，各部门、各地方也要根据设备制造情况、需要的缓急和施工技术力量，进行排队，依序完成，并且保证质量。

过去两年中，我们已经停建了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今

年又将停建一些项目。建设项目中途停建，是会造成一些损失的，但是，如果应该停建的还不停下来，就势必分散力量，使许多重要的工程不能迅速发挥投资效果，就会造成经济上更大的损失。当然，对于那些中途停建的项目，必须切实做好维护工作，避免损失。一切停建项目的设备和材料，必须由国家统一调剂使用。

第四，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

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这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的城镇人口仍然过多，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养现有的城镇人口还有困难。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低以后，现有的职工人数也还显得过多。我们的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仍然存在着机构庞大、人浮干事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计划在一九六二年继续压缩城镇人口和精简职工。

动员城镇的人口和职工，首先是动员从农村来的职工，回到农村参加生产，不仅可以加强农业生产战线，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机关的工作效率，而且可以减轻城市供应的困难，节省国家的开支。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应该做好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城镇乡村密切配合，妥善安置精简下来的人员。我们希望到农村去的职工，在农业生产和建设的光荣岗位上，为国家做出新

的贡献。

现在有些企业、有些部门的负责人，还没有从全局利益出发，下最大的决心精简职工。他们总想把一些以后可能有用的人力都保留下来。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当然，企业在精简职工的时候，要注意保留必要的技术骨干，但是，有些技术工人，如果目前没有适当的工作，也应该动员他们回到农村去，农村很需要他们。将来企业单位技术力量不足的时候，还可以把他们调回来参加工业生产。

在城镇和人口密度大的农村，要认真地提倡节制生育。

第五，彻底清理仓库，重新核定资金。

目前物资不足，给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但是，许多地方、部门、企业、事业单位中还积压着大量的属于全民所有制的物资，不能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国务院已经决定，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清理仓库、调剂物资的工作。所有、的企业、事业、机关、学校、部队各单位的仓库，都要进行一次彻底清理。清查出来的物资，由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定，分别处理。企业的流动资金，将根据新的情况、由国家财政机关重新核定、多余的资金，一律收归国库。这样，就可以使积压的物资和资金活动起来，用在当前调整工作最必需的方面。根据初步统计，仅积压的钢材一项，至少有一百多万吨。这些积压的物资，只要我们统一调剂使用，就会逐步地发挥作用。

第六，改善市场的供应状况。

各级商业部门和商业企业，在稳定市场方面担负着艰巨的任务。在一九六二年，必须切实做好商品的收购工作和供应工作，扩大城乡物资交流，使市场供应的状况有所改善。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对于农副产品和三类物资[226]的收购，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恰当地规定购留比例，并且努力改进收购办法。国营商业对于日用工业品，要及时地进行收购，按照国家的规定统一调度。国营商业对于一部分日用工业品，合作社商业对于一部分手工业品，可以采取加工、定货的办法，增加货源。

在商品不足的情况下，合理地分配商品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国营商业部门要尽可能多地组织切合农村需要的工业品下乡，凡是农村急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应该优先供应农村，以适当满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并且多换回一些农副产品，供应城市居民的需要。在城市中，要改善商品的供应办法。为了尽可能挤出更多的商品供应市场，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学校、部队要进一步节约行政开支和事业费用，压缩集团购买力。

为了适应工业生产多方面的需要，改变某些企业之间以物易物和采购人员过多的现象，国务院确定恢复和加强一些专业公司的业务，统一组织有关物资、特别是三类物资的供应。

一切国营商店、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合作商店，都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切切实实地为城乡人民的生活服务，为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服务。所有的商品，都要按照正常的商业途径出售，彻底纠正和防止开“后门”的现象。

国营商业应该切实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加强对整个市场的领导，使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城市中的消费合作：社和合作商店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国营商业今年要把一部分人员，包括原来的小商小贩，转到合作商店；对于他们要加以妥善安排。

商业部门和税收机关必须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管理，并且同投机倒把现象作斗争。

第七，保证完成对外贸易任务，偿还外债，努力承担国际义务。

建国以后，苏联给予我们的贷款，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部分贷款，我们已经偿还了大部分，还有一小部分没有偿还。最近几年，我们在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中，对他们又有一部分欠款。所有这些外债，我们将争取在几年内逐步还完。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发展同各兄弟国家的互助合作。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要根据可能的条件，给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以援助，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国际义务。事实上，并不光是我们援助他们，他们也援助了我们。我们对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援助，现在还不是很多，但是，这种援助，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他们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这就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支持。

为了有计划地偿还外债，承担必须承担和可能承担的国际义务，为了换取我国所需要的进口物资，尽管国内工农业产品不足，我们还是应该挤出一些来出口。各地方、各有关部门，都必须努力按质、按量、按时地完成国家规定的出口商品的生产任务和收购任务。

第八，提高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工作的质量。

为了使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这些部门，也应该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且以调整为中心，来安排自己的工作。

一九六二年，各级学校都要努力提高教学的质量。全国的高等学校，凡是具备条件的，都应该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科学研究部门，应该适当调整现有的机构和研究人员，充实重点的科学研究单位，并且加强各个科学研究单位之间的协作。

卫生事业方面，要切实改进医疗工作，加强疾病的预防，增产中西药品，增加城乡药品的供应。

文艺、新闻、出版、广播、体育等事业，也都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提高质量，更好地为国家建设和为人民服务。

第九，节约支出，增加收入，加强现金管理，保证财政收支平衡。

保证财政收支和信贷的平衡，是政府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所有的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都要改进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加强财务管理，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努力降低商品流通费用，尽可能增加收入，减少支出。

现金管理不严的情况，应该彻底改变。一切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都要严格遵守国家的现金管理制度、信贷管理制度和财政管理制度。企业从银行借的款，应该按期归还。企业的流动资金，只能用于生产周转和商品流通的需要，不能用于基本建设、弥补亏损和其他财政性开支。一些企业的亏损现象，应该迅速改变。财政金融部门应该加强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财政监督。

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事业单位，各机关、团体，都应该继续坚决

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反对铺张浪费，努力节约开支。

第十，进一步改进计划工作。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国务院责成政府的各级计划机关，把主要的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和市场方面来，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和调整的具体任务，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计划机关在拟订国家计划的过程中，应该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根据准确的资料，集中各部门、各地方的初步计划，精打细算，不留缺口，做好综合平衡，力求使国家计划指标符合实际，并且适当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

我们的计划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意见，吸取各方面的专家、科学家们的意见。

各部门、各地方，都应该及时地如实地提供情况和统计数字，提出关键性的问题，拟订有可靠根据的计划草案，帮助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切实可行的国家计划。在国家计划确定以后，都要严格执行，保证实现，不得随意改变。对于计划的执行情况，要严格检查。

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目前，我国国民经济还有相当大的困难，人民吃的东西、穿的东西、用的东西，都还不足。这种情况，需要一个时间的艰苦努力，才能够根本改变。在实现调整任务的过程中，我们还可能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新的困难。对于这些，都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但是，困难从来没有吓倒过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我们有着战胜困难的许多有利条件。这些条件主要的是：

第一，我们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巩固的工农联盟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全国各族人民同党和政府密切合作，这是战胜困难的最大的保证。

第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已经进一步发展和完备起来，这对于促进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有重大的意义。

第三，在过去几年的伟大实践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取得的丰富的经验，包括许多正面的经验和一些反面的经验，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地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把工作做得更好。

第四，农业生产正在逐渐上升，农村形势正在开始好转，这对于克服目前的困难，对于活跃整个国民经济，对于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都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这几年扩大了的工业生产能力，新增加的农田水利建设，正在逐步地越来越大地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克服困难的重要的物质条件。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地运用这些有利条件，善于依靠群众，同群众商量办事，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战胜我们面前的困难，胜利地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

认清形势，掌握主动

①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

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235]的报告中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他说，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但目前还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对于这一点，我在那次会上作了分析。现在看来，总的情况还是那样。但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为什么说我们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从总的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呢？

在政治上，全党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党外人士的绝大部分，高举三面红旗[236]，取得了成绩，经历了困难。经过这次考验，大家是团结的，这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同时，这几年对各项具体政策，我们也

在逐步补充和完备。

在经济方面，我们开始高举三面红旗前进的时候，对于新的事物缺乏经验，在执行中犯了很多错误，有很多缺点，而且有很多是原则性的、很严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正面反面初步总结了经验，逐步地认识和掌握了新情况下的发展规律，不像过去那样惜里惜懂了。从这一点说，我们比过去也清楚了一些。

现在，农村中连续三年灾荒造成的困难正在克服中，农业生产下降的趋势，除部分地区还在继续外，大多数地方已经停止并开始回升。这四年，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指标本身就没有综合平衡，结果一面是跃进，一面又被迫地大调整，被迫地后退。年终的产量跟年初的计划数字差得很大。工业问题，可以说是在逐渐认清形势，逐步掌握主动。现在，我们主动地调整指标，大家在数字上基本没有争论了。前几年如果提出今年这样的调整指标，是不可设想的。这就说明，现在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了。

所以，从总的方面说，不论政治形势或经济形势，最困难的时期的确是度过了。如果现在还是懵里懵懂，后果还要严重。当然，现在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但我们总是能够预见发展趋势了。

为什么说目前情况还很严重呢？因为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只能逐步解决。经济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同志说要越做越细，而我们在这个时期恰恰是越做越粗，过去几年甚至可以说是越做越乱。工作上造成这样的后果，影响就比较长远，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灾荒的后果也是严重的，虽然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但是受灾面积这样大，影响这样深，也不是一时能够扭转过来的。

有些地区和部门的情况还很严重。部分地区工作中的错误还没有纠正过来，或者灾荒还很严重。工业、基建部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还继续存在，并影响到其他部门，现在在调整中就看出来了。当然，这些地区和部门绝大多数也在纠正中，只有个别的还没有纠正。

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要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

① 这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第一部分的节录。

首先是情况明。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调查研究的时候特别强调的。目前我们对困难的情况是不是看得够了？我想要有分析。困难的发展趋势我们是看出来了。前年经济调整的时候，觉得很快就可以调整过来了，去年也还是这样想。今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在西楼开会[237]。，陈云[11]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不仅农业要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因为不仅农业生产力被破坏了，工业也是这样，有些生产设备被破坏了，部分的生产秩序弄乱了，规章制度也不存在了，都要重新恢复起来。教育方面也有这个问题。现在看，这个调整时期要相当长。一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163]时 483 期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于还不够。把这个时期看得长一些，现在大家争论不大了，看法比较一致了。

是不是我们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弄清了呢？还不能这样说。趋势是看清了，调整的时期会长一些也看清了，但是具体情况常常是由极复杂的因素形成的，往往是现象发生了我们才看到。这类事情很多。例如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上游清水灌溉，盐碱就不能统统洗刷掉。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既要防洪，又要灌溉，又要发电，又要运输，综合利用。修三门峡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现在不能发电，泥沙又淤塞，还要大调整。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们不能认为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估计够了。每个部门，每个地区，大家都要警惕这一点。

少奇同志说，把困难说多一点有什么坏处呢？领导上把困难指出来，然后找出办法来克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懵里懵懂，怕说困难，一听说困难就泄气，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就是要认识困难，摆出困难，提出办法，克服困难。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革命战争是这样，社会主义改造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是这样。不管哪一个问题，都是千头万绪。姚依林[238]同志讲了物价政策，他是经过一番研究的，但那只是一个设想。情况复杂得很，还会出现购买力超过商品供应量、财政赤字、货币难以回笼等情况。教育、政法方面，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宁可承认对困难估计得还不大够，多看一看，这不仅不会使我们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反而会使我们团结起来，依靠群众，克服困难。

这两年的调整中，我们觉得，我们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好一点，好得快一点。我个人经手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不是如此。你说我愿意慢一点呀？总还想快一点的。当年搞钢铁，别的让路，也是我在那里督战的，结果把大家搞垮了，现在回过头来，钢铁只好让路。这还不是自己的错误？当然，有外在的因素，但外在的因素不能成为借口，还是我们不冷静。钢的产量要求达到一千八百万吨，现在退到六百万吨。你总不能说那个一千八百万吨是对的。问题不在于后悔不后悔。不怨天，不尤人，主要是要得到经验教训。我们主观上想快一点，是好心肠，争取快，但是要准备慢。毛泽东同志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经验还不够，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要有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领导的意见接近一致了，但这还不行，还要把我们的意见传达到广大的干部中去，并且适当地向群众说清楚。当然，领导是起决定作用的，

可是要把领导的 485 意见变为群众的行动，说服群众和我们一道去做，那就需要做艰苦的工作，要经过群众的体验。现在省一级同志的意见大概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地委就差一点，县、社[198]、队[239]，厂矿、各种事业单位就更差。这不能怪下面，还是七千人大会上说的，责任首先在中央，因为许多错误的东西是我们发起和创议的。当然，有的是他们做过了头，做走了样子，但这样做也是上面逼的。所以，上下认识的接近，需要一个过程，必须做艰苦的工作，不能希望很快。调整的具体工作要有步骤，要通气。党内的七千干部通了气，通过人大、政协，也跟党外人士初步通了气，但是还没有全部通气。要全部通气，也需要有个过程。

其次是决心大。现在我们决心大不大？我想，基本上是大的。当然，去年已经是下大决心了，一千多万人下乡，八百七十多万职工精简下来，这是一个大决心。但是去年我们还不能设想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去年没有出大乱子，今年会做得更好一些。原来不敢下那么大决心，觉得去年下了那么多人，今年再下那么多人，不大可能。我对这个问题，一方面主张多下人，可是如何下法，要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最初决定下七百万城市人口，其中包括五百万职工。后来许多地方要求一步走，就提出一千三百万城市人口下乡，其中包括九百多万职工。现在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下了更大的决心，就是下乡职工超过一千万人，下乡城市人口相应地可能争取超过二千万人。这个决心，的确也是逐步酝酿出来的，去年不可能，前年更不可能。现在下这个决心，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它在新的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这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族的决心，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的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再次是办法对。办法现在只能有那么多，更多的办法还要依靠群众创造。革命战争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大家来想办法，一定有出路。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不要怕把话说多了，不要怕我们的干部知道。你把问题说清楚了，他们的办法会比我们还多。你不说清楚，他们不晓得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而互相猜疑，议论纷纷。我们现在把决心传达到下面去，就可以找出办法来，经过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能在初步调整的基础上前进。时机紧迫，不应该犹豫了。可是另一方面，今天的情况又是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于，我们应该有准备。一方面是力争不出乱子，另一方面也要有准备，万一出了乱于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只要把情况跟干部、群众讲清楚，大乱子可以克服，可是办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

在目前形势下，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毛泽东同志在《论 487 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的农业基础没有办法负担这样规模的工业。工业本身也不平衡，没有办法继续均衡生产，也没有办法支援农业、支援市场，兼顾国防，比例的失调极其严重。城乡比例也失调。现在我们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劳力、畜力、地力、水利、肥料、种于、农具、运输工具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或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的恢复要有一个相当的时间。拿粮食来说，总要三五年，少的三年，多的五年，有一部分地区也许要超过五年。至于农业的全面恢复，包括经济作物，农、林、牧、副、渔，那要超过五年。所以，我们首先就应该抓住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这个关键来调整。调整不是今年一年就可以就绪的。工业

也存在这个情况，工业和基本建设三年调整，就必然影响以后的三年。因为基本建设三年踏步，重点又放在支援农业上，那么，工业的后备力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比如煤炭、木材、有色金属、化工材料的增长都不会很大，这就必然影响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我们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指标，还是尽量压下来的，但是现在看来，那些指标还高了。一九六七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煤三亿五千万吨，看来都达不到。粮食产量一九六七年能不能达到三千七百亿斤，还要看两年。棉花产量一九六七年显然到不了三千七百万担。现在我们应该更冷静地看问题。我们对新的发展，总的规模，还没有完全摸清楚，要承认自己不行。

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目前的中心工作，还是我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四句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

要增产，首先农业要增产，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不把农业这个基础恢复起来，现在这个工业基础也站不住，城市就是减了二千万人口也站不住。这个经济形势，大家看得很清楚。

抓粮食要抓两头，一头是商品粮食基地，一头是灾区。还要认真抓棉花。棉花产量不能再减了，每年总要增产才好。每人每年供应三尺布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了。棉花生产的恢复比粮食还要慢。除国家注意棉花集中产区以外，地方上还可以提倡在自留地上种点棉花。自留地种的棉花不要收购。返销农村的粮食，首先要照顾棉农。

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现在工业的秩序是乱的，有些产品的指标很高，很不平衡，这种情况是难以为继的。我们的方针是按照短线平衡，不留缺口，并且留有余地。这个方针不可能一步实现，但是必须坚持，要逐步实现。至于缺门，那是任何一 489 个国家都有的，任何国家都有些缺门短线，都要互通有无，这是另外二个问题。当然，万一世界各国都封锁我们，那我们就要搞一部分代用品，有些就要停止生产。直到现在，合金钢材、橡胶我们还是缺门，靠进口。我们国内能够生产成套设备的，就不要只生产出主机，没有副机，不配套，积压起来。到去年年底，设备积压接近一百亿元，这是一个最大的浪费。

我们现在调整工业的政策是采取关厂、并厂、缩小规模、改变任务、转业这样五个办法。全国六万多个工业企业，可能失掉一半以上。这好像是消极的，实际上，这样就可以把原材料、电力、煤炭集中到消耗少、质量好、品种多、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的工厂去使用。从全国来看，一个时候产量会低一些，但最后会使工业品的数量多起来，质量好起来，有一部分还可以增加出口。当然。这要经过调整，要有一个过程。

我们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缩短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战线，相应地缩短其他方面的战线，精兵简政，减少城市人口，减少职工，达到增加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目的，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针，是一个经过调整、改组，然后前进的方针。

关于国防军工主产的几个问题

①

（一九六二年六月八日）

在这个地方想就军工生产说几个问题。

一、在这次动员中，要注意把过去的工作和经验教训总结一下，不要多，有几句话就行了。孟子说：“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240]就是要总结经验嘛！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战胜困难。军工生产过去十多年来，是有成绩的，成绩是主要的。抗美援朝[41]取得了胜利，打败了世界上最强的敌人，使朝鲜可以和平建设。两年半的抗美援朝，东北的军工发挥了作用嘛！我们自己进行军工建设，也是付出了心血的。加上苏联的帮助，打下了常规武器生产的基础。在全国工业化的基础上，初步打下了国防工业的基础，因此，今天一动员就能生产。这不仅增强了我们自己的国防力量，还支援了越南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斗争及其他许多民族独立国家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做到了我们能够做到的一切，在这方面，我们是无所愧色的。当然，有的地方做过了一点，过了也不好。自己力量不行，不能做的，答应了人家，不妥当，使人家产生幻想；或者把质量不好的给了人家，这就是不对了。总之，成绩是主要的。这个成绩同八十万职工的努力劳动是分不开的，当然也包括各级领导和其他各个行业的协作、支援在内，国防工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老工人的贡献也很大。但是，军工战线的缺点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一样，也是不少的。有缺点，就应当承认、克服、纠正。有的说得过了的，也要注意。每个企业或多或少都有缺点，只要改正就是了。总之，总结经验要肯定成绩，克服缺点。

二、国防工业的基础打下了，但还是弱的。如果认为很强，就会造成错觉。要把基础巩固起来，发展起来。要搞得很完整。这几年搞尖端，注意多了一些，常规武器减弱了，影响了库存。一旦有事，就要加紧生产，生产上过去放松了。生产还不能完全配套，不能说全不配套，有配套的，而是不完全配套。要很好组织各方面配套，还有冶金、化工、石油、一机部等部门的协作在内。布局也不够合理，不单是国防工业，其他部门也有这个问题。这有客观的、历史的原因，也同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基础有关，有许多是在半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在旧的基础上搞起来，必然有这个问题。布局合理也不是一下子能做到的。要逐步使之合理。不完整、生产不完全配套、布局不够合理，这几条要引起我们的注意，重点要抓这些。基础强起来，武器多了，就可以增加库存，配套也可以更好一点，布局合理性可以增加一些。有些民用工厂也可以改为军用工厂，如动员搞手榴弹，就是这样。一机部有些工厂可以改过来或部分改过来，转为大规模的军民结合。

三、自力更生，逐步实现。我们是大国，整个国民经济都要自力更生，这有战略意义，永远如此。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革命要靠自己，建设也要靠自己。但自力更生不能设想一下子什么都行。仗要一个二个地打，自力更生的实现要一个一个表现出来。想一下什么都行，这是没有分析的空想，是错误的。有些武器搞出来了，过不了技术关，也不能用，反而造成错觉。我们

---

① 这是在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这几年有了经验，懂得了自力更生要逐步实现，逐步提高。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技术水平也低得很，要同盟国家的帮助，生产上有许多短线。当然，现在既不是三十年代，也不是四十年代，接近七十年代了，是原子、电子时代，技术水平提高很快，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没有的。原子、电子时代，改变了很多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能是逐步实现，逐步提高，不可能一步攀登高峰，要有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的战略方针，无论革命和建设都要自力更生，但中间要有个过程。

四、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要有步骤和秩序。登珠穆朗玛峰，也要分几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上去。不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困难克服，怎么能上去呢？总不能飞上去，飞上去和从陆地上上去是两个性质的事情。过去几年，把生产和研究工作及发明创造的次序颠倒过来了，想一步登天，这是不行的。当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人民，处在这样的时代，是可以快一点的，也应当快一点；应当有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志向，分阶段地、一步一步地登，总是可以上去的，中间也会有小的跳跃。这几年的经验给我们的启发很深刻。

五、军工，首先要着重生产。生产和基建，生产是基础。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加基本建设，要逐步地把生产基础扩大。不能把生产停下来都搞基本建设。过去设想从国外全部进口设备，就是斯大林时代，也不可能这样。就是国外援助，也要逐步地改变设备分交的比例，提高国内供应的部分。不然，战线拉长，建设的厂子不配套，“瘌痢头”，也不行。这是生产和建设的关系。常规和尖端的关系也是一样，常规是尖端的基础，尖端的基础是常规，逐步升到尖端，也是循序而进。首先要把常规搞得象个样子嘛！飞机也是从米格十五、十六、十九发展到二十一，也是循序而进，一步一步前进。导弹也是先能发射，把运载工具搞出来，然后再搞弹头，从近到远。因此，生产是基础，常规也是基础。基础打不好，尖端也上不去，工作就是不到家。现在的常规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常规了，尖端主要是指原子、电子、导弹、超音速飞机等，其他都是常规，是现代技术水平上的常规。生产上有缺门、不完全配套，应当在现有基础上逐步补缺门。所谓科研以尖端为主，是指那些专门的科研部门；生产部门的科研机构，当然要以常规为主，要有适当分工。这个经验还在总结，不是一柄句话能讲清楚的，生产上的技术标准也要很快定下来。

六、军工生产要加强领导力量，统一思想认识。集中在备战的前提下，统上步骤，一致行动起来。各部门要协作，共同努力完成生产任务。第一批的生产任务已经下达，要努力完成，还要布置第二步的任务，也还要从更大的方面设想，要准备有更大范围的布置。既然开动了马力，就要把第一、第二步连接起来，准备在今后十年中，把常规武器搞充足起来。不管敌人打什么仗，都二定要把敌人埋葬在我国国上上。在这个基础上，也不能放松尖端的探索、试制。

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进一步提高好调

①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一日）

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调整。调整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今年调整的效果是明显的：粮食减少了进口，增加了库存；精减职工一千八百多万人，还有二百到三百万人要精减，基本上完成了精减任务，精减工作已告一段落，今后是进行个别扫尾；城市居民下乡两千万人左右，农村得到一千三百万劳动力，减少粮食销售量二百零八亿斤；工资总额减少了，集团购买力减少了，回笼货币三分之一；基本建设项目减少了，去年有一千三百多个项目，今年减少到六百五十多个项目；生产战线也缩短了，中央直属的企业去年有六万二千多个，现在减少到四万多个；市场供应开始有了好转，浮肿病的情况好了一些。在这次调整中，要不是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要不是有全国人民一致的拥护，是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的。

当前，我门还要进一步调整。在这方面，我讲十项任务。

第一，掌握“工业七十条”[223]的规定，整顿企业。企业的一切工作都要贯彻执行“工业七十条”。

第二，继续精兵简政。煤矿减的人不多，有的地方还需要增加一些人，但总的来说还要精减。许多单位行政人员的比例过大，要精减。这些人精减下来没有地方安置，特别是老、弱、残不好安置。我们宁肯把这些人员放在编外养起来，也要减。不然人多了，兵既不精，政又不简，碍手碍脚。兵一定要精，下井的工人要一个顶一个，要选精干的，这样，效率才能提高，人均日产煤，过去的效率是一吨，现在只有六百二十公斤；行政人员也要精干，行政人员的比例小了，生产人员多了，得用了，效率就可以提高。不要以为精简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就没有多少事可做了，每一个矿总有需要精简的方面。当然，也不需要用很多人去做这件工作，但要有一些人去做。

第三，扭转亏损。过去架子大、规模大、人多以及材料供应不足、生产下降，必然发生亏损。这是过去几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所造成的后果。工商企业今年共亏损约九十几亿元，工业约占三十二亿元，其中煤矿约占六亿元。过去煤矿有上缴利润，今年上缴利润一亿元，亏损六亿元，净亏五亿元，商业部卖煤再亏损二亿元，共七亿元。扭转亏损是明年的重要任务之一，大家要拿出大跃进[194]的劲头、精简的劲头来扭转亏损。

第四，重视安全措施。煤矿生产中有隐患，必须引起重视，要预防。鹤壁矿务局今年发生两次重大事故，据说市委和矿务局党委是合在一起的，市委的负责同志顾了市里的工作，顾不上矿上的工作，没有时间下井。这体情况，无论如何要改变，市委积矿区党委要分开。如果市很小，就成立矿区党委，附设一个市的行政机构。河南平顶山、东北的煤矿也要这样办。

第五，注意维修配套。维修配套工作还要继续加强，机械化水平要继续提高，不能靠人海战术。有些小煤窑用人工开采是允许的，但大矿必须从半机械化走向机械化。对坑木要注意节约代用。今年国家给煤矿的坑木是四百八十万立方米，明年是四百六十万立方米。一方面，林业部门要按质、按量、

---

① 这是在全国重点煤矿干部会议上所作报告的第三部分。

按时供应；另一方面，煤炭部门要尽量节约，使用钢筋水泥支架等代用品，回收的坑木要继续组织复用。生产同等数量的煤炭，坑木的消耗要尽量减少。节约、代用的数量要一个矿一个矿地计算，要实事求是。

第六，重视品种质量。洗煤的灰分和煤炭的含矸率要减少。要供应给冶金、化工部门好煤，出口好煤，多生产块煤。

第七，提高工程质量。我们要继续搞基本建设。维持简单再生产，也要进行开拓延深。新井质量和开拓延深工程的质量要提高。过去搞了一些基本建设，由于质量不好，报废了，这种情况必须纠正。提高了质量，就可以建设得快一些。

第八，开展技术革新，过去，“二十二项命令”[241]有不适当的地方，但是不能因此就不敢再提技术革新了，我们还要继续开展技术革新。但是，新技术、新经验的推广要经过试验。试验成功了，就在这个矿区内推广；在这个矿区里证明可行了，再在第二个矿区内试验，逐步地推广。

第九，调整工资福利和改善工人生活。这几年农业歉收，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国家对煤矿工人有一些照顾，但供应的情况还差。今年精减以后，人少了，口粮、工资就好调整一些，劳动保护用品也要解决，打算在明年二三季开始调整。

第十，加强经营管理。从主管部门到矿务局、矿，都要加强经营管理，最主要的是矿务局，对经营管理有直接的责任。企业要有会计核算制度和品种、质量检查制度，要算帐，要有上缴利润，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

上面说的这些，总起来一句话，是为了增产节约，为了贯彻执行“工业七十条”和进一步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231]。这些工作要用增产节约这条红线贯穿起来。

要重视技术力量

[①]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技术力量在建设中对技术革新、技术革命都起很大作用。这不仅因为过去我们落后，而且因为时代不同，任务也不同了。现在不是苏联十月革命的时候，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而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了。在几千年封建社会里，技术上没有什么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时期技术变化较大。如果说过去是十年一变化，那么现在可能是五年、三年一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六年中，原子、电子、超音速等，其发展速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比过去一个世纪还快，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要赶上去，就要做艰巨的工作。这就需要重视科学、重视实践和重视技术人才。敢想、敢说、敢于，是指我们要有这种创造精神，但是我们也要有科学的根据，这就需要知识。不尊重科学，就会瞎指挥。

要重视科学，重视知识，重视实践。马列主义就是从社会实践中进行科学分析得来的。我们讲重视科学、重视知识、重视实践，是说每个人不可能懂得所有的事情，因此要尊重科学人才，请他们办某些专门的事情。这次冶金部开会，就请了许多专家来，来开会的大约一半是求学。水利会议请了专家没有？水产方面呢？我们是重视技术人才的，但重视得不够，时冷时热。这几年工作忙起来，把专家放在一边了，这是我们领导上的责任。也有合作得比较好的，水电部合作得就比较好。对此，我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解释过了。我们是重视技术人才的，如果大学毕业生就算高级知识分子，解放前大学毕业生不过二十万人，留在大陆的约十几万人，解放以后大学毕业生九十六万人，大多数是新社会教育出来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愿意接受党的领导的，愿意以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特别是搞自然科学的知识分于是愿意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的，同时，也是愿意进步、愿意进行自我改造的，他们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这就要求各级党委与专家合作。当然，还有少数人不接受党的领导，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少数是右派。

知识分子终归有自己的毛病，都有些尾巴，不要隐讳。我有没有呢？也有。我在广州会议上就说过，我是“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242]我自己是个革命知识分子，但要把自己的来历讲清楚。我原籍绍兴，就是戏曲中绍兴师爷的那个绍兴，他们长着红鼻子，也是丑得很！家在淮安，因我生在淮安，现在淮安还有一幢房子，当地还让人去参观，这是个负担。我提过几次意见，最好县里收了去。在座有没有淮安县委的同志，请你最好收了去。既然原籍绍兴，家住淮安，跨了两个省，所以是江浙人也。为什么要交代？就是来自哪里，要讲清楚，不要怕。“猴予变人”，几万万年了，尾巴没有了，还留着块骨头，坐起来还不那么舒服。我们要知道改造是长期的，不要怕，要欢迎。一方面要团结，一方面要自己努力。共产党员到死还要改

[①] 这是在冶金、水利、水产、华侨农场，手工业、共青团中央、华北山区工作等七个专业工作会议上讲话第二部分中的第六个问题。

造。在座的有许多领导同志，要好好团结知识分子。人有点知识，就会不自觉地骄傲起来你们不要怕他们骄傲。

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①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我对自然科学是外行。这次来到上海，碰到各位正在讨论制定十年科学规划[243]，借这个机会我谈谈下面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

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前两点是指要有科学的态度。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整风[24]时就提出了实事求是，这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我国是一个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仅要实事求是，循序前进，还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当然不会一点弯路不走，但总可以少走弯路。我们应该迎头赶上，也可以赶上。我们不应该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那样，我们将永远落在后面。只有把实事求是、循序前进和相互促进、迎头赶上统一起来，才能使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适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要求，比较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我们要看到我们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各方面的有利条件。

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我们有广大的人力和丰富的资源做基础。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天然给我们带来的任务是：对祖国、对人类应该做出较大的贡献。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有过许多发明，为什么到现代就不能有所发明呢？后来居上，我们是应该超过自己的祖先的。

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证。在旧社会，某些科学家赤手空拳，单枪匹马，也还能做出一些贡献；在新社会，社会制度有了根本变化，生产力解放了，人门思想解放了，单枪匹马变为群策群力，科学家有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广大的自由天地。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另外，把集体需要与个人自由辩证地结合起来，也需要有一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我们在座的一些同志，经过清末、北洋军阀政府[17]、蒋介石反动统治和社会主义四个时期，比较一下四个时期的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我们已经有了一支比旧中国大许多倍的知识分子队伍和科学技术力量。从清末派出留学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全国一共只有二十多万大学生。新中国建立后到去年为止，我们有了九十六万大学毕业生，几百万中级知识分子。再过十年，我们又会有一百多万大学毕业生。这是旧时代所不

① 这是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能比拟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支不小的技术力量和一批科学研究机构，这是国家的宝贝。

我们现在有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般设备和原材料绝大部分自己能够制造或生产。这就为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把这些条件运用好，群策群力，自力更生，就一定能够后来居上，做出超过前人的贡献。

第三，如何多快好省地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要求，我讲几点具体意见：

一、加强科技界人士的主人翁责任感。就是要做到接受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自愿地坚持自我改造。我们应该做到老、学到老。只有认识到自己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改遣，才会愉快。不自满，有了缺点就改，就会进步；如果自满了，那就要退步。人总是要不断地前进。大家要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二、集中和加强科学技术力量。科学研究部门、教育部门和工厂要密切结合，有分工有合作，而不是把力量全部集中在科学研究部门，也不是全部集中在教育部门或工厂。如上海要集中力量突破半导体技术，别的地方如有这方面的力量就可以调来。

三、改进各方面的关系。首先是党群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我这里讲的领导是指集体而言，不是讲党员个人。当然，党员个人的讲话有些时候是根据党的指示，传达党的意见。但是，人总是有个性的，某个人在某一方面兴趣大一些，因此在传达党的意见时，在某一方面多讲一些，发挥一些，这是有可能的。领导者讲话也有不是指示性的，如果一讲话就是指示，那么这日子如何过？所以我总是不大赞成讲“指示”。传达党的意见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党群之间的融洽相处。还有青老关系、师徒关系。应该把老放在前面，是老青关系，不过这样讲不顺口。带路的是老的，但青年人有活力，能够推动事业进步。还要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任务和学科的关系，认真实现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以及科学研究机关、学校和生产部门的紧密协作。安排好这些关系是科委的责任。加强思想工作，组织科技力量，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是科委要做的事。

四、适当改善科学技术研究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国家科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给大家便利。研究和教学要有实验室，生产要有车间。上海有些设备不够，必不可少的要补充，需要进口就进口一些吧，总要相当满足你们的要求。关于原材料，可以相互支援，图书也可以相互支援。订购外国书刊，开始时掌握得松了一些，因此重复的很多，但后来又太紧了。必要的图书资料还是要订，必要的交换刊物要给人家，否则人家也不给你。关于助手、技术工人的问题，上海是能解决的，需要从别处调的，个别的可以支持。总之，条件有利，就能创造出新的成绩来。

关于工作环境问题，真正的科学家在生活方面的要求并不高，但生活问题、居住问题也不能完全不考虑，如有的科学家住得太远，就要给予便利。有些科研项目需要协作完成，所以集体活动是必要的，但不要因此而排除个人钻研。科学家专业外的事情应该少一些，这是科委要安排的，每个单位也要注意。我们过去习惯于搞突击 507 工作，对于经常的工作不是安排得很好，大家可以提意见。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订出很好的十年科学规划。

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心情是愉快的；责任是重大的，精神是饱满的。

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我们对上海科学技术界寄予深切的期望。希望上海的科学技术界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做出应有的成绩。

应该确立社会主义人口论的正确观点

①

（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

应该产生我们社会主义对人口的看法，确立人口论的正确观点。这就需要研究。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发展人口的计划，不能就这样听其自然，不管，因为我们国家大。即使国小，也要注意如何繁殖人口。比如内蒙古只有一百万人[244]，四十年前这么多，现在还是这么多。这也是听其自然，那也不行：它也应该发展人口嘛。但是，发展人口必须跟生产、教育、劳动力的安排等方面都联系起来，不可能孤立地发展。所以，我提出研究中国人口的十个问题来。这是初步意见，我们还要找一些专家来共同研究。

第一，控制城乡人口的比例。这个比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根据经济发展来逐步改变的。这个比例我过去提过：解放前，我们的城市人口占百分之十；到了一九五七年底，是百分之十五；到了一九六〇年，一下子增长到百分之二十。这个比例增长得太快了。城市人口太多多了，共有一亿三千零七十多万人。所以，我们非要压缩城市人口不可。城乡人口的比例要根据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来规定。这同经济发展的速度、技术水平、机械化的程度等等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要实行晚婚、节育的政策及其有效的措施。计划生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提倡晚婚，一方面是提倡节育。不论是劳动或者学习，青年都正是有为的时候，精力也旺，把精力用在劳动上、技术上、学习上、发明上，是会有很大的创造的。人的精力最饱满的时候，是二十至三十岁这个脑筋发展最快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把录大的精力放在这些方面，不论对劳动，还是对学习、工作，部有好处。提倡晚婚，对于我们培养共产主义风气也是有好处的。当然，这跟文化有联系。结婚以后要节育，也就是计划生育。但是，光提倡不行，必须有计划，比如说在全国的城乡中，到底在哪些地方更应着力一些？这次邵老提出把“首先在城市人民中”那句话勾掉，我们也同意[245]。但我还要说明一点，实施的时候还不能等量齐观，因为首先是城市更要着力嘛！拿北京来说，去年的人口增长率是净增百分之三点五（不含远郊区）。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是百分之二点五，而北京是三点五，这个城市的人口增长得就太快了。我到哈尔滨一问，哈尔滨市人口增长率是百分之四点五，这就更大了。因此，首先要控制城市人口。城市人口文化比较高一些，比较容易宣传，卫生机构比较多，节育的手术、措施、政策比较容易贯彻。农村中，近郊区文化比较高的，宣传容易；山区、偏僻地区、人口密度稀的或者少数民族人口少的地方，摆在次一步还可以。像现在西藏，你叫它节育，反而不好，反而引起误会，因为那个地方人口本来是减少的，现在慢慢在增加，应该让它多增一点。还有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就要注意这些地方。晚婚、节育必须采取有效的政策、有效的措施。过去有些政策是奖励生育，生孩子给多少布，等等。结婚，就有布，他反而结婚更早，而不是晚婚。现在要加以限制，我不在这里详细讲了。人口增长总要有一个计划。

第三，要贯彻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青年一代毕业以后要劳动，首先是

---

① 这是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〇一次会议上讲话的第六个问题。

农村。因为我刚才说了，每一个学年的儿童有一千五百多万。从现在起节育，到明年才能生效，已经晚了十五年了。现在在我们面前从一岁到十五岁的孩子，已经使我们负担很重。现在节育，十五年后可以少一点。因此，在教育上要解决这个问题。照现在学校的风气，毕业后重点是升学，而不是到劳动中去，那么，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所以，每一家庭都要提倡劳动空气。这不仅关系到做父亲的，更关系到做母亲的，妇联更需要提倡。我们的教育方针要把青年一代引导到毕业后参加劳动上去，因为这是大量的和基本的方面，今年想尝试来做这个事情。

第四，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劳动力如何安排？刚才说了，每年毕业生十五岁的就是一千五百万，怎么安排？这里面绝大多数在农村，好安排；在城市里有三百多万，不能三百多万都升学，也不可能都安排在城市的工矿、机关里头。按照计划，今后五年每年城市劳动力只能增加八十万。这三百多万人中升学的不过一百多万，其中包含升中等专业学校和大学的，如果仅仅算大学，那就不到二十万。因此，有近一半的人要向农村安排。所以，今后十五年安排劳动力需要有计划。

第五，适当地规定工资福利。安排劳动力就需要计算劳动力的增长，我们的工资福利，既要是低工资，又要照顾到农村的收入，使城乡接近。城乡供应比较接近，福利事业也要比较接近，他才愿意到农村去；相差太悬殊了，就更不愿意到农村去。

第六，要有严格的编制、定员。不仅我们的企业要有严格的定员制度，机关也要有严格的编制，否则人还是很容易就膨胀起来。

第七，干部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这也是要提倡的。我们现在的三千二百万左右的职工中，大概有一千多万的干部，包括党支部书记、车间主任、科室人员。如果这些干部都定期地积极参加生产劳动，那就造成一种风气。因为，生产工人是参加劳动的，商业、财贸机关的服务员算半体力劳动，小学教员工作也很勤劳，除此以外，广大干部如果也定期参加生产劳动，那就可以说，我们整个的三千多万职工中，除去在农村的几百万外，在城市的有二千几百万人都参加了生产劳动。现在城市人口一亿一千多万人，等于每家至少有一个人参加生产劳动（定期的，一月、两月，不是全年的），就造成了一种劳动风气，它对儿女的教育，有身体力行的直接影响。儿女看到父母都去参加劳动，当然也会以劳动为光荣，就不会还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惟有升学高”的看法了。毛主席提倡的干部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不仅在农村，在城市也同样适用。我们讲的那五个工厂（湖北襄樊棉织厂、山西潞安矿务局石圪节煤矿、甘肃兰州炼油厂、长沙湖南橡胶厂和上海嘉丰棉织厂），其所以能办得好，决定的条件之一，就是这些厂矿的厂长、支部书记，其中有两个是长期的工人，虽然做了厂长，有时还到矿井、车间去参加劳动；另外三个，有两个是知识分子，有一个是职员，都同样地参加劳动。所以，他们就能跟群众打成一片，没有架子，能够把企业办得好。他们的特点就是这个，《人民日报》的社论介绍了。这一条关系我们的儿童面向劳动、面向农村。

第八，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企业事业。这不仅是节约、积累，可以多建设，而且勤俭持家的精神还可以使我们的低工资能够继续贯彻。当然，工资要调整，我们报告上说了，从今年起，第三个五年计划[163]期间，每年都要调整一部分，使每一个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之内，都能升级一

次或者调整一次。尽管如此，增加的工资都是有限的，我们还是一个低工资的国家。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保证了必要的生活品，我们是能够过下去的。我们就是这样把国家搞强大了嘛！这样，我们自己就能更站得稳，站得住了嘛！这一点要从家庭勤俭持家做起，从青年时就养成风气。这与我们人口的增长也是有关系的。

第九，要提倡面向农村，面向劳苦大众。人人都要从小就养成这么一种风气。农村是我们社会的基础，任何人要以不到农村为耻就好了。我最近得了这么一个材料。有一个高中毕业生，是一个工程师的女儿[246]，决心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跑到天津附近一个县，就是邢燕子[247]的同一个县，在另外一个生产队[204]里劳动。去的时候孤身寡人，大家很奇怪，一个知识分子、女孩子，到农村去劳动，住在一个破房子里。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城市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劳动，生活也没有人照顾，自己搞饭屹，的确很艰苦。她有时也动摇，有时也哭，人也瘦了，但硬是奋斗了一年，从去年七月到现在，还在那个地方。造成一种风气，这是很不容易的。那个生产队队长还算好的，但她也感觉到孤单。所以说，要造成一种风气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在农村造成欢迎的空气，在城市造成支持的空气，那要作很大的努力。要面向劳苦大众，我们的下一代，总是要把自己摆在劳苦大众一起，要能够吃得起苦。因为我们的革命精神，就是从吃昔中得来的！不吃苦怎么能革命呢？不吃苦怎么能有今天这个局面呢？

第十，要不断地克服官僚主义。在人口问题上，在节育问题上，如果不抓紧反官僚主义，计划是不能实现的。我只想了这十个问题，现在正在分别研究。这几个问题都是不成熟的，因为我们想到新中国的前途，大家都信心百倍，欣欣向荣的景象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要解决关键性的问题之一——人口问题，解决得好，那就更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了。人总是要增加的，但要有计划地增加。那么，我国人口到了七万万、八万万、九万万、十万万的时候，我们就更强大、更有力量，就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和目标

①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一、关于工业问题的决定[248]初稿，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有许多好的想法、好的意见，作为讨论工业问题的根据，很有益处。今年二月工作会议印发的工业问题文件[249]，也有一些好内容可以采用。

二、研究我国工业发展方针的出发点是什么？同意小平[160]同志的意见，应当立足现实，瞻望前途。我想从四个方面再做一些解释。

（一）必须进一步总结十四年的建设经验。

毛主席经常总结我们的建设经验，在一九六〇年曾做过十年建设的总结[250]。少奇同志在去年七千人大会的报告里总结了十六条建设经验[235]。十四年中，我们经历了恢复、发展和调整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很丰富的经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84]期间，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经验，主要是学人家的，又主要是学苏联的。一九五八年以后，开始根据我国的特点，摸索出一套自己的建设经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78]。我们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经验，对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必须加以比较分析。正确地总结经验，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建设的信心。十四年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很宝贵的。伯达[251]同志起草的文件试图作些经验的总结，但是太简略了，甚至连“调整”都不敢说。不要讳疾忌医，因噎废食，我们在调整中做了很多好的工作。

（二）必须对现实有恰当的估计。

我们目前工业的基础到底怎样？要有恰当的估计，估计高了不好，估计低了也不好。要反复地调查研究，才能得出恰当的估计。去年开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农业还很困难，当时设想一九七二年粮食产量可以达到四千三百亿斤，现在看，估计低了一些，但是，工业的指标又估计高了一些，当时设想一九七二年钢产量可以达到二千八百万吨，煤产量可以达到四忆五千万吨，现在看，又估计高了。经过了一年半的实践和摸索，认识又接近实际一些。要摸清工业和农业的现实，必须研究几个基本数据，必须根据基本数据，做出必要的计算。搞经济工作，钻到数字里去拔不出来是不对的，不研究数据也是不对的。

工业水平与技术水平要辩证地认识，既要区别，又要结合。我国的工业水平相当于四十年代的国际水平，技术水平有的已经达到五十年代的国际水平。我国的工业水平虽然还比较落后，但是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可以迎头赶上，可以找到捷径，可以更快地促进工业水平的提高。

（三）必须瞻前顾后，有一个远期的奋斗目标。

伯达同志提出用二十三年的时间超过美国和苏联。可能快了些。我看不要把走在世界最前列作为重点，还是提四个现代化。是否可以提，用二十三年的时间或者是在二十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先进的社会主义强国？

（四）必须抓住中国的特点。

中国的特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国大、物博、人多、任重。我

---

① 这是在讨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的讲话要点。

们搞得好，对世界革命就会有更大的贡献。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摆脱经济落后的状态，还是一穷二白。毛主席正是抓住了我国的特点，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调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

三、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目标和道路。

（一）三面红旗[236]特别是总路线，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总纲领。

（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是发展国民经济曲总方针[252]。

（三）应当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基建和生产。

首先，按照低标准解决吃、穿、用问题。全国平均每人应当有六百斤以上原粮，十六尺棉布。

其次，发展基础工业。要根据我国的资源条件和具体情况，以十年作为一个建设周期，进行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比例和构成要活计算，不能死计算。综合平衡不能每年搞，要长期平衡。

再次，照顾国防和突破尖端。要发展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同时要发展民用工业的尖端技术。

第四，培养技术力量，掌握先进技术。这里有技术政策的问题，有技术力量配合的问题，还有教育方针的问题。技术要商条腿走路；有的要循序渐进，不能超越；有的可以迎头赶上。只要抓住技术革新，总会后来居上。

第五，奋发图强，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迎头赶上。

根据上述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经过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三年过渡和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五年十年规划，基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辰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

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有这样几个指标，初步设想，经过十三年，到一九七五年的奋斗目标是：

粮食产量达到五千五百亿斤，那时人口将有八亿五千万，每人平均有原粮六百五十斤。

棉花产量达到四千万担，加化学纤维二十五万吨，每人平均可有布十六尺。

钢产量达到二千八百万到三千万吨，才可以初步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

煤炭产量达到四亿吨，石油产量达到三千万吨，才可以开始改变我国燃料首先是改变化工原料的构成。

再加以在木材、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各种钢材、化肥、酸碱、机床、发电量上达到相应的产量，铁路运输里程：达到五万五千公里左右。在轻工业产品和各种运输量：上，在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上，也有相应的增长和相当的发展。

这样，就可以说基本上建成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了。

四、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构成和各部门的比例关系。

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参考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找出我们自己的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各部门的比例关系。

五、基础工业与重点工业的关系。

化工、石油、电子、有色金属四个工业部门，是我国工业的薄弱环节，对促进农业、基础工业和国防尖端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也可以带动一些工业部门的发展。但是，单以这四个部门做为长期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

纲就不够了。因为还有吃、穿、用，还有农业，还有工业，还有国防，还有尖端。基础工业本身也有变化，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重点。在发展基础工业的过程中（包括地质、采掘、冶炼、制造、动力、运输六个方面），不同的时期应当有不同的重点。

六、新工业基地与老工业基地的关系。

要充分利用老工业基地，同时，又要充分估计到新工业基地的作用，必须结合整个工业布局来考虑新老工业基地的建设问题。

七、大中小企业问题。

大型企业是骨干，中小企业应占多数。发展中小型企业有利于城乡结合。大中小结合，就是城乡结合，不能一集中都搞到城市。城乡结合和大中小结合，要连在一起考虑。

八、专业协作与设备更新问题。

要加强专业协作和有计划地进行设备更新，就必须对机械工业进行比较大的调整和改组。这个工作量很大，应当从现在起，抓紧研究调整方案，按行业、按产品分批、分期地进行调整。

九、综合利用问题。

要认真抓。要把原料基地的综合利用和城市建设的综合利用这两个环节抓住。应当作为这次城市工作会议[253]的重要议题。

十、联合公司问题。

组织联合公司的想法很好，但还缺乏经验，要积极组织试点，一定要同资本主义的托拉斯[254]区别开。

十一、技术力量和技术政策。

科委要大力抓技术政策。

技术力量要成龙配套，不仅要培养高级技术人才，而且要相应地培养中等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为此，“必须加强职业教育，对普通中等教育进行改革。

十二、劳动力安排与工资政策。

解放以后，全国平均每年净增人口一千五百万左右。全国一百八十四个大中城市的七千五百万人口中，每年达到劳动年龄需要就业的有二百多万人。除了每年约一百万人左右在城市就业以外，大部分人要输送到农村，安置在生产队[204]和国营农场、林场、牧场、渔场参加农业劳动。安排和组织这么多的人到农村去，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必须逐步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经验来。

十三、积累与消费。

要研究积累和消费、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财政支出的比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平均为百分之二十六，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平均为百分之三十六；第二个五年计划[150]期间，积累平均占百分之三十二，基本建设投资平均占百分之四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比例可以参考，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比例太高，并且还不平衡。现在积累和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又太低了，应当逐步提高。总之，妥勤俭建国。不勤俭建国，十三年的雄心壮志不能实现，二十三年的目标也不能实现。

十四、管理水平问题。

企业管理必须运用经济的原则，同时，还必须强调政治领导和统一计划的原则，防止和反对脱离政治的单纯经济观点，防止和反对分散主义、本位

主义。

十五、长期规划问题。

要根据发展国戾经济的方针和目标，制定农业长期规划和工业长期规划。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两个重要问题

[①]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现在只想讲讲第二个五年计划[150]里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　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

这一点，去年我向全国人大会议的报告提到了[255]，这一次的报告就没有打算多说。我现在只想说，经验的取得，一定要通过实践。我们过去搞革命战争，摸索了二十二年。开始，不懂得如何进行革命战争，而是摸索了很久，犯了许多错误，正面的经验取得了，反面的经验也取得了，然后总结经验，得到了正确的方针，才取得成功。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坚持正确的、修正错误的中间产生和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建设更加复杂，千头万绪，更需要如此。初期，我们谁也没有搞过社会主义建设，大家也是摸索。恢复经济比较容易一些，一到搞计划经济，谁也没有经验，开始总是要从苏联抄一点经验来，这也是需要的。抄来的，总不是自己脑子里生长出来的，不是经过自己很好独立思考的，所以，好的经验学了，坏的经验也学了，开始还不能鉴别。我们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84]有了一个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第二个五年自己搞出一套建设经验来。在第二个五年，毛主席就提出了十大关系问题[139]，提出了总路线[178]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252]。但是，有了总的方针，“还需要一系列的政策、一系列的规定，把总曲方针具体化。

在摸索经验的过程中，很多是对的，我们去年把它肯定了，基本总结了，我们在去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给大家看了[256]。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缺点，这些错误、缺点，去年也都讲了。有了这两种经验，又经过这几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现在可以说，我们对于经济生活比较清楚一些了，但是还不能说完全清楚。所以，经验的取得是不容易的，必须通过实践，必须经过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各部门的领导、地方的领导共同摸索，总结经验，不断前进，才能逐步地完备起来。开始一个时候的缺点、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不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这种摸索的代价是需要付的。当然，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代价也付得多了一些，但是，现在看起来，是有收获的。

二自力更生问题

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应该立足于国内；主要靠自力更生。本来，这句话毛主席早讲了，革命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但是，那个时候在解放区是战争的环境，建设很少；现在是全国建浚的环境，我们经过实践才能强调：出来；当然，开始也不能一下完全自力更生，也需要外援多一点。但是、从精神上总要明确自力更生为主。一九六〇年苏联撤退了专家，撕毁了合同，许多工厂停下来了，许多设备不进口了，许多大型工厂的设备不来了，那：

[①] 这是在第十九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我们就不得不被迫地自己来生产设备，过技术关，因此有些地方就要停下来。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这几年起了很大的变化。一九六〇年以后，一方面有三年的灾荒，另一方面有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再加上我们经验还不够，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只能在摸索中根据党的农村和城市的一系列政策来工作。经过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到现在，可以说我们确实在自力更生为主这一点上收到了很大的成绩。

现在，的确如问去年所说的，我们已经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上亚体系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这表：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自己设计厂矿企业，不仅小型的，大中型的我们也可以自己搞了，并且能够供应设备了。第一个五年我们自己只能搞五百多项，现在能搞一千多项，质量也不同了，因为大中型的多了。我们的各种材料的品种，不论钢、钢材、机器、化学、有色金属的品种，都有增加。我们的技术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在工业方面，我们有了很大的进步。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最大的成功是石油工业的发展，我们现在石油基本上可以达到自给，当然还要发展。化学工业，包含合成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都有发展。无线电技术也在发展。在尖端方面，我们现在也有了一点底子。在机器设备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只能自己供应百分之六十，现在可以供应百分之九十。钢材品种也能自己供应百分之九十。当然，还有那么百分之十精密的汁匕较大型的设备和材料，特别是比较难搞的合金钢，自己还不能供应。要过这些关，还需要一段时间，两个五年还不行，还要在今后继续努力。但是，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基础，特别是初步的独立的工业基础已经打下了。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这样的大国需要量大，不仅要有质量，还要有数量。此外，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也开始形成了，力量也壮大起来了，现在大概经过专业训练的有二百多万人，但是还不够。

这次的计划报告[257]，在自力更生问题上讲得很多，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过渡计划和长远规划

①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日）

我们把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的三年计划，叫做：过渡计划[258]，意思是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84]主要学习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150]在总路线[178]的指导下，摸：索把马列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过渡到以后十五年的三个五年计划，求得在基本上建成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因为有这样一个目的，我们需要总结经验，全面安：排，创造条件，全面跃进，就必须有这三年的过渡。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开国初三年，恢复了财政经济以后，就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由于我们没有经：验，不得不首先而且必须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当时、，斯大林和苏联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建设了一百五十六个重要的工程项目，这对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打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精神来办事的。那时我们还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到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希望在几年内，就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几年摸出一个规律来，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加以大家求成心急，就发生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加以从一九五九年以后三年的严重灾荒，给我们在粮食和一些工业原料方面带来极大的困难。特别是苏联在一九六〇年七八月间突然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给我们经济建设造成极大的困难。这一切，就不能不使我们在国民经济建设中进行这三年的调整工作[231]。经过三年调整，我们克服了困难，开始了全面好转，打下了独立伪国民经济体系的初步基础。这个情况，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55]中，特别是今年的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259]中，已经提过了，我就不再讲了。

但是，这三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只是初步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进行，以争取进一步的好转。要这样做，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要总结过去三个时期的经验。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学习苏联的经验，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创造育己的经验，进行调整工作的经验。总结这三个阶段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需要进行全面的安排，而不是一项一项地调整；需要实行综合平衡，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并且需要瞻前顾后，创造出有利于今后长期规划的条件，以便于实行全面的跃进，完成历史的任务。所以，我们提出这三年过渡时期的任务，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逐个解决，而是要全面安排。

现在，这三年的第一年已经快过完了，还剩下两年。明年的计划和预算也做了初步的安排。今后的政府工作就要抓紧这个全面规划，瞻前顾后，分期进行。就是说，不单单地看到今后的两年，还要看到以后长期的规划。我们要利用这个过渡时期，进行这样的准备工作。

讲到规划，联系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大概有这样十六个：

---

① 这是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报告的第三部分节录。

第二、农业的规划和技术措施。这是大家都注意到了的。但是，必须有全面的规划，看到农业发展的远景。适应我们人口和工业发展的要求。

第二，工业交通的布局；地质勘察规划，国防工业规划和工业体制。

第三，商业的全国布局和商业的管理体制。这个问题，现在才开始着手解决。

第四，外贸的规划。我们要实现自力更生的国民经济计划，外贸的发展需要引起更大的注意。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以后，我们在设备、器材方面不能再从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口了，不能不转到国际市场上互通有无。同时，我们的外债到一九六五年就可以还完，这样，我们出旧的物资就可以更多地转移到进口物资的交换上，我们的技术水平跟我们现在科学技术工作的研究，一方面，需要从我们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循序前进追赶国际上先进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我们要迎头赶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使我们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科学技术水平。这样，就不得不使我们要在有利的条件下，在乎等互利的条件下，进口一些新的技术设备和技术资料。这就需要在外贸工作上开展一个新的局面。现在，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民族独立国家的增加、美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影响，资本主义市场缩小了，互相争夺加剧了，因此，引起西方国家对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市场的极大的注意。正是由于这样一个有利的条件，我们要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进行有利的外贸活动。所以，就必须有一个长期的规划，以适应我国工业生产和技术水平发展的要求。我们在计划报告[257]上说，既要照顾吃、穿、用，又要发展基础工业，还要照顾国防，突破尖端，这同外贸工作也有很大的关系。

第五，在教育方面，我们对高等教育、普及教育和职业教育也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因为我们不是短期内能够完全实现普及教育的，所以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进行职业教育。在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还需要继续提高和发展。

第六，科学规划。今年我们定出了一个新的十年科学技术规划[243]，也定出了一个农业的技术规划[200]，现在已开始下发并开展工作。

第七，我们需要一个文化改革的规划。我们要肃清国内长期遗留下来的封建势力、贪本主义势力和传统的。旧的、保守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就要在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我们的新闻、广播、体育，也应该有长期的规划。第八，卫生工作，特别是计划生育的工作，要有长期的规划。有的代表也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正在进行这一项规划。

第九，大中城市的建设规划。工业的发展，使我们故城市扩大了，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控制。现在二十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包括矿区、林区，大概有二百个左右，有七千五百万人口，我们应该对这二百个左右大中城市很好地进行规划。

第十，城市劳动力的安排和工资规划。每年我们能够增加劳动力的数目、工资增长的数目和调整的计划，应该有个规划。

第十一，我们城市的后备劳动力是超过城市劳动力安排的需要的，应该把这部分超需要的劳动力有计划地下乡上山，支援农业生产的发展，现在也正在进行规划。

第十二，我们的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但是，农产品和工业品相互之间的比例，还有调拨价格等等，也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规

划。

第十三，我们的财政税收方面也要有一个规划，计算我们今后长期规划中需要的数目和能够积累的数目。

第十四，在金融管理和信贷计划方面，也应该有一个规划。

第十五，行政编制的规划。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辽阔，我们的行政编制、行政的层次，比中等的、小一点的国家多得多。如果在县以下还要设区的话，那么，从中央一直到生产队[204]就有九级之多，即中央、大区。省、专区、县、区、公社[198]、大队[203]、生产队。这就说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要贯彻到基层单位非常费事，而且常常走样。如何使我们的编制适合我们这样人口多、面积广的国家的需要，不是图案画式的千篇一律，而是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实现的。但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行政编制的规划。行政人员太多，就妨碍事情的深入下达和政策的正确贯彻，而且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事务主义。

第十六，政府应该有一套工作制度和办事的章程。我们今年在“五反”运动[63]的初期，曾经起草一些条例，但是，要经过各个部门或者企业事业单位试行以后，才会提炼出一些原则，制定出一套通用的条例章程出来。这件事，毛主席在去年就提醒我们了，总要有一套章程制度来工作。

这些规划，当然是一个初步的设想，一定要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具体地安排。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1]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时候，严格遵：守以下八项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

[1] 这是在访问加纳共和国时答加纳通讯社记者问的节录。同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中国同马里共和国商国政府的联合公报中正式写入了这八项原则。

中日经济合作应当招眼光放得更远些

[1]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诸位访问中国不过几天，团长先生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日两国应该如何友好相处，如何进行合作的问题。确实如此，中日两国如果真正友好相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的完全独立，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这对于我们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都是一个远大的理想。因此，诸位先生提出的问题是有远见的。

我们知道，日本经济的发展，不光是靠国内，同时也靠国际市场，而诸位是从关西来的，那里的对外贸易占日本整个对外贸易的很大比重。所以你们是很重视对外贸易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诸位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但是，要使经济技术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也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合作。这就是说，根据以上的情况，我们互相有这个愿望和需要。团长先生刚才提到友好合作问题，所以我想多说几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依靠国际合作。为了实现国际合作，就需要确立几个比较长期有效的原则。

第一，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包括贸易往来和技术合作：等，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来进行。刚才团长先生提到：平等互利这一点，这是很好的，确实如此。中国过去是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使中国遭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现在中国解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处于大国地位，但是出现了军国主义，使日本受到战争的灾难。战后日本处于战败国的地位。团长先生刚才说日本战后得到美国的一些好处。但是，月时也带来坏处，就是在若干方面受到美国的控制，日美之间不是完全平等互利的。特别是最近美国遭受经济危机。想把它转嫁给日本，对日本的商品进行限制来保卫美元。月本企业家当然要考虑怎样才能独立和平等互利，对于日美政府谈判，日本的舆论也反映了这一点。我刚才谈到中国过去已经有过教训，现在日本也有同样的处境，因此，今后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应该真正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这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第二点，中日两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发展的可能性是大还是小？据我看来，这一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尽管中日贸易现在还是有限的，例如，今年的中日贸易额即使达到两亿美元以上，在日本整个对外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也还是很小的，比起日美贸易的规模就更小了，同日本与台湾的贸易相比较，也仅仅超过一点点。但是，这是眼前的开始的现象。今后在真正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几十年以后，就一定会大大超过现在。这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的，日本需要的原料，中国基本上都有。日本可以供应中国技术设备的种类相当多。中国有六七亿人口，日本有一亿人口，彼此有很大的市场，中日经济力量发展了，需要就会增加，互通有无的可能性就会更大。现在美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饱和点，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进口日本的商品加以限制，以防止美元外流。如果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美国在日本的军事支出

---

[1] 这是会见日本关西经济访华代表团时的谈话节录。

会减少，这也会影响日本的经济。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这就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发展。我们的关系不应当是一方依靠另一方的，而是相互的、根据彼此需要进行合作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中日两国发展经济合作是不是可靠？是不是冒险？团长先生刚才提到两点：一、日本企业界是有信用的，也就是重信用的；二、有人担心发生类似长崎事件那样的事，从而取消合同。

长崎国旗事件不是孤立的问题。这个事件反映当时的中日关系。当时中日贸易是根据贸易协定进行的。贸易协定虽然不是官方的，但实际上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也就是半官方的。因为每年有一个半官方的贸易协定来维系双方的贸易活动，所以政治上如果发生问题，就会影响合同的执行。当时，中日贸易关系是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两国互办商品展览会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我上一次同松村[261]先生也谈了，我说日本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来北京举办展览会的时候，村田省藏[262]先生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我出席了。北京饭店大厅挂了很大的一面日本国旗，横跨整个舞台，给我的印象很深。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日本国旗。当时中日还没有建交，日本政府承认台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友好地处理这个向题，没有提出意见。这件事说明中国人民是愿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的，对日本国旗是尊重的。当时，我参加招待会，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国的总理出席的。但是，一九五八年中国在长崎举办了一个很小的手工艺品展览会，会场上挂了一面很小的中国国旗，却：遭到日本暴徒的侮辱。日本政府对这个事件不负责任，也不道歉。这两件事情对比起来，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很大的愤慨。同时，日本政府对第四次贸易协定中几个关键性的问题[263]也不给予批准，使贸易协定不能成立。因此相应地使有关协定的合同和钢铁合同也不得不取消。以上当然是直接的原因，还有一个间接的原因，那就是岸信介[186]内阁不仅在经济上，还在政治上敌视中国。例如，岸信介访问台湾，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到南亚：进行反华活动，到华盛顿支持美国对华政策。这是不友好的，是敌视中国的。因此，岸信介政府的行动使中日经济贸易关系不能发展。后来、松村、高■、[264]、石桥[265]等几位先生相继访华，要求改变当时的情况，他们做了努力，并取得了结果。同时，池田勇人[187]先生执政，日本的内阁也起了变化。我把过去的实际情况向团长先生说明，不是中国方面不守信用，错误不在我们这一方面。

但是，不管日本政府对新中国表示友好或不友好，总遇到一个问题：这就是日本同台湾保持妙卜交关系”，而不、承认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是最根本的矛盾。我想，诸位也会想到这个问：题的。现在，当池田政府对中国采取比较友好的态度，诸位就可以放心一些。但是，如果明天岸信介再出来组织内阁，或者岸信介的兄弟佐藤荣作[266]上台的话，诸位就会担心起来。我们也觉得需要给予不同看待。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不管政府是否换人。政策是不会变的。假如今年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不再选我当总理一假定我不当总理，而由别人来当，也不会因此影响外交政策，别人照样执行现在执，行的政策。但是日本政府如果换了人，就有这个问题。因此，难怪池田先生想出这个办法，就是“政治和经济分开”。我们说，政治和经济是不能分开的，基本上是不能：分开的，但是，有时也可以分开。诸位知道，自从岸信介政府撕毁了贸易协定，我提出了政治三原则[267]；是强调政治的。政治三

原则对于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日本人民愿意同中国友好，不敌视中国，承认新中国，为恢复中日邦交而努力。诸位先生来中国访问，正是代表了日本人民的意愿。所以，政治三原则主要是对日本政府说的。由于松村、高荷、石桥等几位先生的奔走，我又提出贸易三原则，作为我们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根据。贸易三原则就是，第一，最好是由两国政府在彼此承认之后，缔结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以前的贸易协定不要再恢复了。但是，这一条现在还做不到。因此，第二，可以通过两国的民间团体、或者与政府有关的团体，建立若干关系，签订全面的或个别的贸易协议和合同。这种协议和合同是个别的，互相交流物资，也有一方买另一方的，例如广州的交易会[268]。自从一九五八年贸易协定失效以后，这种小额的、民间的友好贸易一直发展到现在。第三，由比较负责的团体或人士代表双方签订长期的议定书，例如前年签订的高畸达之助和廖承志的备忘录[269]，范围比较广泛，其中有易货贸易，成套设备的分期付款和某些商品的延期付款，将来还可以广泛发展技术合作。这是通过负责人士来签订的，例如，高■达之助和廖承志都代表一个方面。高■先生不幸去世了，但是还有人接替他，就是冈崎嘉平太[270]先生。为了纪念高■先生，日本方面仍然用高畸办事处的名义，同廖承志办事处来处理备忘录贸易事宜。有时候，用人物来作代表，比团体的作用大。它的好处是：日本政府即使改变了，也不致于受到影响。对中国友好的日本政府会支持这个办事处，而对中国不友好的政府就可能不支持或限制这个办事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影响到贸易。如果岸信介再出来组织内阁，是不是会取消这个办事处呢？这我不能保证。你们是不是也不能：保证？不过，我有一个信心、一个认识：一九六四年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同一九五八年不一样了，即使岸信介再次上台，下令聊肖办事处。也是不可能的，日本广大的产业界是不会赞成的，因为双方的生意越做越大，影响就越、来越广了。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有这个需要；从日本方面来说，日本广大的企业界也有这个需要。这样，在两国经济上都有了根基，任何人也不能随意把它取消。形式上备忘录是非官方的，实际上是半官方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为什么只能是非官方的呢？因为现在日本政府承认台湾代表中国，而实际上它也知：道台湾是不能代表中国的，这是滑稽的，但是现实中就存在这个笑话。如果中国政府在东京设立办事处，就会产生“两个中国”的问题。如果日本政府也到北京设立办事处，同样也就等于日本政府承认“两个中国”。这是从形式上来讲的，也就是从法律上来讲的，因为一般地总要从法律上来考虑问题。但是，如果讲政治，就要讲实质。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说与官方有关。高畸先生也好，现在的冈崎先生也好，都是启由民主党的人士，能说他们同日本官方没有关系吗？廖承志先生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说他同我没有关系呢？所以，实质上是半官方的。目前按照这第三个原则，双方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正在向前发展。

我提出了贸易三原则，高■先生很高兴，因为解决了他的困难。池田首相说的“政治和经济分开”，基本上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同意了，就等于承认日本政府所谓中国只是在经济上代表大陆。这样就形成“经济中国，政治台湾、不但中国人民不赞成，日本大多数的人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日本人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主张日本同台湾断绝关系。如果是“政治新中国，经济台湾省”，那倒还讲得通。但是，我晓得池田先生不会作这样的解释。因此，对“政治和经济分开”的说法，我基本上不赞成。这是我们的立

场，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立场。但是，经济问题是不是有时候也可以单独加以解决呢？这胚是可以找出办法的。所以我提出贸易三原则。第一条现在还办不到，就摆在那里作为目标，现在不能实现，要在恢复邦交以后才能实现。现在能够实现的是第二条和第三条，主要是第三条。

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是可靠的，有保证的。这一点，不但中国方面要努力，还要靠诸位来努力。我们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越发展，关系就越巩固，也就越能推动！政治状况的改变。因此，高■先生曾强调采取积累的方式，也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要互相促进。

第四个问题,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发展下去,中国是不是有支付能力？中国过去的商人做买卖是讲信用；的，这是诸位所知道的。而现在中国是作为一个国家来同日本的企业做买卖的，所以中国方面的支付能力是很雄厚的。对于延期付款的商品和一般商品，国家是有支付能力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新中国成立十五年以来所欠的外债，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还清了。这就是欠苏联：和一部分东欧国家的债务，总金额接近三十亿美元，其中包括苏联的贷款三亿多美元。这笔帐接近三十亿美元，是包括利息在内的。剩下在明年要还的，有多少呢？只、剩下两千万美元，其他的都还光了。不但是外债，解放、后发行的内债大部分也还清了。五年前我们停止发行公债，那是一九六〇年，正是我国经济遇到困难的时期。中国有一句老话说：“ 无债一身轻。 ”现在跟日本进行经济贸易往来，我们是“ 轻装上阵 ”的。我们是有支付能力的。

以上就是我们两国发展经济贸易往来的四个问题：第一是平等互利，第二是有发展前途，第三是关系可靠，第四是有支付能力，而且这个支付能力日益增长。如果说，过去十年我们支付了三十亿美元，那么，今后十年，我。们支付三十亿美元以上也没有问题。

我看，关于中日经济合作的问题，我们还应当把眼光放得更远些。我们两国都是亚非国家，九年前，我们两国都参加了万隆会议[156]，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我们所尊敬的高畸达之助先生；他当时是日本政府代表团团长。他是我们所尊敬的朋友。高畸先生虽然同我们永别了，但是我相信在日本还会有几百个几千个新的高畸先生出现。现在已经决定在明年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271]。第一次亚非会议曾经通过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和平宣言[272],第二次会议将更具体地把这些原则发展和扩大起来。中心问题是亚非的团结，更好地进行经济合作。首先是各国要取得完全的民族独立，真正在平等互利、五项原则[177]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亚非地区有十六亿人口，古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有广大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大多数的国家还不发达。如果我们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那么，发展前途是无限的。不发达国家的开发，国际市场上的需要，将超过现在好多倍。当然，这不是几年的事，而是需要几十年。但是，这是很有前途的。我们希望亚非各国在乎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过去殖民主义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中国自己遭受过殖民主义的灾难，决不会用这种做法对待别人。日本人民也遭受过军国主义的灾害，不同意日本再采取旧的态度。这样。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大家就可以平等相处，友好合作。关于试办托拉斯的

几个问题

①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一）全国性的托拉斯[254]及其分公司同所在地区和地方的关系；委单写一段。组织托拉斯以后；还要照顾地方，地方上对全国性的托拉斯，既有责任，也有权利和要求。

（二）成立托拉斯以后，仍要注意搞好同外部的协作关系，同地方的协作关系，包括原材料、产品、零配件等生产供应方面的协作，不能什么都自己搞。现在我们的工业部门，总想什么都自己搞，认为只有自己搞才能搞好。其实，什么都自己搞，不一定能搞好。

（三）文件的开头总纲里，要把托拉斯的发展前途写明。成立托拉斯以后，随着托拉斯职能的扩大，部的机构就要缩小，行政部门只留少数人就够了。将来有些专业部，如石油部可改变为大企业，石油部本身就可以变成总。托拉斯。

（四）托拉斯要按照经济的办法来办，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来管理。公司的企业职能逐步扩大，行政职能就要逐步缩小，行政的职能转化为经济的职能。将来地方上同托拉斯的关系，也要由行政关系为主转化为经济关系为主。

（五）请主办托拉斯的有关部，就不同类型的托拉斯，如盐、卷烟、长江航运、华东煤炭、铝业等行业，写出具体的试办实施方案，作为文件的附件，一并送中央审查。

（六）现在看来，去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起草的工业决议[246]，还有一个实践的问题。

---

① 这是在讨论试办托拉斯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

组织托拉斯，解决管理问题

①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这次开计划分[273]，一定要有革命思想

尤其在工业建设方面，对过去大而全的方向问题[274]，要否定二下，过去苏联帮助我国建设，它只有这方面的经验，只好这样搞。现在我们应当加以总结，要解决这个方向问题，要来个革命。这不仅从发展新技术的要求看是需要的，而且从战争的观点考虑就更加需要了。

我们现在办工业的这一套办法，在西方先进国家看来是落后的，而在亚非国家看来则办不起。

一九六〇年日本高■之助[264]参观鞍钢以后，曾对我说：你们钢的数量问题解决了，但品种、质量还不行，技术还落后。他送给我们两部日本钢铁工业采用新技术的影片。我为了促进对新技术的重视，放给王鹤寿[275]同志和有关干部看，但未引起他们重视。

冶金部对钢铁工业的发展方针，在两个问题上始终

坚持己见，同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一是数量和质量关系问题，他们强调先数量后质量。一是他们认为中国劳动力多，可以多用些人，不一定采用先进技术，维持中等技术装备水平、就可以大发展。这是我国钢铁工业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我们现行的工业管理体制，不利于新技术的发展

工厂搞大而全，生产数量越来越大，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则越来越少、越来越差；只重视新厂建设，企业折旧费也大部分用来搞基本建设，而忽视老厂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不能发挥老厂的积极作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管理机构则越来越庞大，官僚主义就越来越发展。

组织托拉斯[254]，就是要解决行政管理和生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要对目前的一些官僚主义的办法来个革命，汲取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长处，当然不是只追求利润的办法，而是用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的办法，来发展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

三、调整计划应该采取革命措施

毛主席提出三年过渡[258]，今年已是第二年了。去年的调整工作，还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填平补齐[276]。今年就该革命，但是没有搞，迟了一年。如果明年再不搞，使得第三个五年计划[163]在新的比例关系基础上前进，那么，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就会继续落后下去。明年的计划，必须革命。

四、要贯彻毛主席关于和战结合的思想[277]

对大而全的工厂要采取一分为二或者一分为几的办法，开展厂内和厂外协作，实行专业化和分工协作，有的厂可以像抗美援朝[41]时那样，迁厂搬家。

五、组织托拉斯，可以有两种做法。

一是开始就组织全国性的托拉斯，又设分公司。这种托拉斯既是集中，又要分权，地方上也管，但是要用经济办法来管。一是先从地区搞起，然后再组织全国性的托拉斯。例如，可以以天津钢厂、石景山钢厂为主组织一个

---

① 这是在讨论试办托拉斯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

托拉斯，以上海钢厂为主组织一个托拉斯，或者以天津钢厂、唐山钢厂为主组织一个河北省范围内的托拉斯。鞍钢本身就可以搞一个托拉斯。还可以和政权改革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行政机构和人员。这两种做法的原则，先肯定下来。至于冶金和机械托拉斯怎样组织、可以指定冶金部门和机械部门进行具体研究，提出方案。

六、组织托拉斯，是先搞容易的还是先搞难的

我的意见，不管难易，准备好了，条件成熟的先搞。

必须使工业产品的数量同质量、品种均衡发展

①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埃德加·斯诺[278]（以下简称斯）：你能否告诉我，一九六四年在钢、铁、煤和电力等方面的工业生产数字，或者同往年比较的数字？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工业生产要全面地看，要看到数量、质量、品种等各个方面。我今天把原则告诉你。这几年调整的目的，不仅在于发展数量，还在于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提高质量成为我们生产的主要要求。必须使工业产品的数量同品种、质量，并且使各种工业产品之间，都均衡地发展起来。所以，单独说一两种产品的数字不能说明问题。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期间，我们钢和煤的生产增长过快，使工业各部门的生产发生了不平衡。一九六〇年以后，我们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231]，尽一切可能使工业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趋于均衡的发展。

我记得，上次你来时同你谈过这个问题。现在，调整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今天上午我说，目前经济形势已经是全面好转并将有新的发展。如果单独说钢的产量，比过去是低了些，但品种大大增加，例如钢和钢材的品种、合金钢的品种，都大大增加了。煤的产量也低了些，但石油产量却大大提高了，一九六五年石油产量将接近一千万吨，这是很大的增长。因此，燃料的构成也起了变化。

斯：我了解到，自从在大庆[279]地区有了伟大的发现并已得到了利用，中国在石油方面已经自给自足，包括喷气机所用的燃料和其他特殊燃料，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在已经自给自足，还是仅有自给自足的潜力？

周：现在接近自给，还进口很少一点。各种石油产品基本上都能供应了。当然，还要增加品种，提高提炼技术，使原油尽量得到综合利用。中国人口多，原油只生产这么一点，我们要尽量节约使用。中国还不能算是个工业发达的国家。中国有这么个矛盾，工业技术水平不算太低，但从需要量讲，经济还很落后。如供应农村用电问题，现在绝大多数人不能用电，也不是到处用煤油点灯，有些地方还用植物油点灯。所以，从需要量讲，中国变成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从工业化标准来说。

斯：的确非常使人感兴趣。可以看到上海制的一万二千吨水压机[280]和精密仪器，同时又可以看到人拉东西和赶大车的。

周：同时存在。

斯：有新的柴油机轮船。

周：还有舢板。在上海，特别是收集和运送肥料的。船更破烂得很。到苏北，还有更落后的现象。

中国的情况复杂得很。比如说革命战争，我们学会了不少，我们的确打败了蒋介石，的确跟美国打过仗。这都不是假的，是流过血的。但是，搞了十五年经济建设，老实说，我作为总理还没有学会呢！学了一些，但是没有学好。我们都在学习。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极其复杂的。我们有了些经验，还

---

① 这是同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节录。

要取得更多的经验。我们认识了一些规律，还有更多的未被认识的经济发展规律。十五年来，我们做对的不少，也有些做错了的。人必须有两方面的经验。过去打仗就是这样。我们打过胜仗，打过败仗，而且不止一次，然后经验才丰富，革命才成功。建设也需要如此。我们认为，只有敢于正视困难，才能克服困难：只有敢于承认缺点、错误，才能纠正缺点、错误。这样不断地克服困难，纠正缺点、错误，我们就能不断地前进。这些只能同懂得的朋友讲。不懂得的，以为我们一直都是全好的。哪有这样的事！另外一种人专挑岔于，发现我们有点缺点，就认为中国经济困难得不得了。现在中国经济情况好转了，又有人说好得不得了。他们总是对中国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察。对我们来说，方向是走对了。但是，这中间还会不断地发生困难、缺点，并不断地被克服和纠正，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得出更好的办法，推动事业前进。革命斗争如此，生产建设也如此。换句话说，阶级斗争如此，生产斗争也如此。人类总是不断地实践、总结经验，不断地发现、发明、创造、前进。

斯：顺便提一下，我曾说中国现在已经完全能自己制造喷气发动机和飞机了，但有些人提出了异议。你能否改正我的提法？

同：可以制造。

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这次会议是国务院召开的，我本来想用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去现场看看，由于临时有国际活动，回国后又忙于准备三届人大，离不开北京。

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281]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当然，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但改建后情况总会好些。

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早下结论。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能使黄河水土为民兴利除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是允许发表的。旧中国不能治理好黄河，我们总要逐步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黄河治理从一九五〇年开始到现在将近十五年了。但是我们的认识还有限，经验也不足，因此，不能说对黄河的规律已经都认识和掌握了。我们承认现在的经验比十五年前是多了，比修建三门峡枢纽工程时也多了，但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未知数要我们去解答。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

改建规模不要太大，因为现在还没有考虑成熟。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这个总设想和方针是不会错的，但是水土如何结合起来用，这不仅是战术性的问题，而且是带有战略性的问题。比如说，泥沙究竟是留在上中游，还是留在下游，或是上中下游都留些？全河究竟如何分担，如何部署？现在大家所说的大多是发挥自己所着重的部分，不能综合全局来看问题。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彼认识的领域，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不断地去认识，认识了一个，解决一个，还有新的未被认识。自然界中未被认识的事物多过人们已经认识了的。即使有那么多有关黄河的历史资料，当时也许看着比较好，现在再看就不够了，因为情况变了，沧海桑田，要变嘛！即使古书都查了，水文资料积累更多了，也还不能说我们对治理黄河的经验已经够了。这样说是不是永远无法做结论呢？那也不是。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内掌握得比较全面、比较成熟的东西，能够做结论的先做，其他未被认识的或未掌握好的，经验不成熟的，可以等一等，可以推迟一些则间解决。推迟是为了更慎重，更多地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有利于今后的规划工作。、

治理黄河规划即使过去觉得很好，现在看到不够了。也要修改，农村工作六十条[24]要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125]也要改。像这些摸熟的东西还要不断地改，何况黄河自然情况这样复杂，哪能说治理黄河规划就那：么好，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可能！因此，希望所有行政领导同志、专家要和群众相结合，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允许大家继续收集资料，到下面去观察、蹲点、研究。大家可以分工从各方面用力。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谦虚一些，谨慎一些，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

评补充。要破也要立。不要急躁，慢一点做结论。这是不是调和的意见呢？当然不是。而是集中对的，去掉不对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样，才能不断前进。

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对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既没有全面肯定，也没有全面否定。至于设想，可以大胆些。我曾经说过，可以设想万一没有办法，只好把三门峡大坝炸掉，因为水库淤满泥沙后遇上大水就要淹没关中平原，使工业区受到危害。我这样说，是为了让大家敢于大胆地设想，并不是主张炸坝。因为我不这样说，别人不敢大胆地想。花了这么多投资又要炸掉，这不是胡闹吗！我的意思是连炸坝都可以想一想。不过不要因为我说了，就不反对，就认为可以炸了。毫无此意。我也是冒叫一声，让人家想一想。如果想出理由来，驳倒它，就把它取消，不必顾虑。专门性的问题，就是要大家互相发现矛盾，解决矛盾，有的放矢，这样，才能找出规律，发现真理。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原来苏联专家是按正常高水位三百六十米设计的。我们把大坝高程和运用水位都压低了，施工时大坝高程改按三百五十米，初期蓄水位不超过三百三十五米。三百三十五米以下阵容原为九十六亿立米，现在已经淤了五十亿吨泥沙，只经过五年，已经淤了一半。仅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四年两年就淤积了三十多亿吨。如果再经过一个五年，又遇上两场大水，加上平常年度的淤积，三百三十五米以下库容即将淤满。到那时，回水不影响渭河、洛河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曾设想三门峡水库堆沙年限至少维持二十多年到三十年，在这个时期内，大搞水上保持等各种措施。但是，五年已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毫无问题对关中平原会有很大影响。关中平原不仅是农业基地，而且是工业基地。不能只顾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肯淹关中。这不是辩证的说法。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么办？为什么不从另一方面想想？如果三门峡水库淤满了，来了洪水，淹了上游，洪水还要下来，遇上伊、洛、沁河洪水，能不能保证下游不决口？即使不决口也有危险：我们看问题要有全局观点，要进行比较。

有的同志主张维持原状。但是，五年之内能不能把上中游水土保住？绝不可能！要求在五年内把西北高原上的水土保住，我看砍了头也没办法。要叫我去，也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因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三门峡工程总要改建。

当前的关键问题在泥沙。眼前五年十年内这一关怎么过？即使二洞四管的方案[282]批准后就施工，也要到一九六八年或一九六九年才能生效，而且四管只能泄一千秒立米，排沙有限。如果在这期间遇上像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四年的情况，库区再淤上三十亿吨，怎么办？这是燃眉之急，不能等。

本来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事，请计委批准就可以了，可是有些意见出入比较大，不征求大家的意见还不安心，因此挤出时间来参加这次会；听了大家的意见以后，情况清楚了。现在，大家都认为增加二洞四管还是需要的，对三门峡工程改建问题的争论少了。个别同志反对这个方柔，主张上游修三个拦泥库，只拦泥，不综合利用。我看光靠上游建拦泥库来不及，而且拦泥库工程还要勘测试点，所以这个意见不能解决问题。即使说过去水上保持做得不好，上游勘察工作做得不好，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电力部工作上都有错误，但是眼前的这个病怎么治？要回答五年年怎么办这个问题。反对改建的

同志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不看中游发生了坏现象呢？如果影响西安工业基地，损失就绝不是几千万元的事。对西安和库区同志的担心又怎样回答呢？实施水土保持和拦泥库的方案还遥远得很，五年之内国家哪有那么多投资来搞水土保持和拦泥库，哪能完成那么多的工程。那样，上游动不了，下游又不动，还有什么出路！希望多从全局想一想。我也承认三门峡二洞四管的改建工程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是在想不出好办法的情况下的救急办法。改建有利于解决问题，不动就没法解决问题。改建投资可能多一些，但即使需要八九千万元，也不能不花，哪能看着问题不去解决！看问题要有全局观点，要看到变动的情况。三门峡工程二洞四管的改建方案可以批准，时机不能再等，必须下决心。

今天，我只能解决第一步增建问题，其他问题我还要负责继续解决，不是光注意了中游，不注意上游，更不是不注意下游。绝无此意。现在成熟的方案只有这一个，其他的事情还要继续做。

再补充一点，一切问题都要到现场去实践，通过实践，不断总结，取得经验，然后再实践再总结。到现在我还担心二洞四管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满，还可能会遇到困难，还可能发生预料不到的新问题。设计方面要多研究，施工时要和工人多商量，要兢兢业业地做。如果发现问题，一定要提出来，随时给北京打电话，哪一点不行，赶快研究。不要因为中央决定了，国家计委批准了，就不管了。因为决定也常会出偏差，会有毛病，技术上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更多。我再重复一句，决定二洞四管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既然决定了，就要担负起责任。大家要时常多想想。因为，黄河的许多规律还没有被完全认识，这一点要承认。我还要再三说一下，不要知道一点就以为自己对其他都了解了。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一九五九年水电部修建了三百多座大型水库，这几年“下马”了一些，现在还有将近二百座，很大一部分工程没有完成，遗留问题很大。修水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几年的教训是应该深刻吸取的。

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

①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大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163]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实现上述第一步任务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工作做好了，再经过大约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可以有把握地使我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我们在今后发展国民经济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顺利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78]的一个重要保证。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应该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

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252]，工业的发展规模，要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各行各业都应该面向农村，为农业服务。重工业部门应该首先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机械、化学肥料、农药、燃料、电力、水利灌溉设备和建筑材料，同时为轻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原料、材料和设备。为了实现这个要求，进一步加快重工业首先是基础工业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农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国家给以必要而又可能的财力、物力的支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公社[198]的集体力量。

第二，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从而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

各国人民之间的援助，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互助互利的。那种以“经济互助”为名，把别国的经济变成附庸，是大国沙文主义[159]的作法。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一个国家只有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才能更有力量去支援别国。而在援助别国的时候，又必须促进受援国家实现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方针。中国人民不是懒汉懦夫，过去没有、今后也决不会依赖别人过活。我们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同时，我们仍然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认真地加强对外援助，努力做出更大的国际主义贡献。

第三，实行技术革命。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

---

① 这是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第一部分中的一段话。

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283]

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

第四，实行集中领导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领导群众运动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开展群众运动，也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就是：要把任务交给群众讨论；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实行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要干劲十足，又要劳逸结合；对于群众的各种创造，必须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必须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农村卫生工作和计划生育问题

①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一日）

这是林大夫[284]和傅连■[285]会长给我出的难题。你们讨论妇产科专门问题，我完全是外行。我讲什么呢？我讲讲卫生工作面向农村和计划生育的问题吧。

我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八，城市人口只不过占百分之十二三。如果我们的卫生工作不把重点放到农村，那怎么为劳动人民服务啊？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的口号等于没有兑现嘛。这个问题直到毛主席再三提出来，才引起卫生部门的注意。当然我们政府要负责，我做国务院总理的首先要负责。虽然有时也说过，但提得不那么着重，不那么尖锐。毛主席这么一提，卫生部门就具体订计划了，现在已经有了初步规划。

在五年之内真正把农村中三种卫生人员培养起来。这是一个艰巨而伟大的任务。一种是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每个生产队[204]有一名，全国有五百多万生产队，就要训练五百多万卫生员，五年能不能做到，现在还说不定，也许需要十年。要培养这样多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使他们成为多面手，既能治一般的病，又能治妇科病，还会接生。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你们在座的都有责任，不要把它看得容易了。卫生员不脱离生产，又有一定的本领，生产队非常欢迎。当然不能保证培养这样多的人都是百分之百地合格，不合格就再培养，再进修嘛。第二种是在生产大队[203]和一部分公社[198]能够有半脱产的卫生员，治病时给他记工分，不治病时也去参加体力劳动，这些人由公社或大队管。对他们的本事要求高一点，不仅能治一般的头痛、伤风，还能治一些比较难治的病。全国有八十多万个生产大队，一个大队培养一个人就是八十多万个，有的大队还可能不只一个人。第三种是为公社或区里培养脱离生产的专职医生。全国有七万多个公社，每个公社培养三至五人，总共就要培养大约三十万人。这些人基本上脱离生产，在一年里有些时间能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也好。应该说明医务人员的工作也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的。林大夫过去忙的时候，一星期要做好几次手术。年轻的大夫每天在手术室做手术一站几个小时，手术前还要做准备，这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是脑力和体力结合的劳动。护士也是一样。除去医生和护士外，还有医院的其他技术人员也都是半脑力劳动半体力劳动。

怎样才能帮助农村培养出这三种人，这是个大问题。现在整个卫生队伍除行政人员外，还不到一百万人，要训练这三级卫生人员六百万到七百万人，我看五年不可能实现，也许十年才能实现，可能还要扫尾。计划可以打得宽一些，工作要抓紧，如果不到十年完成当然更好。在座的女同志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培养上述三种人中人数最多的不脱产的卫生员一级，可能大多数是女同志，六七百万各级卫生人员半数以上是女同志，任务很艰巨。你们如何去培养呢？如何入手呢？一定要组织大中城市、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以及军队的医务人员，分期分批组成医疗队，到农村去，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治病，一是培养医务人员。只要真正为农民治病，为他们培训医务人员，

---

① 这是接见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农民就欢迎得不得了。对一部分年老体弱的大夫不能勉强他们去，年纪太大了，走路都要人扶，还不如留在城里。像蒲老，蒲辅周[286]先生，是很有名的中医，如果到农村去，受了风寒，反而把他的服务期限缩短了。这样的医生就要留下，他们可以教学生，也可以写点东西，把丰富的经验留下来，对人类对人民都有贡献。城市也不能不管。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三，有一亿多人，将来也许更多，要做好他们的医疗保健工作。要改革医疗制度，还要培养人，这也是很重要的任务。

另外，我讲讲计划生育问题。对计划生育要进行宣传教育。一方面要有一些规定，如在工资、住房、供应等方面，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要给予优待，一方面要自觉自愿，绝对不能强迫命令。又要自觉自愿又要有所约束。要用各种办法帮助人们避孕。怎样使我国人口能有计划地生育，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现在全国有七亿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得太快，生产就跟不上，这是一个大问题。要使全社会都能够按照计划生育的要求，在二十世纪以内把人口年纯增率控制在百分之一，这就很了不起。总之，计划生育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上述这个要求并不高，如果能够提前做到当然很好了。

抗旱防涝，争取丰收

①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

这次会议开了十天，因为讨论的问题比较大，多耽搁了你们几天，但是有好处。我现在综合大家的意见，扼要地作个发言。讲五个问题。

一　为什么这次只召开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会议

因为这个地区去年旱灾较大，而且据气象预报，今年旱象仍大部分集中在这个地区，不仅是旱一年，也可能是旱二年、三年。更主要的是，这个地区经常出现灾荒，东至辽宁，西至陕西，北至内蒙古，南至山东、河南，非旱即涝，有时春旱，有时秋涝。从历史上看，这个地区就常常连续大旱几年。

解放十六年来，国家对这个地区的农田水利拨款、救灾拨款占全国同类拨款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这个地区的人口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三十四，可见这个地区拨款是偏高的。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国家支援农业的投资共六百六十五亿元，这个地区共二百二十三亿元，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五。但在这个地区内也很不平衡，河北、河南、山东占的比重更大些。我们应该承认这个地区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但是也要承认我们没有能够大大减除这个地区的旱涝威胁。国家长期南粮北调，近五年来还进口粮食，主要是接济这个地区。这个地区一般每年要调进一百亿斤左右的粮食，一九六五年度要调进一百二十亿斤。我们进口的粮食最高数是六百万吨，这就等于把全部进口的粮食用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农民的口粮和收入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更不及南方。

这个地区又是重工业的集中地区，一九六五年的工业总产值五百四十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九。从工业总产值上看，全国第一是上海，第二是辽宁，第三是河北，第四是北京。这个地区一旦有事就是一个大战场，古战场在这里，今战场也会在这里。这里又是首都的所在地，打起仗来很可能是敌人轰炸的重点与主攻方向。

因此，从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287]的长期战略思想来看，这恰恰是一个薄弱地区。正因为这样，在这个地区不仅要抗旱防涝，而且要把它作为农业上的主攻方向，像搞大小三线[288]、国防工业、基础工业那样重视，并且由中央、国务院协同各级党政领导一起来抓。一定要狠抓。你说过去没抓，也不是，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五年给了这个地。区水利贷款七十亿元，钱是花了，但抓得不狠，松松垮垮。急起来就忙一阵，过去那一阵又丢了。我们有许多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要从战略上考虑，时不我待，一旦有事，这个地区是有弱点的。把弱点补上，不快不行。现在要狠抓快抓，每年要抓几次，一直抓到合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起码要求。什么是起码要求？第一，粮食要自给。不仅河北、河南要自给，天津、北京的城市用粮也要在这个地区解决。第二，队有余粮。现在粮食主要储备在生产队[204]。毛主席讲过多次，我们在陕北的时候，每年

---

① 这是在国务院召集的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山东、河南、辽宁等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征收不超过二十万担，后来减到十八万担。那时候，我们走到哪里都有粮食吃。一九四四年大旱，部队、老百姓都有粮食吃，老百姓还有余粮。所以，队有余粮才靠得住。第三，国有储备。国家在这个地区要有粮食储备。第四，农民的口粮和收入要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这是农业上的战略要求，是主攻方向。

当然，这不是说对其他易旱易涝地区就可以不注意了，更不是说对全国农业就不注意了，毫无此意。全国第三个五年计划[163]的农业投资拨款六十六亿元，已经定了就不变了。这些投资要按计划分给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去管；部分旱灾区，如东北吉林西部，华东徐、椎、宿、阜[289]，西北宁夏、陇东，均交各大区负责抓。农业部除拿出一部分力量搞北方的抗旱防涝外，对全国也要注意，要照顾全局。总之，中央和国务院要集中主要力量抓农业战略地区，也是备战的战略地区。这是我们的主攻方向，要长期抓下去。

二　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形势如何

这个地区的人口有二亿四千万，占全国七亿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的三分之一。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三分之一略多一些。这个地区的土地面积共有二百二十三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三。耕地六亿四千万亩，占全国十五亿五千万亩的百分之四十，耕地是比较多的。全国森林复盖率是百分之十一，这个地区是百分之十，略少一点。这个地区的年降雨量通常有四百到八百毫米，去年是二百到六百毫米。但是，这个地区粮食的产量是比较低的，去年只有一千零四十八亿斤，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五。棉田面积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十，但棉花产量只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三。油料产量占全国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是比较好的。猪占全国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七。大牲畜二千五百四十七万头，占全国的百分之三十一。农民的口粮全国平均每人三百八十斤，这个地区只有三百斤出点头。农民的收入全国平均每人五十七元，这个地区是四十六元。从这些数字综合起来看，这个地区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农业的产量、农民的口粮、农民的收入水平一般落后于全国，但也不是很落后的，说得那么泄气也不好。从全国来说也是很不平衡的，在这个地区以内也极不平衡。不仅农业不平衡，工业也是如此。这是中国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带来的，现在我们要逐步走向平衡，但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从自然条件看，这个地区的耕地多，土层厚，日照时间长，雨量在正常年份也不算少，但不均匀。地上水和地下水也不是那么少的。森林复盖面积少一点，但是造林。并不是很困难的。比如，北京和天津，北京注意了，就把造林搞起来了，可是天津的铁路两旁没有树，难看得很，不是不能造，就是注意不注意的问题。当然，这个地区的地形、地质比较复杂，有黄土高原、山地、坡地、洼地，有碱地、沙地。地上水不少，但是一旱就干了。地下水位有些地方很低，有的地方低到二百米以下，我们的水文地质工作做得不到家，对地下水的情况不了解。希望地质部抓一抓农业的水文地质工作，在华北搞一些资料。

从社会经济条件看，这个地区的人多、劳力多，生活比较苦，但只要动员组织得好，干劲更大。工业支援农业的条件好，是个重工业地区，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交通运输比西北也便利得多。中央也在这个地方，近

水楼台嘛。过去国家对这个地区投资不少，有积累，但没有用好、管好，一旦配起套来，用好、管好，潜力会很大。对这个地区的农业，中央抓过，但没有一直抓下去，我们作自我批评。

这个地区有很多“红旗单位”[290]超过了“纲要”[125]。如，河北的山地有个遵化县，是全省的模范；平原有个正定县，粮棉双丰收；盐碱地有沧州的佟家花园，台田亩产七百零七斤。天津治碱搞了一百五十万亩，种了一百零五万亩水稻，平均亩产六百斤，这不是过淮河了吗！山西的大寨[291]去年那么旱，平均亩产还是七百九十斤，今年还要搞到八百斤；羊井底农、林、牧、副综合经营和改土都搞得很好；太谷县的水利也搞得很好。北京市搞得最好的是平谷县。内蒙古伊克昭盟的乌审昭公社搞治沙很有成效；赤峰县的当铺地大队搞林网畦田[292]，改造沙地也很好，达到了高产。辽宁的建昌县白塔子大队粮棉双丰收，棉花亩产一百九十斤。山东有个下丁家大队，是大家知道的；鲁西还有一个阳谷县，土地盐碱化很严重，过去寸草不长，现在粮食亩产三百多斤；还有临沂专区搞得也很好。河南的林县山地梯田、鱼鳞坑搞得好。陕西澄城县改土改得好，百分之七十的土都改了。总之，省省有“红旗单位”，县县有“红旗单位”，问题是我们要抓这些典型，推广这些典型，要搞比、学、赶、帮、超。所以，这个地区也不是很落后，天下到处有芳草。任何“红旗单位”都是有缺点的，不会是十全十美的。大寨也有缺点。陈永贵[293]到了下丁家大队，感到大寨有不如下丁家的方面。有对立面才能前进嘛。

总之，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大有潜力，大有可为。既然是这样，就要克服困难，解决矛盾，只要掌握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就能够解决它。共产党就是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根据上面说的这些情况，我们提出八省、市、自治区的任务是：抗旱防涝，争取丰收，摆脱落后，力争上游。抗旱防涝，争取丰收是当前的任务；摆脱落：后，力争上游是长远的任务。这是八省、市、自治区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光荣的任务、光荣的战斗。

三　如何抗旱防涝，争取丰收，摆脱落后，力争上游

改造客观世界，首先要改造主观世界：要丢掉幻想，确定人定胜天的认识和信心，精神面貌才能一新。要突出政治，全面动员。去年，我们在工业、财贸、文教等各个战线上，都是强调突出政治，收到了很大成效。抗旱要丢掉幻想，全面动员，要一直讲到生产队，讲到工、农、商、肆、兵中去。各级领导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学习毛主席著作，走群众路线，结合“四清”[294]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抓两头，带中间，树立样板，推广典型，以点带面，推动全局。要把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和领导结合起来。具体办法是：

（一）中央和国务院要发一个动员文件，搞短一点，要在县、社[198]、大队[203]都能讲、能读。还要经中央批准成立北方农业领导小组[295]，并建立各级农业领导小组。要狠抓、快抓、年年抓、长期抓。

（二）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局一年至少要抓三次。八个单位分七个组，有组长，配一两个副组长。我抓河北和北京，先念[296]抓河南，震林[297]抓山西，秋里[298]抓陕西，乎加[299]抓山东，光伟[300]抓内蒙古，富春[136]抓辽宁，富春要是身体不好，一波[111]代上。这次只是一个开端，今后一年至少要抓三次。要到下面去蹲点，要抓一个先进单位、一个落后单位，经验要从

群众中来。还要和省、市、自治区一道开会，出点主意，把群众的经验集中起来，帮助推广。还要督促检查。也不要希望我们做得很多，至少可以起鼓舞、带头作用嘛！我们还要和有关的中央局打招呼，一道去抓。

（三）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委一年至少要抓四次。书记、常委要分工，一个人管几个地委或者管几个县委，要下去蹲点，好的、落后的都要抓，要开三四级干部会[301]，总结收获，推广经验，发掘潜力，继续前进。县、社怎么。抓，由省、市、自治区规定。中央、中央局和省一起抓，省、地委一起抓县、社抓到队，这样才能抓深抓透。

（四）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的有关文件。还要甩中央的“前十条”[302]和“二十三条”[303]教育群众。（五）改变领导方法。毛主席听了河北检查三多三少的情况汇报，到南方各省都讲了。一个是一般号召多，个别指导少，今后要倒过来，个别指导要多于一般号召；一个是依靠领导核心多，依靠群众少，今后领导要多和群众相结合；再一个是自上而下多，自下而上少，今后要多到群众中去取宝，从群众中取经，要自下而上多于自上而下，从群众中来多于到群众中去。

（六）要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办法和智慧都是从群众中来的，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然后再到群众中去实践，坚持好的，修正错的。

（七）依靠贫下中农和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依靠他们发动和组织群众，使落后的变先进，先进的更先进，你追我赶，不断进步。

（八）中央、大区、省市自治区和地委的干部，有一部分人要搞“四清”，也要有一部分人下去蹲点抓抗旱。上面下去的干部，一定要听从当地党政领导的指挥，不要瞎指挥。一切为人民、为革命，要有组织才能做好工作。

四　抗旱防涝、争取丰收的方针和任务

（一）抗旱防涝要与备战相结合。现在形势逼人，我们要立足于打仗，立足于早打、大打。当然，打不打还晃有两种可能性。

（二）抗旱防涝要与备荒相结合。要有长远打算，不能一锤子买卖，这样才能积累经验，克服困难。

（三）抗旱防涝的紧急措施要与农业的长期规划相结合。当前调拨的一些物资要与“三五”计划结合起来。

（四）抗旱防涝要作全面动员。不仅农村要讲，城市也要讲。城市用水要节约，不讲不行。要用中央的文件、各省的报纸进行宣传，动员群众。

（五）抗旱防涝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国家要积极支援，一定要落实，说了就算数。支援的东西不在于多，而在于实。县以下单位一定要立足于自力更生。

（六）抗旱防涝，现在以抗旱为主，但不要忘了防涝。

（七）抗旱防涝要节约民力，不要浪费民力。不要把群众动员起来以后，搞得过于疲惫；不要在非紧急时，过于消耗民力。否则，到真正需要的时候用不上。不要忘了我们还要有备战、备荒的长远考虑，还要有早打、大打的准备。没有人民一事无成，一定要爱护民力。党的领导、领袖是从人民中来的，不要忘掉劳动人民。河北解冻后还要搞献县减河工程[304]，我们提醒一下，要注意节约劳动力。

（八）抗旱防涝要安排好群众生活，要注意防治疾病。下去的人首先要抓这个事情。现在有七百万人没有水喝，特别要解决好群众最小限度的饮水

问题。

（九）抗旱防涝要保护好牲畜，特别要严防兽疫。

（十）抗旱防涝要注意保护农具，修理农具，不要损坏农具。

（十一）加紧积肥和沤肥。要多施底肥。分配化肥要照顾抗旱，但主要靠农家肥料。

（十二）多备种子，特别要多准备一些晚田种子，公社、生产队要准备，粮食部也要准备。

（十三）千方百计开辟水源，节约用水，控制用水，不要浪费一滴水。城市也要节约用水，自来水也要控制。

（十四）要打井。打机井、砖井、土井。要搞半土半洋的井。要开渠，截潜流，修水窖，整土地，修“四田”（梯田、台田、园田、坑田）。这些都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绝不要强求一律。要有长期打算，有阵地地前进。打井要勘察清楚了再搞。失败总是会有的，但是要少一点。搞起来的水利工程，暂时不配套的要保护好，要有长期打算。

（十五）要清查机具。各省要组织专门班子抓这件事情。要修复机具，使各种机具配套，并要管好、用好机具，安排好新添的机具，务收最大效益。清理、修配、使用、管理都要抓好。排灌机械由什么机构来管，有的主张搞机械公司，就是搞托拉斯[254]，把管理、供应、修配统一管起来：有的主张分开，由机械公司管修配和供应，另外有一个行政机构进行监督。我们打算搞灵活一些，由各省良已去定，在一个省、一个专区之内也可以有所不同。

（十六）要管好用好一切抗旱救灾物资。工作要落实。

（十七）归地方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分省作全面考虑，进行排队，急其所急。归中央管的项目也要逐一审查，基本不动，如有必要，容许局部和进度上的调整，但是调整项目要与物资设备对口。

（十八）地方机动的财力、物力，要集中使用，用在刀刃上，并要留有余地。特别是动用上年结余和当年预备费，要向中央打招呼，看物资能不能解决，如能解决，再办。

（十九）要不误农时，抢季节，定先后，抓重点，更要早作准备工作。现在干旱，只要下一点雨就要及时抢种。

（二十）高产田与基本田要并重。前者是重点保丰收，后者是全民保命粮，队队有，人人要，都放松不得。各省、市、自治区都分了几类情况，有水源的地方要保证高产。亩产达到六百斤、四百斤、三百斤。但是，我们看得不一定那么准，达不到这么多怎么办？因此，缺水的地方一定要搞保命田。这些地方连保命粮都得不到，那就不只是调进一百二十亿斤粮食的问题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不能指望再多进口粮食，我们现在已经进口六百万吨粮食。所以，要队队、人人都搞保命田，否则将来人口到处流散，对备战、备荒、为人民都不利。农业与工业不同，农业的生产关系是集体的，生产力还是手工作业，交通运输就把我们限制住了，农村面那么大，居住那么分散，就是有粮食也运不到。

（二十一）各省、市、自治区都按地形分了几大片，采取分别抓的办法，我们赞成，这样注意力集中。根据当地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但要注意经常检查，发现措施不适当的要改正。要抓两头，丰产区要抓好，困难的地方也要注意抓好。

（二十二）尽管是灾年，粮食减产了，副业和多种经营可以多搞一些，

粮食少了，要使农民的其他收入有所增加。

五　要积极支援八省、市、自治区抗旱防涝，争取丰收

既然决心把抗旱防涝作为主攻方向，长期搞下去，那就需要各方面积极支援，使这一地区达到“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起码要求：粮食自给，队有余粮，国有储备，农民生活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如何支援，将来还要作具体的部署，现在先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物资支援。中央在物资支援方面的十几个项目，计委、农办作了安排。我说各省、市、自治区既满意又不完全满意。物资支援不只是一次的，但也不要有奢望。我们还要搞“三线”、基础工业和国防尖端，这些不搞上去。国力不增强，敌人就要欺负我们。

（二）地方自助。要清仓，清地方积压的物资，挖掘地方的潜力。

（三）工业支援。这一点要责成经委继续抓。地方工业增产部分归地方支配，中央工业增产了也可以分给地方一些。工业的增产大有油水。这次拨下去的四万吨钢材就是增产解决的。

（四）“三清”。清设备、清材料、清资金，归地方管的清出来由地方支配。中央管的你们也要帮助清理，清出来的东西除了照顾大小“三线”和国防工业以外，也要帮助地方解决一些问题。要点滴归公，不要平调[305]。

（五）财粮准备。财政和粮食，中央和地方都要留一部分在手上，作为机动，不要一下用空。特别是粮食要控制得紧一些。现在不是农忙季节，不要前方吃后方粮。

（六）运输调动。要抽调一些车辆支援抗旱。要减少一些自行车的生产，增产一些胶轮车，支援抗旱。运输线上也可能有调动，中央、地方都要准备。

（七）城乡结合。建厂和迁厂都要像大庆[279]那样，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每个城市如何与农村结合，由省、市、自治区安排。一旦有事，城市就有了后方，还可以吸收一些剩余劳动力。青年要下去，大中城市都要做这个部署，由各省、市、自治区安排。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

（八）地方挂钩。市委和地委挂钩。天津市和承德专区挂钩，北京市和张家口专区挂钩。北京市要有一个书记兼张家口地委的书记，张家口要有一个书记参加北京市委。挂钩是互相协作，彼此支援，不是互相吞并。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

我讲的这些意见，千万不要作为指示，仅作为建议，供大家参考。会后，中央将会下达一个文件[306]，应以此为准，贯彻执行。

抓紧科学技术考察

①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

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要从国外买一些东西，还要学一些东西。我们在国外的考察人员不是没有出过问题的。对出国考察人员的审批要严一些，出去的时间要错开一些，不要一个时期集中在一个国家。有些国外的东西并不那么先进，那就没有必要去考察。有些考察得不适当，不仅没有取得东西，反而把我们的底都漏给了人家。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一定要把住这个口子，对出国代表团、科技考察小组负责抓总。以后每年年底都应该抓下一年的出国代表团问题。外办可先要国内有关单位报告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和经验，然后作个总结。请陈毅[188]同志或廖承志[307]，同志主持开个会，请有关各部部长来参加，把这方面的问题讲清楚。外办要有专人负责管理出国考察人员的工作。组织工作绝不能大而化之，作为综合的归口部门要抓得细。此外，外办和有关外事部门还要抓好对出国代表团的教育问题，大使们也要抓紧对出国代表团的领导工作。

各个不同地区的使馆应有不同的任务，有些使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抓好科技调研。我们可以从西方学到一些东西。当然，西方的科学技术也不是什么都先进，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要学，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已经有了。知道我们有什么不够的地方，才可以决定我们要向国外学习什么。

驻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要学点科技知识，夫人们也要学一点。我们的干部既要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又要有一定的科技知识，这也是两结合。在西方国家做大使要亲自学些东西，自己不懂，可以找一两个帮手，认真啃点东西。使馆回来的同志也应该结合驻在国的科技情况的特点，在国内参观一些有关的工农企业，如果在安排参观问题上有困难，可提到我这里解决。]

---

① 这是同我国部分驻外国使节的谈话节录。

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

①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林业工作要面向全国，依靠全党全民，要两条腿走路。林业部过去只注意林区采伐，我看主要任务还是造林[308]。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可能转过来，林业和水利上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百分之十多一点。十六年来，全国砍多于造，是亏了。二十世纪还剩下三十几年，再亏下去不得了。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

造林也要两条腿走路，要依靠六亿农民。四旁[309]植树也是个大工作。兵团要搞试点。用剃光头的办法采伐森林，采光了就走，修一条林区铁路废一条，这怎么得了！营林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吃光了就算，当败家子。[310]。过去林业部长梁老[311]经常讲这个问题。现在抓紧造林还不晚。

林业部要把主要力量放在南北方造林上。要调查公社[198]的造林办法，总结推广经验。

国营与群众营林，重点放在群众；伐木与育林，重点放在育林；前方与后方[312]，重点放在前方。重点放对了，才能用得少，造得多。总得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63]时期摸出一套林业工作的经验来。

北方八省[313]地区大，人口多，树林少，造林工作搞起来能很快发展。南方各省条件好，更要做好。南方本来有林，现在一些地方也有水土流失的现象。南方造林、护林、用林都很重要。

林业部到处提倡植树，可是在眼睛鼻子底下，就是到北京机场这一段路好，北京到天津的路上最难看了。十多年了，要你们在铁路两旁植树，就是不种，可难看了！有人讲公路上好一些，可是我从火车上看公路，也是一样。树本来是容易种的，与公社结合，委托给他们，分段负责，就能种好管好。

西北地区造林要集中在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地区，不要孤零零地分散搞。分散了，投资很大，功效很小，起不了多大作用。

西北黄土高原搞了多少年造林啦？劳大功小，要很好总结经验。陕北防沙林带有人烟，地下水浅，就可以造林。靖边、定边高原上水位低，不容易成林。要有选择、有阵地地前进。面对黄河流域二十八方平方公里水土流失区，只要有雄心壮志，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能战胜它。黄土高原是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我们不仅要恢复森林面貌，而且要发展得更好。

西北局要搞一个领导小组，管农垦、水土保持。农林互相支援有好处。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总得坚持到二十一世纪。华北大有可为，西北更是大有可为。

---

① 这是同出席全国林业工作会议的西北各省、自治区林业厅（局）长和西北林业建设兵团、林业部负责同志的谈话。

改造北方农业的落后面貌

①

（一九六六年三月五日）

许多同志下去看了，发现了一些问题，也发现了一些好的典型，取了一些经回来。下边动起来了，只要到下边去看，抓住要害，抓到底，前途无量。改造北方农业的落后面貌，现在是一个好的开端。下面我就同志们谈的一些情况，讲十个问题。

一、首先还是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挂帅

抓八省、市、自治区的农业，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287]这个战略思想出发。我们已经抓晚了，现在就利用旱灾来抓这个地区。最近下了雪，旱情好了点，但不能松劲，更要抓紧，而且下了雪更容易抓了。秋里[298]同志说的很对，今年要做到真正能增产，打响头一炮，群众看到这样干有效，才能增强信心，才能把生产建设搞上去。如果头一年就搞瞎指挥，以后就不好办了。

长葛县委的材料很好，毛主席有批语[324]。毛主席抓住了长葛，讲了水、肥、土、种、密植。我们就是要抓典型，要毛泽东思想挂帅，深入下层，总结当地的典型经验。省省有“大寨”[815]，县县有“红旗’”。下去的同志遇到问题，要求教毛主席的书，求教老农。毛泽东思想就是从实践中来的。关键就是要抓紧，抓紧了下去就会发现问题，就会发现好的样板，就地推广。一年不行，二年、三年，一直搞下去。不要怕走弯路，总要走一些弯路才能取得经验。但是，这次我们抓北方八省、市、自治区，要力争少走些弯路，多交流经验，互相提醒，互相学习，谁也不能、发指示，最高指示是毛主席著作。一般的是依靠总结群众的经验，认真加以推广，反复地总结、推广，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要把各种错误的思想、幻想、等待情绪和侥幸心理等抓住，把大寨[291]等几面红旗高高举起，依靠自力更生。去年陈永贵[293]看到了困难，想了一些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亩产七百九十多斤的成绩，交了国家二十多万斤粮。他们首先是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国家的观点、全民的观点，他们表现得最突出。焦裕禄[316]虽然未完成他的事业，但是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他的文章别人可以继续完成。我们是含着眼泪看完歌颂焦裕禄事迹的报道文章的，可见这种教育很重要。这样才能把比、学、赶、帮、超搞起来，才能改变精神面貌，改变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农业落后面貌。

二、点、面、片结合问题，带的问题，经验交流问题

点、面、片相结合，带的办法是个好办法，但不要只是一带二，可以多带，可以一带几，要有一套办法。山东曲阜东郭大队一带八是一个好办法。主要靠自己，但不带他们就起不来，就认为高不可攀。现在有的地方就是不敢树红旗，不敢搭梯子，如大寨旁边的大队[203]就不学大寨，下丁家附近的也不学下丁家，倒上江苏去学启东。因此，东郭大队一带八是个好经验，可以大力传播这个方法。

要解决两条：一是政治挂帅，二是具体深入实际。推广典型经验，关键

---

① 这是在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汇报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是干部带头蹲点，向群众学习。工作队下去不是搞瞎指挥，而是规定三大纪律：下去首先是学，第二是帮，第三是听指挥。因为下去的干部多是知识分子，千万注意不要瞎指挥。瞎指挥往往是由上而下产生的，不是由下而上，因为下边搞瞎指挥没有饭吃他就不干了。下去蹲点，大批干部都下去了，我们不下去也不行，这叫形势逼人。毛主席提的一年要下去四个月，我们领导同志哪一个下够了四个月？我看从今以后，一年至少要抓两次，至少要到生产队[204]里去看看，只要抓，总是可以抓出点名堂来的，这样才能起带头作用。五年不行十年，把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农业面貌改变过来，初步改变是三年、五年。三五年内不把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面貌改变过来不行。办法是勒紧裤腰带，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由下而上搞出个农业规划出来。对下边我们只是起帮的作用。有人提我们叫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领导小组，我想还是叫农业小组，不要提“领导”二字，一提领导，问题就多了，也与我们帮的作用有矛盾。主要还是依靠地方，不靠地方，光靠我们几个人能干出什么来。我们还是一学二帮三听指挥，对下顶多是提提意见。智慧在群众之中，所以我们下去要听群众的，首先是：学，要三同[317]，能同多少就同多少，一般干部争取多同一点。要听地方上的指挥，要帮助，但要有成熟的意见再讲。当然，也不要太过分了，该讲的还是要讲。号召起作用，但弄不好就成了一般号召。不是成熟的意见捅下去，就会出乱子。

三、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厂社关系问题

处理这些关系，既要带又要结合，而且要慎重。厂社挂钩搞得不好又要平调[305]，还会产生依赖思想。所以，要试点，搞得好的要推广。巩固工农联盟，缩小三大差别，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不要一下子就说得太好了，这样就会发生一九五八年头脑太热的情况。就拿家属来说，有安置问题、工资问题，这是极其复杂的问题。大庆[279]试点的经验很好，有节制地来安置职工家属，生产扩大一点来一点，现在只有一半家属到了大庆。去年我就想发愤抓一下人事工作，搞一套制度，但没有时间，也没有个班子，看来，要设个班子，不能光搞枝枝节节。究竟如何搞，大家可以考虑，但要慎重，各行各业都要好好研究试点。把一些不合理的旧框框、旧教条都改掉，这是个关系到工农关系的大问题。每年仅纯增加的城市人口，就要增加十二亿斤粮食，连同其他各项补助共增加二十四亿斤。要实现不进口粮食，不南粮北调，这是个大任务。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总要求来解决这个问题。

四、工业支援农业、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

工业对农业，应当支援的要认真支援，但是农业也支援了工业，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互相支援。中央和地方上的关系也是一样，有些事要让地方去做。关于成立北方农业小组的事，我为什么迟迟不向中央提出来呢，主要是要看一看，考虑一下这样做对不对，不要出乱子。中央要靠各中央局，各省要靠各专县[318]，应由地方管的，中央就不要去管。不要多干涉，应该多请教，要有这样的精神。号召文件不要多，电话可以打但不要乱打，不要干扰人家。要强调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现在农业小组管八个省、市、自治区就够了，不要再增加了，主攻战略方向还是要集中，不能再扩大战线了。省与省的关系主要还是要靠自己，不要伸手去要。鼓励多支援，鼓励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都要自力更生，也要互相支援。如钢铁、煤炭、化肥等，别人援助一点还是需要的，但眼睛不要总看着外头。

五、农机具问题

四大套农具和改土、打井、排灌、土石方基建、运输、加工等等机具，不可能一下子都解决，但希望计委、经委、一机部和八机部等单位很好地计算一下，每年能拿出多少分配给地方，分配给农业，分配什么型号，要因地制宜。农机具不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不行，光靠公司怎么能生产？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分了一点给地方，也没有很好用，如双轮双铧犁，人们不用挂起来，现在恢复了名誉。一条经验，外来之物得来容易，就不重视，所以还是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因地制宜，由地方自己去做。如何生产，如何分配，管理这一套，计委、经委、一机部、八机部要研究解决。这是多少年的事，总得有个设想。一九五九年，毛主席提过到底给农业多少吨钢，只有个数字还不行。要省省、县县落实。这个问题下次中央工作会议要回答，“三五”计划期间[163]要解决。

六、水、肥、土、种问题

基本的东西还是土和良种，土、种是根本，其他是条件。没有土、种就长不出粮食来，兰草、水仙可以离开土，但开始种还是要在土中长出来。土、种重要，但没有水、肥不行，没有空气也不行。关于水、肥、土、种的次序问题，有人提出要改为“土、水、肥、种、密……”、少奇同志也讲过要把土字放在前头，听说毛主席讲可暂时不改。无论改不改，土、种这是两个基本方面，改土是比较长期的基本功，搞水也是长期的基本功。如打井，要求一年都打起来，就要犯错误，打多了一定会出毛病，会劳而无功，要提醒人们注意。水对摆脱落后把粮食搞上去，是一个主要矛盾方面，但是也有时间性，有时防涝，有时抗旱，因此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不能千篇一律。抗旱应防涝，抗灾要保畜，内蒙古不提保畜不行。种子要经过试验也需要时间，试验了还要年年选种，良种时间长了也会退化。肥来的快一些。总之，要考虑土、种、水、肥等等的相互关系，不要取其一点，要八字宪法[211]综合运用，但也要有重点。

七、科学推广和劳动力安排问题

劳动力浪费是很危险的，浪费了劳动力就等于浪费了粮食。如城市的青年、儿童到郊区去劳动，干不了多少活，还要生产队的劳动力看着他们；他们多吃了粮食，还起不了多少作用。如要劳动锻炼应用别的可行办法。要把劳动力安排到必要的地方。河北省一搞就是上多少人，一窝蜂、大平调、大兵团、大呼隆，这要注意。

科学种田，就是把农民群众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科学分析，找出作物生长的规律，加以科学推广。科学家要下去，总结经验要通俗一些，才更有利于推广。

八、搞规划问题

眼前的、长远的规划都要搞。人俊[319]、正人[320]的看法对，搞农业规划要从下到上地搞。我们只能提出粗线条，如提出国有储备、队有余粮，提出达到或超过纲要；但多少年达到，具体的指标还是由生产队由下而上地搞可靠，最重要的是大队。规划搞得粗一点也不要紧，要由粗到细，还要因地制宜。因为下边总比我们实际一些，农业规划一定要由下而上地搞，这是我们找到的一个方向。不仅农业是这样，工业和其他部门也应该这样。

九、节约问题

用水、用电都要提倡节约。尽管下了雨雪，也要注意节约用水。还要节约用粮、用煤。我们中央机关在北京每年都增加人，这次应逐步把人分下去，

要下这个决心。

十、打井的问题

要很好研究一下。要组织人到下边去看，找水电部同志研究一下哪种有效，由下边打井指挥部抓好。不要一哄而起，哄起来就很危险。

发展主产，重建家园

①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同志们，乡亲们：

你们受了灾，损失很大，党中央和政府非常关心你们，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慰问大家。昨天夜里我到了隆尧县城，听了地委、县委的汇报，今天又来到这里。

这次地震来得很突然。你们这个地方从邢家湾到耿庄桥是地震的中心，二十年前，在抗日战争中，你们也受了损失，那是和民族敌人作斗争。这次是和地底下的“敌人”作斗争。每个村庄、每个家庭都有很大损失。付出了代价，也取得了经验。

听到地震的消息后，解放军立刻赶来了，地方上的工作队和医疗队也来了。重伤的得到抢救，轻伤的得到治疗，牺牲的也掩埋起来了。他们牺牲了，我们要继承他们的事业。我们要和地球“打仗”。你们这个地方是洼地，过去改造得不错，现在要战胜地震灾害，重建家园。重建家园光靠你们的力量还不够，你们县西部有好多没有受灾的庄子，巨鹿、宁晋、任县都有些没有受灾的庄子，可以来帮助你们。互相支援，过去打日本就是这样。重建庄子要建得分散一点，房子要矮一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要带头抗震救灾。你们组织起来，办法一定会有的。国家当然要支援你们。你们这个地区有三十个公社[198]、三十四万人受灾，现在已开进解放军两万多人，地方上的工作队和医疗队一万多人，共三万多人，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帮助。真是一人有困难，大家来相帮，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你们不是学过《愚公移山》吗？愚公能够移山，我们对现在的困难也一定能够战胜。死了人当然难过，但是不要低头。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老年人家里没有人，我们要照顾他们，娃娃没有人带，我们要帮着带，这些都要靠青年壮年去做。

我不能到每个庄子去了，请你们庄子做代表，你们要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我讲的这些话传给别的庄子。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你们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把劲头鼓起来，用七八天的时间把生活组织起来，过几天还要搞生产。隆尧要和巨鹿、宁晋比嘛！恢复了生产，恢复了力量，就对得起死去的人。现在大家一起呼口号：

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发展生产！

重建家园！

重建家园后，再来看你们。

---

① 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三月九日，周恩来同志到达灾区。这是在隆尧县白家寨慰问灾区人民大会上的讲话。

加强地震科学研究

①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把你们留了一个星期，六天的会变成两个星期，我们因为有别的工作，你们这一星期也有事干。你们这次会是重要的会，到了四百多位地震工作者。据科学家估计，这次会是十几年来最丰富的一次地震科学讨论会。不能把以往的会都否定，但这总是一次有收获的会。

旧社会只有一个地震台，三个地震工作者。你们能看到这个发展，是个好事。说旧社会有了地震也不去实地考察，是否这样差？一九二〇年六盘山大地震[321]总有人去看过。不要否定一切，历史也要一分为二，批判吸收嘛！说到苏联去学习有教条，总还学到一点东西，也是一分为二。苏联有些框框，自己做些比较，就突破了。没有低的，怎么来高的？现在全国有一百多个地震台了，比美国、日本还多，这也要一分为二。在某一点上超过，在全国说起来呢？就算美国、日本只有一百多个地震台，那么中国六七亿人口，他们只有一二亿，和日本比我们应该有七百多个台。所以，还差很远，不要满足于现象。现在地震技术人员有三百五十人，也是成百倍增长。但是，从国家的人口、面积上来比，从地区情况不同来看，我们的地震台和地震技术人员的数量还不够得很。希望以此为起点继续往前进。

有了数量，还要有质量，不然数量可以增得很大，但未起质变。量变到质变要通过实践。这次抓住了这个现场去实践，是一个关键。事情总是要通过实践，才能有一个飞跃，有一个认识。这一次邢台地震考察，对地质构造、地震预报等进行了探索，有了一个初步认识。地震预报过去国外都不敢提，“三八”节那天地震[322]后，有些科学家说：“地震预报世界上没有解决。”李四光[323]同志独排众议，认为世界上未解决，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解决？我们派去大批人马，到现场实践，大力协同，就能得出结果。群策群力嘛！单是一方面，只一个行业，就没有比较，不能从各个侧面去探索。这次的确是多兵种联合作战。参加的有科学院、地质部、石油部、水电部、农业部、建工部、测绘总局、海洋局、北京大学、科技大学等单位和地方的同志。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各方面力量，才能进行比较。抓住一个现实的关键问题，就要抓住不放，所以还要继续观测。这次地震，震动最多的一天是一千零七十次，现在一天还有一百多次。科学就要有数据。必须从多方面来研究，不能由一方面包了。任何事情不能一个人垄断，学术不能一个人垄断，专家也不能垄断。要同群众结合，吸收群众的经验和智慧。知识是从群众中来的，不过他们的分析方法不大完整。专家的作用就是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加工、提高成为一门学问，再到群众中去进行考证，对的肯定，不对的修正，不断地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反复不断地提高。

量变到质变，要通过实践，不断地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不断提高，这是毛泽东思想。量变到质变，就是要做出成绩来，赶和超要立足于超，才能赶过去，才能赶、超并进。我们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要到现场实践，大力协作，协同作战。我们这次有收获，将来可能把世界上这个未解决

---

① 这是在接见邢台地震科学讨论会代表时的讲话节录。

的问题解决了。现在粗线条看出点眉目，有希望。

要搞两个三结合。我们领导就是起推动作用，不然你们互不相识，互不熟悉，组织不起来。我们帮助解决些困难，把你们组织起来，调动起来，集中起来。我们提出领导、专家和群众三结合，因为真正有本事是群众，其次是专家，用力量最次的是领导。另一个三结合就是科学研究要和教学、生产相结合。搞密云水库，就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师生去设计，这样三结合，一年就搞起来了。有些人不赞成两个三结合，要专家包办，那怎么行？怎么包办得了？这么大灾，如果不是群策群力，哪能有这么好条件去研究，也得不到现在的结果。两个三结合还只是开始。一定要把科研、教学、生产结合起来，才能搞得起来。我们需要这么多仪器，还要建立那么多地震台。现在一百多个台，三百多位专家，绝对不够。要同学校（科大、北大）地球物理系好好研究，抓住不放，好好搞下去。请国家科委、聂总[324]抓下去，一直抓，抓出大成果来。石油已放出异彩，我们要在地震问题上也放出异彩，不要像狗熊掰包谷，抓住又丢了，要作为事业抓一辈子。

现在有了一定的数量，大乒团协作，到现场实践，这是一大进步，但还未做出最后成绩——赶上、超过世界水平。我们是七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作出成绩。如何做出成绩来？搞两个三结合。用什么方法？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一分为二。对第一手材料要分析，要发现矛盾，分析矛盾，就是要找到主要矛盾方面，改正错的，让正确的站住。经过分析综合，就是一方把另一方吃掉，对立统一，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每个部门的研究不会所有的都对，一个时期坚持自己的意见是许可的，总要有点见解，但经过共同讨论，多数证明是错的部分，就要丢掉，把人家的正确的接受过来，才能得出共同的好意见。否则，就是“门户之见”、“闭门造车”。科学界提“三严”，军事上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同“三严”也近似。“三敢”[325]，现在是“五敢”，加上敢闯、敢革命。闯不容易，在权威面前可是不敢闯。没有这两个“敢”，顶多是个改良派，敢于革命才敢闯，要做真正革命派。总之，方法从思想上来，这就得学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不仅可用在社会科学上，而且可用在自然科学上。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我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亲自加了一段话：“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这一段话运用马列主义哲学，最集中地、深入浅出地说明了社会、自然发展的规律。地震工作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首先学习几篇哲学论文，这非常重要。

总之，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群众请教，同左邻右舍协作，搞两个三结合。抓住这些方法，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作，不仅地震预报，任何部门都会有成果。

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工业、交通等方面的工作

①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

北京怀柔县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326]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很好。这些经验，《人民日报》已在三月十二、十三两日加以报道，并在十二日发表社论，予以支持。现在各地已在转播、转载这些报道和社论。

中央认为，怀柔县的经验应在全国推广。全国省（市）、专区、县各级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当地军事领导机关或驻军，都要立即行动起来，以军事代表[327]为主，建立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尤其要迅速建立县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要拿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及其增产措施，狠抓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对春耕生产的支援工作。

不论需要不需要夺权[328]或者已否夺权的地区，都应该这样做。在已经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地区，第一线指挥部应设在革命委员会[329]之下，成为抓生产的班子，通过各业务部门，一直抓到基层生产单位。在没有夺权或者正在夺权的地区，第一线指挥部如能在军事代表推动下组成，它不仅对生产斗争有利，也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给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330]打下了基础。这样做，将大大有利于革命、生产双丰收。

---

① 这是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级党委，各军区、军分区党委的文件。

藏富于民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

毛主席说过，农民以多报少是藏富于民。粮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处，农民是不会乱吃掉的，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你们不要产生错觉，这不是提倡不老实，毛主席讲这句活的意思是整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者不下去，不调查，一九六一年以前实行高指标、高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以多报少。城市也是这样，多报人口，口粮就多算了。

土地以多报少，粮食以多报少，人口以少报多，灾情以少报多。两个以多报少，两个以少报多，这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如果我们实事求是，依靠贫下中农，他们就会说真话。

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过去实行奖励政策是需要的。对产棉花地区要给些化肥和粮食，使他们的生产恢复得快些。我们出口一吨大米可以换回一点七吨小麦或两吨玉米，换回来外汇，很有利嘛！

粮食工作也有错误。以前有过大进大出。征购多了。必然返销，造成假象，徒劳往返。毛主席主张能少购就少购一点，藏富于民是好事。战争打起来还是藏富于民好，特别是要消灭敌人在国境内，这就更有必要了。

[1] 这是接见十四个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代表时的谈话节录。

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

①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送上铁路中断情况电讯八份，请阅。今午在主席处，已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下午曾约集富春[136]、先念[296]、剑英[331]、肖华[332]、成武[333]、谷牧[334]、秋里[298]各同志会商此事，除已报请批发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命令外，并拟将全国十八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运交海军军管包干，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335]工作，以便统一全国铁路轮船运输，免受干扰。这一计划正由总参草拟，明日当可订出送审。

此外，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

① 这是致“中央文革小组”的信。

联合起来，保护海港运输

①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

据说，由于厦门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致英国商船到来后无法靠岸，而该船有三病号，吃喝均成问题。这种违犯国法、影响祖国信誉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望厦门军管会、调查组接此电话后立即向两派组织号召：对外，对业务必须采取联合行动，如果哪一派响应中央、主席号召并见于行动，中央将通报表扬，如拒不执行，中央定予揭露，并命令军管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港检查、靠岸装卸。哪一派破坏这一行动，军管会应按《六六通令》[336]惩处该派的主使人和肇事头头。

① 这是给厦门军管会的电话稿。

改变气象技术落后面貌，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1]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二月七日）

四机部也好，邮电部也好，在通讯上都是落后的。地上、地下，有线、无线，要区分开来，要严格保密。最重要的是改变落后现象。

邮电部一定要采取措施，改变落后面貌。把中央气象局的通讯传递工作交给邮电部，邮电部要解决。中央气象局要和邮电部很好地规划一下，研究解决，要准备战时的破坏，有线断了怎么办？无线怎么办？

在我们的卫星没有出来以前，要想办法接收国外卫星传递的气象情报。而且应该搞我们自己的气象卫星，气象火箭也要搞。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打破敌人的封锁。一是要自力更生搞基本建设，要赶快改变落后面貌，搞气象卫星和气象火箭；二是要采取各种办法收听国外的广播。

气象人员要到现场去看看，懂得一些气象对劳动人屁的生活、海上航行、铁路交通运输影响的情况。你们应当到北京附近去看看气候变化对铁路、交通、工业、农业的影响，做好服务工作。你们年轻人不要像我们老年人总坐在办公室，要常到下面去。

我们研究气象，就是为了使一切有生命的力量都能够很好地生存，让植物、动物很好地生长；就是为了保护人民，首先是保护劳动人民。气象对邮电、铁路、交通、工业、农业、航海、航空、牧业、渔业等各方面都有影响，劳动人民的各种正常的生产都要受到影响。气象工作对国计民生各方面都有直接影响，因此，你们要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

[1] 这是听取邮电部、铁道部、中央气象局的军代表、领导干部、群众代表汇报时的两次谈话节录。

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下放问题

[1]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

企业下放分类：

一、大多数下放给地方！

二、一部分双重领导，地方为主；

三、极少数几个双重领导，中央为主。

企业下放，为的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促战备，把地方积极性、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和多种潜力都动员起来，而且也有利于中央的政策和计划的实施，绝对不能把它看成是卸包袱。基建可以立即下放的立即下放，需要建成后下放的建成后下放。企业和管理体制的下放要区别地区，有系统地有准备地有步骤地有交代地分批分期进行。一切好的协作关系都要保留，而且要进行有效地调整，要把交接工作安排好，多方面关系衔接好，中央各部门决不能撒手不管，而要负责下放到底。

[1] 这是在《全国计划座谈会简报》第 10 期上的批语。

合理的规章制度应该保留

[1]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

飞机因质量事故影响到战备和援外，影响到安全。你们都是空军来的，怎么能对同志的性命这样不负责呢？一个军事工厂一搞得这样怎么行？四一0 厂取消了检验制度你们是不是知道？报告了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敢抓？为什么不下命令恢复？你们就是怕事，怕群众。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军事工厂哪能搞成这样！你们现在还说检验制度正在逐步恢复。什么逐步恢复？你们怎么能这样说话，怎么能用这样的词句？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当马上恢复！对的、合理的要马上恢复，不对的不恢复。检验是不能放松的。你们应当下命令嘛！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的。不能违背科学。应该相信工人阶级，只要把道理给他们讲清，他们是不会同意取消这些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这是极左思潮。对西北、西南、东北都要派人去检查。二十年来，毛主席的红线还是主要的，不能否定一切，要一分为二，不然二十年的工业生产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1] 这是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解决飞机生产质量事故问题时的谈话节录。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种好棉花

①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三日）

棉花会议[337]有一年没有开了。事实上，棉花生产从一九六二年就抓了，一九六三、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是大幅度增产的。总的看，棉花增产潜力很大，要认真抓。毛主席不是讲“三抓紧”吗？“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必须把布匹抓紧”[338]。去年碰到灾荒，抓了粮食，棉花松了一年，吃了一点亏。有灾荒，总是可以克服的，粮食也好，棉花也好，总可以找到办法，很多很苦的地方也找到了克服的办法。东北辽宁气温低，南方雨多，搞好了一样增产。江苏、湖北等省可以高产。江西、湖南、安徽、四川也一样可以搞上去。山地、坡地，如四川的阆中、剑阁[339]都可以生产棉花。北方有北方的情况，各种土地，包括盐碱地、砂窝地都可以生产棉花。自然灾害给了我们一点困难，这真是考验。共产党员、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贫下中农带头克服困难，就可以使棉花高产。像山东滨县、河北正定、河南新野、新乡、安阳附近都可以高产。既然河南、河北都可以，辽宁建昌都可以，那么，山西汾河流域和陕西关中平原，过去都是产棉花比较出名的地方，为什么就不可能克服自然灾害？完全可以。北方潜力很大，亩数也多，是一个重点产棉区。北京的条件在北方是好的，但北京土地少，棉田计划搞三十万亩，报了二十七万亩，可以达到。北京的棉花亩产还没有到百斤，小单位亩产超过百斤的是有的。山东、河北、河南有高产的，山西、陕西一定可以赶上去。辽宁也可以赶上去。新疆是大面积的产区。北方种棉的重点是八个地方，北方的棉田亩数占设想八千万亩的一半，但产量比南方低一些，设想“四五”计划[179]到一九七五年北方棉花亩产八十斤，南方一百斤，平均九十斤。现在各地报的亩产数超过一些，北方九十多斤，南方一百多斤，那就很好嘛！把指标提高了。七十年代都像山东杨柳雪[340]那样，就会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订规划可以低一些。要自力更生，先公后私，种棉花更要先公后私。尽管国家有化肥、农药、种子、排灌机械的帮助，但主要还是靠自己。湖北新州就是多年好，后来松懈了，大水一来棉花产量就低下去了。不能光看到顺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困难的一面，要赶上去。

这次开会的重点县有二百六十三个，先进单位四十四个，所有参加会议的不管是重点县也好，先进单位也好，总之，自力更生是第一条。棉花的政治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若奋斗。自力更生，就可克服自然灾害。自力更生，就要一切从困难着想。解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问题都一样，要把困难想到家，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不会措手不及。棉花有季节性，一年就是一季，把季节错过了，又遇到水旱灾，一年的收成就完了。打自然仗比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更有时间限制，打仗今年不打明年打，这个地方不打到别的地方打，但是农产品，特别是棉花，一年只有一次，粮食还有两季，棉花没有两季的。必须准备好，各种困难都要设想到，旱了要准备涝。拿北京说，今年有旱象，夏天有可能来洪水，我们预报了，必须设想旱后又有涝。要想到洪水集中下来如何排出去，既要把井挖好，又要能控

---

① 这是在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

制水，要未雨绸缪。有半机械化的更好，没有的也要想办法。山西有一种办法，挖地壕。大寨[291]过去对水注意不够，一九六五年受了旱，后来想了点办法。一年完全旱，北方是常有的，这就要打井，山地要打深井。怎样引水上山，也要有准备。应该找自己的种棉花的高产地区做模范，公社[198]也好，大队[203]也好。大寨经验是在山西，不一定在河北、江苏适用。各省都要找自己的“大寨”[315]，一个省也有地势不同，有川地、平坝、山地、砂地、碱地，面貌不同，自己想办法改上。棉花种子要自己想办法调换。这些都要预先想好。

办一件事要想各种办法，种植棉花有很多经验。各种困难都要设想，要想到家，想一二十条，甚至要想到种了还要再种，这些都要预先准备好，困难来了就有办法。水来了可以排，旱了就可以浇。各方面想得多，灾害来了就有办法对付。

一九七〇年至一丸七五年的棉花生产，重点抓“两个八”、“一个七”。“一个八”是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占八千万亩半数的棉田；“一个八”是南方的八个省，都是沿长江一线的地区，大约有三千六百万亩棉田；“一个七”是分散产棉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甘肃、天津等地，约有四百多万亩棉田。其他地区以后再看发展，太冷的地方如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不去设想；西藏太远，宁夏太小，将来可能产一些。至少目前不抓它们。

种棉花也有个公与私的关系问题。种棉花总是为大家的，但开始种棉花的时候，粮食不能高产，国家就要供应粮食。棉花生产出来要先卖给国家，由全国统一分配；絮棉、纺纱、织布是全国需要的，要首先供应全国。自留棉不要留得太多。我们搞先公后私，提倡“公”字精神，这是毛泽东思想。只要提倡“公”字精神，大家的干劲就更足，科学种田就会种得更好。

要保证八千万亩棉田巩固下去，不要一年多，二年少，要稳定。我国耕地有限，但是现在耕地固定八千万亩种棉花，还是有可能的，当然，间作也可以，二亩并一亩也是许可的，由县和公社自己去安排，不要去干涉。我们有一条原则，棉田不能削减，不能因为要弄粮食而少搞棉花；吃的要全国调剂，棉花更要全国调剂。上海纱厂靠上海、江苏还不够，要加上浙江，还有别的地方帮助。要全国一盘棋，统筹安排，尽可能满足国家需要。大家报的数字不太悬殊，这就好嘛！各地方自己报的数字七千多万亩，我们提的是七千五百万亩，两三年搞到八千万亩，四五年巩固八千万亩。在这个基础上，亩产逐步提高。维尼龙多起来了可以代替一部分穿着，但棉织品还是主要的。人口要计划生育，但总要增加的，穿着还要拿维尼龙补充。棉田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要逐步提高产量，“四五”计划达到平均亩产九十斤，南方一百斤，北方八十斤。

国家对种棉花，也要按照过去的政策办事，“纪要”[341]也写上了，过去答应的事要照办。国家的化肥、农药、排灌帮得多，自留棉换购[342]等政策执行得好，棉花收上来就会比设想的快一些。口粮标准，一般不低于临近产粮队的口粮标准，也可稍高一点。要提倡粮、棉双丰收。粮食不能自给的要保证口粮，使他们逐步转到粮、棉双丰收，这有一个过程。预购定金，供应化肥、农药、排灌机械等，都要保证无缺。每个县都要有一个支持农业的厂子，像河北广平棉油加工厂，两台机床什么都能搞。这几件事要抓紧。你们责任最大，要层层抓起来，抓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204]。

总的政策是，自力更生，估足困难，先公后私，国家帮助。一九七〇年的棉花总产要超过五千万担，收购也要在五千万担的基础上安排。留成要合理，不提倡自留棉太多，不提倡土纺、土织，自留棉不准进入自由市场，要有一个政策上的压缩。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需要，也就是劳动人民的需要。

时令不等人，会议今天一定要结束。如果今年搞得好，明年还要开这样的会。要继续抓五年，达到七千多万担，情况就大改观了。

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

①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去年十月，主席在武汉曾在曾思玉[343]、刘丰[344]两同志提议修三峡大坝时说到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后来，他们就同水电部、长办[345]转而设想改修三峡下游宜昌附近的葛洲坝低坝，采用径流发电，既可避免战对轰炸影响下游淹没的危险（低坝垮了只多三亿到八亿五立方米水量的下泄，宜昌到沙市河槽内可以容积），又可争取较短时间加大航运和发电量（航运单向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左右，发电装机可达到二百零四万千瓦，保证出力八十万千瓦，时间五年可成）。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本年十月就提出报告请中央列入“四五”计划[179]。中央政治局十一月会议讨论，原则批准，要他们多做水工试验和研究，并写一可靠的水坝工程资料。我和国务院业务组（先念[296]、登奎[346]、德生[347]三同志均参加），与曾思玉、张体学[348]、林一山[349]等同志和水电部负责人经多次研究和讨论，认为在“四五”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350]是可行的。他们所提出的资料和数据，也是经过十来年的现场地质勘察、水工试验和历史水文记录的积累和分析得来，基本可靠。而在施工过程中，还可精心校正，精心设计，力求避免二十年修水坝的许多错误。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现将中央批复送审稿及报告和附件、附图（二张）呈上，请审阅，并请主席批示[351]。林一山意见书一并送上，供参阅。

---

① 这是致毛泽东，林彪的信。

中西医结合仅仅是开始

①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

不要吹得不得了，中西医结合仅仅是开始，是序幕。应该谦虚，实事求是，应该更符合实际。我的话那天没有说完全，两夜没有睡好觉，就想这个问题。话没有说完全，只是一面倒。如果这个报告拿出去，首先毛主席通不过。万一发表出去，有片面性，就成了笑话。我们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骄破满。张医生[352]说，他亲眼看到针刺麻醉的情景，8341 部队[353]的五个战士疼得哇哇叫，医生还说不要紧，继续开刀，影响别的病人，这怎么行呢？这是在蛮干嘛！回去人家不会说好话的。自满骄傲怎么行呢？济南文件[354]都学了吗？“一贯正确”、“领导高明”、“两个包袱”，稍有所得就骄傲自满、强加于人怎么行呢？

针刺麻醉还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吧？一个镇痛不全，一个肌肉松弛不好，一个内脏牵拉有感觉。尽写好的怎么行？有三关，就比较辩证了。镇痛，具体人、具体情况、具体位置都得研究，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不要迷信。不要像“无痛分娩”[355]那样宣传，完全无痛我不相信，总有点痛，人很紧张怎么不痛。

两个群防群治的材料，一个是腾冲县的，我不相信就那么平衡，那样一般高、一样齐。每个生产队[204]都那样，我不相信。群防群治只搞了两年不到，有没有差别？为什么不加一句不平衡呢？还是有不平衡的。同样，德兴县的群防群治，是否像说的那样好？说从现在起每个大队[203]有“赤脚医生”[356]五至六名。水平都差不多？我看不见得。说每个公社[198]有十多张病床。有的像病床，有的怎么样？三百三十九名草医当顾问，水平都一样？都能掌握一百多种草药的生长规律？什么事都不要说过头了。对新的事物当然要首先肯定下来，要提倡鼓励，但现在要冷静下来，你们是做领导工作的，尤其要冷静些。

医道无止境，不要自满啊！任何事情都是无止境的。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任何发明创造，都要多次实践，总结经验，只有有了经验才能有所前进。所以，不行的要改进，不要保守。有的针麻效果不好，药物麻醉还是需要的。应该辩证地看问题。济南文件讲了“三破三立”，要与医疗业务结合起来学，与医院情况结合起来学。毛主席的思想，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要千篇一律。典型事例也要把缺点写出来，不要什么都是好的。

我感觉我们还不够得很。向谁学？还是向群众学，上靠毛泽东思想，下有群众智慧。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时代，能够放出一点光辉来就了不起，不要把我们一点成绩说得神乎其神。报道还是要报道的，核实以后再报道。方向是对的，不等于每一个创造发明都十全十美了，还要不断总结提高。

---

① 这是同卫生部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

尖端工程必须列入国家计划，带动其他工业发展

①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

材料问题要考虑，你们的工程计划要把材料、设备问题考虑进去，要扩建的工厂、新建的工区，放在工程计划内提出来，通过这个工程带动其他工业发展。把这些问题放在工程计划中提出来，列入国家计划。这个问题不单对上海同志讲，二机部、七机部等都要注意，都要考虑。如果我们批准了工程方案，你们的问题还是没解决，你就要挤掉别人的计划，自己也上不去；你把这些问题事先提出来了，放进国家计划中去解决了，你就上去了。石墨也是如此，你们要多少？清华大学也还要。总之，你们要的东西总共多少，目前能生产多少，还需要扩建、新建多少，都要提出来列入计划，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过去不注意这方面，开始不提出，中央批准了他的方案，后来发现有问题了，他就拿中央批准的作为“尚方宝剑”，说我这个如何如何重要，把人家的计划给挤掉了。特别是专委会[357]讨论后报毛主席批了，他就拿这个“尚方宝剑”去压人，谁敢不照办？一照办，就把其他项目挤掉了。这个教训不但要向上海的同志提出来，要注意，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和其他部委也要注意。已发生过这种事了。你们这个工程叫728。余秋里[298]同志，全国这种专案有多少？你给我统计一下。总之，大家都要为国家的事出主意，共同管理国家的事，来推动全国各项事业的发展。

关于工程用材料的品种、数量等问题，你们冶金部要研究解决。大家都要为整个国家利益着想，不能只考虑自己那一部分。在一个局部看来是很好的事，但整体看就可能有问题。牡丹虽好，也要绿叶扶衬；果子虽好，没有树和叶，果子也结不成了。

我赞成上海搞此项工程，原则上批准这个方案。去年来时，说鼓励的话多，没泼冷水，现在要落实就要考虑细致些。原则上同意方案，具体的请二机部、一机部、燃化部、冶金部在一起研究一下，由国防科委召开会议计算一下。过去你们不大注意，只要一批就拿去压人，结果完不成。现在学乖了，人总是由不认识到认识，这次好好计算一下。上海搞试验要全面考虑，那些要建厂、要发展的全都提出来。但要注意，你们提出方案设计的计划后，就想把材料一下拿到手，你们要懂得中央精神，我们鼓励你们搞，但国家不是万宝库，中药铺也不会那么全的。发展新技术要搞好。国家科委要把这个工程有关的各个方面都计算一下，把哪些搞上去、带上去，要全面安排一下。过去的经验要注意，开始不全面考虑，后来发现有问题，就拿“尚方宝剑”去压人，压得大家都挤，结果大家都上不去。今后不能那样做，要全面平衡，不能把别的项目挤掉了。上海这项试验工程要搞好、搞成，要实事求是，时间不要太急，稍微迟一些中央不会责怪你们，重要的是要搞好。工程技术人员要三结合。中央支持你们搞，要把各种材料、设备问题计算在内，提出来由国家科委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统一研究，安排好。资本主义国家只管订货购买，不管平衡，我们不能这样做，所以委托你们部、委商量解决。这回订计划，要统统算进去，但各部不要借此机会“发洋财”。今天就开到这里吧！

---

① 这是在中央专委会上听取秦山核电站工程汇报时的插话。

祝上海同志成功。

要把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

①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歼六”四十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七架不能交付，占全数百分之十七点五。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么！

请秋里[298]像剑英同志一样，把长汽、二汽、重汽、南汽[358]抓一抓。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

① 这是关于飞机、汽车生产质量问题的两件批示。

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

①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

文裕[359]同志交来二机部四〇一所一部十八位同志一信[360]，已由郭老[361]、西尧[362]同志处转到。看了很高兴，正是月初我们同见巴基斯坦那位科学家[363]时所说的话。

现在请文裕同志将你们今年四月送给二机部和科学院那份报告[364]转给我一看。西尧同志请朱光亚[365]同志召集有关方面一议事，请不要等我批，先议出办法，供大家讨论采用。

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所见可能有错，请你们研告。

---

① 这是致张文裕、朱光亚的信。同年七月，周恩来曾指出，要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并强调有什么障碍就要拔除。八月，他还对当时的科教组和科学院负责同志指出，要“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第三世界国家要自主地发展民族独立经济

①

（一九七三年二月三日）

最近，我们高兴地在北京接待了阿尔梅达外长一行。非常感谢你托他带来的良好祝愿。通过他这次来访，我们双方有机会进行直接交谈，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并且在加强中智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对此，我们表示满意。

总统阁下一月九日通过林平大使提出的要求，我们一直在认真考虑。这次阿尔梅达外长来访时，我们同他又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提出了一个具体措施，相信阿尔梅达外长会向你汇报。我们希望这个办法对你们能有所帮助，当然，这也只能起到一点应急作用。我们本愿能对智利人民的经济建设事业做出较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我们的经济力量还很有限，同时又肩负着支援越南和印支各国人民斗争和其他方面的国际义务，目前尚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总统阁下想必对此能予谅解。

中智两国同是发展中的国家，对于智利现在面临的困难，我们很能理解并给予深切的同情。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是长期的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留下的恶果。不少第三世界国家[366]在不同程度上都遇到类似问题。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发展中的国家除了相互帮助外，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如果经济不能立足国内，过多依靠外援，特别是依靠大国的贷款，这是很危险的。在这方面，一些国家有过沉痛的经验教训。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要自主地发展民族独立经济，就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牺牲。相信我们的人民都是勇敢勤劳的人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干涉、赢得自己的独立幸福的生活，他们会懂得如何清醒地估计局势，勇于接受面临的挑战，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形势下，更要考虑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局面；作两手准备，争取好的，准备坏的。总之，改变经济落后面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只有结合现实的条件和可能，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才能逐步实现。这是我们从中国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的一点体会。我们对智利的情况很不了解，但是，作为老朋友，出于关切，我愿坦率地同阁下交换看法，供彼此参考。

两年来，智利政府和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帝反殖、发展民族经济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我们表示钦佩。相信智利政府和人民，在阁下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坚持斗争，进行充分的准备，谋而后动，就一定能够克服目前遇到的暂时困难，取得新的胜利，继续前进。

我们为两年来中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感到高兴。我们今后将竭尽自己的努力，使这种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乘阿尔梅达外长返国之便，特赶写此信。顺致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

---

① 这是致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信。

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

①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九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367]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368]，影响到一九七三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369]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

工业生产指标，煤增长最少，电也少啊！这样，生产怎么能上去。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

经济协作区问题怎么提法？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

基本建设战线为什么长？一是中央各部的项目多了，

一是地方项目也多了，原因就在这里。中央和地方，首先中央收缩一下。中央、地方都不许扩大建设规模，中央先下一些，给地方留点余地。

基本建设要经常检查，全年抓。一九七〇年基本建设大膨胀，一九七二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

基本建设中的问题，还要说一条，有人在基建中顺手牵羊，搞非生产性建设。当然必要的可以建，如宿舍、商店、学校要建。但是有很多建筑不是这方面的，要指出来。

地方五小工业[370]要整顿的问题说得不够。搞五小工业也要有原料、材料和设备的保证。没有原料也搞，同大厂争原料，变成自由发展了。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发展五小工业要有个范围，要对农业有利，破坏计划的无论如何不能发展。

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我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

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这不是那么舒服的。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我们与他们根本不同，但也不那么舒服。商品有差额，货币回笼不了。职工人数多了，工资多了。货币流通量也一定多了。多是一定要多的，但现在超过了实际需要，要研究这个问题。今年市场平衡有三十亿元的商品差额，票于发多了。

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湖北货币大投放，去年第四季度顶支今年的，安徽、江苏也投放。这样大胆地开支，过去是少有的哩！

全国职工总数突破五千万人，一下子达到五千六百多万人。你们要抓一下。民工好减，五小工业工人、临时工要动员回去，现在就要进行工作。

钢那么多，钢材怎么样？前后左右不衔接，出了钢不能轧材，白白消耗了热能。还是十年前存在的问题，一前一后，前后左右总是个大问题。运输能力也不行，进出口拥挤不堪。这些不建设，光搞大品种不行。

按劳分配的问题，现在是四个一样[371]嘛！还有干难干易一个样。“不

---

① 这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汇报一九七三年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草稿）》时的插话。

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也不利于控制职工人数的增加”，这句话说得对！

必要的奖励制度是可以的。

要学外国的长处

①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最近我们出去了两个代表团。一个医学代表团在国外看了回来，不敢做报告。他们要做报告，有一个军代表[327]说，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这么老大，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结果他们不敢讲了。这种风气不好。出去花了不少钱，回来连报告也不敢做。科学家代表团出国回来后，连一个报告都没有写出来，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寻求不同政治制度下有利于

---

① 这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汇报一九七三年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管理的规定（草稿）》时的插话。

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

[①]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我们是刚开始跟你们接触。如果在我们两国贸易往来中不使用美元或人民币计算而使用第三国货币来计算，这是很滑稽的。我们人民币不出国，不可能作为国际货币[372]，但美元可以作为国际货币。我们人民币只限于国内，范围很小，所以比较稳定。我们货币的后备力量靠物资，而不是靠黄金。因此，我们人民币不发生跟国际市场竞争的问题。我们跟你们贸易往来中势必要使用美元来计算。所以，我想把美元问题弄清楚一些。

我很注意你来华的第二天同我们乔培新[373]达成的谅解，即中国银行可同大通银行直接办理互相汇款和支付旅行支票的业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戴维·洛克菲洛（以下简称洛）：我们对此很高兴，我们认为这是历史性的发展。中国革命以后，中国银行同：美国银行打交道，这还是第一次。我们感到很骄傲的是，你们邀请我们第一个来访问，而且跟我们达成了这样的谅解。同时，希望我们两国债权问题解决以后，我们能同中国银行一起，以其他方式在两国交往中起到有益的作用。

周：那是第二步的事。现在主要是为了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两国银行必须有基本的信用。

洛：我同意。同时我们也应该一般地考虑到将来如：何处理两国间贸易的扩大，即如果中国银行能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市场的第一手材料，这可能会是有用的。我们将很高兴地欢迎他们来。如果你们觉得有用的话，我们会尽一切力量给以帮助。

周：你们国际活动经验多，一下抓到了一个问题。你们原来由化学方面的澳大利亚于公司从中国进口松香，现在发现可以从中国直接进口松香，不需要再通过澳大利亚。化学公司出口设备吗？

洛：这家化学公司不出口设备，但它出口化工产品，我们认为其中有些产品你们可能感兴趣。赫尔克里斯化学公司也是我们银行的客户，他们通过在澳大利亚的子公司在广交会[268]上同你们接触。他们认为，以后直接同你们打交道比通过子公司同你们打交道肯定更有效小我拿这件事作为例子是想说明，我们两国银行往来以后，这方面来往和交流会更发展。

周：通过两国银行往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现在中国银行同你们办了第一个交涉。

洛：我们需要更多地相互了解。因为我们希望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保持接触。斯坦卡德先生是大通银行高级副行长，负责银行的业务和同亚洲的商务关系。如果不是他，其他人也可以带着助手来，不时跟中国银行保持接触，这将是有利的。他已认识许多中国银行的人。随着事情的发展，如果你们认为对你们有利，我们认为对我们也有利，那么，我们建议最终在你们这里派一名大通银行的常驻代表，这样能跟你们保持日常的接触，对扩大两国的贸

[①] 这是同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的谈话节录。

易将是有益的。可能你们愿在晚些时候加以考虑，但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因为我认为，这种接触可能是增加我们互相信任的有效办法。

周：你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作为第一步是一个好办法，就是说，我们派一些人去你们大通银行那里考察市场和进行学习接触，你们临时派一些人来，接触一个时候，作为临时办法。考察相互的市场和国家需要，有好处。这恐怕是好办法，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市场需要。你很清楚，我们所有的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国有机构来进行的。我们希望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毫无疑问，你们的设备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有些商品

可以供应你们市场的需要。互相了解才能提出意见和要求，不然盲目性很大。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因此，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我很直率他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涂[374]。严在台湾替蒋介石作帮手。

洛：我不认识他。

周：他本来在国民党中没有地位，只是在银行中有一个小职位，但他对做生意、搞贸易有那么一套，这对蒋介石是有好处的。他知道一些国家市场的需要，然后他在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后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375]，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

洛：无疑他们会这样搞的。

周：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很惊奇，似乎台湾这个做法是好办法，认为台湾的经济生活很好。我也是这两年费正清[376]教授跟我谈了这个问题我才知道，原来我很奇怪，它的贸易额为什么这么高？一调查，清楚了。它吸收一部分外资，这部分外资当然是支持它的。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劳动力很便宜，比香港和日本的还便宜。

洛：而且他们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条件。

周：中美两国是大国，难道一点贸易往来不能发展吗？不可能嘛！当然可能发展，会慢一些。你说不要说过头的话，很对，可能发展会慢一些，但这可靠。所以，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台制度的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

洛：我完全同意，而且需要加强人员间的接触。我想，第一，相互接触了解。第二。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办法，而且是不同于任何一方过去习惯的方法。

周：对，比如中美联合公报[372]跟其他双边公报完全不同，可能诸位已经读过了。

洛：是的，这是一个可观的文件，只有你和基辛格[378]博士才能办成这件事。

周：不能这么说，你们总统同意了，我们毛主席也同意了。是啊，先把双方不同的立场说清楚，然后找共同点，这才是诚实的态度，这样才能相处下去。

洛：今天上午我跟你们贸促会[192]的李川[379]先生进行了很有意义的讨

论。贸促会的对口组织是新成立的美中贸易全国理事会，我是理事会的成员，而且是副主席，威斯汀豪斯公司的伯纳姆是主席。我们讨论了这两个组织之间怎么相互接触，共同工作。我们已和李川先生商定，美中贸易全国理事会将派一个代表团参加今年十月秋季广交会，双方将讨论今后怎么进行共同工作。参加美中贸易全国理事会的有二三百家美国公司。

周。互相多接触就能够推动发展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

洛：肯定会的。

经济建设必须根据各国的情况，制定一条正确的路线

[①]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我国的经济建设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次序发展的方针。各国的建设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订一条正确的路线，我国的经验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发展了，粮食、棉花能够自给，解决了人民的吃、穿问题，就能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提供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原料和劳动力，才能为工业开辟广大的市场。而轻工业的发展，则能为发展重工业积累必要的资金。我国发展钢铁等工业的情况说明，工业发展必须与农业发展水平相适应，经济建设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

我们还坚持了毛主席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搞建设，要区别轻重缓急，量力循序进行。集中使用人力、物力，就能一个一个地增加建成投产项目。这样，表面上看，建设速度慢些，实际上速度是加快了。如果依靠外资、外援同时上马项目大多，就会出现劳力、物资紧张，建设周期拉长，技术、管理力量缺乏等一系列问题。我们第三世界国家[366]的人力、物力有限，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出超过国家经济能力的福利口号，会引起群众对国家领导的不满 J这种极左的做法，说得好，是空想；说得不好，就是破坏。

[①] 这是同刚果总统马里安·恩古瓦比第四次单独会谈纪要的节录。

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①

（一九七四年三月四日）

我国一九五三年以前是经济恢复时期，从一九五四年开始搞基本建设，至今已二十年了。经验有一条，凡属中央管的大中型工程项目，超过一千二百项就管不过来了。中央加地方一起搞一千二百项还差不多，如超过一千二至一千八百项，就有三分之一完不成。超过了，又得调整。调整总不如在开始时就把计划搞得小一些，因为调整，有时把重要的项目也调掉了，并造成人力、财力、物力很大浪费。项目一多，势必就不能处处都照顾到，会出现这个地方停工待料，那个地方等待设备，另一个地方没事干，只搞些土木工程的情况。毛主席经常对我们说，不要把项目搞多了，不要超过一千二百个，能控制在一千个就好。我们已经吃过两次大苦头了[380]，小苦头还不算。

要提醒的，就是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搞大中型项目时要注意到：原材料、沙、石等是否有，够不够；本地的人力包括技工人员够不够；设备、材料是否要从外地调来；如果是进口设备、器材，是否能保证及时运到；运输能否解决；搞的项目是用电的还是手工的，如用电的，电力是否够分配；还有用水的问题，商品粮、市场供应、日用消费品和本身的交通问题，等等。如果项目一多，就必然吵架。所以，搞建设，要排个队，要分步骤。即使都是急的，也要分前后，要有个步骤。

① 这是会见越南交通运输部长和越南驻华大使时的谈话节录。

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

①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163]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179]，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329]，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204]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注释

[1]农业社会主义，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第 2 页。

[2]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称土地革命，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土地改革。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祖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以后，改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在一亿五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 4、14、25、37、44、53、69、78、83、92、106、114、124、162、177、369、414 页。

[3]《轻骑队》，指一九四一年延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办的街头墙报，一九四三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时停刊，——第 7 页。

[4]七届二中全会，即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问题。同时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全会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第 11、30、160 页。

---

① 这是在弟四届全因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中的一段活。

[5]新政治协商会议，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里提出的政治协商会议，当时被称为“新政协”，以区别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召开的那次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仍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第16页。

[6]《共同纲领》，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确定了当时我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备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第20、43、56、98、121、135、151、166、176、222页。

[7]绥远，旧省名。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同年九月缓远和平解放。一九五四年该省撤销，其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第23
贝。

[8]供给制是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对党政工作人员和军队指战员，按照大体平均的原则，直接供给最基本生活资料的一种分配制度。一九五〇年以后，大部分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即把服装、伙食等一些基本的供给项目折成货币，连同津贴一起，作为生活费，以现金支付。同时，还保闰了一部分供给制的项目。到一九五五年，供给制和包干制一律改为工资制。——第26、83、94、118、197、203、217页。

[9]指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王稼祥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安德烈·扬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之工作条件的协定》。—第37页36页。

[10]银根，指金融市场上货币的供应情况。如果市场上货币供应大于需要，就叫银根松；反之，就叫银根紧。——第37页。

[11]陈云，一九〇五年生，上海青浦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〇年六月任代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十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四年九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彼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九六二年出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第37、76、125、167、253、329、340、459、483页。

[[12]]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

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第 37、70、115、184、213 页。

[13]南汉宸（一八九五一—一九六七），山西洪洞人。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第 37 页。

[14]林垦部，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改称林业部。——第 39 页。

[15]李范五（一九一二——一九八六），黑龙江穆棱人。当时任林垦部副部长。——第 39 页。

[16]清朝初年，因郑成功等在东南沿海领导反清的武装斗争，清政府厉行海禁，严禁人民出海，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才允许商民造船出海，并于一六八五年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商来华贸易。一七五七年，由于英国等殖民者在中国沿海进行非法活动，清政府又下令只准在广州通商，并制定了许多外商来华贸易的禁例，继续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英、法等国家先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迫使清王朝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开辟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汪、南京、镇江、天津、喀什噶尔等地为商埠，并剥夺了中国关税自主权，取得了深入内地贸易、自由传教和招募华工出国等项特权。这样，它们用炮火打破了清王朝闭夫锁国的局面。后来，人们把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这种形势，称为“ 海禁大开 ”或“ 海禁开放 ”。——第 41 页。

[17]北洋军阀，是清末袁世凯在北方几省首先建立起来的封建军阀：集团。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 新建陆军 ”，归北洋大臣节制。一九〇一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培植党羽，自成派系。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六年袁死后，这个集团分别在英、日等帝国主义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二系，力争权夺利彼此间进行过多次混战。一九二六年皖系军阀段棋瑞下台，一九二七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闷政府垮台。至此，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结束。——第 41、505 页。

[18]李仪祉（一八八二——一九三八），陕西蒲城人，水利专家。一九二二年起，历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曾提出很多治理黄河的意见，主办过陕西省径惠、洛惠、渭惠和织女渠等灌溉工程。——第 42 页。

[19]孔祥熙（一八八〇——一九六七），山西太谷人。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长期控制国民党政府的财权。一九三八年他在任行政院院长时，颁行“ 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 ”，实行所谓战时经济管制政策，大幅度压低棉花价格，对农民进行公开的掠夺。据统计，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陕西每市担棉花所能换取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只相当于抗日战争前的百分之四十左右。——第 42 页。

[20]花园口的决堤，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炸开黄河大堤的事件。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徐州，随即沿陇海路西进。六月初，蒋介

石下令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西犯。结果不仅未能阻住日军进攻，反而给人民造成空前灾难。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四十分县被淹，数十万人溺死，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大水过后，留下了一片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第 42 页。

[21]候德榜（一八九〇——一九七四），福建闽侯人，化学家。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先后创办塘沽永利碱厂和南京永利硫酸铵厂，一九三九年发明联合制碱的生产技术，称为侯氏制碱法。一九五〇年时是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第 45 页。

[22]萨福均（一八八六——一九五五），福建福州人，铁路工程专家。曾参加修建粤汉铁路。一九五〇年时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兼西南铁路工程局副局长。——第 45 页。

[23]詹天佑（一八六一——一九一九），广东南海人，铁路工程专家。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九年主持修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今京包线的北京至张家口段），后又主持修建粤汉铁路。——第 45 页。

[24]整风运动，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赖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第 49，503 页。

[25]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这次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 49 页。

[26]大禹，是传说中我国古代部落联盟领袖。他率领群众用疏通江河的办法治理水患。——第 51、87 页。

[27]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莫斯科签订的，同年四月十一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十年。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决定条约期满后不延长。——第 52 页。

[28]七届三中全去，指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至九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讲了话；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聂荣臻分别就土改、外交与统战、财经、军事等问题作了报告。会议确定，要做好土改、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肃清反革命、整党等工作，争取在三年的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第 53 页。

[29]《共同纲领》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之目的，国家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第

[30]五种经济成份，指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第 56、98、140 页。

[31]这里所说的概算，指一九口九年十二月二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并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〇年度全届财政收支概算》。——第 57 页。

[32]新经济政策，是苏俄一九二一年开始实行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发展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自由贸易和私商存在；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并以租让、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第 65、428 页。

[38]深圳原为九龙半岛上深圳河北岸的一个小渔村，因河得名。一九七九年三月，始改宝安县为深圳市，属省辖市。一九五〇年十月六日，周恩来讲话时，为说明深圳的位置，讲了“ 九龙的深圳 ”一语。一第 73 页。

[34]外国税务司制度，指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国家为控制中国海关所制定的由外国人担任中国海关主管的制度。——第 73 页。

[35]政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74、129、132、175214 页。

[36]谭平老，即谭平山（一八八六——一九五六），广东高明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 76 页。

[37]龙州，位于广西省西南部平而河与水口河汇流处，与越南毗邻，自古为边防重镇。一九五二年置龙州县。——第 76 页。

[38]指海关总署根据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至六月十六日召开的全国关务会议精神向政务院提出的《关于全国关务会议的总结报告》。一九五〇年十月六日，第五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一第 77 页。

[39]章伯钧（一八九五——一九六九），安徽桐域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部长。——第 77 页。

[40]国民党统治期间，在南京没有淮河水利工程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在南京设置淮河水利工程总局。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广日，《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指出：“ 为加强统一领导，贯彻治准方针，应加强治淮机构，以现有淮河水利工程总局为基础，成立治淮委员会 ”。治淮委员会设在蚌埠，下分设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治淮指挥部，另设上、中、下游三个工程局。——第 80 页。

[41]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 三八线 ”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 81、83、91、138、152、159、343、356、427、452、491、551 页。

[42]财委，即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第 81、85、111、125 页。

[43]邓子恢（一八九六——一九七二），福建龙岩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 81、107 页。

[44]饶漱石（一九〇三——一九七五），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第 81 页。

[45]指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六日中财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会议根据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形势，研究了财经工作的方针。会议认为，一九五一年则政方针应放在战争的基础上，财政支出以战争需要为第一，维持市场金融物价的稳定为第二，各种经济和文化建设愣在第三位。这在当时称为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第 82 页。

[46]大行政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力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六月，各大区行政委员会撤销。——第 82、93、162 页。

[47]依率计征，即按照法律规定的税率征税。——第 83 页。

[48]剪刀差在工农业产品交换的比价中，工业品价格越来越偏高，农产品价格越来越偏低，两者好像剪刀张开形状，称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状价格差距，简称剪刀差。——第 83 页。

[49]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分别发行币值不同的货币。加上物价不稳，所以预决算和供给标准，均以小米计算。一九四九年开始改用折实计算（即以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实物为单位，按其价格折算为货币支：付的方法），但一般仍保留了用小米计算的习惯。一九五〇年物价稳定以后，逐渐取消小米制，改用人民币计算。——第 84 页。

[50]黄副总理，即黄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字任之，上海川沙人。清末考中学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七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九四〇年底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五年底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

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第 87 页。

[51]前水利学院，指河海工科大学，初名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一九一五年张春创办于南京，隶属全国水利局。一九二四年，河海工科大学并入第四中山大学，一九二八年，第四中山大学改称中央大学，一九四九年，中央大学改称南京大学。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的水利系和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的土木系水利组以及华东水利专补学校的水工专修科合并组成华东水利学院。一九八五年改称河海大学。——第 89 页。

[52]指一九五一年二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讨论划分财政收支系统的问题。会议通过财政部提出的方案，一九五一年度先实行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三级财政体制，一九五二年再建立县一级财政。同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规定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将财政分为中央、大行政区和省（市）三级管理。——第 93 页。

[53]指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至三月六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全国工业会议。会议讨论了一九五一年工业生产、基本建设控制数字和实现这个任务的有关问题。会议决定，对地方工业应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民主改革，在工资问题上，应采取由地区到全国，逐步清理、逐步调整、逐步统一的方针。——第 93 页。

[54]优抚条件，指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公布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仙暂行条例》等。——第 105 页。

[55]荆江分洪工程，为分蓄荆江超额洪水，以确保荆江大堤安全，一九五二年三月经中央批准，四月五日动工修建，六月二十日主体工程完工。分洪区位于荆江南岸，公安县虎渡河以东，安乡河以北，总面积九百二十一平方公里，有效库容五十四忆立米。整个工程项目包括荆江大堤加固、进洪闸、节制闸、拦河土坝、围堤培修以及安全区工程等。——第 107、188 页。

[56]李葆华，一九〇九年生，河北乐亭人。当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第 107 页。

[57]布可夫，苏联水利专家。——第 107 页。

[58]傅作义（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山西临猗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部长。——第 107 页。

[59]程颂云，即程潜（一八八二——一九六八），湖南醴陵人。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 107 页。

[60]建国前后，各项民主改革的进行与国民经济的发展，都亟需大批工作干部。为此，各大行政区都设立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招收青年、学生和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施以短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教育，然后分配到行政区的各条战线去工作。——第 109 页。

[61]黄敬（一九一二——一九五八），浙江绍兴人。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第 109 页。

[62]“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

111、121、144、214、223、353 页。

[63]“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 111、121、144、214、223、353、533 页。

[64]南洋，指东南亚。——第 112 页。

[65]锡兰，即今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第 112 页。

[66]附加税是地方随正税征收的、下列人国家预算的部分。正税指列入国家预算的税收。因家对地方附加的比例有严格的限制。例如，农业税地方附加，一般不得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五，某些获利大的经济作物区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六日政务院公布《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规定“取消一切附加”。——第 115 页。

[67]廖鲁言（一九一三——一九七二），江苏南京人。当时任政务院参事室主任。——第 116 页。

[68]见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92 页）。——第 116 页。

[69]李明灏（一八九七———九八〇），湖南醴陵人。当时任中南行政委员会民政局局长、中南政法委员会委员。——第 117 页。

[70]这里的文委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简称。——第 118 页。

[71]内务部，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一九七〇年六月撤销。——第 119 页。

[72]安部长，即安子文（一九〇九——一九八〇），陕西子洲人。当时任人事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第 119 页。

[73]立三，即李立三（一八九九———九六七），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劳动部部长。——第 119 页。

[74]“五毒”，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些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的五种违法行为。——第 122、144 页。

[75]施复亮（一八九九——一九六〇），浙江金华人。当时任劳动部副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第 124 页。

[76]资方的三权，指资本家的财产权、经营管理权、人事调配权。——第 124 页。

[77]指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六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发布的《政务院关于加强增产粮食和救灾工作的指示》。——第 131 页。

[78]第四办公厅，是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的负责农业、林业、水利的办事机构。——第 132 页。

[79]高岗（一九〇五——一九五四），陕西横山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三年调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积极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五四年被揭露。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第 133、157、175 页。

[80]贾拓夫（一九一二——一九六七），陕西神木人。当时任政务院财

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 133 页。

[81]财经去议，指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四日至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提出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总结了近四年来我国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批评了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在税收、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中的错误。会议期间，高岗利用党批评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共中央纠正了在高岗影响下发生的一部分不正确意见，强调了集中领导和反对分散主义。——第 135、161、271 页。

[82]毛泽东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多次表述过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这里引用的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一九五三年八月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所作的表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准确的表达，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第 136 页。

[83]盛丕华（一八八二——一九六一），浙江宁波人。当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等职。——第 137 页。

[84]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个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 141、157、177、287、295、375、516、525、528 页。

[85]“四马分肥”，是当时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形式的形象的说法，指企业利润按国家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资方的股息红利四部分分配。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股息红利被定息代替。——第 144、167 页。

[86]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当时我国劳动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愿联合组成的集体经济组织。按照集体化程度的不同，分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收益按土地和劳力比例分配；牧言、农具等生产资料入股，也取得合理的代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取消了报酬，归集体所有，牧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作价入社，完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第 144、369、435 页。

[87]见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8—100、150，151、152页）。——第144、146、147、147、148、148、149、153、155、167页。

[88]三大运动，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第144页。

[89]思想改造，指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在我国知识分子中开展伪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这次运动的主要内容是：组织知识分子学习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学习《共同纲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划清敌我界限，建立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观点，——第144页。

[90]第七次代表大会，指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一九四八年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全国工会工作的经验，确定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的工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积极地完成国家经济建设什划，为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第148页。

[91]荣毅仁，一九一六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申新纺织公司管理处总经理、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第155页。

[92]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一语，见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锗误》（《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第157页。

[93]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第157页。

[94]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第二十六条的内容是：“全国人民一致努力，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而奋斗，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ｉ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见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第157页。

[95]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第161页。

[96]张鼎丞（一八九八——一九八一），福建永定人。当时任中共杨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第166页。

[97]民主改革，指全国解放初期，在工矿、码头等企业中，消灭封建势力和废除压迫工人的包工制、工头制、抄身制等民主革命性质的社会改革。——第166、177页。

[98]见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98 页）。原文是：“ 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 ”——第 170 页。

[99]关于军需工厂生产力过别的报告，指一九五四年一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副部长周纯全、张令彬，写给周恩米、彭德怀关于《处理军需工厂剩余生产力的请示》的报告。他们汇报了军需工厂生产力过剩的情况，分析了过剩的原因，并提出了如何处理的建议。建议的一、二、三项主要内容是：走生产之道，把一部分生产力转向为社会服务；集体转建生产部队的服装由军需工厂代为制作；每年均储备少量的产品。——第 175 页。

[100]指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在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残存着大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了迅速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第 177 页。

[101]官厅水库，根治永定河的重点工程，跨河北省怀来和北京市延庆两县。拦河坝、溢洪道及输水道工程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开工，一九五四年五月竣工。总库容二十二点七亿立米，是建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库容大于十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第 188 页。

[102]独流减河入海工程，是为根治大清河水患而修建的水利工程。一九五一年三月开工，一九五三年七月完工。从大清河和子牙河会流处的第六堡起，东穿南运河、律浦铁路，到万家码头与马厂减河相交，新开了一条四十三公里长的河道。如遇大清河洪水，打开进洪闸，洪水将顺着减河宣泄到大港，然后漫流入海。——第 188 页。

[103]章乃器（一八九七——一九七七），浙江青田人。当时任粮食部部长。——第 203 页。

[104]见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8 页）。——第 203 页。

[105]编制委员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立“ 政务院及所属单位机构编制审查委员会 ”，由政务委员章乃器任主任，一九五三年中央一级机关整编开始后不再活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成立 “ 国务院编制审查委员会 ”，以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为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龚子荣兼任秘书长。鉴于调整国家工作人员薪资待遇需要与编制工作结合，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编制审查委员会扩大并改名为国务院编制工资委员会。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六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国务院编制工资委员会改力国务院编制委员会。——第 205、208 页。

[106]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第 205 页。

[107]龚子荣，一九一四年生，福建闽侯（今福州）人。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第 205 页。

[108]一九五〇年苏联援助我国五十个项目；一九五三年五月，苏联援助与改建九十一个项目；一九五四年十月，苏联追加援助十五个项目。共一百

五千六项。——第 206 页。

[109]第一汽车制造厂，又称长春汽车制造厂（在吉林长春），是我国：“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授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五日破土动工，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正式投产。这个厂投资总额为六亿五千万元，生产能力为年产解放牌载重汽车三万辆。——第 212。345 页。

[110]索克，译音。——第 212 页。

[111]薄一波，一九〇八年生，山西定襄人。一九五〇、一九五二年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先后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 214、253、261、578 页。

[112]邵老，即邵力子（一八八三——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 217、337 页。

[113]征购，是当时我国农业税征实和粮食统购的总称。征购余粮是指当时从定产数量中按规定标准扣除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等用粮和实缴公粮后，对剩下的余粮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计算收购数量。——第 219
页。

[114]一九五五年一月中旬，为检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执行情况，陈云赴他的家乡上海青浦小蒸乡调查。——第 219 页。

[115]指陈三于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上作的题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见《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80—292 页。——第 222 页。

[116]指陈云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就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的六点意见：第一，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第二，各个行业内部，必须有或大或小的改组；第三，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第四，应该推广定息的办法；第五，组织专业公司；第六，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第 222 页。

[117]赎买政策，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对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采取有偿办法实行国有化的政策。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采取赎买政策。这种赎买不是国家另付给资本家赎金，而是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中，通过忖给资本家以一定数量的股息、红利的办法，由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生产一部分剩余价值。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前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采取定息制度。——第 223：页。

[118]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资本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定息从一九五六年趄支付，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期间，经过清产核资，参加公私合营的私营工商业者的全部资金约为二十四亿元，国家每年付出的定息为一亿二千万元。——第 226、248、404、页。

[119]见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85 页）。——第 227 页。

[120]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总称。国家通过国家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个政策在一九四九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载人全会决议，一九五三年作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组成部分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布，一九五四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第 227 页。

[121]布尔加宁（一八九五——一九七五），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里引用的布尔加宁的活，是一九五五年七月四日他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作《关于在工业的进一步高涨、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组织的改进方面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的。——第 234 页。

[122]按当时的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未，指一九六六年。——第 235 页。

[123]见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17—718 页）。——第 242、250、251 页。

[124]为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自一九五五年六月起至一九五六年底，在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党政机关、团体，工矿企业、部队和学校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机关肃反或内部肃反；农村、街道和私营企业等方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社会肃反。——第 243 页。

[125]《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共中央根据毛译东的倡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布。一九五七年十月公布修正草案。一九六〇年四月经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作为正式文件烦发。纲要全文共四十条，提出了我国农业、育牧业、林业、渔业、副业以及农村商业、信贷、交通，邮电、广播、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规划。关于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纲要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在黄河、秦岭、自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姻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要达到五百斤；淮何、秦岭、自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八百斤。——第 244、281、304、340、558、576 页。

[126]定股，是指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对原来私营企业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清理、估价，以核定私股股额。——第 248 页。

[127]三大改造，指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的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 253、265、332、338 页。

[128]张玺（一九一二——一九五九），河北平多人。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第 253 页。

[129]王磊，一九一四年生，山东掖县人。当时任商业部副部长。——弟 254 页。

[130]《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写成的。——第 256 页。

[131]引自《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见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第 257 页。

[132]李森科（一八九八——一九七六），苏联农学家。一九三五年起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他在学术界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打击、排斥不同观点的学派，造成了严重后果。一九五二年底开始受到批判，一九五六年去职。——第 258 页。

[133]胡先■（一八九四——一九六八），江西新建人。植物学家。当时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在一九五五年三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学用书《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曾对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作了批判性的介绍。——第 258 页。

[134]指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至三十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第 260、264 页。

[135]指最初草拟的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第 260 页。

[136]富春，即李富春（一九〇〇——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一九五〇年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一丸五四年至一九六六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齿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 261、578、612 页。

[137]吴波，一九〇五年生，安徽泾县人。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第 261 页。

[138]引自李先念《生产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见《率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05—206 页）。当时，有人不同意在报告中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认为这是同一九五五年夏季以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相背离的，会引起思想混乱。周恩来的讲话针对这种认识作了耐心的说明和解释。——第 263 页。

[139]十大关系,指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论述的十个问题：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非关系；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第 265、337、413、525 页。

[140]《十五贯》，是根据清初戏剧家朱素臣的传奇剧本《十五贯》（又称《双熊梦》）改编的昆曲剧目。主要情节是：赌徒娄阿鼠图财杀死屠户尤葫芦，窃去铜钱十五贯，反嫁祸于尤之养女苏成娟及身带十五贯钱的路人熊友兰；无锡知县过于执主观地断定熊、苏二人通奸杀人，将熊、苏判处死刑。苏州知府况钟奉命监斩时发现疑点，连夜去见巡抚周忱，请求缓刑复查。况亲赴现场和民间查访，终于查明了真凶，平反了冤狱。——第 267 页。

[141]指剧中人物江南巡抚周忱。历史上的周忱（一三八一———四五三），明宣德年间以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为官清廉，兴利除弊，曾与况钟一起奏请减免江南重赋。——第 267 页。

[142]指剧中人物苏州知府况钟。历史上的况钟（一三八三——一四四三），明宣德年间任苏州知府。任内抑制豪强，严惩贪官污吏。曾与周忱一起奏请减免江南重赋。——第 267 页。

[143]彭真，一九〇二年生，山西曲沃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第 268 页。

[144]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湖北黄陂人。北洋政府总统。——第 268 页。

[145]李烛尘（一八八——一九六八），湖南永顺人。当时任食品工业部部长。——第 270 页。

[146]罗隆基（一八九八——一九六五），江西安福人。一九五〇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一九五六年任森林工业部部长。——第 270 页。

[147]许德珩（一八九〇——一九九〇），江西九江人。当时任水产部部长。——第 270 页。

[148]高，即高岗，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即饶漱石，原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五三年，他们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这一重大斗争，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第 271 页。

[149]统购统销政策，是我国政府在建国以后陆续实行的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有计划地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在当时有效地保障了城乡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保证了物价的稳定，促进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越来越丰富。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从当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第 271、309 页。

[150]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简称。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这个计划的建议。后来由于经济指导工作上发生严重失误，这个计划建议没有付诸实施。——第 287、292、347、377、467、522、524 页。

[15l]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一第 292、339、383 页。

[152]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了便于各级主管机关对建设项目的计划、设计、施工等工作实行分级管理，按基本建设项目总投资的多少确定一个数额，这个数额称为限额。如一九五四年规定钢铁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一千万元，纺织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五百万元，其他各项轻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三百万元至四百万元。总投资等于或大于限额的称为限额以上项目，小于限额的称为限额以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一般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第 300 页。

[153]一九五六年五月至八月，国务院召开全国体制会议，检查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讨论改进国家行政体制问题，制订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八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三十六次会议，讨论了这个决议（草案），并作了修改。十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

这个决议（草案）修正本。决议（草案）提出：“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首要步骤，是先划分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管理职权，并且对地方的行政管理权予以适当扩大”。——第 314 页。

[154]指《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是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迅速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的指示精神，从一九五六年四月开始，组织六百多名中国科学技术专家，并邀请二十多位苏联专家，经过半年的研究和讨论制订的。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急需的五十六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六百一十六个中心问题，并指出了各门类科学的发展方向。这个规划的实施，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迅速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最后未能制订。——第 318，359 页。

[155]《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是关于组织和管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条例。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第 321 页。

[156]亚非会议，也称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以及网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第 327、343、546 页。

[157]指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至二月六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和一月二十日至二月人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厅局长、税务局长会议。计划会议研究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制订了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考虑需要多，对国家物力、财力的可能条件研究不够，安排上要求过高过急，财政会议着重研究了一九五六年地方预算，健全地方预算管理制度和有关工商业税、农业税的改革等问题。二月六日，周恩来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解决两个会议在计划指标上表现出的冒进倾向，要求把高指标压下来。——第 332 页。

[158]八大，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 335 页。

[159]沙文主义，原指资产阶级反动的本民族至上主义。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产生于法国，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拥护拿破仑一世的侵略扩张政策，主张用暴力建立法兰西帝国而得名。它宣扬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在帝国主义时代，沙文主义成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其他国家和压迫其他民族的思想工具。——第 335、565 页。

[160]邓小平，一九〇四年生，四川广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二年任政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四年仕中共中央秘书长。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六年仟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第 337、516 页。

[161]日内瓦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朝鲜李承晚政府及英、美、法以外的其余十二个侵朝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保大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第 343 页。

[162]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一九四七年八月，巴基斯坦宣布独立，成为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包括东、西巴基斯坦，一九五六年三月，改自治领为共和国，定国名为巴基斯但伊斯兰共和国，由东、西巴基斯但两部分组成。一九七一年三月，东巴基斯但独立，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第 346 页。

[163]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个计划原定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七年实行。从一九六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同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鉴于对国际国内形势和一九六一年开始贯彻调整方针情况的分析，曾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主要是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后来根据国民经济恢复较快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贯彻。调整方针，打下底子，从一九六六年起搞第三个五年计划。这个主张得到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同。——第 347、404、409、483、514、550、563、573、589、596、652 页。

[164]指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第 347 页。

[165]万里长征，指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即中央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与红四方面军会会后，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及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的战略性的大转移。红军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走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苦，击溃敌人的多次围追堵截，长征两万余里，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恨据地。——第 347 页。

[166]指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十二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宣布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主要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第 349 页。

[167]陈郁（一九〇一——一九七四），广东宝安（今深圳市）人。当时任煤炭部部长。——第 350 页。

[168]食品部，即食品工业部。一九四九年十月设立，一九五一年一月撤销。一九五六年五月重设，一九五八年二月再次撤销。——第 351 页。

[169]狄景襄，一九〇八年生，山西原平人。当时任食品工业部副部长。——第 351 页。

[170]晖峻，指晖峻义等，一八八九年生，日本医学博士，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一九五七年六月，日本医学访华代表团成员。——第 357 页。

[171]长桥，指长桥千代，一九〇八年生，日本医学博士，赤十字社产院医员。一九五六年六月，为日本医学访华代表团成员。——第 358 页。

[172]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提出改政体为五族共和。孙中山曾经宣传过这种思想，主张汉，满、蒙、回、藏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通过五大民族平等参与国家政权，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第 368 页。

[173]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认为从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各地的宗族，同源于一个始祖，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它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生活的互相依赖、文化的交流和累世的婚姻关系，逐渐同化、融和为一个“中华大民族”。蒋介石在这里实质上只承认有汉族，否定少数民族的存在，把各少数民族称之为汉族的大小宗支。——第 368 页。

[174]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82—783 页）。——第 374 页。

[175]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接见外贸部各口岸外贸局长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中，提出了外贸工作的十四个政策性问题。本文所谈的十四个问题是在那次讲话的基础上的补充，那次讲话中的有些内容，本文没有重复。如关于和平经济政策这一条，他说，对外贸易一定要建立在和平经济的基础上，对外贸易的基本观念，应该服从于和平经济政策，具体说就是：第一，平等互利；第二，互通有无，第三，其日的就是求得人类繁荣，经济发展。我们用这个政策来反对帝国主义独占市场和商品倾销政策，来反对帝国主义破坏民族经济、使人民贫困的政策。——第 395 页。

[176]指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对外贸易部党组《关于执行对外贸易计划中存在问题的请示报告》时的批语。批语指出：过去两个月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委供应出口商品计划的执行情况，总的来说是不好的，这已严重地影响到对外贸易出口计划的完成和对外合同的执行。为完成一九五九年二月八日中央批准的对外贸易计划，中央认为，在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和统筹安排的原则下，在中央批准的对外贸易计划范围内，对于出口商品，应当安排在先、生产在先、原料和包装物资供应在先、收购在先、安排运输力量在先。——第 397 页。

[177]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在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两个联合声明中正式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关系的准则。以后许多国际文件中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这个提法已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第 399、546 页。

[178]这里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欢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第 403、413、461、517、525、528、564 页。

[179]第四个五年计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

划的简称。五十年代未设想这个计划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实行，实际实行这个计划的时间是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第 404、429、620、625、652 页。

[180]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上，毛泽东作了多次讲话，号召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他说，从古以来，发明家在开始都是年轻人。他还列举了甘罗、吕不韦、贾谊、韩信、李世民、王勃、马克思、列宁、达尔文等一大批古今中外杰出人物。说他们都是在青年时代有所作为的。——第 406 页。

[181]李昌，一九一四年生，湖南永顺人。当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第 406 页。

[182]刘居英，一九一七年生，吉林长春人。当时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党委第一副书记、副院长。——第 406 页。

[183]预科，是为高等学校培养新生的机构，附设在高等学校，也有单独设立的。我国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的学制，设独立的预科，一九一二年的学制，预科属于大学。解放后，有些高等学校曾设立预科，招收初级中学和同等学校的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第 406 页。

[184]关于厂矿办高等学校、寒假招生的问题，周恩来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七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大跃进”中许多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时，作过自我批评。他说：“许多大办、大搞是不切实际的，有些是过早的，而且要求又过急，这就使民力、财力受到损失。政府部门常常乱出许多新点子、新花样。”“我也出过一些点子，比如提倡寒假招考，厂矿办高等学校，于是许多厂矿就办起大学来了，大学生就招多了。”——第 407 页。

[185]一九五八年一月至三月，毛泽东先后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讲到要发展科学教育，大搞技术革命。在一月的南宁会议上，他说：“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到技术革命方面。”在三月的成都会议上，他再次说：“过去我们在建设方面用心大少，主要是搞革命去了。现在革命松了一口气，就要来搞建设，搞技术革命。”——第 407 页。

[186]岸信介（一八九六——一九八七），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六〇年六月任日本内阁首相。——第 410、540 页。

[187]池田，指池田勇人（一八九九———一九六五），当时任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首相。——第 410、541 页。

[188]陈毅（一九〇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市长。一九五四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八年起兼任外交部长。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 411、436、586 页。

[189]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会见以田尻正泰为首的日本民间广播联盟代表团和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记者时，以及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接见新华社记者时，都谴责了以岸信介为首相的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对华政策。——第 411 页。

[190]日本总评是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简称，一九五〇年七月成立。它是日本最大的受日本社会党影响的工会组织。——第 412 页。

[191]日中贸易促进会，一九四九年八月成立，原称日中贸易促进协会，一九五五年一月改力日中贸易会，一九五八年四月改称日中贸易促进会，由二百七十家日本贸易商、制造商、轮船公司、银行、保险公司、运输公司、工业团体等组成。——第 412 页。

[192]国际贸易促进去，即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成立于一九五二年，是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一个民间性组织。其宗旨是：按照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开展对外经贸工作，以增进中国同各国民间经贸界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第 412、646 页。

[193]铃木，指铃木茂三郎（一八九三——一九七〇），当时任日本左派社会党委员长、众议院议员。——第 412 页。

[194]“ 大跃进 ”，是一九五八年轻率发动的一次群众运动。这一年的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的“ 大跃进 ”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 共产风 ”为主要标志的“ 左 ”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到一九六〇年冬，“ 大跃进 ”运动才被停止。——第 413、422、453、498 页。

[195]指一九六〇年七月五日至八月十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加强农业是全党长期的首要任务；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并制定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第 413 页。

[196]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是重、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这是说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要先把农业生产及其需要安排好，然后根据农业所能提供的原料和市场的需要，安排好轻工业的生产，最后根据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决定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避免孤立地发展重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这是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提出的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原则和方法。——一第 414、423、462 页。

[197]明组暗社，指一九六〇年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后，有些地区出现的名义上办互助组实际上办合作社的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做法。由于西藏民主改革刚完成，人们对社会主义改造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因此，这种做法在农牧区引起了部分群众的思想不安，也挫伤了部分中等农牧民的积极性。为此，中共中央于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发出《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步发展的方针，从一九六一年起，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

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彻底，把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巩固下来。——第 414 页。

[198]指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后，农村中出现把小型农业合作社并力大社的热潮，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并于八月定名为人民公社。同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未经试点就迅速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为特点，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一乡一社，构成我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公社内部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贫富拉平，平均分配，无代价上调下属生产队以至社员个人财产，导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瞎指挥和“共产风”的泛滥。一九五八年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人民公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界限，陆续纠正了一些错误，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所存在的平均主义与过分集中的倾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公社原有的一些经营管理制度逐步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被突破。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设立乡政府的规定，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至一九八四年底全国基本完成这项工作。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第 415、435．443、464、486、533、564、578、589、621、628 页。

[199]这里的队指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和生产小队。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决定将原来的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分别改称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第 415 页。

[200]“共产风”，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错误。主要内容是：不承认生产队之间的差别，贫富队位于，在公社范围内实行平均分配；公共积累过多，义务劳动过多；破坏等价交换原则，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某些财产。——第 415 页。

[201]“一个指头”，是当时衡量错误相对成绩的一种形象表述。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错误地批评反冒进时说，成绩与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九与一之比，成绩是九个指头，错误是一个指头。——第 415 页。

[202]指中共中央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指示信指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指示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向社队和社员个人平调的各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和认真执行劳逸结合等，指示信对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局势，起了积极作用。——第 415 页。

[203]这里的生产队即后来改称的生产大队，也简称大队。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生产资料和产品归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度，大队是介于公社和生产队之间的一级管理机构。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在公社的领导下，负责组织和管理本大队的生产和经营。大队一级所有的财产，归全大队范围的集体所有和支配。大队一级经济所占比重一般不大。——第 417、435、469、533、568、578、593、621、628 页。

[204]这里的生产小队即后来改称的生产队。是当时农村人民公社经营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是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在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制经济中占主要比重，是三级所有的基础。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在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其所有的土地、

山林、牲畜、农具、水面等的经营管理有自主权。——第 417、435、446、456、465、514、522、533、568、573、593、624、628、653 页。

[205]一九四〇年十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七八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 421 页。

[206]延安的生产运动，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当时，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扫荡”和国民党政府军的包围封锁，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陕甘宁边区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号召部队和机关开展生产运动，并号召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随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经过这一运动，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而且积累了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第 421 页。

[207]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边和陕北领导革命游击战争，逐步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五年夏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以后，陕甘边和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同年十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此时称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使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陕甘边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一九三六年红军西征甘肃、宁夏，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又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一九三七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共辖二十三个县。——第 422 页。

[208]指一九四五年七月初，黄炎培、褚辅成、冷〇、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六人以个人名义参观访问延安。——第 422 页。

[209]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属安吉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仕。一九四七年三月，率二十五万人的兵力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动突然袭击，实行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为拖住国民党军的战略总预备队胡宗南部，给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举行战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第 422 页，

[210]王熙凤，小说《红楼梦》中的人物，又名凤姐，荣国府的管家。《红楼梦》第六回写到，刘姥姥进荣国府向王熙凤借钱，王熙凤道：“我如今接着管事，这些亲戚们又都不大知道，况且外面看着，虽是烈烈轰轰，不知大有大的难处，说给人也未必信。”——第 422 页。

[211]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根据我国农民群众的生产经验和农业科研成果总结出了农作物的八项增产措施。因其内容是以土、肥，水、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八个字来表示，所以叫八字宪法。——第 424．446、597 页。

[212]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首领。一九一九年，参加德国工人党（次年改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后成为该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保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

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人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苏。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第 425 页。

[213]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38 页）。——第 428 页。

[214]一九六〇年，我国市场供应十分紧张，商品可供量同购买力之间有巨大的差额，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为安定人心，回笼货币，解决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的差额，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各地逐步敞开出售高价糖果、糕点。随后依次实行的高价商品还有：高价饭馆、钟表、名酒、粮食白酒、啤酒、针织品、砂糖、自行车、烟卷等。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从一九六二年七月起，高价商品政策逐步取消。这一政策对当时回笼货币、稳定市场物价、减少市场供应压力，起了重要作用。——第 431、460、466 页。

[215]指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在上海写给李井泉和陈正人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s3 年版，第 580 一 581 页）。信中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半个月内，下苦功夫去农村认真做调查研究工作。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陈正人当时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机械工业部部长，在四川作农村调查。——第 435 页。

[216]一九五八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全国农村普遍地办起了公共食堂。社员不论家庭人口多少和劳动力强弱，公共食堂对他们一律实行吃饭不要钱或口粮供给、半供给。这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共产风”以及给群众在生活上带来的不便，严重影响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一年五六月间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决定停办公共食堂。——第 435 页。

[217]这里的供给制指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在分配方面对社员群众实行的主要是免费供给口粮或伙食的制度。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在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由于实际上生产并没有很大增长，供给部分在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工资部分所占比重很小，不能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所以这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一年五六月间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规定取消供给制。——第 435

页。

[218]《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对农村中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生产队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享受这“五保”的社员户，称为五保户。——第 435 页。

[219]这里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举

行的扩大的国内瓦会议。陈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

后，美国违反日内瓦协议，对老挝进行干涉和侵略，并在一九六〇年挑起老

挞内战。为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中、苏、美、英、法、老挝，柬埔寨、

越南民

主共和国，南越（以上为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参加者）、印度、缅甸、加拿大、波兰和泰国举行了这次会议。会议最后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确认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第 436 页。

[220]许明（一九一九——一九六六），河北沧县人。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第 436 页。

[221]魏征（五八〇——六四三），唐初政治家。唐太宗在位时，任谏

议大夫和秘书监等职。他敢于直言进谏，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第 438 页。

[222]在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过程中，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右倾保守思想”的反面人物，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为在“拔白旗”、“反右倾”等运动中被错误地批判

和处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第 438 页。

[223]工业七十条，即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七十条。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由于许多企业没有实行严格的责任制，不讲究经济核算，工资、奖励制度上存在平均主义，以及党委包揽企业的日常行政事务等，相当普遍地出现了生产秩序混乱，瞎指挥、乱操作，设备损坏严重，经济效果很差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工业七十条草案明确规定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要求建立和健全必妄的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强调计划管理、按劳分配、企业经济效果和职工物质利益等。条例草案还要求对企业实行“立定”，即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对于总结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贯彻执行当时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促进我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 444、497 页。

[224]农村人民公六十条社，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针对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在纠正社、从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又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第 446、456、465、558 页。

[225]工业指示八条，指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针对当时计划指标过高，工业内部及工业与其他部门的比例关系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工业管理部门和工业企业中的浮

夸风、瞎指挥以及企业管理工作混乱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八项规定，主要内容是：一、切实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二、在企业管理中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三、在全面安排的基础上，抓住中心环节，集中力量，解决问题；四、努力增产日用品和农业的生产资料，稳定市场；五、加强经济协作；六、切实整顿企业的管理工作，严格实行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七、坚持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八、加强纪律性。指示对于贯彻执行当时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促进我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 447 页。

[226]为了加强对物资的管理，做好物资供需的平衡，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市场稳定，国家按各种物资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分三类管理，即由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中央各主管部门分配的物资和地方管理的物资。根据商品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国家把商品也分一、二、三类管理。地方管理的物资和第三类商品称三类物资。这类物资品种繁多，生产分散，使用面广，主要是通过市场调节产、供、销之间的关系。——第 451、475 页。

[227]商业条例，指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在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度出现了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倾向，一些必要的商业机构、商业体制和流通渠道被改变和取消，商业工作受到严重削弱，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不良后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草案明确规定了商业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制度。提出了改进商业工作的许多具体措施，主要是：坚持工农业产品的等价交换原则，推广农副产品收购合同制度，改进国营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恢复供销合作社和合作商店，恢复同农村商业有关的农产品加工作坊，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等。一—第 451 页。

[228]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写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正式提出了三十二个字的领导原则。——第 454 页。

[229]“五风，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第 454 页。

[230]“五多”，指毛泽东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在《解决“五多”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第 454 页。

[231]一九六〇年八月间，李富春在讨论研究冶金工业、交通运输、农业和经济计划问题时，集中大家的意见，多次提出应当对经济实行调整、巩固、提高。八月底，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向国务院汇报一九六一年经济计划时，提出了对经济实行调整、巩固、提高的问题。周恩来表示赞成，并且加了“充实”两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党中央肯定和同意了这个方针。为解决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后造成功国民经济严重失调问题，一九六一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从当年起，在两三年内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由于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努力，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到一九六二年底取得了明显成效。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再用两三年时间，继续实行调整方针。到一九六五年，原定的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新面貌。——第 461、499、552 页。

[232]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参见本书注[223]手工业工作条例草案，指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全文共三十五条。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由于手工业盲目过渡到国营工业和公社工业，并改变生产方向，造成大批手工业者改行转业，许多日用小商品减产、停产、供应十分紧张。针对这种情况，草案规定我国手工业应有全民、集体和个体三种所有制，以集体所有制为主；手工业者必须归队：生产经营方式要灵活多样：工资制度应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以及供产销要统筹安排等。——第465页。

[233]指一九六一年六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同年七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中央批准这个草案的批语中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草案就正确理解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的要求，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明确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出成果、出人才），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改进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方法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规定。中央认为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第467页。

[234]指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后三年多高等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针对当时学校教学质量降低，忽视知识分子作用以及劳动过多等主要问题，规定了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力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以及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第467页。

[235]这里指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第481、516页。

[236]三面红旗，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总路线提出后，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在全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

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当时由于党还没有从根本的指导思想上总结经验教训，所以党的文件中都还使用“高举三面红旗”的提法。——第 481、518 页

[237]西楼会议，指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财政、金融、市场以及整个经济形势的问题，认为当时财政经济的困难很严重，估计当年的国家预算有很大的赤字。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眼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会议一致同意陈云讲话的精神，认为在国民经济的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经济，要全党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这次会议对扭转当时财政经济状况的被动局面起了重要作用。——第 483 页。

[238]姚依林，一九一六年生，安徽贵池人。当时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第 485 页。

[239]这里的队指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参见本书注[203]。——第 486 页。

[240]孟子（公元前三七二——公元前二八九），名轲，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是儒家学说的主要继承者。这里的引文见《孟子·告子下》。——第 491 页。

[241]指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一日，煤炭部向各省（市、自治区）煤矿，管理局（厅）及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发出的《关于普遍推行二十二项新技术和新经验的命令》。命令要求各管理局、矿务局、厂、队和一切企业、事业单位，“在接到这一命令之后，应以战斗姿态、迅速、全面地作出详尽的规划和措施”，大力推广“广泛应用强化器（即超生波发生器）”等二十二项新技术和新经验，并保证“限期予以实现”。——第 499 页。

[242]见周后来《论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56 页）。——第 501 页。

[243]十年科学规划，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批准了中央科学小组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个规划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部署了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试验工作，安排了人造卫星的研制计划，确定了农业、工业等方面最新科学技术成果的研究和应用。规划要求，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迅速壮大科学技术队伍，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争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第 503、532 页。

[244]本文中的所有数字均系当时的统计数字。——第 509 页。

[245]邵老，即邵力子，见本书注[112]。一九六三年七月五日下午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小组讨论会上发言，谈到晚婚和计划生育的问题时，建议修改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中的有关字句，他说：报告提出首先在城市提倡晚婚和节育，农村干部看了，可能产生在农村可以慢慢来的感觉，所以建议将报告改为“为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有必要在全国人民中大力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根据他的建议，报告改为：“为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有必要在全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城市和人口密集的农村中，大力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第 510

页。

[246]指侯隽，女，一九四三年生于北京。一九六二年高中毕业后。响应中共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自愿放弃参加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到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窦家桥村插队务农，受到群众称赞。——第 514 页。

[247]邢燕子，女，一九四〇年生，天津宝坻人。一九五八年初中毕业后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带头回乡务农，成为青年学生回乡从事农业生产的一个先进典型，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第 514 页。

[248]指《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的通知》。——第 516、548 页。

[249]指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的有关工业问题的文件，主要有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今年一月份工业生产情况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和中央清仓核资领导小组《关于清仓核资工作的报告》等。——第 516 页。

[250]指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他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第 516 页。

[251]伯达，即陈伯达（一九〇四——一九八九），福建惠安人。一九六三年时仕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文化大革命 ” 期间，任 “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 组长，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一九八一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第 517 页。

[252]以农业为基础，就是要求切实加强农业，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加快农业的发展速度，使之与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相适应；同对要求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不超过农业负担的限度。以工业为主导，就是要求大力发展重工业，生产先进的技术装备，实现对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问的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第 518、525、564 页。

[253]城市工作会议，指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当时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第 521 页。

[254]托拉斯是英文 Trust 的音译。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集中达到很高程度后产生的垄断组织的一种高级形式。它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和与产品经营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而成。在社会主义国家，托拉斯是社会主义企业的组织形式之一。——第 522、547、550、582 页。

[255]指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六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详细说明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绩和缺点，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第 524、529 页。

[256]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由刘少奇召集的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

议，就即将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商讨。会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基本经验教训，总结了十六条。——第 525 页。

[257]指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代表国务院作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由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第 527、531 页。

[258]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之间的过度阶段，这三年的计划叫过渡计划。——第 528、550 页。

[259]指一九六三年七月三日，李富春副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九次会议上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第 529 页。

[260]农业的技术规划，指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至三月底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制定的今后若千年内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规划要求全国农业科技人员广泛调查研究我国的自然资源及其利用情况，研究制定合理利用资源的方案，研究应用传统耕作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大幅度提高农副业生产水平的措施；加强基础农学的理论研究，并运用基础学科和技术学科的最新成就，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第 532 页。

[261]松村，指松村谦三（一八八三——九七一），当时任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众议员。一九五九年以后五次访问中国。中日恢复邦交前，他是日中贸易日方总联系人。一九六二年九月访华时同我国缔结日中综合贸易协定。一九六四年继高畸达之助负责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宜。——第 540 页。

[262]村田省藏（一八七八——一九五七），日本政治家、实业家。一九五四年十月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曾是签订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的日方最高负责人。一九五六年来我国主持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开幕典礼。——第 540 页。

[263]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签订的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中，双方同意在对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各自取得本国政府的同意，给予对方商务代表机构及其所属人员以安全保证和进行工作的方便；在发生法律纠纷时，采用双方所同意的方法处理；商务代表机构有权莅其建筑物悬挂本国国旗等。但是，日本政府针对上述规定声明：日本政府坚持尊重同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关系，无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商务代表机构有权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同时宣布将按日本国内法令规定处理中日贸易协定有关法律纠纷问题。这就表明日本政府在上述几个原则问题上坚持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违反国际惯例，破坏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精神，对中国商务代表机构的安全及工作便利也无意提供保证。由于日本政府设置障碍和破坏，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未能生效。——第 540 页。

[264]高时，指高倚达之助（一八八五一一一九六四），日本自由民主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伪满洲国政府经济顾问、满洲重工业厅开发公司总裁。战后多次当选众议员和参议员，并先后任国务大臣和通商产业大臣。

曾以日本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一九六〇年来华并到鞍钢参观。他积极推进中日两国民间贸易，曾任日中综合贸易联合协会会长，一九六二年同我国廖承志签订发展日中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第541、549页。

[265]石桥，指石桥湛山（一八八四——一九六三），前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首相。一九六三年后多次任日中经济贸易展览协力会会长。一九六四年、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连续当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总裁。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当选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顾问。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三年两次访问中国。一一第541页。

[266]佐藤荣作（一九〇一——一九七五），前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二年七月，三次组阁，出任日本内阁首相。——第541页。

[267]为了探讨缓和中日紧张关系的途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前首相石桥湛山、政界知名人士松村谦三于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相继来华访问，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在同他们会见时多次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三项条件，也称政治三原则，即：日本

政府保证不再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论，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两国民间正常关系的发展。——第542页。

[268]广州的交易会即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渠道之一，由中国各对外贸易公司联合主办。自一九五六年开始，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定期在广州举行。——第542、643页。

[269]高时达之助和廖承志的备忘录，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和日本自由民主党人士、众议院议员高倚达之助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在北京签订的关于发展中日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备忘录记载了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七年五年内，双方就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出口的主要商品、交易合同的签订、各项交易的结算、商品检验和仲裁等各项问题所达到的协议。——第542页。

[270]冈崎嘉平大（一八九七——一九八九），曾任全日本航空公司总经理、日中贸易联络协议会会长。一九六四年高倚达之助去世后，为高猜事务所的负责人。——第542页。

[271]一九六四年四月十日至十五臼在雅加达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上，决定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在非洲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后来由于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使会议一再延期。一九六五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二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国家外长会议上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定期延期。——第546页。

[272]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和平宣言，即《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到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第 546 页。

[273]这次计划会议,指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十月十九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会前，八月二十七日，宅泽东在陈伯达的一封信上批示说：“ 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的计委，另立机构。 ”这次洲戊 1 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集中讨沦了计划工作如何车命化的问题，指出计划工作的主要错误是教条主义、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会议提出了十四项改进措施，井通过了一九六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一一第 549 页。

[274]指在规模上贪大、在部门上求全、自成体系的基本建设的设什思想，一一一第 549 页。

[275]二王鹤寿，一九 0 九年生，河北唐县人。当时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冶金工业部部长。一一一第 549 页。

[276]经过“ 大跃进 ”和关、停、井、转的初步调整后，在各行各业中普遍存在现有生产能力明显高低长短不齐的现象。为此，一九六三年以后继续贯彻“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方针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工业（包括水利）特别是基础工业进行填平补齐工作，伎之成龙配套，以形成综合生产能力。这种填平补齐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企业内部各个生产环节按照设计要求进行填平补齐；二是对行业内部主产品与配套产品的生产按照合理的匹配原则进行填平补齐；三是对工业基地内部骨干企业与“ 配伊企业以及交通运输、原料和燃料供应、职工生活和文教卫生等项设施，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填平补齐，使它们发挥工业基地应有的作用。…一第 550 页。

[277]和战结合，即平战结合，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思想。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初，他多次阐述这一思想，强讽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包括经济建设）。要着眼于战时需要，将二者很好结合起来，诈到有备无患。一一一第 551 贝。

[278]埃德加·斯诺（一九 0 五——一九七二），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一九二八年来中国。一九三六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毛泽东等会见了他。新中国成立后，于一九六 0 年、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 0 年三次到中国访问。一一第 552 页。，

[279]大庆，原名萨尔日，位于黑龙江省西南，属我国东北松辽盆地，滨州铁路通过境内。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这个地区的第三号探井喷油，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而取名大庆。一九六 0 年二月，中央决定在大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经过三年努力，探明了油 m 的地质储量并进行大规模开发，使我国原油产量大幅度增长。大庆是随着油田的开发而兴起的我国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是按照“ 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主产、方便生活 ”的原则建设的新型城市。一一一第 553．585．页。

[280]指我国自己制造的一万二千吨压力的自由锻压设备。当时连我国在内，世界上共有美、英、西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五个国家能制造这种机械，而且一共只生产了二十来台。——第 554 页。

[281]三门峡水利枢江工程，是黄河干流上的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和山西省平陆县的边界河段。一九五七年四月动工修建，一九六〇年建成：由于原设计方案不合理，蓄水运用后出现了严重的泥沙淤积问题。经过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的第一次改建和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的第二次改建，基本解决了泥沙淤积问题。改建后的三门峡工程以防洪为

主，同时兼具防凌、灌溉和发电等综合利用作用。——第 556 页。

[282]一九六〇年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建成蓄水后，发现泥沙淤积严重，威胁上游一些地方及水库本身的安全，为了增加枢纽工程的泄流排沙能力，减轻水库淤积，有关部门提议：在大坝左岸打两条泄流排沙隧洞，把八条发电引水钢管中的四条改成泄流排沙道。这就是后来被批准实施的二洞四管方案。——第 560 页。

[283]从“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起的这一段话，是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的这个报告稿时增写的。见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49 一 850 页）。——第 566 页。

[284]林大夫，即林巧稚（一九〇——一九八三），福建厦门人，妇产科专家。当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 567 页。

[285]傅连障（一八九四—一九六八），福建长汀人。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 567 页。

[286]蒲辅周（一八八八——一九七五），四川梓潼人。当时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 569 页。

[287]一九六四年五月以后，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从备战、备荒的角度考虑经济建设。他在一九六五年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谈话中，谈到了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写给刘少奇的信中，明确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第 572、591 页。

[288]大小三线，指全国和省、市、自治区的战略后方。大三线，指全国的战略后方。小三线指各省、市、自治区的战略后方。一九六四年五月，毛泽东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搞好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的决定。一第 573 页。

[289]徐、淮、宿、阜是江苏省徐州地区、淮阴地区和安徽省宿县地区、阜阳地区的简称。—第 574 页。

[290]指当时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单位。——576 页。

[291]大寨，即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当时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发出过“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第 576、592、621 页。

[292]将田地按一定宽度与长度划分若干块，每一块田地称为畦，在畦与畦之间修路植树造林，组成林网分割的畦田。——第 576 页。

[293]陈永贵（一九一四——一九八六），山西昔阳人。当时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第 577、592 页。

[294]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一九六五年一月，党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这个文件虽然对“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错误地提出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 578 页。

[295]北方农业钡导小组，即中央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一九六六年一月下旬至二月初召开的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上提出成立这一机构。一九六六年三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的通知》。中央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成员共二十四人，周恩来任组长。——第 578 页。

[296]先念，即李先念（一九〇九——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第 578、612、625 页。

[297]震林，即谭震林（一九〇二——一九八三），湖南攸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第 578 页。

[298]秋里，即余秋里，一九一四年生，江西吉安人。一九六六年时任石油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七二年时是中共中央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第 578、591、612、631、633 页。

[299]乎加，即林乎加，一九一六年生，山东长岛人。当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第 578 页。

[300]光伟，即王光伟，一九一四年生，山东沂水人。一九六六年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第 578 页。

[301]这里指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地委分别召开的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省（市、自治区）召开的三级干部会包括省（市、自治区）、地、县三级的干部，四级干部会扩大到公社一级的干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包括地、县、公社三级的干部，四级干部会扩大到生产大队一级的干部。县委、公社党委也可以召开三级或四级干部会。—第 578 页。

[302]前十条，指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决定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时我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价级斗争情况。——第 579 页。

[303]二十三条，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一九六四年底至一九六五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肯定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尽快解脱他们；工作方法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神秘化，也不要靠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实到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志之一。这些规定部分地纠正了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各地运动中的一些过左作法。但是，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第 579 页。

[304]献县减河工程，包括献县枢纽工程和子牙新河、滏阳新河，北排河、滏东排河等主体工程。这项工程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破土动工。一九六七年八月完工。——第 581 页。

[305]“平”，指否认按劳分配原则，搞平均主义，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贪富拉平，平均分配；“调”，指否认等价交换原则，县社两级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平调，是一九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

化运动初期发生的“共产风”的主要内容，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第 584、594 页。

[306]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抗旱防涝，抗灾保畜，争取丰收，为改变我国北方农业的落后面貌而斗争的决定》。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一日，周恩来对这个文件作过四次修改，但后来没有正式下发。——第 585 页。

[307]廖承志（一九〇八———九八三），祖籍广东惠阳，生于日本东京。当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第 586 页。

[308]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林业问题时提出“林业的经营一定要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后来，他的这一思想发展为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实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越采越多，越采越好的林业建设思想。——第 588 页。

[309]四旁，指村旁、宅旁、路旁、水旁。——第 588 页。

[310]从六十年代初起，周恩来针对林业生产中重采伐、轻育林的错误作法多次指出，长此下去，林业生产在几十年后就要出现生产中断的危险，我们将会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历史错误。——第 588 页。

[311]梁老，指梁希（一八八三——一九五八），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林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林业部部长。——第 588 页。

[312]前方，指林区和林业生产第一线；后方，指林业的领导机关。——第 589 页。

[313]北方八省，指长江以北的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以及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第 589 页。

[314]指毛泽东称赞河南省长葛县深翻土地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省长葛县委负责同志作了《土地大翻身，争取高产八百斤》的发言，说截至四月底，全县三十万亩旱秋地都深翻了一遍，深度在一尺五左右，这样可以增产百分之几十以至一、二倍。毛泽东当即称赞了他们的做法，提出：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五年总可以翻一次了吧？——第 591 页。

[315]指各地像山西大寨那样的农业生产先进典型，——第 592、621 页。

[316]焦裕禄（一九二二—一九六四），山东淄博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起仕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为了解除兰考三十六万人民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的痛苦，他不顾自己患癌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中的一百二十个生产队，跋涉五千多里，查清了全县八十二个风口、一千六百个沙丘以及大小河流，带领全县人民战天斗地，治理三害。他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被群众誉为“党的好干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在郑州逝世。一九六六年二月，《人民日报》发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报道和《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全国掀起了向焦裕禄学习的热潮。——第 592 页。

[317]三同，指干部深入农村，和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利调*　绮檠芯亢椭傅脊ぷ鳘！！5　*594 页。

[318]专县，指专区和县。专区是省、自治区派出的专员公署所领导的区域。一九七〇年专区改力地区，作为一级政权机构。一九七八年后。除自治

州外，又改为省、自治区的派出机构。一九八三年试行地、市合并，由市领导县的体制以来，有些地区行政单位撤销。——第 595 页。

[319]人俊，即李人俊，一九一四年生，浙江温州人。当时任建筑工程部部长。——第 597 页。

[320]正人，即陈正人（一九〇七——一九七二），江西遂川人，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农业机械部部长。——第 597 页。

[321]指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发生在宁夏海原六盘山地区的八点五级大地震，震中裂度十二度，死二十多万人。——第 602 页。

[322]指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的地震。震级为六点八级，震中裂度为九度左右。震中在宁晋、隆尧、巨鹿三县交界地带。五个县三十四万人受灾。周恩来于第二天即亲临地震灾区慰问，指导救灾工作，——第 603 页。

[323]李四光（一八八九——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地质学家。一九四八年赴欧洲，随后参加在英国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会议。一九四九年九月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离开英国，经瑞士、意大利辗转回国。同年十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次年五月到北京。一九六六年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第 603 页。

[324]聂总，即聂荣臻（一八九九———九九二），四川江津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第 605 页。

[325]三敢，指敢想、敢说、敢于的精神。——第 605 页。

[326]“抓革命，促生产”，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口号。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同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项规定（草案）》。——第 608 页。

[327]军代表，指“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三结合”领导班子中的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简称军代表。——第 608、641 页。

[328]夺权，指“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造反派组织篡夺各地党政机关领导权的行动。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所谓“一月风暴”。随后，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的领导权相继被篡夺，机关工作陷于瘫痪。——第 608 页。

[329]革命委员会，指“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从一九六七年上海所谓“一月风暴”开始，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了军（当地驻军代表）、干（革命领导干部）、群（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作为各级地方的临时权力机构。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决定取消革命委员会名称，恢复人民政府。一第 609、653 页。

[330]大联合和三结合，指“文化大革命”中各造反派组织按系统实行的大联合和由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干（革命领导干部）、群（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组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第 609 页。

[331]剑英，即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第 612 页。

[332]萧华（一九一六——一九八五），江西兴国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第 612 页。

[333]成武，即杨成武，一九一四年生，福建长汀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第 612 页。

[334]谷牧，一九一四年主，山东荣成人。当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第 612 页。

[335]支左，指在“ 文化大革命 ”中派人民解放军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是“ 三支两军 ”（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一个方面。这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第 612 页。

[336]《六六通令》，指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令》。——第 613 页。

[337]棉花会议，是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全国棉花生产会议，自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六年一月共召开五次，一九六八年二月召开第六次，一九七〇年二月召开第七次。参加第七次会议的有十六个主要产棉省（市和自治区）、六十八个专区、二百六十三个县、四十个先进单位、六个分散产区的代表，还有纺织、加工和收购等方面的代表，共计五百余人。——第 619 页。

[338]见《我国农业生产普遍丰收、样样丰收》一文（载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第 619 页。

[339]阆中县，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嘉陵江中游，县境南北狭而东西广，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海拔最高点八百八十八点八米，最低点三百二十八米，属低山地貌为主和少数丘陵带地形。剑阁县，位于四川北部，西北高，东南低，海拔高程在三百六十八米至一千三百三十米之间，北南高差九百六十二米。——第 619 页。

[340]杨柳雪，位于山东省鲁北平原，原属滨县，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经国务院批准撤滨县，并入滨州市。当时杨柳雪的棉花生产搞得比较好，平均亩产超过一百斤。——第 620 页。

[341]指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四日，国务院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情况的报告》。一九七〇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发了这个报告。——第 623 页。

[342]指棉农按国家政策规定把收获的棉花出售给国家后自下的自用棉可以换购生产或生活必需品。——第 623 页。

[343]曹思玉，一九一一年生，江西信丰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第 625 页。

[344]刘丰，一九一五年生，河南渑池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第 625 页。

[345]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简称。——第 625 页。

[346]登奎，即纪登奎（一九一三——一九八八），山西武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 625 页。

[347]德生，即李德生，一九一六年生，河南光生县李家凹（今属新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第 625 页。

[348]张体学（一九一五——一九七三），河南新县人。原是中共湖北省

委代理第一书记、湖北省省长。当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第 626 页。

[349]林一山，一九一一年生，山东文登人。当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第 626 页。

[350]葛洲坝水利工程，是长江干流上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位于长江三峡出口南津关下游二点三公里的宜昌布境内。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工，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停工修改设计，一九六四年十月复工，一九八一年一月四日大江截流成功，同年六月十五日首次试航成功，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长江葛洲坝水力发电厂建成投产。—第 626 页。

[351]毛泽东看了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后写了以下批示：“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第 626 页。

[352]张医生，即张佐良，一九三二年生，上海人。当时是保健医生。——第 627 页。

[353]当时中央警卫团的部队番号。——第 627 页。

[354]指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通知转发了济南军区政治部一月五日《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 军队要谨慎 ”指示的情况报告》和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批示。报告写有贯彻毛主席指示中主要抓了三破三立，即：“ 破‘ 一贯正确论 ’，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 ”；“ 破‘ 领导高明论 ’，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 ”；“ 破骄傲‘ 有资本论 ’，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 ”。—第 627 页。

[355]指运用按摩法和压迫法等辅助手段助产，减轻产妇分娩时的痛苦。——第 628 页。

[356]赤脚医生，指当时农村中不脱产的初级卫生人员。——第 628 页。

[357]专委会，即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以周恩来为组长，包括七位副总理和七位部长级负责人共十五人组成，专门负责我国国防尖端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第 631 页。

[358]长汽、二汽、重汽、南汽，指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长春）、第二汽车制造厂（在湖北十堰）、重庆汽车分公司和南京汽车制造厂。——第 633 页。[359]文裕，即张文裕，一九一〇年生，福建惠安人。当时任第二机械
工业部四〇一所副所长。——第 634 页。[360]指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一部张文裕等十八位科学工作者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这封信反映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情况；提出了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第 634 页。

[361]郭老，即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第 634 页。[362]西尧，即刘西尧，一九一六年生，湖南长沙人。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组长。——第 634 页。

[363]指物理学家萨拉姆教授，当时是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一九七二年九月五日，周恩来在和他谈话中，强调了自然科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第 634 页。

[364]指一九七二年四月四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一部提出的关于

发展高能物理方向、任务的请示报告。——第 634 页。

[365]朱光亚，一九二四年生，湖北武汉人。当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第 634 页。

[366]第三世界国家，指经济比较落后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说：“亚洲除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第 636、649 页。

[367]林彪（一九〇七———九七一），湖北黄冈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第 638 页。

[368]指“九一三事件”，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第 638 页。

[369]九大，即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在思想上、政治上极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第 638 页。

[370]五小工业，是我国地方小型厂矿的统称。六十年代一般是指小钢铁厂、小煤矿、小电站、小化肥厂、小机械厂，后来又包括小水泥厂等。——第 639 页。

[371]四个一样，是对当时在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做法的概括说法，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第 640 页。

[372]国际货币，指国际市场上国与国之间共同使用的货币。某些与黄金有联系的货币如美元和瑞士法郎等在国际上可以自由兑换其他国家的货币，被公认为国际通用货币。——第 642 页。

[373]乔培新，一九一二年生，内蒙古依克昭盟达拉特旗人。当时任中国银行代董事长。——第 642 页。

[374]严家淦，一九〇五年生，江苏吴县人。一九六三年任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一九六七年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一九七二年连任副总统，辞去行政院院长的兼职。——第 645 页。

[375]自由港，又叫自由口岸，外国货物可免征关税进出，可在此进行装卸、贮藏、买卖、加工和改装，但外国船舶必须遵守有关的卫生和移民等法律规章。自由港的范围，有的仅限于某港口的特定地区，也有的扩大至邻近地区，该地区通称自由区。——第 645 页。

[376]费正清，即约翰·全·费尔班克，一九〇七年生，美国历史学家和中国学专家。一九三〇年来华在当时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研究中国历史，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曾在重庆的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七二年任哈佛大学教授。——第 645 页。

[377]中美联合公报，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由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签署并于二十八日发表的，简称“上海公报”。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

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第 646 页。

[378]基辛格即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一九二三年生，美国前国务卿。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四年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任国务卿。一九七二年二月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积极推动恢复中美两国的正常关系。——第 646 页。

[379]李川，一九二三年生，河北省安国县人。当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第 646 页。

[380]指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和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两次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力的可能，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比例严重失调的教训。——第 650 页。

后记

《周恩来经济文选》，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在编辑工作中得到李琦的指导，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力平、高勇、刘武生、赵春生、曹应旺、李静、陈扬勇。杨增和、梁翔踪曾经参加过编辑工作。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李岚清、钱正英、朱光亚、怀国模、张作文、钟子云、乔培新、曾宪新、吴正裕、吴瑞章、陈浩等同志，阅读过部分书稿并提出过宝贵意见，谨致谢意。